

20世纪 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

上册

A Chronicle of Historiography in 20th Century China

王学典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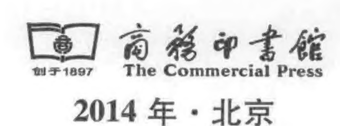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山东大学985工程二期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团队项目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1950～2000)
上册

王学典 主编
郭震旦 编撰



2014年·北京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言

呈现在学界面前的这部书稿，动议于2002年春，着手于2005年9月，操作过程迄今已历十数年。这样一项工作竟耗去如此久的光阴，实在出乎当年的想象之外。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以为两年、顶多三年即可结束此项工作。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感觉前50年的中国史学，基本上已有定评，尘埃落定，而后50年的中国史学，则是笔者的专攻所在，许多东西虽然是非未定，但文献相对比较熟悉。鉴于上述两端，所以就产生了一种能尽快结束战斗的乐观预期。

谁知工作一旦展开，困难即接踵而至，小到一系列细节的考订，大到一部著作学术史意义的估定，无不颇费周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可以说是对我们十多年来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操作编年，当然首先要求对史学文献和史学事件做出时间上的定位，而不少文献事实上已很难查找，有的甚至已渺无踪影，也有太多的史学事件被辗转误传。对这些非常模糊乃至以讹传讹的文献或者事件的精确化考订，耗费了我们巨量的心血，乃至让我们苦不堪言。例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一部划时代名著的初版时间，就存在着多种说法，其中，《郭沫若年谱》的说法是1930年3月20日，我们遍检文献，根据其最早版本确定是在1930年1月20日。再如，李泽厚关于20世纪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论断广为流传，但这一论断究竟出在何处，众人均语焉不详。我们查阅了大量书刊，最后才发现这一说法最早出自1994年6月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刊登的一封不起眼的李泽厚致编辑部的信中。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之所以会面对如此多的困难，原因在于，这项工作基本上是前无所承，几乎是白手起家，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从基础做起，任何一个环节都不敢懈怠，因为这是一部工具书、资料书，“准确无误”自然是基本要求。我们不能为追求进度而牺牲准确

性,而是需要一种蚂蚁搬家般的耐心和毅力。这样,工作就只好年复一年的推延下来,十余年的光阴就这样消耗在一条条材料的考订、整理、斟酌中。其间,编撰团队大小会议开了数十次,逐字逐句通稿不下五次,许多条目不知修改推敲了多少遍,仍不令人满意。其中之艰苦,实难与外人道也。中间有几次甚至想中止这项工作。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我们用十余年的时间坚持做完这部史学编年呢?

笔者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喜读学者年谱和历史编年,以为它们比传记和普通的历史叙述更有趣、更全面,甚至更有意义。年谱和编年的最大价值在于能容纳空间的存在。而普通历史写作的一大问题,是历史叙述的强大内在逻辑,迫使叙述者把空间时间化了,牺牲了空间的共存性,成就了时间的一维性。历史的本质是变迁,变迁的参照是所谓时间,而时间的本质则是事物或现象的先后次序,所以历史写作就只好迁就时间的要求。花开数朵,但只能一枝接着一枝表,无法在语言上同时呈现,这样就出现了先后问题。历史写作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历史叙述几乎都牺牲了空间的存在。在笔者看来,唯有年谱、编年、年表等体裁,可以静态地同时兼顾时间与空间,可以呈现同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多样化甚至是多元化的事实存在,——至少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事实的存在。尤其是,20 世纪的历史学是过渡形态的历史学,过渡形态的历史学复杂多变,可谓新旧参半,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编年这种体裁恰好可以同时容纳这些不同的事实。

推动我们用十数年的力量做编年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20 世纪中国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史而言,"20 世纪"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纪,不是 3 世纪、5 世纪,也不是 17、18 世纪,它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从世纪之初梁启超《新史学》对以往中国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全面清算开始,中国现代史学从无到有,全面铺开,不断深入,曲折推进。也正是从此开始,以往的史学全部被归并到"传统史学"的范畴,而此后的史学则全部被纳入到"现代史学"概念之中。不管此后的历史延伸多久,——不管延伸 30 世纪还是 40 世纪,人们都会把 20 世纪的历史学作为自身的起点,而把此前的历史学当作自己的"史前史",或仅仅当作史料使用。从形式到内容,从思想到观念,从语言到体裁,从侧重叙事到专题研究,"传统史学"和"现代史学",已无法放置在同一个范型内予以考虑了。相对于以往的历史学,"中国现代史学"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是一次新的日出。所以,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学就具有特殊的分水岭的意义,而研究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学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在我们看来,紧跟 20 世纪的脚步,撰写一部翔实的编年,无疑是推进 20 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如同前面所说,这部编年从发凡起例,到条目甄择,从材料收集,到细节核实,几乎均前无所凭。开山辟莽,前驱先路,是撰作这部编年给我们的最大感受。万事开头难!实际上,最难的,还不是"开头"本身,而是如何坚持"客观性"这一治史原则。为了这一原则,我们不知付出了多少精力。对前50年的历史学界来说,这一原则坚持起来问题不大,甚至对后50年的"前17年"来说,问题也不算太大,最难斟酌的是"文革"后的20多年,其中,世纪末的最后10年尤甚。其故在于:第一,这10年论著之多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遍览不易,究竟选择哪些论著入编,确难把握;第二,离当下太近,没经过时间的淘洗和沉淀,许多论著的价值是无法即时作出判断的;第三,作者与此一时期的许多研究者均为同辈人,这更增添了格外的难度。为了克服上述困难,我们已尽最大努力:尽最大努力去收集资料、考订史实和细节;尽最大努力克服"偏见"和局限,追求"客观"和全面,尤其是关注易被忽略和被掩盖的东西。其中,最为我们所倾力的,是那些具有创始、开拓、突破和有标志性意义的论著。"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毕竟是我们编撰这部编年的基本宗旨。

主观上的追求是一回事,但客观上能或已做到什么程度,则有待学界的检阅和时间的审查。令撰者感到欣慰的是,读过本部编年初稿的学者们均给予这项工作以较高评价。出于审慎和郑重,我们于2012年将编年稿本送呈12位学者审读,这12位学者来自不同研究领域,既有世界史又有中国史,既有史学理论,又有具体学科,既有专门史,又有断代史,而且这12位学者多是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我们恳请这12位专家既审读与各自专业相关部分,又通审全部稿本,而审读的重点在于:有无重大遗漏?评估是否准确?体例完善与否?最后这12位专家均就和自己的专长相关部分和全部编年,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态度之认真令人感动。之后,我们的编年团队又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来研究落实专家们提出的修改增删意见,最后才形成现在的面貌。所以,本书不折不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笔者在这里感谢这些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专家。这些专家在提出建议和看法的同时,顺便也表达了对整部编年的鼓励和赞赏,认为"有功学林","厥功甚伟","学术意义重大",还认为编年"不仅具有文献学的价值,更具有学术史尤其是学术史入门与导读的作用",甚至预言本部编年"将是年轻一代学子们的必读书",等等,等等。我们深知,这只是专家们对我们这些劳作者的慰劳之语而已,但我们也深为这批最早读者的积极反响所鼓舞!

事实上,来自学界的鼓励之声,并不始自这12位专家,这项工作从一着手,我们便得到了朋友们的鼓励。笔者从这些鼓励声中得出一个结论:当"新史学"走过一个多世纪的行程之后,无论是史学史研究的从业人员还是

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对"历史学回顾"或"世纪盘点"抱有极大兴趣和渴望,而一部翔实的20世纪史学编年,将会给这种"回顾"和"盘点"的进行提供基本的凭借。这大概就是朋友们对这部编年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我们由此找到了支撑我们这项工作的意义,我们所付出的心血也将因此获得足够补偿。当下的中国史学界(确实)需要这样一部世纪编年!而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者又何尝不需要自己的专业编年?我们感到,至少以下三类编年需尽早着手:一是断代史编年,如先秦史研究编年,秦汉史研究编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编年,隋唐史研究编年,宋辽金元史研究编年,明清史研究编年等;二是专门史编年,如考古研究编年,经济史研究编年,思想史研究编年,文化史研究编年,经学史研究编年,政治史研究编年等;三是专题编年,如孔子研究编年,《论语》研究编年,《史记》研究编年,《汉书》研究编年,甲骨文研究编年,乃至儒学史研究编年,道教史研究编年,佛教史研究编年等等。相信这些编年不仅具有学术史回顾的价值,更具有指引当下相关研究方向的作用。历史研究者不仅要指导社会,他自己也同样需要自己历史的指引。而只有当这些编年出现之后,一部翔实丰满的20世纪史学编年才可以预期。至于我们这部编年稿本,表面上是得风气之先,实质上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由于20世纪中国史学文献卷帙浩繁,如恒河沙数,此书篇幅虽巨,仍难以均衡地照顾历史学科内部的方方面面,舛误之处想必所在多有。限于学力及识见,难免会漏收少量具有一定学术史价值的作品,留下遗珠之憾;同时,也可能会有不该收录而予收录的现象发生,给人以鱼目混珠之感。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我们最感惶恐的。另外,书中对于若干作品和史事的评价判断也不无可议之处。这里补充说明一点,本部编年从编纂构想到体例制订,从框架设计到具体作品的评价口径,特别是对那些敏感时段敏感作品的把握和去取,均是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由笔者来进行和决断的。因此,本书若有这方面的问题,应由笔者来负责,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诚恳期待着来自学界和读者的批评。

王学典

凡例

一、本书以20世纪中国史学史事和重要论著为主,凡与史学变化发展有关之文化、政治、社会等重大事件也酌予辑录。

二、本书所指“史学”,乃一外延较广之称谓,与今日通行的“史学”概念存在出入,而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学”重合,大体囊括文、史、哲诸领域,文学和哲学方面主要侧重于重大的哲学史和文学史研究活动。盖因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渡状态,在西方学科体系的影响下,旧有的史学形态面临改造和重组,其学术定位和学科特征还相对模糊,及至20世纪后半期,现代中国史学才基本成型,与今人心目中的“史学”相吻合。

三、本书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力图全面、细致地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概貌。本书取材力求广博,基本涵盖百年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展现其整体学术面目,同时也有所倾斜和侧重,凸显史学演进的趋势和主流,尤其关注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重要成就。

四、本书文献与记事并重,前50年侧重文献,后50年突出记事,大体包括下列内容:

1. 与史学有关的国内国际政治、思想、文化大事;

2. 重要史学主张和史学思想的提出、重要史学论争与事件、史学理论的建构、历史文献的发现与整理、重要考古活动、史学社群的活动、中外史学交流、历史教育等;

3. 史家生平经历、学术交游及行止;

4. 史学及与史学相关报刊之动向;

5. 刊行的主要著作(包括译著)、文集及报告;

6. 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或社会影响的论文;

7. 波及全局的学术思想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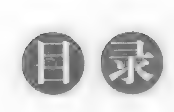
五、本书力图在体例上作若干探索，以年代和时间为主线，同时吸收整合学案体和纪传体的优长之处，尝试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学案、专题研究诸体冶为一炉。

六、本书纪时，采用公历，个别地方注明旧历或民国年号。本书正文按年、月、日次序编排。凡无日可考者系月，标明月份或称“是月”；无月可考者系年，标明“是年”。

七、本书各条目，一般包括标题和内容两部分，标题均以黑体标示，内容为对标题的进一步介绍和说明。基于对问题重要性的判断，有的条目仅有标题而未作内容上的说明。

八、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港台史学，暂未网罗。

九、本书以原始资料为主，同时参考利用了相关研究成果，囿于篇幅和体例，恕未能一一详注。



1950 年

※ 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展开。
※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 2、3 卷出版。
※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成立。
※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出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开始编辑出版。

1 月

30 日　陈垣在辅仁大学新校刊《新辅仁》创刊号发表《发刊词》。

《发刊词》说："现在的辅仁，已今非昔比，当我们看见新的辅仁，无论是先生，无论是同学，是校务的进行，是工作的推动，是政治理论的学习，是日常生活的态度，是学术趋向，是思想方法，渐渐在改变，渐渐在进步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欣慰和兴奋。"

31 日　《文物参考资料》创刊。

初时为内部刊物，1951 年改为公开发行，不定期出版。1953 年改为月刊。1959 年改名《文物》。1966 年 5 月停刊，1972 年 1 月复刊。

该刊是中国文物考古界和历史学界权威学术性、资料性刊物。

是月　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分《长短句》、《云谣集》和《乐府》3 卷，于 1940 年完成。所收 162 首（内 7 首残）曲子词，均著录自敦煌所出 32 种钞卷。

本书是敦煌曲子词研究的较早成果，是当时海内外收录最完备的敦煌曲子词集。

华岗《目前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任务》由海燕书店出版。

该文是作者 1949 年 9 月 18 日在青岛文化教育界座谈会上的讲演提纲，表现出对新政权建立之后文化建设的自觉。文章介绍了中国新民主文化的基本内容及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规律，重点论述了当前新

文化运动的总方向与总任务，并对知识分子改造提出要求。

2月

25日　范文澜在《中国青年》第33期发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第34期连载。文章认为，农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对生产的可怕的破坏、工业生产力发展的迟缓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

该文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论文，开启了绵延数十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大讨论的序幕。这一讨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学界历时最长、参加人数最多、所获学术成果最为丰富的学术论战之一。

该文还刊登在本年4月出版的《新华月报》第1卷第6期上。本年6月，又列入"大众历史丛刊"，由大众书店出版单行本。

是月　蔡尚思《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由棠棣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的学术思想代表作之一。20世纪40年代，针对当时朝野一片尊孔浪潮，蔡氏发表了一系列猛烈批判孔教及其现代传人的文章，该书即是这些文章的结集。书中对孔子进行猛烈挞伐，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几乎就是封建思想，封建思想几乎就是儒家思想，儒家的祖师是孔子"，因此要对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最后的"总攻。作者把儒家思想分为周汉儒学创立、宋明理学演变、清民西化挣扎三个阶段，并对其逐一进行批判，从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哲学及教育等各方面对儒家思想进行"总清算"。

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指导批判传统思想，是本书的最大特色。作者把阶级斗争观点贯穿到儒家思想批判当中，"不仅从考据方面挖掘孔学和儒家思想的真面目，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它为统治者剥削者服务的本质和社会作用"。作者对孔学作了"为少数恶人师表，集片面谬说大成"的"总判决"，并对宋明理学和清季民初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人的学说进行抨击。

该书对传统封建思想的系统分析和批判，恰好配合了50年代政治和经济上的反封建斗争，因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一个月后再版，至1952年印至第8版。

1952年2月，作者又在棠棣出版社出版《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补编》。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由耕耘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作者所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奴隶制及初期封建制》二书的合订增订本。

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

3 月

10 日　侯外庐任西北大学校长。

11 日　艾思奇在《文汇报》发表《历史唯物论与唯心论问题》。

13 日连载。

19 日　郭宝钧在《光明日报》发表《记殷周殉人之史实》。

文章结合安阳殷墟墓葬发掘，揭示了殷代集体殉葬之史实，但对于"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隶，是否皆从事生产之奴隶"，"未敢进一步推断"。

21 日　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拉开 1949 年后古史分期大讨论序幕。

该文对郭宝钧《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进行批评，认为此文"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握"，"虽然抱着一大堆奴隶社会的材料，却不敢下出奴隶社会的判断"。针对殷周墓葬所殉之人，作者指出，"这些人毫无人身自由，甚至连保全首领的自由都没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少数近亲者之外，必然是一大群奴隶"，"这一段史实，正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西周封建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占多数，因此郭论一出，立即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1952 年，郭沫若出版《奴隶制时代》，放弃此前把奴隶社会下限划在秦朝灭亡的观点，将奴隶制下限重新断定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公元前 475 年，对战国封建说的依据进行了系统论述。此书的出版推动古史分期讨论成为一场大规模的学术论战，并形成了"战国封建说"、"东汉封建说"、"春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等诸种论断，其中尤以"战国封建说"、"西周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影响最大。毛泽东赞同郭沫若的主张，"战国封建论"遂定于一尊，在学界最为流行，大中小学教材均采此说。这场论辩一直持续到 60 年代初，"文革"结束后到 80 年代中期，这一问题又成为学术界讨论热点。

古史分期讨论是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论题之一，与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

成问题等讨论并称为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

是月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由中外出版社出版。

该书写作于1945至1948年，行文深入严谨，信而有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研究明代政治的重要参考书。作者从各个角度详细介绍和评述了明代的特务统治，并将朱明王朝的覆亡归结为特务统治，以此影射蒋介石政府。书中内容曾刊登在《新华日报》、《文汇报》、《中华论坛》等报刊上。

丁氏为文学家，因而该书文笔优美，没有一般史书沉闷枯燥之感，在读者中广为流行，一度成为普通读者了解明史的首选之作。

4月

12日　中国科学院发掘队开始对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

这是1949年后首次对安阳殷墟进行发掘，由郭宝钧主持，在侯家庄西北冈发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发掘持续到本年6月10日。

23日　徐特立在《新建设》第2卷第5期上发表《关于学习及写社会发展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该文论述了为什么要学习历史、怎样写社会发展史以及运用唯物史观写社会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是月　敦煌艺术研究所改为敦煌文物研究所。

艾思奇在《学习》第2卷第1期发表《学习——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

文章提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努力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用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律知识来克服经验主义的盲目性。

艾思奇《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该书经修改后曾在广播电台播讲，1951年3月改名《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由三联书店出版。

华岗《苏联外交史》由海燕书店出版。

郑天挺辞北京大学秘书长职，续任史学系主任及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

5月

15日　《科学通报》创刊。

该杂志是中科院编译局主办的综合性月刊，主要介绍院内外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工作概况、国际重要学术动态、国内外科学的发现与发明、学术论著的评价等内容，特别注重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专业期刊较少，该刊也发表了大量史学文章。

19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24 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并颁行《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和《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

是月　董家遵《中国收继婚之史的研究》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

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作者对我国各族历代收继婚历史进行了研究。初稿成于 1940 年，由作者此前研究贞节观念起源和变迁的两篇论文——《从汉到宋寡妇再嫁习俗考》和《我国收继婚的沿革》合并扩充而成。

侯外庐《汉代社会史绪论》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出版。

该书是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代表作，是作者在其所撰《汉代社会新论》的基础上写成的。作者以汉代社会与汉代思想为中心，论述了汉代生产手段的社会性质及其特点、汉代劳动力的社会性质，认为汉代社会的生产方法是领主土地所有的生产手段与农奴的劳动力二者之结合关系。这一特殊的结合关系支配着封建社会的性质。书中论述了汉代社会史诸特征，以及汉代士大夫与汉代思想的总倾向，并勾画了汉代思想的演进路径。

该书主秦汉封建说，书中明确提出，中国封建制萌芽于商鞅变法，形成了秦的统一，而集其大成者为汉武帝的“法度”。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 2、3 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两卷书稿共 80 万字，对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史发展流变进行了梳理。作者力避学术界以正统儒学代表人物为主线书写哲学史、学术史之窠臼，着力突出一批历来不被重视的“异端”思想家，如王充、王符、仲长统、范缜等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尤其重视从思想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来梳理两大思想体系斗争的发展脉络，对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进行了深入挖掘。书中从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专制统治的大背景考察秦汉以降儒家的正统思想，并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作者

尤其重视对意识形态与封建政治经济之间关系的探究，并提出以全面涉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各阶级地位的法典作为判断社会性质标志的理论，又以汉初萧何定律、韩信申军法、张苍制章程、叔孙通定朝仪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确立的具体标志，提出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中的秦汉之际封建说。

1955年，侯外庐主持《中国思想通史》的修订和增补工作。第1卷内容基本如旧，只将周代奴隶制形成说稍加提前，改为"殷末周初"，第2卷和第3卷分别增写了"汉代白虎观宗教会议与神学思想"和"佛学与魏晋玄学的合流"两章。修订版《中国思想通史》于1957年出版。新版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强化了对思想家思想基本倾向的阐述，凸显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区别及其相互对立，高度评价了无神论思想和异端思想的历史作用，对作为对立面的正统神学思想进行了更猛烈地批判。

6月

1日 首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

到会者包括各大行政区教育部及全国各主要院校负责人，历史学界有陈垣、汤用彤、嵇文甫、杨东莼等人参加。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郭沫若、黄克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马寅初，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奚若等出席会议。教育部长马叙伦要求高等教育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的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有高等教育的内容，准备和开始为工农开门，并使高等教育随着国家建设的逐步走上轨道，逐步走向计划化。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等草案，呈请政务院批准。

5日 陈垣在高等教育会议"理论与实际一致"专题讨论中检讨自己"为学术而学术"的问题。

语云："我一辈子所研究的，都是狭小的题目，与冷僻的题目，凡是有人研究的，我就不研究；我本来研究的，既有人研究，我也不研究。因此从没有在书报上，与人有过论战等事，很像与世无争的。我是研究历史的，但上古史一段，我没有研究；近代史一段，我也没有研究。我所研究的，就是从周秦到清初而止；我所研究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有兴趣的，与社会实际无关，谈不到大众化，更谈不到为人民服务。"

6日 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不要四面出击》讲话。

讲话说："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其后，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接受新思想教育。

20 日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

该所是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基础上建立的，范文澜任所长。从 1954 年起，改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23 日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号召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是月　雷海宗在《社会科学》第 2 期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

该文探讨古书中所载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的变迁，并对未来华北的气候状况和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本文显示了作者"有意识追赶时代步伐的某种姿态和努力"。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书稿原名《清代捐纳制度之研究》，本为 1947 年 6 月燕京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毕业时提交的论文，其时作者未满 25 岁。该书出版后广受推许，一直是海内外研究明清中国政治史和社会史的重要参考文献。东京大学教授坂野正高在其名著《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中称赞该书是"犀利的制度史"，认为其有关清代捐纳制度影响的论述十分精彩。

许书在清代捐纳制度研究上具有开创之功。前言有云："捐纳为清代秕政。吾人欲究其原委，考之官书，既乏有系统之记载，求之私人著述，又复为数不多，即询之当日躬与铨政者，亦皆语焉不详，视为书办之学问，不屑齿及。《清史稿·选举志》中虽有叙述，唯以材料不足，遗漏滋多。"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以吴泽所著《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为主要批评对象，从文字释读、史料考证、史实推证等方面批评了古史研究尤其是殷商史研究中易犯的错误，重点对时人误引误用甲骨文的现象进行纠正，被视为 1949 年后第一部讨论学术规范问题的专著。

张舜徽在《中国历史要籍》中特别推荐该书，认为"此书虽是小册子，着墨不多，但对研究古史应注意的问题，以及近人治甲骨学的弊病，都简括地指出来了，识议甚通"。

7月

6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

23日　陈垣致函丁树声谈学习马列。

内云："语曰：'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孔孟，古圣；马列，今圣也。生今之世，宜先读马列主义之书，然后以马列主义衡量古籍，庶几不迷于方向。"

27日　周谷城在《文汇报》发表《中国奴隶社会论》，提出东汉封建说。

该文从世界史角度来研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为古代埃及、亚述、波斯、印度、罗马诸帝国都处于奴隶制全盛时代，秦汉帝国与这些帝国处同一系列，其社会性质当然也应是奴隶制。奴隶主分贵族奴隶主和工商奴隶主两大类型，后者的出现是奴隶社会成熟的标志。秦汉几乎完全为工商奴隶主支配，当时社会用奴之风兴盛。

是月　贾兰坡《中国猿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

该书凡八章，对古猿演变到人的过程、中国猿人产地之发现及其发掘过程、周口店化石堆积之地质情况、中国猿人文化层及其生活状况、中国猿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论述。

裴文中为该书作序。本年12月再版。

文化部文物局派出裴文中任团长的雁北文物勘察团。

勘察团分考古、古建两组，调查了雁北地区古文物和古建筑。调查团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古建、考古专家组成。

8月

1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

所长由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梁思永、夏鼐任副所长。

该所是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部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本年5月开始筹建，是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成立的第一批研究所之一。

11日　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

文章指出："从前所谓业务，只限于本门功课，和本课有关系的课目，

往往注意不够。如教国文的不了解科学常识，讲中国史不了解外国史，讲外国史不了解中国史等，都应该加以改正。”

15 日　华东戏曲改革工作干部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讨论了历史人物的处理问题。

29 日　毛泽东致陈寄生信，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信中说：“先生所从事的学术，因我未曾研究，不能赞一词；唯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

陈寄生，湖南溆浦人，长期担任中学教师，曾经研究过少数民族的历史。

是月　汪敏之《美国侵华小史》由三联书店出版。

顾颉刚被上海市政府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9 月

文化部文物局组织裴文中任团长的东北考古发掘团，发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十九座。

李亚农《殷契摭佚续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编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对所收甲骨文字进行了考释，内容曾经夏鼐、胡厚宣校阅。书中共收甲骨拓片 349 片，多为精品。

10 月

1 日　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一年以来》。

文章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一年来全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性转变和巨大进步”，云：“一年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培植教育下，一向以‘为学术而学术’来标榜的我，已经开始了我的新生。”

8 日　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新理学”底自我检讨》。

作者虽对其哲学思想不合于辩证唯物论之处进行了检讨，但根本目的在于自我表白。文章说，自从 1933 年起，自己就一直相信马恩的历史唯物论是正确的，一直到 1949 年前都相信自己可以在历史研究方面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帮助其解决了中西文化问题，《新理学》受了历史唯物论的影响。在解放以前，其本已不喜欢“唯心论”这个名词，也不承认其哲

学思想是“唯心论”。其并不主张复古开倒车，也不相信不经革命的流血斗争即可使新社会来临。在过去有个时候，其对于新哲学有相当的爱好，几乎要被吸引到革命这边来。

文章辩称，《新理学》是有它的进步性的，不相信一个完全没有进步性的东西，会在某一时能有相当的流行。“新理学”反对当时的实验主义不可知论，反对当时直觉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它试图从唯物史观的观点，解决中国文化问题，它的民族主义的色彩在对日抗战时期，在某方面相当地起了鼓动的作用。

其后，作者又写了《从“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说到新旧哲学底区别》、《新理学原形》、《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问题——答谢关锋同志》等文章，对自己的哲学体系、哲学思想不断进行否定。

11日　文化部文物局召开各大行政区文物处长会议。

12日　教育部明令接办辅仁大学，并提请任命陈垣为校长。

25日　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聘任名单获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

近代史组专门委员有：白寿彝、田家英、吴玉章、胡乔木、范文澜、徐特立、华岗、叶蠖生、翦伯赞、刘大年。

历史考古组专门委员有：尹达、向达、杜国庠、吴晗、李亚农、吕振羽、金岳霖、侯外庐、梁思永、夏鼐、徐炳昶、马衡、陈寅恪、陈垣、汤用彤、裴文中、冯友兰、翦伯赞、郑振铎、邓之诚。

专门委员为名誉职务，为学术顾问性质，并以学科分为若干组，参与研讨与科研有关的重要问题。

是月　范文澜在《新建设》第3卷第1期发表《金田起义一百周年纪念》。

文章对太平天国运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空前重大意义的。它不同于秦汉以后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因为它破天荒提出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纲领。它又不同于后来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因为它敢于发动广大农民参加战争，而资产阶级则不敢唤起民众。太平天国革命如果得到成功，资本主义将在中国顺利地发展起来，比之六十年后的辛亥革命，成就要大得多。因为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不曾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

该文的看法对后来的太平天国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商鸿逵由中法大学转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琉璃阁等地进行考古发掘。

这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由夏鼐任发掘工作团团长。这次发掘中，成功剔剥一座大型的战国车马坑，被国际考古学界誉为战后田野考古方法一项新的进步。

《辉县发掘报告》1956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1 月

翦伯赞在《新建设》第 3 卷第 2 期发表《怎样研究中国历史》。

作者认为，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问题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关键。史学家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历史问题，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历史学总是贯彻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敌对观点的斗争。

文章否定堆积史料的研究方法，特别强调要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历史，认为中国过去的史学家，放着中国史上的许多震撼全国及震撼世界的历史大事变不闻不问，专门从中国史上挑选一些最偏僻、最微细，亦即最不关重要、最不能特征历史倾向的一些问题，把这些问题孤立起来，好像一个历史家的任务就在于吹嘘和玩弄这些愈小愈好的个别问题，就在于退避历史上的重要问题或关键性问题，就在于拒绝对历史的全面研究。

同期还刊登了徐特立撰写的《历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翦伯赞在《学习》第 3 卷第 4 期发表《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

该文主要目的在于注疏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所持观点。1950 年秋，范文澜建议翦伯赞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之古代部分写几篇注释性文章，以宣传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观点，翦接受了范这一建议，写了该文以及《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翦文认为，封建统治阶级没有也不可能把剥削所得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巩固他们的阶级支配和加强他们的阶级剥削，而农民被迫交出他们生产物的十分之七八乃至全部，甚至要交出他们的妻室儿女乃至自己的身体，更没有力量来改进生产，这就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增进速度的迟缓，决定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内占主要的地位。土地之被封建统治阶级瓜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强烈的封建剥削制度和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缓的最主要原因。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由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出版。

该书是作者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时完成，开创了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治史新途径。全书对元稹与白居易的主要作品进行了精推细考，对唐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等都提出创见，为陈氏

晚年代表性作品，广受学界推崇。

陈氏学生胡守为在《陈寅恪的史学成就与治史方法》中认为，倡导诗文证史是陈寅恪对史学方法的一大贡献，《元白诗笺证稿》是陈氏学术上新的里程碑，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也有论者诟病此书考证过于琐碎。钱钟书曾对作者在书中花费大量笔墨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否是处女提出过批评。1978 年，钱钟书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会上的报告中说："譬如 1949 年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

荣孟源《历史资料与历史人物》由大众书店印行。

该书是"大众历史丛刊"的一种。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强调了史料的重要，论述了史料的阶级性和处理史料的方法，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是生产方式，历史人物可以阻滞或加速事变的必然进程，并阐述了处理历史人物问题的具体方法。

12 月

20 日　傅斯年在台湾逝世，终年 54 岁。

29 日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实践论》。

同时配发社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指出《实践论》"充实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具备"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点。

1951 年 2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认为"学术革命"就是"要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用于各种的学术部门"，因此"必须大力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在我们的学术界各方面、各部门，应该认真地讨论《实践论》，而把自己的工作的检讨与这个讨论联系起来，采取有秩序的恰当的态度，而不是采取粗暴的态度，从而改进我们的工作"。

1952 年 4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

"两论"发表后，学术界迅速掀起宣传学习的热潮。对"两论"的学习，是建国初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

是月　谢兴尧编著《太平天国史事别录》由修绠堂书店出版。

此书内容大部分为读太平天国史料札记。自序云，清季对太平天国的所述多恶意诬谤，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对之则多善意渲染，然而从史料上说，两者都是不正确的。因此作者从早年即着意史料搜寻以勘谬说。

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由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着重对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在广西爆发的前因后果进行了研究。

是年

年初，陈垣致信老朋友席启驷，谈自己史学思想的几次变化。

信中云："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要》、《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解放以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耳。"

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编《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金田起义百周年纪念》由三联书店出版。

收录范文澜、荣孟源等所作论文九篇，内容包括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意义，太平军、太平天国的商业政策，太平天国如何对付外国侵略者，中外反革命的勾结过程，洪大全、捻军、杜文秀回民军的团结问题，以及太平天国所刻书籍考略等。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开始编辑出版。

1949 年 7 月中国新史学会筹备会成立后，即把推动近代史研究作为工作重点。这一项目的开展与毛泽东的指示有关。1942 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1950 年，《丛刊》总编辑委员会成立，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十一人组成，并确立了各个专题及其负责人。1951 年 7 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950 年出版了《义和团》（4 册，翦伯赞主编），1952 年出版了《太平天国》（8 册，向达主编）和《回民起义》（4 册，白寿彝主编），1953 年出版了《戊戌变法》（4 册，翦伯赞主编），1954 年出版了《鸦片战争》（6 册，齐思和主编），1955 年出版了《中法战争》（7 册，邵循正主编），1956 年出版了《中日战争》（7 册，邵循正主编），1957 年出版了《辛亥革命》（8 册，柴德赓主编）和《捻军》（6 册，范文澜主编），1959 年出

版了《洋务运动》（8册，聂崇岐主编），1978年出版了《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齐思和主编），共计11种，2700多万字。

该丛书涵盖了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收录文献资料1800余种，其中有些是罕见的珍本、抄本、孤本和外国档案及私人译著。内容涉及经典作家的论著、有关史事的官私著述、上谕、奏稿、函牍、条约章程、档案文电、方志、日记、年谱、传记、西书译文、当时报刊等。反映了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演化、重大政治事件的基本过程。为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教学工作提供了系统的基本参考资料，是国内近代史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除正文外，《丛刊》还附有“书目解题”、“大事年表”、“人物传记”等，方便了学者们查检利用。

该丛书颇受海外汉学界的重视，据美国学者透露，他们利用这套丛书，培养了数百名汉学博士。美国汉学界著名学者如费正清、刘广京、邓嗣禹、芮玛丽等对《丛刊》均表赞许。

有学者认为，该丛书也有缺点，主要是对近代历史的完整性与连贯性考虑不周，过于重视革命与政治斗争，忽视了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另外，没有统一的编辑体例、标准，各集特色不一，甚或有矛盾，有些材料收集也不够充分。

曾毅公辑《甲骨缀合编》由修文堂刊行。

本书共缀合甲骨396片，各片的排列略以王号、祭祀、方国、地名、天象、田猎、卜年、卜旬、卜夕、卜日及甲子表为序，再以时期定先后。对每片所缀合者，标以号码，并注明出自某书、某卷、某页、某片号等。因据拓本所缀，缀错者不少。收录书中的特大片甲骨，因缩小过多，有所失真。

邓广铭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尚钺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副主任。

何干之、胡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

谭其骧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傅衣凌由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调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1 年

※《历史教学》创刊。
※《新史学通讯》创刊。
※ 全国掀起大规模批判《武训传》运动。
※ 中国史学会成立。
※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展开。
※ 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讨论展开。
※ 全国高等院校开始院系调整。

1 月

1 日　《历史教学》创刊，李光璧任主编。

该刊是 1949 年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由张政烺、李光璧、杨生茂、傅尚文、孙作云、丁则良及关德栋等七人发起，徐特立为该刊题写了刊头。1953 年，马叙伦（时任中央教育部部长）也为该刊题写了刊头，始刊于 1953 年第 7 期，沿用至今。

1966 年 6 月停刊，1979 年 1 月复刊。

11 日　《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社论。

该文由胡绳执笔，主要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太平天国史进行了论述，对此后太平天国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文章高度颂扬了太平天国抗击国内外敌人的业绩，认为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高峰”，指出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

社论还指出，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是从农民阶级的狭隘眼光出发画出的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在实质上又带有反动性。

同时还刊登了罗尔纲撰写的《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日期的考证》。

17日　侯外庐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

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

社论指出，《实践论》的重新发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应该引出中国的一个理论新高潮。

31日　《新史学通讯》创刊。

该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较早的一份史学刊物，创始人为时任中国新史学会河南省分会会长、河南大学校长的嵇文甫，黄元起任主编。1957年改名《史学月刊》。《新史学通讯》的创刊，为史学界宣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建国初期影响了一大批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学者。

该刊在创办过程中，不断因政治运动而停刊，1961年开始，《史学月刊》停刊3年多。复刊未久，"文革"爆发，《史学月刊》再次停刊14年。1980年7月第二次复刊时暂定为双月刊，2002年起恢复为月刊，为国内史学专业刊物中影响较大的学术期刊。

是月　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由开明书店再版。

该书最早对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做出解释，提出了李秀成"伪降说"，认为李秀成此举在于"图谋复国"。

修改本、增订本分别在1954、195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作者再一次修改，推出《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并继续利用新发现史料对其进行补注，至1995年刊印《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该书从太平天国制度、避讳字、特殊称谓等十二个方面详加训诂，另从事实、时间等十个方面订正原文的错误或补充其缺略，名物训诂与史实考订并重，共注释了七百条左右，注文达到原文的四倍多。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由开明书店出版。

该书改写本、增订本分别在1955、195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华岗《五四运动史》由海燕书店出版。

该书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五四运动的专史，系统论述了五四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原因、发展经过以及意义，其中对五四时期风云人物多有评价，且较为客观。如作者并未一味否定胡适，肯定了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反对旧礼教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该书出版后广受欢迎，新文艺出版社等另出新版，销量巨大。

2 月

翦伯赞在《学习》第 3 卷第 10 期发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用“让步政策”论来解释农民战争的作用。

文章重在诠释毛泽东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真正动力的观点，但接受了范文澜的意见，用“让步政策”来补充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论述。文章认为，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史上的每一个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

这是 1949 年后最早阐述“让步政策”的论文，这一观点后来为翦伯赞招致杀身之祸。

赵俪生由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调至青岛山东大学文史系工作。

3 月

16 日　《进步日报》发表(苏)葛瑞科夫《斯大林与历史科学》。

17 日　四川资阳黄鳝溪出土人类头骨化石，属晚期智人，被命名为“资阳人”。

18 日　陈垣在《新建设》杂志编辑部谈考据之学。

是日，《新建设》杂志编辑部设座谈午餐宴请陈垣、范文澜等人，编辑部约请陈垣作考据、校勘方面的文章。陈垣婉拒，称此类文章已陈旧、不现实，并嗔怪范文澜：“你要负些责任，早不告我马列主义，使我几年来摸索。今老矣，不能再有成就，精力枉费，实在可惜。”

23 日　白寿彝在《光明日报》发表《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

是月　《新建设》杂志社从第 3 卷第 6 期开始连载特别约请李达撰写的《〈实践论〉解说》。

全文约 5 万字，分 4 期连载。编者按说：“最近，全国的学术工作者、各级干部，都正热烈展开《实践论》的学习运动，我们特请李达先生就

《实践论》的全文，逐段加以解说，帮助读者作进一步的学习。”

1952年7月至1953年1月，《新建设》又分7期连载了李达撰写的《〈矛盾论〉解说》。

在这两篇解说当中，作者旁征博引，对“两论”作了详尽的诠释，认为《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总结，是“指导中国革命行动与建设新中国的总指针”。《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另一重要基础，同样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统一。李达对“两论”的解说，大大促进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和普及。

李达的“解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在致李达信中，称赞《实践论》解说的第一、第二两部分“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并告诉李达待“解说”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毛泽东认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李达为此“多多写些文章”。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书中对1899—1949年间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概括性总结，对殷墟甲骨发掘情况进行了重点介绍，并首次披露了二战以后甲骨文的出土及有关资料。据作者统计，自1899年以后的五十年间，共发现了16万多片甲骨，书中按“已著录者”和“未著录者”，分别注明了出处或收藏地及其甲骨的片数。这一数字受到董作宾的质疑，董在1955年出版的《甲骨学五十年》一书中批评这一数字是“了不得的夸张”，“距离真实性太远”，认为“共总约为九万六千一百一十八片”。

贾兰坡《河套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

该书为通俗性考古学读物，介绍了河套遗址的地理位置、调查和发掘以及河套人化石的研究情况，对河套人的文化进行了探讨。作者最后再次论述了“尼安德特人”与“中国猿人”的关系，不同意把旧石器时代定为“前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定为“氏族社会”的阶段划分。

4月

13日　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敦煌文物展览”。

展品包括莫高窟壁画摹本九百余件，以及被外国人掠走的敦煌文物照

片。展览于6月6日结束，对敦煌艺术研究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为了配合这次展览，《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卷第4、5期推出“敦煌文物展览特刊”，发表了《敦煌艺术概论》等研究论文和资料二十多篇，内容涉及敦煌艺术的源流、风格、敦煌乐舞、建筑、史地等方面。

是月　赵俪生在《历史教学》第4期发表《斯大林对史学的新指导——学习〈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札记》。

胡华主编，戴逸、彦奇编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苏）葛烈柯夫著、余元盦译《斯大林和历史科学》由时代出版社出版。

胡厚宣编《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由来薰阁书店出版。

该书共收录甲骨1141片，线装，2册。

作者对抗日战争期间出土甲骨的搜集和著录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作者从四川到京、津、沪、宁一带，努力搜集流散的甲骨并予以整理，20世纪50年代先后整理出版。

郭士杰《美日勾结侵华史》由十月出版社出版。

5月

1日　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创刊。

该刊是新中国创办最早的高校文科学报和人文社会科学杂志，华岗任社长，杨向奎任主编。起初是同人杂志，自办发行，文史两系的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构成了最初的编辑班底，1953年成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之一。该刊创立后，发表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文章，并率先发起古史分期、农民起义及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成为“五朵金花”争鸣的重镇，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

创刊号共发表十一篇文章，杨向奎《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体会》对考证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了胡适考据学的局限，反映了史学研究从民国考据学向唯物史观史学的转变。郑鹤声《天王洪秀全状貌考》原是应南京博物院之约而作，其时该院正筹备太平天国革命纪念展，要为洪秀全画像。文中对洪秀全长没长胡子进行了考证。1958年“史学革命”期间，该文受到批判，被当成烦琐考证的代表。

5日　白寿彝在《光明日报》发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

针对学术界处理中国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时“似乎都还在历代皇朝的疆域里兜圈子”的现状，作者认为：“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

20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全国掀起大规模批判《武训传》运动。

电影《武训传》描写和歌颂了清末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1951年初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公映，立即在知识界、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对武训、对影片好评如潮。3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专门调看了这部影片，并撰写了这篇社论。

社论严厉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社论认为，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如此之多，不但“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而且表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社论发表后，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武训传》运动。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它开创了以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先例。批判《武训传》运动的实质是推崇革命造反与暴动，反对改良与妥协。这一运动对史

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推崇暴力革命逐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观念。

27 日　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

1949 年 9 月，华岗从香港抵达青岛养病，后应邀为山东大学讲授政治大课《社会发展史》，遂留在山东大学。

是月　房山周口店中国猿人发现地再度发掘。

贾兰坡《山顶洞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

郑振铎编《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由上海出版公司全部出齐。

该书是作者精心制作的一部巨著，自 1947 年 3 月开始出版，共二十四辑，收录我国上古至明清时代有关宝绘墨迹、鼎彝磁皿、石像泥俑、壁画零缣等图片三千余幅，为研究我国历史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材料。其中刊载了许多尚未正式发表的考古照片。作者为部分图谱撰写了说明，其中既有各辑所涉历史情况的总体说明，又有每个图版和每幅图片的具体介绍。

该书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郭沫若说："郑振铎先生以献身的精神编纂这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实在是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这是应该国家做的工作，而郑先生以一人之力要把他完成。"周谷城认为："振铎兄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直是一部最美丽之中国文化史。"翦伯赞指出："郑振铎编撰《中国历史图谱》，我认为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我以为郑撰此书，与其称之曰《中国历史图谱》，不如称之曰《绣像中国史》。同时，我还要着重地指出，这部书的出版是中国全面图谱第一次的通俗版……有了这部书，中国的历史，便会从纸上浮凸起来，甚至会离开纸面，呈现出立体的形象。"吴晗说："郑西谛先生积数十年的搜藏，汇集历代有关人民生活的图录及实物拓片，精选复制，从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到铜器，甲骨，周、秦文化遗物，流沙堕简，乐浪漆器……举凡一切可以代表各时代生活文化特征的，辑为《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取精用宏。有了这个工具，几乎把历史拉回到现实来。如对古人，相见古代历史，不再是文字的讲授，而是目睹的实验的学问了。这部空前巨著的出版，不止填补了学术界的缺乏，而且也开辟了新史学的道路，滋育了下一代人的历史兴趣，为中国人民史的写作，奠下新基。"

6 月

1 日　范文澜在《新建设》第 4 卷第 2 期发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

该文以自我检讨《中国通史简编》的方式，对当时史学界存在的一些

重大偏颇进行反省。

文章对《中国通史简编》中存在的“非历史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对片面反封建及“借古说今”进行了剖析。作者指出，对中国的封建时代，不能“无分析的一律抹杀”，“必须承认这段历史时期对于中国民族生活的发展有其积极作用”。因此，对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历史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的态度”，对于其中的个别历史人物、个别历史事件“无分析的一律抹杀或一律颂扬，都是主观主义的、非历史主义观点的表现”。他说，在《中国通史简编》“这本书里，有些地方的叙述就有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缺点。例如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就他们整个阶级的地位来说，没有问题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但是他们中间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条件下，确实也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如果一律否认或缩小他们对历史的贡献，那是不对的”。

范文澜认为，对农民起义，既要肯定它的作用，也要指出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因之它只能起着有限度的推动作用。“借古说今”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但如果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这就不是“一切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的历史的观察社会现象的态度，而是古今不分，漫谈时事了。

文章还对西周封建说做了详细论说。

该文提出的一些观点，因具有普遍意义而引起广泛关注，产生重要影响。

7日　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

1950年8月，郭氏曾为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的《武训画传》题签书名，认为“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该文检讨了自己为《武训画传》题名的“错误”，反思自己由于对武训的真相“不曾加以研究”，所以“容易为一些表面上的刻苦行为所蒙蔽”，下定决心痛改自己“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的老毛病”。

22日　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该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而作，是1949年后第一部正式发表的中共党史，受到毛泽东首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产生很大影响。

该书建立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体系，即突出毛泽东在中共党史的地位，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以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为主线，对不同时期中共路线、方针、政策的演变、重要会议、中国社会及中国革命的发展等问题进

行概述和分析，并总结各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在研究方法上，该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毛泽东的著作和中共文献为依据，分析研究中共党史上的重大问题。这一结构和研究方法为后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者所继承，并成为各种中共党史讲义的范本，影响深远。

同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23日　李则纲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论〉对历史教学的启示》。

是月　翦伯赞在《学习》第4卷第5期发表《我对电影〈武训传〉的意见》，对《武训传》进行批判。

文化部文物局委派专家对莫高窟进行全面勘察。

参加调查的有北京大学赵正之、清华大学莫宗江，以及古建筑学家余明谦、陈明，调查组对莫高窟石窟文物保护工作做了全面调查，并制定了具体的保护方案，对濒危的五座唐宋时代窟檐的木结构建筑进行了抢修。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莫高窟进行的第一次抢救性维修。

安志敏《中国史前考古学书目》由燕京大学出版。

1948年秋，作者在齐思和指导下，利用在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工作之余，开始编撰本书，耗时年余编成。所收书籍包括中外学者用各种文字写成的考古学著作，分“通论”、“地域”、“其他”三类，以发表年代先后为序。

荣孟源在《新建设》第4卷第3期发表《爱国主义与历史科学》。

《燕京学报》第40期出版，此后被迫停刊。

该期发表了陈梦家《甲骨学断代甲篇》、陆懋德《中国古文数名考原》、（日）鸟居龙藏《辽上京城以南伊克山上之辽代佛刹》等文。

7月

6日　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武训是个什么人，为什么有人要歌颂他?》，参加对《武训传》的批判。

13日　周生在《进步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国的历史科学》。

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江青主持撰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

连载至本月28日。

28日　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推举郭沫若为主席。

郭沫若在会上发表《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讲话，指出自从1949年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成立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具体说来主要有六个方面：一、从唯心史观转变到唯物史观；二、从个人研究转变到集体研究；三、从名山事业转变到群众事业；四、从贵古贱今转变到注重现代史的研究；五、从大汉族主义转变到注重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六、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变到注重亚洲史以及其他各洲历史的研究。

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国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于9月17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史学会章程》，郭沫若被推举为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会停止活动，直到1980年4月才恢复重建。

中国史学会第一届理事（43人）：郭沫若、吴玉章、吴晗、陈垣、翦伯赞、吕振羽、陈翰笙、陶孟和、嵇文甫、邓初民、白寿彝、金毓黻、杨东莼、罗常培、金灿然、杜守素、季羡林、吴泽、范文澜、华岗、侯外庐、周谷城、叶蠖生、马衡、周予同、夏鼐、马坚、徐特立、向达、汤用彤、潘梓年、徐炳昶、叶恭绰、楚图南、郭宝钧、郑振铎、陈寅恪、裴文中、翁独健、邵循正、宋云彬、尹达、杨树达。候补理事（9人）：杨绍萱、唐兰、钱杏邨、王伯祥、蔡尚思、李则纲、赵宗复、杨荣国、孙叔平。常务理事（7人）：白寿彝、邵循正、陈垣、吴晗、翁独健、尹达、翦伯赞。

是月　童书业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

童文发表后，杨向奎、杨宽、吴大琨、赵俪生、王亚南、王仲荦等著名学者纷纷在《文史哲》上发表论文参与讨论，就中国封建社会到底出现于西周还是春秋战国之交或者是魏晋以后展开长时间争鸣。《文史哲》成为五六十年代刊载古史分期讨论文章最多的杂志。

黄云眉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考证在史学上的地位》。

针对学术界"矫枉过正"、一边倒地把考证学推到唯物史观对立面的做法，作者力排众说，反对对考证方法的过分贬低和排斥，认为考证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需要，尤其在编纂新史的资料问题上更显出它的重要性。并呼吁在批判继承传统考证学遗产的基础上，再来一次更新的考证高潮。

顾颉刚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

该文是新中国成立后《穆天子传》研究的第一篇文章，打破了《穆

天子传》研究的沉闷局面，提出《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说，并考证了穆王西征的路线。

黎澍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党史资料室主任，主持编辑出版《中共党史资料》。

向达、常书鸿等著《敦煌》由学习书店出版。

周一良编著《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由开明书店出版。

8 月

4 日　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读〈武训历史调查记〉》。

郭表示对自己负责领导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出“问题”承担责任，对自己曾“附和过”歌颂武训“重新再检讨一次”。

是月　北京大学哲学、历史、中文、图书馆四部门联合召开“胡适控诉会”，展开胡适批判。

胡适当年的同事与学生，如汤用彤、沈尹默、朱光潜、顾颉刚、杨振声、俞平伯等人作批判发言，并检讨与胡适的关系。

远走美国的胡适得知情况后，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百分同情这些可怜的人，可怜他们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一点不怪他们。”

吕振羽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郭若愚《殷契拾掇》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王瑶《中古文人生活》由棠棣出版社出版。

9 月

29 日　周恩来为京津地区高校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展开。

本年 11 月，“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成立，学习改造运动的重点转向“控诉胡适”、“批判胡适”。参加批判的多是胡适当年的朋友及学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对胡适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批判胡适的政治思想或道德修养方面，尚未深入到学术领域。

思想改造运动使相当多的旧知识分子受到震动，意识到只有克服原有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才能为新社会所接受。

是月　张政烺在《历史教学》第2卷第3期发表《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

第4、6期连载。该文是讨论商周史研究的名作。作者运用甲骨卜辞与金文资料，对商周时期的氏族组织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当时氏族组织与军事组织和农业生产组织是一体的见解，大大推进了学术界对商周社会结构的认识。

杨向奎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从周礼推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作者认为，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时候，必须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以部分代全体，不能以后来的发展情况说明古代。根据西周某一地区的铜器文字而概括地说明当时所有地区的社会性质，或者是对于某一种材料的时代还弄不清楚，而用以判断某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特色，全是违背马列主义的方法的。西周以后中国的疆域扩大，包含的部族加多，彼此的历史条件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在社会的发展上也不一致，而史学工作者当说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时候，往往不考虑这些问题，而笼统地说，西周是什么社会，春秋是什么社会，实际上是挂一漏万，以片面代全体。

10月

4日　邓广铭在《进步日报》发表《论钟相、杨幺的起义和岳飞的绞杀起义军》。

12日　《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

第一次印行达106.6万册。毛泽东从头到尾参加了《毛选》的编辑工作。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细致修改和校订，并为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协助毛泽东编《毛选》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

《毛泽东选集》第2、3、4卷，先后于1952年4月、1953年4月、1960年9月出版。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长时间成为历史研究之圭臬，其中有关中国历史的论断，对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16日　《学习》第4卷第12期发表编辑部文章《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反对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历史人物评价中影射的史学方法提出批评。

文章说："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由于出版言论完全没有自由，许多作者曾经不得不用隐晦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有些人就采取了'借古说今'的方法，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影射当前的时事和当代的人物，以达到揭露反动统治者的罪恶的目的。这是和国民党的检查制度进行斗争的一种方法。但是必须承认，这种'借古说今'的方法实际上也是违反历史主义的。现在，我们当然不需要再采取这种方法了。我们评论历史人物或以历史人物的事迹编为戏剧，固然都可以，也应该和当前的某种政治任务相配合，然而我们不应该用简单的历史类比来实现这种政治任务。"

同期还发表了尹达《怎样学习祖国的历史》，该文论述了"为什么要学习祖国的历史"、"学习祖国历史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认为"学习祖国历史应以现代史和近代史为重点"。

23 日　《人民日报》发表《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短评。

认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种种障碍和阻力在于"教职员的政治水平"普遍不高，"因此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乃是改革旧教育的重要前提之一"。

27 日　文化部发布《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

其中指出，博物馆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教育。

是月　张政烺、余逊、宿白、商鸿逵、金毓黻、杨翼骧《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由开明书店出版。

周乾荣在《历史教学》第 2 卷第 4 期发表《〈实践论〉与历史教学》。

11 月

1 日　汤用彤在《光明日报》发表《高等学校教师抓紧时机积极学习》。

文章批评长期以来北京大学自由主义猖獗、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严重，指出为了改造学校的颓风，教育工作者应进行自我改造。

是月　童书业在《文史哲》第 4 期发表《论"亚细亚生产方法"》，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中的"原始社会说"，揭开了 1949 年后史学界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序幕。

该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篇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专文。作

者认为，“马克思所说作为生产方法之一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就是原始共产社会，因为这种社会的模型是借亚细亚地区近世社会中所残存的上古制度来说明的，所以称为‘亚细亚生产方法’，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地方所说的亚洲的具体社会是不相干涉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文献中所说的亚洲社会、东方社会的“亚洲”、“东方”乃是地理名词，并不是特殊的社会结构，不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纠缠在一起。

文章发表后，日知立即提出不同意见，由此引发了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田昌五、徐启基等赞同童说，日知、吴泽则提出“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杨向奎提出“特殊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说”，庞卓恒、高仲君提出“封建社会说”，雷海宗提出“铜器时代的部民社会说”，吴大琨提出“过渡形态说”，等等。

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从五十年代延续到八九十年代，众说纷纭，成为史学界长期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胡厚宣编《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由来薰阁书店刊行。

收录甲骨3276片，大部分为第一次著录的新材料。

白寿彝《回回民族底新生》由东方书社出版。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新的民族观念撰写的第一本回族简史，对后世回族史研究影响深远。书名没称“简史”而用了“新生”这样一个名字，是为表达喜悦的心情，欢庆回回民族的新生。全书共分十二章，主要论述了回族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民族关系和内部社会分化，以及回族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贡献。

12月

13日　轻工业部、文化部联合下发通知，规定禁用旧版书做纸浆原料。

16日　顾颉刚在《大公报》发表《从我自己看胡适——我和胡适的学问关系》，公开与胡适决裂。

文章说：“我和胡适都生长在累代书香的人家，阶级成分是相同的。我比他只小两岁，所受时代教育是相同的。我和他都是从小读旧书，喜欢搞考据，学问兴趣又是相同的。他从外国带了新方法回来，我却没有，所以一时间钦佩得五体投地。”“现在觉悟到应该严格分清敌我，所以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唯有彻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

18 日　中国科学院举行思想改造学习动员大会。

郭沫若在动员大会上作了《为科学工作者的自我改造与科学研究工作的改进而奋斗》的报告，论述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等问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邵荃麟也就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目的及内容做了报告。

郭沫若向全国科学工作者发出号召："要以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劳动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对国家有用人力物力的热爱，来努力学习，纠正自己错误的思想，克服科学研究中的缺点。"

是月　华东文物工作队在江苏淮安青莲岗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青莲岗文化"。

《中国考古学报》复刊。

该刊创刊于 1936 年 8 月，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刊名为《田野考古报告》，第 2 册起改为《中国考古学报》，至 1949 年出至第 4 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于 1951 年 12 月出版第 5 册。1953 年第 6 册起改称《考古学报》至今。

该刊为中国考古学权威刊物，主要刊发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报告、考古研究专题论文、考古学和古代史的论文、科技考古报告和论文，以及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的其他重要论著，是国内最重要的考古学期刊。

黎澍在《学习》第 5 卷第 4 期发表《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奋斗》。

是年

全国高等院校开始院系调整。

指导思想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等等。其中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确定为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等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院校被撤销。改为工科或撤销的大学的历史系合并到综合性大学历史系中。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并入北京大学，齐鲁大学历史系并入山东大学，岭南大学历史系并入中山大学，等等。

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原来的负责人被大批更换，具有中共背景的干部和学者纷纷担任学校校长或系部主任，学校的实际领导权和决策权收归党的手中。例如，翦伯赞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侯外庐出任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系主任，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吕振羽任大连大学、东北大学校长，成仿吾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嵇文甫任河南大学校长，邓初民任山西大学校长，王亚南任厦门大学校长，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等等。

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使得与旧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历史学家们不得不接受体制的管束。

山东大学成立历史系。

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合并，筹建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入华东师大任教。

傅乐焕拒绝叔父傅斯年多次致信致电召其赴台之命，由英国返回中国大陆。

初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 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副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

彭燮琛编撰《太平军初占江南史事录》由上海正风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成立。

前身为国民政府国史馆，1964 年改隶国家档案局，更名为第二历史档案馆，1977 年底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年重归国家档案局领导。

1952 年

※ 胡厚宣编《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出版。
※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出版。
※ 翦伯赞就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中国考古学专刊”开始出版。

1 月

6 日　范文澜在《光明日报》发表《科学工作者应怎样开展“新我”对“旧我”的斗争》。

18 日　丁山在山东大学逝世，终年 51 岁。

28 日　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成立。

李亚农任主席，周谷城为副主席，胡厚宣为秘书长，顾颉刚等十七人为理事。

是月　胡厚宣编《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为纪念甲骨文发现五十周年而作，是研究甲骨学及古代史、古文字必备工具书，被视为甲骨学研究的基石和起点。书中辑录自 1899 至 1949 年五十年间全部关于甲骨学的中、日、英、法、德、俄各种文字的专书书目和论文篇目，共 876 种，分发现、著录、考释、研究、通说、译论、汇集、杂著八大类，类下又各分子目来编纂。在所收专著和论文题下，详注出版时间及版本出处。后附著者、篇名、编年三种索引，以便读者检查。

作者在前言中对五十年间甲骨文的出土、研究甲骨学而有论著的学者、著作性质及发表时间等都分门别类进行了统计和说明，将 1899 年甲骨文发现以来分为五个时期：一是古董时期，以王懿荣、刘鹗为代表；二是金石时期，把甲骨学看作金石学的一门，以马衡、陆和九为代表；三是文字时期，专研甲骨的文字，以孙诒让、罗振玉、唐兰、于省吾为代表；四是史料时期，以甲骨文考论古代史，以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胡厚

宣为代表；五是考古时期，以考古学的方法发掘甲骨，以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石璋如、胡厚宣等为代表。

李学勤在《建国六十年来甲骨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说：我是1949年左右开始学甲骨的，一开始确实不知道该读什么书。那时候我见到朱芳圃写的《甲骨学》，有《甲骨学文字编》、《甲骨学商史编》，可是那些书的出版太早了，很多后来的材料没有包括，所以到图书馆去摸有关甲骨的材料是非常不容易的。胡先生这本《论著目》一出版，我们就如鱼得水了，因为你就按这个查就行了。过去说“莫把金针度与人”，胡先生这本书就是“把金针度与人”的一部著作。

郭应德《维吾尔史略》由东方书社出版。

杨宽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

该文从多个方面对战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考辨，认为战国奴隶不从事主要生产；战国时代的剥削者为地主，从事主要生产而被剥削的为农民；战国的“变法”表示封建社会的量的变化；战国的奖励“耕战”政策是奖励农民尽力生产和当兵杀敌。作者由此认为，战国社会决非奴隶制，而是地主制封建社会。

杨向奎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学习“毛泽东思想”与自我改造》。

文章认为，上层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们，因为出身及经常接近反动的阶级，所以思想多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须广泛展开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否则思想会落后于现实而开倒车。

3月

15日　华岗在《光明日报》发表《两年来中国历史科学的转变和趋势》。

文章回顾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成就，认为“历史科学具有显著的阶级性，所以随着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动，原来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史学，已经失掉了它的基础，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需要为新社会服务的历史科学”。

是月　华岗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清算教育工作者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章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教育阵地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在表面上标榜“为学术而学术”和“纯技术主义”，而在实际上则利用各种方式和方法，

对人民散播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观点，借以毒害人民和维持资产阶级的剥削地位。

《文史哲》第 2 期刊登童书业撰《“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及杨向奎撰《“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顾颉刚展开批判。

童文表示了与“古史辨派”一刀两断的决绝立场。文章说，所谓“疑古派史学”是美国实验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产物，它的首创者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当前的战犯胡适。顾颉刚所说的一系列不反对人们运用唯物史观的话，“其实都只是抗拒唯物史观的一种手段”，反对唯物史观的“方法不必一致，或者尽情诋毁，或者托词抗拒，或者截取变质，而这三种方法我们这批人之中就都用过的”。疑古派史学的真实企图，最初是右面抵抗封建阶级，而左面抵抗无产阶级，到后来，“这派的史学家多数与封建阶级妥协，只坚决抗拒无产阶级了”。“古史辨派”的作品，“在考据学上说，也没有什么价值”。“我的结论是：当前的思想改造运动，是要肃清封建思想和改造资产阶级意识，疑古派的史学思想是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正是应改造的对象之一，同志们赶快起来改造自己罢！”

杨文认为顾颉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论者，……这一派的治学方法，彻头彻尾是唯心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有没有学术上的价值呢？肯定地，没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根本不能成立。……这一‘发现’，没有说明任何问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文末强调说：“顾颉刚教授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接受了开明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又接受了买办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方法，造成了他的疑古学说，因而没有解决任何古史问题，反而造成了混乱。”

两文发表后，顾颉刚在 1952 年 3 月 12 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两文“均给予无情之打击”。

日知在《文史哲》第 2 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提出“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

作者主要针对童书业《论“亚细亚生产方法”》进行商榷。依据苏联学术界的有关见解，作者认为，“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奴隶制，也就是古代东方的奴隶制”，它“在历史发展中与古典的奴隶制前后相承”。“亚细亚的或东方的财产形态是以集体所有与公社成员的劳动力为基础”，这表明“古代东方是奴隶制的原始阶段或低级阶段”。彼时学术界以苏联学术为圭臬，此说遂占据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主流。王亚南、侯外庐、吴泽等同持此说。

童书业在同期杂志上发表《答日知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为

自己的观点辩护。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就此展开。

20世纪70年代末，日知放弃己说，改奉童说。

4月

16日　政务院公布《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全国院系调整大幕由此拉开。

通过此次调整，国内各大学历史学者被大量调动。

是月　陈垣在《新建设》第4期发表《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

文章表示：“今后要在毛主席、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在觉悟了的群众督促之下，进一步批判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改造自己。”

5月

19日　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为新北京师范大学。

是月　荣孟源在《新建设》第5期发表《〈矛盾论〉对历史科学工作的指示》。

（苏）阿尔帕托夫著、王以铸译《为战争贩子服务的反动史学》由中华书局出版。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选用了大量美国官方档案，内容充实，叙事周详，较全面地评述了从鸦片战争前后到19世纪末期美国的侵华历史。

第2卷于1956年出版。

陆侃如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纪念五四，批判胡适》。

文章说，三十多年来，在文化教育界散播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最厉害而至今还保存一定程度的坏影响的，就是那个冒充五四运动“领袖”，甘心做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走狗，一贯出卖祖国人民利益的战犯胡适。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间纪念五四，批判胡适是完全必要的工作。

6月

19日　刘大年在《光明日报》发表长篇论文《学习斯大林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为了纪念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发表两周年而作》。

该文主要针对郭沫若“战国封建说”提出不同意见，主张“西周封建说”。文章依据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生产、生产力并不直接决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的思想和理论，而是经过经济基础的中介；同样地，上层建筑也不是直接反映生产中的各种变更，而是通过基础的各种变更来反映”的观点，说明生产、生产工具不能决定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上层建筑如思想、理论等也不能决定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并指出，分析社会制度、社会性质，首先就是要分析社会经济基础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也就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由此来考察西周社会，可知西周已经是封建社会——封建领主制阶段。

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一定反响。杨向奎在《文史哲》1952 年第 5 期上发表《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对刘文的史学方法提出尖锐批评。

20 日　修睦在上海《新闻日报》发表《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特别长》。

文章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特别长的原因在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残酷，使农民经常生活于贫困和痛苦中，生产力发展很慢；外族的侵入，带来了落后的生产方式，使生产力倒退；中国的手工业主要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它只求自给自足，而没有发展；中国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总是封建地主兼营的，使商业资本不可能发展到破坏封建制度的程度；农民革命只起了改朝换代的作用，而不能推翻封建制度。

是月　郑天挺主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辑《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由开明书店出版。

所辑资料来源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收存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及别处所藏大库档案，共 220 篇，主要反映了李自成和与他有关联的农民起义运动的情况，对涉及当时社会背景的材料也一并收入。对所选史料只是辑录排比，不加删节，不加增改。对于某些重要事件，作了必要的研究考证。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 1950 至 1952 年间所写有关中国古代的研究论文集，可以看作是《十批判书》的补充。书中大多数文章围绕中国古史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展开论述。作者通过对井田制的兴废、殷周人殉的史实、奴隶与农奴的区分、汉代政权的实质，以及古文字的发展等众多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力驳众说，将中国古代史上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界确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战国封建说。此说因获毛泽东赞同而

在诸说中影响最大。

本书后来一再修订再版，成为影响巨大的名著。

7月

《文史哲》第4期发表了一组“思想改造”文章。

童书业在《学习“矛盾论”，认识思想改造的真义》中说，一般从旧社会来的史学工作者，有人没有自觉的史观，自觉的政治思想，因为旧中国的史学是考据的史学，典型的考据家往往是专钻故纸堆，“没有”（其实是有的）任何思想的人，他们为考据而考据，自以为绝对客观，绝对科学，看不起史观，看不起思想，更看不起政治，他们认为史学如沾染上了政治色彩，便立刻变成“宣传的工具”，没有任何“学术上的价值”。典型的考据家往往拒绝接受马列主义的理论，拒绝接受史学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在1949年后依旧关起门来，自以为是地抱住考据包袱不放。他们也许会说几句马列主义的理论，讲课时插上几个马列主义的名词，事实上还是满脑子“考据至上”、“史料至上”。

赵俪生在《学习“矛盾论”，联系史学工作的一点体会》中说，一方面要彻底认识旧考据学形而上学方法的错误，把这种方法和它的影响从根本上拔除抛弃，另一方面又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把旧考据学留下的“遗产”（即材料）加以检查、鉴别和分析，还原或补充其被斫丧的部分，矫正其被歪曲的部分，然后把这些材料连同重新发现、重新发掘的材料，一同组织起来，拿去说明历史的发展，拿去充当推广历史唯物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丰富资源。只有这样，才既不至于再度蹈袭考据学的形而上学方法的旧轨道，又不至流于忽视史料而堕入空洞教条主义史学的道路。

同期还发表了张维华的《清除我的封建、买办思想》。

8月

11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文物干部训练班开学。

训练班经过三个月的课堂学习和田野实习，于11月结业。

至1955年，共举办4期，培训341人。裴文中兼任历届训练班的主任。这四期训练班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影响巨大，20世纪80年代之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考古队领导人员，大部分出自这四期训练班。

9月

15日　陈垣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是月　郑天挺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中国史研究组主任。

郑天挺在《自传》中回忆说："1952 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我奉调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史教研组主任、系主任。这一决定在我思想上颇有波动。第一，我五十多年基本在北京生活，热爱北京；第二，我中年丧偶，一直和子女一起生活，而他们也都在北京，到天津后我必然又如在昆明一样，过孤单的生活；第三，我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他地方所及。但是经过郑重考虑后，我决定不考虑个人的生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愉快地只身来津任教。我知道如果当时我提出任何要求，会引起许多不同反应的。"

吴廷璆也回忆说："1952 年院系调整时，我原负责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工作。经过与范文澜同志协商，请教育部调聘郑天挺同志和清华大学的雷海宗同志来南开执教，由于当时工作的需要，我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便由郑天挺同志主持历史系，雷海宗同志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郑、雷两位方家的来津，大大增强了南开历史系的阵容，引起史学界的瞩目。"

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大多数调往北京大学，其余调往东北人民大学。

雷海宗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随迁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授。

翦伯赞在《新建设》第 9 期发表《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

文章说，在历史人物的评论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即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提出过分的要求，甚至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人物。好像不如此就会失掉立场，就不能通过具体的历史人物去进行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育。作者认为，评论一个历史人物，是应该公开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去和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对历史人物的歪曲作坚决的斗争，但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不等于要用今天的，乃至今天工人阶级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而是要求用工人阶级的历史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论历史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是要求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严格地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

该文事实上提出了后来争论纷纭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问题，反映了史学界要求在历史研究中贯彻历史主义思想的愿望。

郭晓棠在《新史学通讯》第9期发表《略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

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之所以比西欧发展缓慢，原因在于皇帝对全国的土地有最高处理权，最多最好的土地，都集中在历代的皇帝及皇亲国戚与文武官僚的手里；地主政权掌握经济职务；落后民族的侵入，甚至长期地统治中国；封建领主、封建军阀内部的反革命混战大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众的国家，由于经济的不发达，没有向外发展的强烈要求，中国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轻视外国人的态度，遂形成了闭关自守的政策，而对于民间的经济向外发展的要求（因为国内不自由），则采取严防的海禁政策。

孙楷第《傀儡戏考原》由上杂出版社出版。

本书对我国古代木偶戏剧进行了论述和考证。分“傀儡戏考原”和“近代戏曲原出宋傀儡戏影戏考”两部分。前者着重对汉代及汉以后的傀儡戏进行考证，并对傀儡戏的音乐做了叙述。后一部分续考唐代以前的傀儡戏及宋代的傀儡戏，重点论述了宋代的傀儡戏、影戏与宋元以来戏文杂剧的关系，指出近代戏曲原出于宋代的傀儡戏、影戏。此书对戏剧史研究助益良多。

文化部文物局所属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举办第一期古建人员训练班。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

本书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以考释清代金文书籍所著录的两周铜器铭文为主，所涉及的铜器有239器，收文286篇，按著作时间先后排列，自1941至1951年，分为7卷。书中共释金文300余字，对前人解释不当之处多有驳证。

作者以研究古代文法、汉字结构与音韵训诂的深厚功底来研究金文，并与古籍相互参证，反复推求，所见往往出人意表。其最值得注意的是卷首开头“新识字之由来”一章，详述识辨古文字的途径与方法。作者认为：“古人字形无定，而文义都有定，吾人对此，当以有定决不定。换言之，当以文义定字形，不当泥字形而害文义。文义当，则依字读之可也；依字不通，则当大胆改读之。”所谓“改读”，就是借重文法和声音，用假借字去解释。此方法有些解释得对，有些则不免于牵强。

1959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增订本，加入《积微居金文余说》。后者收 1951 年 12 月至 1955 年 3 月作者所撰文章 94 篇。作者逝世后由周铁铮整理，并作校语。

10 月

翦伯赞就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历史系由原北大、清华、燕京、中法四所大学的历史系合并而成，阵容首屈一指。

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

苏秉琦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请郑振铎、裴文中、夏鼐、林耀华、郭宝钧等为兼任教授。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修订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版删去原有十七篇考释中的九篇，以及原有的序文和两篇后叙，保存下来的是《甲骨文字研究序录》、《释祖妣》、《释臣宰》、《释耤》、《释龢言》、《释朋》、《释五十》、《释岁》、《释干支》，并增加了一篇 1934 年写的文章。在《重印弁言》中作者纠正了自己过去把殷代看成金石并用时代和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看法。

11 月

9 日　中国科学院邀请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员、苏联著名历史学家叶菲莫夫和我国历史科学工作者举行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史学家有陶孟和、范文澜、郑振铎、罗常培、翦伯赞、尹达、刘大年等四十多人。座谈会由范文澜主持，叶菲莫夫在会上就苏联历史研究工作的一般情况、苏联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和东方历史的研究情况、苏联科学工作者怎样进行集体研究、今后中苏两国历史学者如何加强联系等问题做了发言。叶菲莫夫还解答了中国历史科学工作者所提出的苏联如何培养历史科学工作者、苏联如何编辑科学史等问题。

12 月

2 日　陈垣致信杨树达，提出“法高邮何如法韶山”。

是月　《国学季刊》停刊。

杨树达任湖南文史研究馆馆长。

是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讨论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讲稿，新、老派史学家之间发生争论。

邓广铭回忆，翦伯赞主张按照自己《中国史纲》的框架模式去编写，任何朝代都先讲经济基础，再述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先讲政治，再说军事、科技、文化，招致老北大教师反对，认为凭空地先讲一些经济现象，反倒使历史的脉络变得模糊不清，应当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种因素糅合在一起，做综合性论述。为了让翦伯赞放弃自己的主张，邓广铭搬出了由斯大林亲自定稿的苏联官方颁布的一个关于怎样讲授历史的决议，该决议明确写道，不要把历史讲成抽象的社会发展史，而是要严格依照历史的年代顺序，具体讲授那些丰富又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历史人物等等。“苏联老大哥的权威毕竟高于翦伯赞的权威，这场争论就因此而结束了。”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专刊”开始出版。

“专刊”为全国性考古学论著系列丛书，根据内容性质的不同分为四种。甲种为研究性著作，乙种为资料性著作，丙种为通论性著作，丁种为田野考古报告，其中有相当数量已成为考古学名著。

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由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

该图录据1951年1月南京天朝宫殿内举办的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及华东文化部之部分收藏品编印，是1949年后第一部太平天国文物图录，收录99件文物。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又影印出版郭若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续编)》，共收文物图片76件。图录后附说明并考证，部分抄录全文。1955年11月，郭若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又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影印出版，收87件文物，图后附说明并考证，内容较续编丰富。

三部图录的出版，为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图片资料。

杜国庠任中南师范学院院长。

《爱国主义通俗历史故事小丛书》由大中国图书局出版。

唐兰调故宫博物院。

吕思勉由光华大学入华东师范大学任历史系教授。

梁方仲由岭南大学经济系转入中山大学历史系。

陈梦家从清华大学调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任研究员。

柴德赓由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转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

燕京大学停办，邓之诚由燕京大学调任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

1953 年

※《历史问题译丛》创刊。
※《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创刊。
※ 刘大年发表《中国历史科学现状》。
※ 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

1 月

《历史问题译丛》创刊。

该刊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和世界通史教研室联合编译，至1954 年 6 月共出版 9 辑，内容主要是介绍苏联历史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关于历史教科书的结构问题，除供高等院校历史系教学参考外，还面对整个史学界广为发行。1954 年 2 月《历史研究》杂志创刊后，《历史问题译丛》转由《历史研究》编委会编辑，改名为《史学译丛》，由中国科学院公开出版。《史学译丛》为双月刊，以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理论的论文”和“苏联历史学者的学术论著”为主，同时也刊有书刊评介及国外史学消息等。1958 年停刊。

河南大学历史系编《中国通史资料选辑》（上下册）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分五编，上册三编，下册两编。第一编通论与方法论，分为五章，选辑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论正统、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和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问题。第二编中国原始公社制社会与古代种族分布的情况，分为四章，选辑了中国人种之由来、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及其与中国古史的关系、论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和中国图腾制度存在的形迹等方面的内容。第三编中国奴隶制社会，分为两章，介绍了中国奴隶制度的特殊性、中国奴隶制度存在的时期问题。第四编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章，选辑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论述以及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长期延续性问题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

问题等方面的内容。第五编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分为七章，选辑了经典作家关于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大问题，诸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方面的论述，以及毛泽东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斯大林和中国革命方面的内容。

宋泽生在《新史学通讯》第 1 期发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于历史工作者的启示》。

《文史哲》第 1 期刊发一组讨论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论文。

杨向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和吴大琨《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形态说”和“过渡形态说”。

杨文不同意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简单地看作是古代东方的奴隶制度，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一种生产方式或制度，它实际上是指残留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里的原始公社制度。

吴文认为马克思在提出奴隶制与农奴制以外还提出了一种存在于亚洲和埃及的“代表共同体的个人”的特殊的土地所有形态。从时间上说，它处于原始公社末期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刘毓璜在《试论农村公社的过渡性质与中国农村公社的发展》中对吴文提出质疑。后吴大琨放弃己说，改信“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

童书业《从古代巴比伦社会形态认识古代“东方社会”的特性》将中国古代社会分成几个阶段：殷和西周大体相当于埃及的旧王国时代，希腊、罗马的王政时代，都是奴隶制和国家开始形成，部族领袖窃取政权，开始统治人民的时代；春秋大体相当于埃及的中王国时代早期，希腊、罗马的贵族政治时代，都是奴隶制和国家进一步发展，地方政权争雄，贵族势力跋扈，平民起来与他们斗争的时代；战国大体相当于埃及的中王国时代晚期，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时代，都是国家开始凝固，地方政权逐渐集中，贵族势力逐渐衰败，奴隶制更进一步发展，新兴奴隶主逐渐抬头的时代；秦汉大体相当于埃及的帝国时代，希腊的马其顿时代，“希腊化”时代，罗马的帝国时代，都是大帝国形成，专制主义发展，奴隶社会全盛（相对的），并由极盛转衰落以至崩溃的时代。

同期还发表了王承祒的《周代社会史试论》，并开始连载日知翻译的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

3 月

5 日　斯大林逝世，学术界掀起纪念高潮。

19日　荣孟源在天津《大公报》发表《历史科学工作者遵循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前进》。

24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化教育组开会讨论革命建筑及名胜古迹的保护、修整，保护地下文物及考古发掘等问题，郑振铎在会上做了报告。

26日　天津《大公报》刊登一组学习斯大林学说指导历史研究的文章。

包括袁良义《学习斯大林同志关于对历史科学的伟大贡献》、漆侠《学习斯大林学说，反对历史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蔡美彪《学习斯大林学说，加强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等三篇文章。

是月　杨向奎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读〈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

作者提出："社会历史分期，应当以物质资料直接生产者的地位变迁为主要因素。"并将封建社会分为四个阶段，即封建社会前期，西周到西汉；封建社会的成熟期，东汉到晚唐；封建社会后期，宋到鸦片战争；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作者认为，从宋朝到清中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之所以迟滞，主要源于手工业与农业的顽固结合，中国农村封建统治与商人资本存在的结合，外族不断地入侵，封建垄断经济。

王仲荦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从茶叶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

该文从考察茶叶作坊的出现及其发展道路出发，对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何以不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进行了论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与封建经济政治体制的强固结合，由于这种结合，更加强了封建阶级对于茶农与制茶手工工人的残酷剥削，阻碍了手工业向工场工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后来更由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保持了封建统治。

吴大琨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论地租与中国历史分期及封建社会的长期阻滞性问题》。

该文在《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基础上对东方式地租的蓄积过程及其影响进行了进一步论证。文章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阻滞性，与中国的地租性质及其为统治阶级所分割蓄积的方式有关"。作者指出，根据东方式地租的蓄积方式看，可以

得出一条法则来，那就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东方社会”的能否昌盛实有待于地租的征收数量（不超过侵犯再生产的限度）及其在使用上完成社会经济职能部分的数量的多寡而决定。但因在征收地租与使用地租的过程中，地权的集中与使用的分散是成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国家征收地租增多的数量与其在经济职能上的有效使用部分也是成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即社会租赋愈苛重时，由于官僚机构的庞大与贪污，真正花在社会经济职能上的数量就反愈少），所以一个东方王朝的由“昌盛”到“衰落”，几乎是成了有一定的法则可寻的事情。东方地租的蓄积法则，它不受人们的意志所左右，坚决地、无情地在整个中国的封建制阶段都贯彻了它的作用。它具体地代表了“东方社会”的特征，使“王朝不绝变更”，但“社会却毫无变化，社会经济基本要素的结构，不因政治风云的袭来，受丝毫影响”。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不仅长期受阻滞而且不断更换朝代的基本理由。

赵俪生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北宋末的方腊起义——“中国农民战争史”之一节》。

该文为作者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所开“中国农民战争史”课程之讲义，此后，作者又连续在《文史哲》杂志发表有关中国农民战争史的论文，成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成立，林惠祥任馆长。

郭若愚《殷契拾掇二编》由来薰阁书店刊行。

4月

4日 《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创刊。

该刊是《光明日报》文史哲经几个专刊中最先与读者见面的一个。此刊是由1950年下半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的《抗美援朝史学专刊》（同时刊载在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上）几经演变而来的。1951年1月13日，《抗美援朝史学专刊》改刊为《史学周刊》（仍由上述两报刊载），北大历史学系也参加主编。1952年10月院系调整后，清华历史系合并于北大历史学系。1953年3月，《进步日报》并入《光明日报》，《史学周刊》与《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合并，成为《史学》双周刊，成为《光明日报》的副刊之一。

专刊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三单位出人组成一个松散的编委会，三家轮流主编。范文澜、翦伯赞先后任编委主

委，陈垣、荣孟源、邓广铭、向达、邵循正、杨人楩、白寿彝、谢琏造、田余庆、汪篯、陈振飞等先后任编委会委员。郭沫若、吴晗与《史学》编委会关系密切。其时全国同类史学刊物甚少，《历史研究》尚未创刊，所以《史学》所登文章很受学术界的重视。许多位国内史学界知名学者都在上面发表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史学界的研究与学术讨论的方向，曾数度受到毛泽东的关怀与重视。后改为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单独编辑，具体由邓广铭负责。

翦伯赞为《史学》制定的原则是"史学研究要为政治服务，但不能为政策服务"。据邓广铭回忆："在《史学》编辑工作中，我们始终遵循史学研究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宗旨，并据以制定审稿的标准：一、思想性、科学性都好的文章，亦即把史与论结合得好，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为第一等文章；二、思想上有精到见解，材料不够丰富充实的，为第二等文章；三、思想性差，而在搜集材料方面下过功夫，所用材料准确、扎实、可靠的，属第三等文章。这三种都是可以见报的。"1959年，《史学》双周刊"主动地开展了一次如何正确评价曹操的讨论"，成为这场讨论的主要阵地，可谓极"一时之盛"。

1966年6月以后，《史学》断断续续停刊、复刊，实际均由报社政治部负责编辑，北大历史系不再参与。

5月

王亚南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由封建的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引论到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诸问题》。

尚钺在《历史教学》第5期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

文章论述了"历史科学的对象与任务"、"历史科学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之一"、"学习历史掌握党的政策"等问题，着重强调了历史学对现实的作用。

同期还发表了郑天挺《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一文。

嵇文甫在《新史学通讯》第5期发表《关于历史评价中的几个矛盾问题》。

该文对历史评价中要么一概肯定、要么一概否定的倾向提出批评，认为历史评价不能简单化，对于历史上的革命与当皇帝、伟大工程与暴虐百姓、抵抗异族与镇压农民、统一与自卫、侵略与扩张等历史矛盾现象要进行具体分析。

6 月

冯家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由中国科学院出版。

1930 年回鹘文写本三藏法师传在新疆出土，其中一部分为清华大学袁复礼教授所购，售与北京图书馆收藏。1932 年被德国人格玛丽设词骗往柏林。后经多方追索，1946 年复归。1951 年春，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委托冯家昇对其整理与编辑。秋，影印问世。这本研究报告就是作者在整理编辑后写成的。

书中驳正了学界一些固有看法，如书中不同意回鹘人在鄂尔坤河流域时代只使用古突厥文的看法，认为此时回鹘人已有两种文字：古突厥文和据粟特文而创制的文字。书中论回鹘古语文法，先论其梗概，再每句分析其字根、语尾，使读者了然其语文的结构。另外还系统地说明古突厥系民族的纪年法的三种演变：第一时期只用十二兽名，第二时期加上干支，第三时期加上数目字。用回鹘字母写出来的汉字，在此之前最多举出十来个，本书作者则举出一百多个。作者还对玄奘的卒年等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进行了考辨。

7 月

刘大年在《科学通报》第 7 期发表《中国历史科学现状》。

1953 年 3 月间，作者随团访问苏联，在苏联科学院哲学历史学部作了《中国历史科学现状》的报告。报告着重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四年来史学界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史学家最紧迫的工作是认真系统地学习马列基本理论和苏联历史科学的理论，着重进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三十年的历史。

文章写道：“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原来被分隔在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两部分进步的史学工作者会师了。原来处在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下的其他史学工作者都获得了解放。他们一般的在整理、考证史料方面有过一些成绩，其中如陈寅恪、陈垣等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贡献，而现在大家又有学习马列主义的要求，这是中国新旧史学家大团结的基础。”

该文又发表于 7 月 22 日《光明日报》。

漆侠在《新建设》第 7 期发表《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

作者指出：“近来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三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阶级

中没有一个好家伙，一句话说：朝朝代代都是坏蛋江山'"，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作者认为，封建统治阶级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动力，也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应该历史地看待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封建王朝和封建帝王。

此文与范文澜对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非历史主义倾向的检讨有关，是对范文有关观点的展开。

高昭一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试论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提出此后农战史讨论中涉及的几乎所有理论问题。

该文认为，中国农民战争具有四个特点：其一，中国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基本群众虽然都是农民，但由于革命的对象往往是反对暴政，即所谓“官逼民反”，因此在革命农民的影响下，所发动起来的群众，就不只包括手工业工人，而且是经常包括了城市贫民，甚至小作坊主、知识分子和中小地主等等，这就形成了以农民阶级为首的中下层社会人民的联合战线。其二，从起义的敌对方面来观察，统治阶级之不可消解的内部矛盾，是中国农民革命的一个经常性的有利条件。其三，宗教与秘密结社供给了中国农民起义的组织条件。其四，由于中国历史上经常有异族的入侵，因此中国的许多次农民战争便不可避免地要与种族斗争相结合，而每一次地结合又给农民战争带来更加复杂与更加深化的内容。

8月

5日　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

该委员会隶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方针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研究历史，是历史学界贯彻和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的一个重要机构，成员有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及尹达等十一人，基本囊括了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权威人士。毛泽东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

11日　刘大年在《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历史科学的基础——苏联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特点之一》。

该文主要对苏联史学的经验作了介绍。作者认为，苏联的历史科学是真正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苏联史学家们认为把社会历史看作是社会生产发展与阶级斗争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与一切唯心主义的历史学相区别的根本原则。苏联史学家成功地运用了“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原理，在对待历史人物方面，认为必须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苏联史学家善于创造性地运

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他们一方面反对胡乱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另一方面善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新思想，进行创造性的研究。

14日　刘大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工作是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特点之二》。

该文继续介绍苏联史学的经验。文章认为，把历史研究工作作为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它来和革命的敌人做斗争，是苏联史学研究的目的，是苏联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政务院颁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重申1950年5月24日政务院颁发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

规定各单位进行各种工程时发现遗址和古墓葬，不得擅自发掘，违者要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15日　刘大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着历史科学的发展——苏联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特点之三》。

文章认为，创造性的讨论，不同意见的争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推动苏维埃科学发展的巨大力量。先进的苏联历史科学也正是在这种力量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是月　钱伟长《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9月

20日　周口店出土文物材料陈列室举行预展。

该陈列室建在周口店古生物发掘地点，历史及地质、考古方面的学者裴文中、孙定国、陈梦家等参观展览。

21日　“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决定创办《历史研究》。

会议决定在原来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为三个所，使科学院也成为史学研究的权威机构，吸收陈寅恪、顾颉刚等著名史学家到研究所工作。同时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几点应该注意的问题：一、学习马、恩、列、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著作；二、熟悉苏联三十年来关于历

史科学的经验和一些重要的结论；三、对于二十几年来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些作品，也要加以研究。

关于《历史研究》，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由郭沫若作召集人的编委会，具体工作由尹达和刘大年负责。陈伯达指示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从前有军阀、财阀、学阀，你们办刊物，不要当'杂志阀'。什么叫'杂志阀'？就是只发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不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要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

会议还决定编印一些资料供教师参考：北京大学负责思想史和文学史资料，山东大学负责农民战争史资料，近代史研究所负责政治史资料，民族学院负责少数民族史资料，经济研究所负责近代经济史资料，东北人大、东北师大合作编古代经济史资料。

是月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卷出版。

到1956年4月陆续出完13卷。

刘大年在《科学通报》第9期发表《苏联培养历史科学工作干部的经验》。

尹达调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

荣孟源《中国近代史历表》由三联书店出版。

此书系据120年的历书制成的公历和中历对照表，起自1830年1月25日，下迄1949年9月30日，并有二十四节气，末附太平天国天历简表、五千年间星期检查表及韵目代日表三种。它被认为是对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的增补，给近代史研究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10月

3日　方回（向达）在《光明日报》发表《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

作者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科学发展的成就，同时指出了存在的缺点：一是领导不够强，不够明确；二是没有树立起自由讨论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三是没有一种比较全面的历史学的刊物；四是各大学的历史系缺乏联系。

12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

是月　管燮初《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出版。

本书根据十六种较重要的甲骨文著录，以《卜辞通纂》、《殷契粹编》、《殷契佚存》、《殷虚文字》甲编及乙编上中辑为主，系统探讨了卜辞的语法现象。郭沫若审阅过全文。

11 月

汪篯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之托，南下广东邀请陈寅恪担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

陈寅恪以《对科学院的答复》作为回应。云："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陈氏对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职坚辞不就。

邓广铭《王安石》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着重叙述了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的政治思想、主张及实践，为作者代表作，前后共改写四次。1972 年，毛泽东接见来访的田中角荣时曾谈道：你这次来，很像王安石的"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历任日本首相都反华，你来访华，想使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祖宗不足法；……而你不管这些，就是人言不足畏。此言一经传出，人民出版社即商洽作者对该书进行改写并扩增篇幅，着重提出要"特别发挥三不足精神"，并要求在三个月内写好。1973 年，作者将改写好的《王安石》书稿交出，并拿到北大、北师大和"学部"历史所讨论，共同的意见是"没有反映儒法斗争"。于是，作者又将收集到的王安石反对司马光是"代表法家反对儒家"的意见写进书中。

改写之后，又逢批林批孔，出版社又提出加上批林批孔，作者无奈又改写了结尾。修改稿于 1975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叫《王安石——中国 11 世纪时的改革家》。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拨乱反正，出版社又找到作者，要重印《王安石》，并提出对第二次修订时补入的有关儒法斗争与批林批孔内容加以删削和修改，于 1979 年出版，书名未动，修订

过程中对有关史料的发掘、梳理、排比、校补、拾遗、注释做了大量的工作，解决了王安石研究中最难解决的史料问题。

一书三改，当时港台的报纸曾有人撰文论及。进入晚年，作者又对此书做了彻底地修改，在史料考订和辨伪上下了很大功夫，篇幅也增加了二分之一以上，完全摆脱了政治的干扰，并改名为《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于1997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尝言自己最重要的四部书是《陈龙川传》、《岳飞传》、《辛弃疾传》和《王安石传》，其中，以最后完稿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最为引人注目。

刘大年在《科学通报》第11期发表《苏联的先进历史科学》。

文章认为："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努力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就是苏联史学家在工作方法上的基本经验。""中国史学工作者须要努力学习苏联历史科学的先进经验，学习它们已有的一些重要结论；了解它们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哪些是被批判的；并且熟悉它们的工作方向和工作方法等等，来帮助我们有效地加强中国的历史研究工作。"

刘大年关于苏联史学工作的几篇文章，被认为是中国史学界学习苏联经验的指导性篇章。

黄绍湘《美国简明史》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叙述自北美发现、独立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止的美国历史，后经作者修订，更名为《美国通史简编》，由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再版，以后又多次修订再版。

12月

尹达接受中国科学院第41次院务常务会议任命，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协助郭沫若筹建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上古史所）并组建《历史研究》编辑部。

是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专著。

这套系列专著的撰著和编辑出版，历经半个世纪。从1953年开始启动，"文革"中被迫中断，直到2003年才告完成。该系列汇聚了国内各断代史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权威著作，共13卷16册，近1000万字。1955年，杨宽首先完成了《战国史》，当年9月出版后引起学界普遍关注，数年内一再重印。1961年又出版了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

后因种种原因，出版计划中辍。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这套“断代史”出版计划重又启动。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改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种，前者经修订补写于 1979、1980 年，分上下册出版，后者分上下册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齐。杨宽的《战国史》经过较大的补充和改写后，又于 1980 年重新出版。嗣后，又相继推出了林剑鸣的《秦汉史》，南炳文、汤纲的《明史》（上、下），以及周良霄、顾菊英的《元史》。1994 年以后，这套系列专著又先后推出了杨宽的《西周史》与《战国史》（增订本），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顾德融、朱顺龙的《春秋史》，李治亭主编的《清史》（上、下）。陈振的《宋史》，李锡厚、白滨的《辽金西夏史》和胡厚宣、胡振宇的《殷商史》于 2003 年出版。

杨翼骧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调往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

杨树达由湖南大学转入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授。

1954 年

※《历史研究》创刊。
※ 侯外庐发文引发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大讨论。
※ 胡绳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
※ 范文澜发文揭开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序幕。
※ 尚钺提出“魏晋封建说”。
※“标点《资治通鉴》、改编‘杨图’委员会”成立。

1 月

白寿彝在《新建设》第 1 期发表《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

2 月

《历史研究》创刊。

该刊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最早、最具权威性的综合性史学期刊。初为月刊，1961 年起改为双月刊。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发出专门指示：“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为《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

第一届编辑委员会成员有郭沫若、尹达、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晗、季羡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刘大年、翦伯赞、陈翰笙、杨人楩等。郭沫若任编委会主任，尹达任主编，刘大年任副主编。

郭沫若撰写了《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高潮》的发刊词，明确提出办刊宗旨是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郭沫若说：“历史研

究的资料对于我们是绝对丰富的，而历史研究的需要在今天却又相当的迫切。汉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的历史、亚洲各民族的历史乃至世界史都需要我们以科学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和解释。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很多方面，我们不仅还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甚至还不曾有初步的接触。”“我们取名为《历史研究》，用意也就在把范围放宽一点，以展开历史研究工作。‘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这就是我们所遵守的原则。”“但假使一时还得不出‘理论性的结论’，只要能够‘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甚至只要能够提出‘详细的材料’或新出的材料，也都是我们所一律欢迎的。”

1966 年“文革”发动后，该刊停刊，1974 年复刊。

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引发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大讨论。

作者认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皇族所有制”，也即土地国有制。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延续至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态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我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中，占支配地位的究竟是土地国有制还是私人土地所有制即地主土地所有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60 年，讨论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争鸣文章达到 150 余篇。历史研究编辑部 1957 年编辑出版了《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 1962 年编辑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性看法：（1）土地国有制为主要形式说，持此说者有侯外庐、郑天挺等；（2）地主所有制是主要形式说，持此说者有胡如雷、束世澂等；（3）封建土地所有制前后期不同说，持此说者主要有华山、高敏等人，韩国磐、贺昌群的见解也类似于前后期不同说；（4）诸制并存说，持此说者主要有李埏等。

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第一次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作者认为，“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具体特征，我们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主张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要标志，将近代史分为七个阶段（1840—1850 年、1851—1864 年、1864—1895 年、1895—1900 年、1901—1905 年、1905—1912 年、1912—1919 年）。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二三年中，史学界形成了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热潮，孙守任、范文澜、金冲及、戴逸、李新、荣孟源、来新夏、章开沅、赵德馨等纷纷撰文参加讨

论，一些高等院校历史系也召开了专题讨论会。

《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还发表了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王崇武《论元末农民起义的社会背景》等文。

侯外庐撰《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适用于古代中国的问题》发表在东北人民大学出版的《历史科学论文集》第1集。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由中国科学院出版。

作者于1937年出版《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一书。1951年，作者取其中金文跋题成《积微居金文说》刊行。《积微居小学述林》是复取其中说字之文及其他文字结集而成。共收文207篇，凡7卷。卷一至卷三为说文之属，凡120篇。卷四至卷五为通考文字，凡8篇。卷六为故书古史杂考，凡40篇。卷七为序跋书札杂文，凡39篇。

端己编《红巾军》由四联出版社出版。

3月

29日 罗尔纲致信范文澜，对即将奉调到中科院近代史所表示感谢。

信中说：

"奉接手示，喜悉我已奉调到近代史所来工作，我万分感谢党和政府把我这样的恰当的安排，使我从今以后，得亲受到先生的教诲，得参加到一个党性最强的历史研究机关来工作，这是我渴求已久的愿望！

"现在我首先向先生致以恳切的衷心的敬意，请求先生把我认为一个还可教育的学生，虽然已经是白发苍苍，但只要他还有工作的活力一天，就不断地对他训诲、提高，使得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接着我要向全所同志致敬，请求大家对我这一个正在向马列主义开始学习的人，多多指示，多多帮助，使我在同志们扶掖之下，也逐渐地跟得上队伍，以参加我所的工作。

"闻说刘大年副所长已到南京，我今天就去向他请指示工作。"

是月 贾兰坡《从猿人脑发展到现代人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陈寅恪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论韩愈》。

文章从六个方面论述了韩愈在唐代文化之特殊地位，认为韩愈实乃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转折点之人物也，而千年以来论韩愈者尚未能窥其蕴奥。全文多用习见之材料，融精微考证与宏通思辨于一体，充分体现了陈氏见微知著的治学特点。

此后，《历史研究》再未刊发过陈氏论文。

同期还发表了向达《南诏史略论》、荣孟源《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杨树达《关涉周代史实的铭文五篇》等文。

《历史教学》第 3 期刊登 C. 喜尔著《斯大林与历史科学》。

荣孟源《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由三联书店出版。

全书共十章，从鸦片战争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为纲，概括了一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史。由于该书满足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学习中国近百年史，以便从中学习到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观察历史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时代需要，受到读者广泛欢迎。1955 年，日本学者将其译成日文出版。

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由群联出版社出版。

线装，4 册，收录甲骨 5642 片。

完白编《唐代的长安》由四联出版社出版。

杨宽在《文史哲》第 3 期发表《论春秋战国间社会的变革》。

文章从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变以及秦国的变革过程论述了“战国封建说”。文章认为，这时促使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便是铁器使用的发明，而且，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水利事业也已有了发展。秦蜀守李冰在四川成都平原的水利设施，更是大规模的有利于生产的建设。把战国的生产情况和春秋作一比较，很显见的，这是跨上了一大步。生产这样的突飞猛进，必然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及其上层建筑的相适应的改变。跟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在春秋战国间商品经济的比重，也就一天天地增多，这种商品经济的基础是建筑在手工业经济和卷入交换之中的农民经济上的。这时所出现的商人垄断市场的情况，城市繁华的情况，铸造货币流通的情况，高利贷横行的情况，都是战国以前不曾有过的。春秋时货币简直找不到踪迹，列国君臣送礼、贿赂和赎罪，大抵为服饰、珠宝、丝帛、粮食、家畜和奴婢，而无黄金货币，和战国时代动辄用黄金千斤千镒的决然不同。春秋以前的土地占有形态，是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一层层分封下来的，最高的所有权是属于天子（即王）的，诸侯、卿、大夫等只有使用权，不能够随便转让的。而战国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荒地的开垦一代比一代多了，越出原有封疆开垦出来的土地一天天多了，于是新的土地私有权就产生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广泛流通，高利贷的横行，使土地也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可以作为商品买卖了。另外，从秦国

整个变革过程看来，春秋战国间社会的变革也是由领主封建制转变为地主封建制。

4 月

2 日　梁思永逝世，终年 50 岁。

是月　《历史教学》第 4 期刊登社论《悼念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学习斯大林关于历史科学的理论》。

王仲荦在《文史哲》第 4 期发表《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农村公社”进行深入研究。

该文被誉为“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探讨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村公社制度的性质和作用”。吴大琨在《回忆〈文史哲〉初期的王仲荦教授》（《文史哲》1986 年第 5 期）一文中说：“在当时王仲荦教授所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我认为发表在 1954 年 4 月号《文史哲》上的《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一文，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探讨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村公社制度的性质和作用。仲荦教授在文章中说：许多世纪中，村公社的继续存在，成为古代专制国家停滞性的坚强基础。所有村公社的社员，只能成为土地的使用者——他的占有，也是经由劳动实践过程为前提之下发生的——而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公社社员既不是公社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本身就会变成公社的财产，也就会变成专制君主变相的奴隶。他们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了起来，完成着自给自足的生产，他们要经常地向他们的统治者贡献力役，也贡献物品。这些公社成员们，在身份上虽是‘自由’的，在经济生产上也是独立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公社成员们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就比较奴隶或以后的隶农们来得轻，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也许还重得特别厉害。在这种特殊生产形态里，自由人生产还是占重要的地位，奴隶的劳动不能尽量代替自由人的劳动，这样，不但阻碍了奴隶形态的发展，也会阻碍了以后农奴形态的充分发展。我认为仲荦教授这段话是十分精辟的，他所说的‘特殊生产形态’，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以，我认为，王仲荦教授应该说是中国历史学界第一个以他独立的研究证明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适合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他的这一贡献，在学术上的意义是很大的。”

5 月

20 日　翦伯赞在《光明日报》发表《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强调考古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文章说，历史研究工作者不应望着考古的发现视若无睹，以为自己的责任只是咬文嚼字、寻章摘句，而是要以更大的努力不断地向考古发现吸收知识去丰富中国的历史，补充和订正中国的历史，把考古的发现应用到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去，使这些发现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教材。

21 日　文化部主办“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在故宫午门城楼举行。

展品共 3760 件，毛泽东曾两次观看了这个展览。展期近半年，观众达 17 万余人。

是月　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该书介绍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证据及人类发展的几个阶段，系统论述了自中国猿人开始的中国整个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及其特征，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历程。其尤具价值之处，在于对中国早期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流变这一核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创见。作者认为：“汉代文化”是古代最成熟、最繁荣、最强大的文化，是真正的或典型的中国文化。汉代文化上溯，中经战国、春秋可推至西周。周初的文化大部分承袭了殷代文化，到了春秋战国才有所发扬。可能在这段时期内，吸收了附近许多其他地方性文化的优点，而形成了汉代文化的“先型”，后经秦代而发展为强大的汉代文化。殷代文化就是河南安阳的“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之间还有一个相当的距离，其间不能不有一个过渡的阶段，可称为“原始的中国文化”。传说中的“夏代”，大概就是这个过渡时代。夏代文化应当就是原始的中国文化，或者说是发展为汉代文化的基础。作者强调，没有任何理由把殷代文化解释成由外国输入的一种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黑陶文化的扩散，使我国各地区的地方性文化，第一次受到统一的影响。原始的中国文化的发生和扩散，是又一次的统一。最后强大的汉文化则是第三次的统一。

书中还批驳了外国学者提出的“中国无史前文化说”以及“中国文化西来说”。

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根据 1949 年前在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的提纲改编、整理而成，1949 年以后又作了若干修改。全书共十一章，从唯物与唯心、进

步与保守的路线斗争入手来揭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孔子和思孟学派及道家和道家的逻辑派，被列为保守派，他们的全部理论都被判定为落后的、反动的；墨子、墨家后学、荀子、韩非等人被列为进步派，他们的全部思想都被解释为进步的。

该书在国内外颇受重视，1973年7月印行第2版，以后又曾多次印刷和再版。在语言文字上，对引文都采用白话转译的方式，有助于一般读者了解掌握中国古代思想的大致内容。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由中国科学院出版。

本书收录作者1945至1953年间所写有关甲骨文字和古史的论文53篇，分上下两卷。卷上说字，收文33篇，分识字、说义、说通读三类。卷下考史，收文20篇，分人名、国民、水名、祭祀、杂考五类。卷外有卜辞琐记49则。

童书业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学术思想》。

文章对胡适从"实验主义"出发的"考据"历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胡适的"考据"文字只是"实验主义"思想方法的几个实例，企图通过这些实例把"实验主义"的毒素种到青年的头脑中去，变成抵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防身的本领"。胡适的"考据"论文引导人脱离现实，专钻牛角尖，以减少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所起的"危险"作用。这类"考据"因为他的方法错误也往往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6月

罗尔纲《忠王李秀成传》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郭沫若《金文丛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32年5月，作者出版《金文丛考》，同年秋，作《金文余释之余》。1933年秋，成《古代铭刻汇考》，翌年春续作《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54年的这一本《金文丛考》，把以上四书中的金文部分汇集起来，并略加删改补充，主要观点和材料仍旧。

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原书名为《辛亥革命与袁世凯》，194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本次重版进行了修订。

该书以时间为经，以重大事件为纬，脉络清晰，语言凝练，将辛亥革命前后纷繁复杂的历史概貌叙述得明白晓畅。论述全面且重点突出，尤以

政论见长，长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给予重点的、定性的分析。是建国初期中国近代史的典范性作品。

梁园东《中国政治社会史》第一分册由群联出版社出版。

第二分册 1954 年 10 月出版，第三分册 1955 年 7 月出版。

该书从政治社会各种形态入手分析中国社会演变发展的规律，以求说明其演变发展的具体过程。第一分册出版时名为《中国社会发展史》，后改用现名。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时间虽长，但仍时时在演变发展之中，因此不存在“停滞”、“循环”、“再现”等问题。作者也不同意秦汉有“新兴地主阶级”的说法，认为由西周到东周所完成的种种制度，是“典型的封建制度”。

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集中讨论了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与作者另一著作《西周与东周》（新知识出版社 1956 年出版）一同成为春秋封建说的代表性作品。作者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社会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的论断为依据，把阶级关系的发展和变更作为区别两种社会形态的标准。作者认为，夏是比较温和的奴隶制，商和西周是奴隶制的繁荣期。成康之世以后，由于奴隶来源渐告枯竭，奴隶制开始步入衰退，厉王时代则渐至灭亡，宣王开始转入封建制。春秋时代已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特征愈加彰明。

力持“春秋封建说”者还有唐兰等人。

赵俪生、高昭一在《文史哲》第 6 期发表《论有关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几个问题》。

同期还刊登了卢南乔《元末红巾起义及其进军高丽的历史意义》等文。

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 3 期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拉开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序幕。

1953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中译本。在其中收录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斯大林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范文即根据斯大林所论民族的四个特征，再依据《礼记・中庸篇》所载“今天下车同轨，

书同文，行同伦”一语，认为“今”指秦统一以后。“书同文”便是“共同的语言”，汉族生活的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便是“共同的地域”，“行同伦”便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作者由此得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结论。

这一看法一反当时苏联学者叶菲莫夫认为的中国民族出现于近代的观点，也与斯大林民族产生于近代的论断相抵牾，因此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大批学者纷纷撰文参与讨论。多数学者反对范文澜的观点，认为秦汉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商品生产不发达，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不存在共同经济生活，因此秦汉时代不可能产生民族，只能是部族，并批评范文澜提出的汉族具备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也不准确。在讨论中，除了范文澜等“秦汉之际形成说”之外，还出现了“明代后期形成说”、“鸦片战争以后形成说”。

同期还发表了黎澍《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汤用彤、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它的政治背景》，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周一良《论诸葛亮》，罗尔纲《金田起义事实考》等文。

江苏丹徒出土西周青铜器《宜侯夨簋》。

此器共有铭文126字，对了解西周的分封制具有重要价值。

7月

吕振羽《史学研究论文集》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所收文章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关于唯物史观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二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专题研究，包括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研究、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等。所收论文包括《关于治史方法方面的零片意见》（1949年11月在东北行政学院的报告）、《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的解答》（1950年11月对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师生的报告）、《关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和特点问题》（载《新建设》1950年第12期）、《伟大民族民主革命的开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后改题为《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载《学习生活》第3、4、5期）、《论社会思想意识》（载《东北日报》1951年4月14日）、《我们伟大祖国的伟大文化遗产》（载《东北日报》1951年4月15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几个问题》（1951年7月对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夜党校政治常识班的讲稿）。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诠释和宣传，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学术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起了推动作用。

漆侠《隋末农民起义》由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根据《隋书》、两《唐书》、《资治通鉴》，并参考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论文和其他有关著作写成。对农民起义前隋封建国家的概况、农民反隋斗争、隋末群雄纷争和唐帝国的统一等进行了叙述。并分析和论证了隋末农民起义的特点和作用。作者认为："国内外矛盾的发展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便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个特点；而粉碎对高丽的战争，也就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作用。"

韩国磐《隋朝史略》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第一本隋代断代史，篇幅较小，内容简明扼要。

华岗《辩证唯物论大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在北戴河提出应为曹操翻案。

毛泽东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8 月

22 日　顾颉刚由上海抵达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级研究员。

1953 年秋，中国科学院院部会议决定请顾颉刚到该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顾颉刚当即应承下来。此时夏衍对顾说："北京有好些人希望你去，说你这样的年纪，也不必学习了。"这句话给了顾很大安慰，他说："我以为到了北京之后，就可以照我预定的计划读书写作，不再参与社会活动，趁我精力还够的时候干上十余年，还可以做出一点真正的成绩来，不辜负我一世的心愿。"

是月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录作者撰于 1939 至 1940 年的五篇论文，1942 年曾由耕耘出版社刊行，本次重印由作者进行了修订。其中，《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一文是全书的中心。《"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

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等篇叙述了各个问题的发展过程，着重批驳了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史观。

作者对发表于1940年10月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一文作了重大修订，认为形成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根源有四：（1）农民为逃避残酷的剥削压迫，便在农民战争、民族战争中及其失败后，向四周移徙，结果促进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迟缓了中原汉地的社会进步；（2）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带来的严重破坏，以及地主阶级为镇压农民的反抗，而施行的屠杀、焚烧、劫抢，都阻滞了社会的发展；（3）封建皇帝、贵族、官僚地主步步趋向豪奢，直接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进步，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与私家手工业及自由商业资本的发展，尤其妨碍自由商人资本向资本主义资本的转化；（4）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则直接遭到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侵略。

1961年，改由北京三联书店重版。

历史教学月刊社编辑《中国历史人物论集》由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提出“魏晋封建说”。

该书原是中国人民大学所设中国古代通史课程的讲义，记述了从原始社会到1840年的中国历史。引人注目之处在于首次明确提出“魏晋封建说”，成为在古史分期讨论中除“战国封建说”、“西周封建说”之外影响最大的一派。这一派的代表性学者还有王仲荦、何兹全、日知、赵俪生、王思治等。

作者在该书第六章对明代的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认为在明代，东南沿海一带，在生产方式中，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地增长起来；但另一方面，这种资本主义因素，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后，受到了封建社会的各种压制与打击，未能获得迅速的发展。明代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产棉区和棉纺织业中心的改征银币，农业中大批雇工的出现，都说明了明代农业上资本主义因素在显著增长。而且，在清代的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手工业、制造业都占一定的地位”。这一观点被认为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作了高估，受到严厉批判。

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写作的完整的中国通史”，为建国初期摒弃旧体系、旧观念，采用全新

的观念解释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范例，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理论学习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是相当长时期内高等学校中国古代史课程的重要教材之一，也成为中小学历史教材编写的基本参考书。曾多次重印，有日文、俄文、波兰文等译本。1980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

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由人民出版社重版。

邓广铭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

此文主要目的在于阐明唐朝的租庸调法是以人丁为本，而不是如历来所理解的那样——“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丁则有庸”。为了说明租庸调法与均田制并无必然的联系，作者提出，唐朝颁布的《均田令》并未认真实施。文章刊出之后，引起相当大争论，很多人不同意作者否定唐代曾认真实行过均田制的论点。《历史研究》1955 年第 5 期刊登岑仲勉《租庸调与均田有无关系》、韩国磐《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等三篇文章与邓文进行商榷。

翦伯赞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

此文意在否定魏晋封建说。文章从两汉官私奴婢的数量、来源、任务、待遇等方面说明两汉的官私奴婢不同于奴隶制社会的奴隶，而是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因此，这些官私奴婢的存在并不能改变两汉的社会已经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封建社会这一判断。

季羡林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文章通过考证认定至迟在 7 世纪半中国纸已经传到印度，而传过去的路径是陆路。文章发表后引起争论，作者于 1979 年又写作《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问题的补遗》，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

同期还发表了邵循正《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买办化军阀官僚势力的关系》、王崇武《论元末农民起义的发展蜕变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等文。

9 月

22 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在贾兰坡主持下开始发掘丁村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

丁村遗址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是我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之一。出土有属早期智人阶段的丁村人牙齿化石三枚，旧石

器二千零五件，1976 年又发现一块小孩的右顶骨化石。丁村人形态介于现代人和猿人之间，其门齿具铲形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相近而与白种人相差较远。石器原料主要为角页岩，属石片石器系统。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球等。三棱大尖状器有显著特点，故命名为丁村文化。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主要以丁村文化为代表。

丁村考古发掘队集中了当时全国第一流的一批各专业科学家。贾兰坡任发掘队长，成员有裴文中、吴汝康、周明镇、刘宪亭、王泽义、邱中郎、吕遵锷、王建、张德光、丁来普、傅子安、张来瑞、解春华、张国斌、程玉树、邢文斌、徐兰芳等。出版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是月　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第 9 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将批判胡适运动推向高潮。

1954 年 3 月，《新建设》杂志发表俞平伯《红楼梦简论》，扼要总结了《红楼梦》研究心得。俞平伯早年著有《红楼梦辨》（1952 年修订再版时改名《红楼梦研究》），与胡适《红楼梦考证》齐名，被称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李希凡、蓝翎对俞氏观点提出批评。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10 月 10 日，《光明日报》又发表李希凡、蓝翎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再次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进行批判。文章明确指出“俞平伯的见解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清朝乾隆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萌芽孕育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反映，社会关系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红楼梦》正是这种时代性在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反映。指出贾府的衰亡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着，表明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贾宝玉的身上体现着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反映着个性的觉醒。而贾宝玉的悲剧也“曲折地透露了那个时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变革封建制度的历史要求”。10 月 16 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其他同志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文中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10 月 24 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对在《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10 月 27 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

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影响。

与此同时，中宣部制订了根据毛泽东意见修改而成的胡适批判计划，决定从九个方面来批判胡适：一、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三、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四、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五、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六、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七、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八、《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九、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为领导这场批判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组成。

其后，在全国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波及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也引发了历史学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始发掘。

半坡遗址为黄河中游地区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距今约六千年，属仰韶文化遗存。遗址于1953年春发现，从1954年秋至1957年夏，共进行了五次发掘，发掘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左右。遗址现存面积约五万平方米，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发现窖穴、陶窑、房屋、圈栏遗址等约三百处，墓葬二百余座。共出土各类器物近万件，石斧、石锛、石刀、石铲等已经采用切、削、磨、钻等较高技术。钵、盆、壶、罐、瓶等彩陶上绘有动植物花纹和几何线条纹，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陶器、陶片上有些简单的刻画记号，则为原始的符号文字，说明我国文字起源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地窖内发现有粟壳、菜籽，证明我国是世界上农业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产粟的国家。围栏遗址则表明饲养家畜的出现。这一遗址内容十分丰富，对研究仰韶文化，以及母系氏族公社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有半坡博物馆。

高教部颁文通知高等学校开设中国现代史课程。

李亚农《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写作本书意在两端：一是根据春秋、战国以及汉初文献来详细地研究周族的氏族制，一是研究氏族社会和封建社会接触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全书除绪论外，分前、后编，共十四章。付梓前曾经顾颉刚校阅。作者认为周族的宗法制度贯串着三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因此，彻底研

究灭殷时期或稍前于灭殷时期的周族的宗法社会是解开中国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改排第1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次重排新版“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加添了好些改正”。首先是把篇目改还了原样，改变了“依据研究内容的时代先后”排列的做法。其次是对原书中由于有些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而导致的结论，“尽可能地进行了删改”，对因变动太大“不便删改的地方，则加上了补注”。作者指出，从当时的材料看，殷代已进入奴隶社会，奴隶制的下限应定在春秋战国之交。

10月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由群联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作者主要著作之一，共两册，从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来研究中国货币发展史。全书大体按朝代顺序，分述先秦、两汉、晋到隋、唐、两宋、金元、明、清的货币情况。共八章，每章的内容都分为货币制度、货币的购买力、货币研究、信用和信用机关四部分，其中以货币的购买力为主。

书中开创性地着重对货币购买力的变动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货币的购买力，短期看变动非常激烈频繁，但从长期看，有逐渐降低的趋势，其中的一大原因是货币本身跌价。作者搜集了1436年开放银禁至1935年废止银本位五百年间的米价记录一千多种，以此论证白银购买力的变化倾向。还对历代主要商品的价格和比价作了叙述和比较，对清末各种货币的数量进行深入分析，并同历代和外国作了比较，从中既可看出清末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也可看出当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农民和工人的收入两三千年间没有什么增加，但比欧洲封建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要高；官吏的俸禄则成抛物线状变化，以唐宋为顶点。

作者强调，研究货币史一定要将货币学和钱货学相结合。

“标点《资治通鉴》、改编‘杨图’委员会”成立

该委员会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成立的，由吴晗和范文澜领衔，尹达、侯外庐、刘大年、翦伯赞、金灿然以及高教部和地图出版社的负责人组成。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由王崇武为召集人，顾颉刚为总校对，聂崇岐、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容肇祖、何兹全等参加标点。工作开始后，由于顾颉刚一人无力承担总校任务，1955年又成立

校阅小组，顾与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共同校阅。同年 5 月顾颉刚患病，由聂崇岐主持工作。标点工作选择版本较佳的清人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为底本，并参考前人校勘过的宋、元、明各本，集历代校勘之大成。分工标点、分段的第一期成果，均再经二三人互校，最后交工作委员会复审。1955 年底标点完毕，由古籍出版社于 1956 年 6 月出版。

由于《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很快结束，原“标点《资治通鉴》、改编‘杨图’委员会”正式改名为“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杨图”改绘工作由谭其骧主持，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等单位的百余人参加。自 1963 开始，工作范围已超越改绘“杨图”，进入了新编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地图集的阶段。这项工作到 1973 年基本完成，1974 年起陆续出版内部试行本，1982 至 1988 年出全 8 册，公开发行《中国历史地图集》。

《图集》有四个特点：（1）以往的历史地图一向只画中原王朝，实际上抹杀了非汉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此《图集》则以 1840 年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基本范围，所有在此区域内少数民族政权都绘入图中。（2）以往的历史地图只以文献资料为定点上图的依据，错漏较多，而《图集》广泛吸收了考古、地理、民族等相关学科的成果，填补了文献的空白，纠正了前人的错误。（3）“杨图”政区的年代太不统一，《图集》则确立标准年代，尽可能显示同一年代的政权疆域和政区建置。（4）“杨图”通过将全图分解的做法克服了“一朝一图”过于粗略的缺陷，但由于采用同一比例尺，内容详略差异很大，《图集》则各分图按内容密度采取了不同的比例尺，做到详略得当、清晰美观。这套图集共 20 个图组，有图 304 幅、549 页，全部采用古今对照，绘入古地名约 7 万个。《图集》是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白寿彝、王毓铨在《历史研究》第 5 期发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

该文对官手工业的古老传统、封建性质、官手工业不同时期的发展、官手工业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积极影响及其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发表后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长寿在《历史研究》第 5 期发表《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

作者认为，研究蒙古草原的奴隶制，是具体解决亚洲和中国各族人民社会发展史的主要问题之一。文章利用大量民族史资料，详细论证了匈奴奴隶制的产生、发展和特征，以及匈奴的家族奴隶制、匈奴的部落奴隶

制、匈奴的奴隶对奴隶主的斗争、匈奴部落国家的经济性质等问题，从而得出了古代匈奴部落国家是亚洲草原上最典型的奴隶制社会的结论。

11月

5日　王若水在《人民日报》发表《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方法》。

文章指出，胡适的实验主义影响着俞平伯和文化界的一些人，因此认清胡适思想的反动性，清除其影响，是文化界、学术界当前的任务。

8日　《光明日报》刊登《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

郭沫若认为，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不仅仅对于俞平伯本人，或者对于有关《红楼梦》研究进行讨论和批判的问题，而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动力。”“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还很少去碰过他。”

12日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研组举行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会。

是月　（苏）依·孔恩等著、张蓉初译《历史科学的特性与任务》由群联出版社出版。

冯家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郦禄遒在《文史哲》第11期发表《太平天国的供给制度》。

杨树达《耐林庼甲文说·卜辞求义》由群联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耐林庼甲文说》与《卜辞求义》二书的合刊。前者收集作者说甲骨的文字六篇，包含《释多介父》、《甲骨文中开矿的记载》、《说殷先公先王与其妣日名之不同》等，为编定《积微居甲文说》时所裁汰的部分文字。《卜辞求义》是作者十多年间读甲文诸家之书所作札记，共分二十八部。

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在《文史哲》杂志发表的八篇论文的合集，这些论文都是

以《由封建的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引论到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诸问题》这一题目发表的，从而构成了一个体系，即从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引论到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问题，如中国集权官僚政治问题、天道观念的政治思想问题、民族产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等，并且较广泛地说明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在有机联系。

作者20世纪30年代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原始共产社会，本书中作者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不发达的奴隶制。

关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长期停滞在地主经济的封建阶段，就因为这种经济形态本身已经存在着一些使它不易在胎内好好孕育出新生产方式的限制，而以这种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官僚政治组织和儒家学说，更从中作了许多缓和矛盾对立的措施。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在农耕技术方面，在工商业组织规模及经营方面，在文化交通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不少的进步，只是由于上述种种条件的限制，使在进步方面的量的积累，不能引起质的大变革。

李俨《中算史论丛》第一集由中国科学院出版。

第二集1954年12月出版；第三集1955年3月出版；第四集1955年6月出版；第五集1955年7月出版。

该丛书为作者旧集，1949年前，作者陆续发表有关中国数学史论文八十余篇，1931—1947年间择其要者辑成《中算史论丛》四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版将其详加修订，或全部重写，或局部修改，并补入新发表的论文，重新编排成五集。

该书对我国各时代的数学文献、中算家的成就与史迹进行了系统整理。第一集集录了中算家各项成就。第二集集录和研究了我国各时代的算书，并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近三十年中算史料的发现。第三集介绍我国明清之际西算输入情况和中算家对当时输入的西算研究之成就。第四集论述了我国特产筹算和珠算的制度，并系统述说唐、宋、元、明、清的数学教育情况。第五集主要清理了中国历算与佛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详细介绍了中算输入日本和朝鲜的经过。

12月

8日　郭沫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作主题发言批判胡适。

郭沫若说，胡适是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也是

中国最大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胡适在1949年前曾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了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对峙，双水分流'。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潜在势力是怎样呢？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的思想立场都和胡适的反动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把反封建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古典杰作《红楼梦》说成为个人忏悔的是胡适，把宣扬改良主义的封建社会的忠实奴才武训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也正是胡适。胡适的潜在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好些人一直到今天都还受着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

这篇讲话，对批判胡适起了推动作用。

9日　周一良在《光明日报》发表《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

文章认为，今天来批判胡适思想在历史学方面的表现，指出他唯心论的"历史观"毒害所在，清除胡适思想在历史学方面的表现，是完全必要的。

文章说，胡适自封为历史学家，其实他并没有在历史科学范围之内作任何工作。他心目中所想和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主要的只是脱离实际的整理国故而已。"原来胡适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整理国故之间画了一个等号。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考据的方法，从文字、声音、训诂、校勘、辨伪等方面去整理古书，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使它们可以了解。从我们今天看来，这是史料整理的工作，只能算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必须更进一步在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指导之下，去分析、解释、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才是科学的历史研究。而胡适却停留在这第一步上，死抱住不放，企图以整理国故为幌子，抹杀阶级斗争，引导青年脱离现实，脱离当前的阶级斗争。胡适在历史方面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属于整理国故范围内的辨伪工作，根本不牵涉到历史。"

文章还对胡适"滥用考据方法的危害性"进行了批判，指出"我们并不否定考据学在科学研究上的作用，但是考据学毕竟只是一种工具"，"如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指导之下，从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把这工具应用在必须应用的问题上，可以帮助我们在探求真理的途径上少走弯路。但如果这个工具掌握在唯心论者手里，应用在无关重要的、繁琐无聊的问题上，或者甚至于为考据而考据，便是滥用这一工具，徒劳无补费精神了"。

15日　孙定国在《光明日报》发表《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反动

实质》。

本月 29 日及翌年 1 月 12 日连载。文章分“引论”和“关于方法论的批判”两部分，绝大部分篇幅用来批判胡适的方法论。文章分析了胡适的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对抗性质，批判了胡适的方法论基础即杜威的“五步法”，并对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进行了分析。作者具体评述了胡适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两篇文章，认为胡适的方法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

25 日　《人民日报》刊登顾颉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顾在发言中极力撇清与胡适在学术上的关联，云：“至于我的学问的实质和基本方法，原是宋人和清人给我的，他们固然受着时代的限制，不能作出圆满的理论来，到底是在祖国的长期文化里自生自长的，我们应当加以批判而接受其优秀的遗产。至于我想把经学变化为古史学，给我最有力的启发的是钱玄同先生，同胡适绝不相干！胡适还常常用了封建思想给我们反驳呢！在 1930 年左右，我已经感到历史唯物论足以解决一切学术思想问题，曾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文上说，要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不妨用考据学的方法来解决，而在研究古代思想及社会制度时则不该不取历史唯物论作为基本观点。这就是感到了考据学用的形式主义的逻辑有其局限性，研究决不能全面，也决不能彻底；要求全面和彻底的研究便非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面用功不可。不过那时候我安于现状，为了旧材料的处理已经压得太重，怕去增加新东西的负担，以为学问应当分工合作，我做了初步的考据工作，听人选用，已算尽了我的职责。现在知道，这是我打成两橛的错误想法，就是做小问题的考据也该从正确的基本原则出发，把理论联系到事实，方不致陷于支离破碎，玩物丧志。胡适本没有掌握丰富的历史材料，又贩卖了空疏的反动的实用主义过来，大吹大擂，买空卖空，根本不能给我们解决什么历史问题，拿章炳麟、王国维的著作来比较，他实在差得太远；至于离开了文学批评来谈文学，更是隔靴搔痒。只要看《红楼梦考证》，在他的《胡适文存》里或者是他自以为最好的一篇文章了，然而他的研究始终停滞于著者身世和版本先后的问题上，一点也看不出这部古典文学杰作中反抗封建社会的思想本质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就是一个极明白的例子。”

顾氏的发言，标志着民国时深受胡适治学思想影响的一批学人开始了痛苦的思想转变。

是月　赵俪生、高昭一《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由新知识出版

社出版。

书中论述了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吴广起义开始的历次大小农民起义，并对农民政权的性质问题、皇权主义问题、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农民战争与统一战争的关系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书的出版，奠定了作者在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开拓者的地位。

赵俪生《史学新探》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该书体现了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问题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成果，共收录《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1949年冬发表于《新建设》）、《学习〈矛盾论〉，联系史学工作的一点体会》（1952年6月发表于《文史哲》）、《论历史科学的内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1954年刊于《新山大》）、《马克思怎样分析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历史?》、《恩格斯怎样分析德国的农民战争?》、《谨评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就，兼论中国文献学所可能预期的水平》、《说蜀汉的兴起》、《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的反清斗争》、《我讲授“明史”的两点心得》等九篇论文。

孙守任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

文章对胡绳提出的近代史分期标准提出商榷，认为应“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性质的某些变化”作为划分标准。孙文指出：“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是一个特殊过渡性的社会，因而在考察这个社会历史的分期问题时就不能不特别注意到这个社会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阶级斗争性质上的某些变化，而不能只拿阶级斗争的高潮和低潮作标准来考察。”

吴大琨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

文章认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在划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理论问题。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以及他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中所提出的西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据都是不够充实的，在运用史料的方法上、理论上，都有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地方。凡是范文澜认为可以解释成西周是“封建社会”的材料，也都可以解释成是“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的材料。因此，要勘定西周（乃至西周以后）的社会性质，关键不仅仅是在史料上，而是在理论上，在于所使用的理论是否正确。作者认为，区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是在不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

吴文发表后，戚其章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发表《关于西周

社会性质的问题》，认为吴文的结论值得商榷，并将西周划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期，即封建主义作为生产的主导方式刚刚建立的时期。吴大琨于《历史研究》1956 年第 3 期上发表《关于西周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对戚文进行答复。

同期还发表了岑仲勉《论周代社会史料的运用问题》、陈梦家《西周文中的殷人身份》、杨树达《耐林庼金文说》、周谷城《圭田辨》等。

张香山《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赖家度、李光璧《明朝对瓦剌的战争》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荣孟源《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认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评论我国历史人物，是我国历史科学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作者主要论述了以下这些观点：一、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是生产方式；二、历史的发展始终需要人们来干预；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四、历史上的人物可以加速或延缓事变的进程；五、评论历史人物以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为标准，分析历史人物须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历史人物必须全面、充分占有材料，给历史人物以正确的评价。

是年

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第一所、第二所、第三所。

第一所研究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间的历史，所长郭沫若，副所长尹达。第二所研究隋唐至 1840 年间历史，所长陈垣，副所长侯外庐、向达。一所的日常业务工作由尹达主持，二所的日常业务工作由侯外庐主持。原有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改为第三所，所长仍为范文澜。

一、二所成立后，顾颉刚、杨向奎、胡厚宣、张政烺、贺昌群、王毓铨、谢国桢、孙毓棠等相继调入，并特邀蒙文通、唐长孺、谭其骧、白寿彝、翁独健、韩国磐、李埏、邱汉生等参加研究工作。

《近代史资料》创刊，荣孟源担任主编。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成立后，范文澜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在近代史所成立了以荣孟源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郭沫若题写刊名，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 4 期，每期约 20 万字左右（个别期号达 30 万—50 万字）。1959 年停刊，共出 24 期（总 1 号至 24

号）。1962年复刊后，改为不定期刊物，由中华书局出版，共出版12期（总25号至36号），1965年再次停刊。1978年《近代史资料》编辑室重新成立，《近代史资料》再次复刊，至1980年仍由中华书局出版，共出8期（总37号至44号）。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刊作为全国唯一专门发表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学术刊物，自创刊以来，陆续刊出1840—1949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其中有档案、函电、日记、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照片、拓片等原始资料，还有年表、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的外文资料的译文，在海内外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和史学工作者中颇具影响。

同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还创办了《近代史资料专刊》，主要收录篇幅较大，《近代史资料》无法容纳的专题史料。至1984年止，共出版专刊22种：《民报》（科学出版社，1957年）、《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鄂州血史》（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庚子纪事》（科学出版社，1958年）、《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3年）、《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山东义和团案卷》（齐鲁书社，1980年）、《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吴虞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范文澜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发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

文中单立一节，重点论述“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这一主张，遂使作者成为“西周封建说”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作者认为，周初之大分封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周代与殷代不同，已无大规模的人殉，显示出了与其不同的社会性质，西周时代的生产者已有了自己的生产工具和独立的经济生活，其性质应该是农奴，西周的宗法制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1955

年 3 月，作者在修订再版《中国通史简编》时将此文改作《绪言》。《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版，扩大了“西周封建说”的学术影响，并推动学术界就古史分期的标准、我国奴隶制类型、西周社会性质等理论问题展开激烈论辩，从而在 1955 年至 1956 年掀起了 1949 年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第一次高潮。

本文是西周封建说的代表作，认同此说的还有翦伯赞、吕振羽、吴泽、束世瀓、徐中舒、王玉哲等。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作小组，由严中平主持编纂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

该丛书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至 80 年代，先后出版了近代工业、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外债、铁路、航运史等资料集八种三十多册。包括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李文治、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等。

该丛刊取材广泛，有报刊、专书、档案、企业账册和调查报告，内容十分丰富具体，为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为经济史研究者所必备。

郑天挺在南开大学开设“史料学”课程。

这是一门研究和利用史料的方法课，除专门介绍《明史》、《清史稿》外，主要讲授史料的分类和辨别，文字史料的可靠性、来源、阶级性及其用途，史料的批判和应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1957 年，郑氏对该课内容进行调整，强调理论性，课程内容共分六章：一、史料学的概念与任务，二、历史辅助学科，三、历史资料的来源，四、史料的搜集，五、史料的批判，六、史料的利用。由此逐渐形成自己的史料学体系。

湖北京山县屈家岭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被命名为“屈家岭文化”。

1955 年

※ 邓拓发文引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
※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出版。
※ 尚钺发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
※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出版。
※ 孙祚民发文引发农民政权性质大讨论。
※ 杨宽《战国史》出版。
※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版。

1 月

4 日　罗尔纲在《光明日报》发表《两个人生》。

文中对自己中了胡适“超阶级的政治立场，为考据而考据钻牛角尖”的“反动学术思想”的毒进行自我检讨。

6 日　《光明日报》刊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座谈会发言摘要。

向达说，自己过去无形中受到胡适思想的毒害。

邓广铭认为，胡适常常自称他是一个有“考据癖”的人，是经常自吹以“历史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问题的人，而事实上他的一切思想方法却是以从美国贩来的那套“实验主义”为其最高指导原则的。他把“发明一个字的古义”和“发现一颗恒星”相提并论，就使得许多对于中国历史文献发生兴趣的人都成了他的俘虏，老老实实钻进故纸堆去，以能够“发明一个字的古义”或能够找得一件较冷僻的历史资料而沾沾自喜。

齐思和认为，胡适有意识地诱导青年们脱离现实，不问政治，对于惊天动地的大事熟视无睹，来考证“一个字的古义”。将活生生的、极富于现实意义历史科学弄成死气沉沉、玩物丧志的东西。

邵循正认为，胡适的考据学以萎靡的精神和十分枯槁的容貌出现，反

映了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

杨人楩说，要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从而建立新中国的史学，必须以清除胡适的腐朽资产阶级思想为先决条件。

张政烺认为，胡适把历史和编写割裂开，其目的是使有机会接触史料的人都不认识历史，把历史的解释权奉送给野心的政客和反动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者。

翦伯赞作总结发言，认为胡适已经是一条死狗，这条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阴魂未散，还在新中国作怪，他还企图在新中国借尸还魂。打这条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难。

9 日　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引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

作者认为，《红楼梦》反映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衰落、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一部伟大作品，“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封建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因此，《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此文发表后，引起大批学者的关注，逐渐从讨论《红楼梦》社会历史背景转而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许多学者如傅衣凌、侯外庐、吴晗、尚钺、翦伯赞、吴大琨、黎澍等都参加了讨论。1955 年后十年间，发表论文达二百多篇，成为当时史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16 日　荣孟源在《中国青年》第 2 期发表《胡适这个人》。

文章说胡适继承了官僚地主商人家庭的遗风，是上海滩上的小流氓、洋奴才，混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卖膏药的骗子，当上了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大买办的文化领班。

19 日　吴文祺在《解放日报》发表《批判胡适派的考据方法》。

20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1954 年 7 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呈送了一份长篇报告，内中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

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判。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随后，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全国性的胡风批判运动由此发端。

21日　金陶斋在《重庆日报》发表《彻底肃清实验主义在历史学中的余毒》。

23日　张志岳在《光明日报》发表《必须认清胡适考据学的反动性》。

是月　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傅振伦编著《明代瓷器工艺》由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为文字和图录两部分，简述了明代瓷器工艺的主要成就和艺术价值，从造型、釉彩、图案等方面对明代瓷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是研究明代瓷器工艺重要的参考资料。

格列科夫、捷列普宁著，郭从周译《历史·史料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书是《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历史”和“史料学”两个条目的合并。“历史”由格列科夫撰写，“史料学”由捷列普宁撰写。两文对历史学和史料学作了非常广泛而深刻的论述，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历史”一文，近两万字，大致论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历史学的含义和性质；二、没有成为真正科学的历史学；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四、苏联的历史学。全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历史与史学的含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史料学”近三千字，主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史料学与资产阶级史料学的区别、史料的来源与分类、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等问题。作者认为，史料学的任务“是把史料分类，予以批判的分析，确定其来源、阶级性质和用途以及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最后就史料的多样性、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性综合研究整个的史料”。资产阶级史料学的特征，“是从形式上看待史料，而对史料的分类和研究又脱离开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斗争，以唯心主义的精神解释史料，选择史料时别有用心，最后

竟至直接捏造史料”。这些史料观影响了建国初期历史学家对不同史学派别的评价。

上海图书馆、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鸿英图书馆、上海市合众图书馆、上海新闻图书馆联合编印《胡适反动论著目录——内部参考》(油印)。

嵇文甫在《新史学通讯》第1期发表《胡适唯心论观点在史学中的流毒》。

冯友兰在《哲学研究》第1期发表《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联系》。

童书业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该文是作者在山东大学古史分期讨论会上的发言，提出从夏代起（至少从殷代起）到春秋末是原始奴隶制的时期，从战国起到汉末是发展奴隶制的时期，魏晋时代才正式转入封建社会，并从中国古代分封制和宗法制的性质以及战国秦汉时代的古典经济形态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杨向奎在该期发表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商榷》，对童书业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童文没有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有许多漏洞和矛盾，这不仅是方法论的问题，也是史料的运用问题。

《考古通讯》创刊。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初为双月刊，1958年改为月刊，1959年起更名为《考古》，1966年中断出版，1972年复刊，改为双月刊，1983年改为月刊。该刊作为考古学专业性学术刊物，以刊登中国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发掘简报和研究论文为主，也刊登有关科技考古的实验报告、论文，以及重要的学术动态和书刊评介等，以其资料性强和严谨的风格为海内外学术界所重视。

李达在《新建设》第1期发表《胡适思想批判》。

文章着重批判了胡适的“反动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认为胡适的“实证法是在于‘求证’，即是所谓‘拿证据来’，这就是普通所说的‘捉贼捉赃’和‘讨债要借帖’的意思。他的实验法是创造证据的方法，是在于证明他主观的假设能否自圆其说。他的归纳法是举例为证的方法，也可说是成立假设的方法。他这一类的所谓方法论，其实是幼稚可笑，粗枝大叶，挂一漏万。……胡适所说的整理国故的方法，实际上还是清代朴学家的治学方法。……这样看来，胡适的整理国故的方法即所谓假设和求证

的方法，仍是汉学家的治学方法”。

文章认为：“研究古人的著作，无论是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文艺的著作，当然要考证作者所处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阶级关系，著作的真伪等等，这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但研究的目的在于阐明那著作的内容及其著作中所反映的社会实况，来了解那著作的意义。但若照胡适那样单以考证代研究，为个人的兴趣而考证，为考证而考证，试问这种研究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研究完全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胡适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许多的历史研究者、古典文学研究者及其他学术研究者之中，是有深厚的影响的，现在正是要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学习》第1期发表评论《展开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

文章说，“中国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有许多不同流派，胡适派唯心论思想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派，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派”，批判胡适，“就是要从学术文化界进一步扫除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就是要通过这种斗争进一步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并且在许多学术部门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力量”。评论明确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政治目的，即通过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使人们在思想上掌握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的同时，在政治上树立热爱新中国的立场。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

2月

3日　童书业在《光明日报》发表《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

文章结合研究实际对胡适的考据学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批判，同时对受胡适考据方法影响的“古史辨”派学者（包括作者自己）也进行了彻底否定。

文章认为：“考据本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初级的必要工作，考据就是搜集史料、校订史料等工作；其目的是在显示史事的现象。它的最大的功用，只是所谓‘整理’；它只是史学工作中的一环，它绝不能包办史学；而且考据学的本身只是史料学，并不就是史学。史学的主要任务，在根据现象，探求本质和规律。考据的方法，决不能探求着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它更没有批判历史的能力。拿考据来代替史学，甚至代替文艺批评，这正是胡适、俞平伯等人的根本错误。”“胡适的‘考据学’只是他的实验主

义反动哲学的工具。在思想上，它引导人们反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抗革命；在实践上，它引导人们脱离现实，钻牛角尖。对于历史的研究，对于古典文艺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真正用处。至多只能解决些枝枝节节的芝麻般的小问题，而它的危害性却很大。为了清算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反动的政治意识，为了整肃当前的历史学风气，整肃当前的古典文艺研究的风气，使科学研究推进一步，我们就必须与胡适的实验主义作不妥协的斗争，与胡适派的‘考据学’残余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应结合这个斗争，检查自己过去和现在的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意识：这不但对于整个人民有益，就是对于自己也是非常有益的！”

5 日　沙英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兼评胡适对这个问题的反动观点》。

6 日　禹贡学会解散。

此前，顾颉刚即与原理事、监事商议，决定正式结束学会。是日，禹贡学会理事、监事在中央民族学院开会，决定将房屋捐赠政府，图书赠民族学院，刊物分送各大学及图书馆，所存现金慰劳解放军。顾颉刚日记云：“禹贡学会从此终了矣！”

17 日　胡绳在《人民日报》发表《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论胡适派思想对科学的曲解和污蔑》。

20 日　《解放日报》发表蔡尚思《论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对胡适历史观点的批判》。

23 日　天津市史学界举行批判胡适反动史学观点与方法论座谈会，王玉哲、王树民、雷海宗、郑天挺等在会上发言。

是月　蔡美彪编著《元代白话碑集录》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辑录 94 种元代白话碑文，主要依据原碑拓片，其中小部分原碑尚存，大部分则拣选自各图书馆和金石家的收藏。拓片中除少数曾经冯承钧发表过外，大多数均未发表。作者对碑文标点分段，并对一些汉译的蒙古语和其他语言的专名作了注释，系以公元纪元。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于 1943 年底在四川李庄完成，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完善、系统的中国建筑史。作者以大量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为基础，第一次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和建筑活动作了详细的阐述，既细致准确，又生动形象。作者将构件、装饰和建筑单体形象地称为

建筑上的“词汇”，而对应地将构件、构件之间和它们的加工处理以及建筑单体之间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称为建筑上的“文法”。对于此种“词汇”、“文法”体系研究，既注重同一时期建筑的横向联系，以表明该阶段建筑的共同特征，又注重不同历史阶段的纵向比较，从而体现出建筑“词汇”、“文法”的发展演变。

徐德嶙《三国史讲话》由群联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分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着手，叙述了魏、蜀、吴三国形成、发展、灭亡的历史。书中采取了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结合起来的叙事手法，将袁术、袁绍、曹操、刘备、诸葛亮、孙权、司马氏父子兄弟等人物活动分别插入历史事件中，以达到通过历史事件来了解历史人物、凭借历史人物来了解历史事件的目的。对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和司马氏父子兄弟等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有新意。

陈旭麓《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收录三篇文章，《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教学》指出评价历史人物的三条标准：“要以历史条件来评价历史人物，对历史起推动进步作用还是起阻碍破坏作用，明确对谁有利”。《论历史人物及其阶级》主要论述了如何从具体生活和政治思想表现来分析评价那些阶级地位转化的历史人物、代表各阶级共同利益行动的历史人物、阶级分化中阶层斗争的历史人物，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实际上也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意识。《评价历史人物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批评了历史人物评价中把历史人物超越于时代之上、夸大个人作用的现象，指出既要避免“个人崇拜”，又不应有非历史事实的“求全”心理。

吴泽在《华东师大学报》第1期发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

文章系统回顾了国内外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的历史和焦点问题，认为古代东方社会就是亚细亚的古代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古代亚细亚国家的特点时常用“东方”和“全东方”等语句，不但把“亚细亚的古代”和“古典的古代”并列，也同样将“古代东方”与“古典古代”并列，因此两者是可以通用的，它们的特点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所包括的地域稍有不同。作者认为，亚细亚的古代或古代东方应指古代希腊罗马而外的古代亚细亚诸国的奴隶制社会。文章对童书业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陕西省长安县沣河西岸客省庄遗址。

此次发掘，发现了相当于龙山文化的“客省庄二期文化”。

王崇武在《文艺报》第 3 期发表《胡适的“历史癖”的实质是什么?》。

任继愈在《科学通报》第 2 期发表《肃清科学研究工作中胡适思想方法的流毒》。

李泽厚在《文史哲》第 2 期发表《论康有为的〈大同书〉》。

该文力排众说，认为《大同书》的内容和特色是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比较集中和没有掩盖地表述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成为康有为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杨宽在《文史哲》第 2 期发表《试论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

该文对中国用铁时代做了重新估定，认为西周时代已经应用铁器，借以证明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

同期还刊登了童书业《从中国开始用铁的时代问题评胡适派的史学方法》，由如何确立用铁时代问题，断言单纯使用胡适式考据的方法，无法回答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这样宏观的问题。

王思治、杜文凯、王汝丰在《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

文章对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一文提出商榷，认为两汉的社会性质问题不是翦文所说的封建社会，并从两汉生产资料占有的形式，以及奴婢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进行了考察，并由此得出两汉是奴隶社会而非封建社会的结论。王思治又在 1956 年第 9 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

同期还发表了胡厚宣《殷代农作施肥说》、黎澍《1905 年俄国革命和中国》、胡如雷《论武周的社会基础》等文。

3 月

1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指示》指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要求在八年内，“使五百万党内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例如三百万）都能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了解唯物主义

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并提出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是在学术界、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推动科学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

于是，全国报刊掀起批判“代表人物”的高潮。

8日　郭沫若在《文汇报》发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1日　陈旭麓在《解放日报》发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26日　马衡逝世，终年74岁。

是月　杨树达《论语疏证》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成于1942年，先作为湖南大学讲义印行，后几经增补修订，1955年才正式排印出版。作者搜检群书，广览材料，对《论语》内容逐句进行疏解。先列文句，再取《论语》本书之文前后互证，然后取群经、四书、诸子之文对原句加以疏释，最后加按语说明自己的见解。书前有陈寅恪序，谓此书“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模楷也”。

季镇淮《司马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俨《中国算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姚蓬子《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周谷城在《新建设》第3期发表《实用主义批判》。

夏鼐在《考古通讯》第3期发表《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收入文章八篇，对清谣传太平军破南京时屠城、奸淫掳掠以及洪

秀全招降张嘉祥被拒绝等不实记载一一做了澄清和订谬，充分展示了作者在鉴定史料、考证史事中辨伪存真的深厚功力。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由三联书店出版。

原为《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二集》，因其中文章均系史事考证，故易今名。收入考证文章六篇、考补一篇、谈话一篇。其中，《金田起义考》对金田起义日期十种说法钩沉索隐，断定为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 年 1 月 11 日）；《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肯定太平天国不曾实行“天朝田亩制度”的分田法，但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认为，内讧根源在于杨秀清假借天父附身传言而篡夺了领导权，主要原因是洪杨矛盾，内讧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内讧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不因内讧而改变；另外，《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洪大全考》、《洪大全补考》三文否定太平天国与天地会联合之说，并考出天德王并非朱九涛，清方俘获的“洪大全”其实是天地会的焦亮。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内中观点多为学术界接受，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史料价值。

顾颉刚、章巽编，谭其骧校订《中国历史地图集》由地图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纠正之前舆图的错误，补充旧有舆图的内容。共收录 31 幅本图、16 幅附图。内容包括我国原始社会文化遗址的分布，及奴隶制时代（夏、商）、封建制时代（西周至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各朝代的政区划分、人民起义、重要战争、交通路线和四邻形势。因各图图例的面积所限，不能做详细的介绍，因此，另作附注，对各图内容作进一步说明。书末附有地名索引，除所收地名外，还包括若干邻国名和邻族名称，并注明了今地所在的大约位置。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出版。

第二编 1957 年出版，第三编第一册、第二册 1965 年出版。

该书开始撰写于 1940 年，在延安先后出版过上册（上古到五代）和中册（宋辽到清中叶）。1949 年出版过修订本第 1 版。1951 年作者着手分编增订改写，到 1953 年出版修订本第一编（远古到秦统一），1957 年出版修订本第二编（秦到南北朝），此为两编修订本第 2 版。1955 年和 1958 年分别出版两编修订本第 3 版。其后由于健康原因，至 1965 年才完成修订本第三编的增订改写。

该书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其要旨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说来叙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

《胡适思想批判》第1、2辑由三联书店出版。

4月

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28日 孙力行在《光明日报》发表《批判胡适的〈井田辨〉及其他》。

是月 胡滨《卖国贼李鸿章》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白寿彝在《新建设》第4期发表《胡适对待祖国历史的奴才思想》。

文章“意图只在剥掉胡适‘为真理而求真理’的伪装，揭露他对待祖国历史的奴才论调和奴才思想的特征”。

罗尔纲在《科学通报》第4期上发表《试说考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章认为，决定考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是所用的方法。考据用的方法是初等的形式逻辑的归纳法，这种方法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所能做的只是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可以处理的范围，而对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却根本没有能力。因此，考据只是历史研究工作中初步的必要工作，考据所担负的任务就是搜集史料、校订史料、考证史事等工作，其目的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显示史事的真实现象。它的最大的功能，只是做了基本的整理工作，它只是史学工作中的一环，它不能包办史学。而且考据学的本身只是史料学，并不就是史学。至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材料上升到理论的问题，从考据现象，到根据现象去探求本质和规律，那是史学的任务，而不是考据所能担负。

作者认为，以考据代替史学，把限于整理资料的考据当作史学，掩盖了社会科学的阶级斗争的使命，使得许多历史工作者只知有考据，而不知道考据在全部历史科学中应该占的地位，这种流毒必须肃清。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

作者对旧考据的批判，反映了史料派学人在变化了的环境下学术路向的自我调整。

万钧（漆侠）《唐太宗》由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殷虚文字缀合》由科学出版社

出版。

该书将《殷虚文字甲编》及《乙编》中同坑出土的破碎甲骨断片加以缀合复原，共得482号。第1至324号由郭若愚缀合，陈梦家审对。陈又会同曾公毅、李学勤将郭未缀合者复加缀合，增补于后，为第325至482号。张政烺对全稿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修正意见。

金冲及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

作者不同意单纯用阶级斗争为标准来划分历史时期，提出“分期的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作者认为，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相互关系，决定着政治生活、社会意识等相应的变化。因此，解决历史分期的标准，必须从生产方式中、社会经济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去考察。同时，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决定历史分期的标准，同时又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表现中去考察。因此，中国近代史应分作五个阶段：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5—1900年、1901—1914年、1914—1919年。

周一良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西洋“汉学”与胡适》。

文章说，胡适尽管口口声声“戴段钱王”，标榜乾嘉考据，但他所提倡号召的“国学”，早已和乾嘉考据不能相提并论。他所谓的“国学”，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学者们所搞的西洋“汉学”的别名。胡适把清代“朴学”的范围扩大到哲学、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方面，而称之为“国学”。实际上所做的工作，又往往限于和现实距离甚远的辽远的古代，这正是西洋“汉学”的内容和范围。这种用考订表面历史现象代替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历史，是西洋“汉学”和胡适所提倡的考据天然合拍之处，也是由资产阶级唯心的、形而上的学术观点必然引导出来的结果。

同期还刊登了田余庆《清除胡适思想在历史考据中的恶劣影响》、陈梦家《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贺昌群《论西汉的土地占有形态》等文。

5月

4日　胡华在《大公报》发表《批判胡适派为封建买办统治服务的“民主”“自由”论》。

13日　《人民日报》刊登关于胡风集团的材料。

毛泽东写了序言和二十多条按语，判定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从此，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批判演变成为从政治上、组织上“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本月24日及6月1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份材料的第二、三部分。随后，这些材料又被汇编成册。

26日　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提高警惕，揭露胡风，请依法处理胡风》。

是月　赵俪生《顾炎武传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何兹全《秦汉史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简要论述了秦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情况。作者在书中没有明确指出对秦汉时期社会性质的看法，用“东方专制政体”来说明秦汉时期皇权的本质以及皇权和一般商人地主的矛盾。

王芸生《台湾史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胡厚宣《殷墟发掘》由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

本书由绪言、早期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1949年前的殷墟发掘工作、新中国人民的殷墟考古学等内容构成，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殷墟发现的经过及历次发掘的情况，并论述了1949年前后发掘工作的不同意义。

《文史哲》第5期刊发一组批判胡适的文章。

童书业在《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中说，胡适的所有“考据”文章的特殊目的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亨《批判胡适的考据方法》说胡适的考据方法彻头彻尾地违反科学法则，他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不过是狗肉摊上挂羊头、砒霜丸上抹糖衣而已。文章对胡适的考据方法提出二十四个字的总批判——“主观假设，片面求证，只会大胆，没有小心，玩弄事实，玩弄证据”。赵俪生在《批判胡适反动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中则着重“揭穿”胡适“经常标榜的考据学方法论和校勘学方法论的内幕”。

这组批判文章还包括葛懋春、庞朴的《批判胡适的庸俗进化论》，以及郑鹤声的《胡适四十年来反动政治思想的批判》。

6月

1日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

郭沫若为学部主任，张稼夫为副主任，刘大年任学术秘书。委员包括丁声树、千家驹、于光远、尹达、王力、王亚南、王学文、向达、艾思奇、何其芳、吴玉章、吴晗、吕叔湘、吕振羽、李亚农、李达、李俨、杜国庠、沈志远、狄超白、周扬、季羡林、金岳霖、侯外庐、胡乔木、胡绳、范文澜、茅盾、夏鼐、马寅初、马叙伦、张如心、张稼夫、许涤新、郭大力、郭沫若、陈伯达、陈垣、陈寅恪、陈望道、陈翰笙、陶孟和、汤用彤、冯友兰、冯至、冯定、黄松龄、杨树达、杨献珍、刘大年、潘梓年、翦伯赞、邓拓、郑振铎、黎锦熙、钱俊瑞、骆耕漠、包尔汉、薛暮桥、魏建功、罗常培等61人。负责安排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并"指导""协商推荐"过程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

据刘大年回忆："当时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政治的标准。社会科学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根据这个要求，来征求他们认为适合做学部委员的人选来。然后，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学部"成员的主体是来自延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人，如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艾思奇、胡绳、范文澜、尹达、张如心等，其中有不少人当时是负责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部门的主要官员，因此他们的当选使得"学部"委员的构成高度意识形态化。

原南京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张元济、柳诒徵、陈达、周鲠生、钱端升、顾颉刚等未能入选。关于陈寅恪的入选，前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曾回忆说："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是月　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文中写道："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这种考据学使用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它在训诂名物方面，确有丰富的成就，可是当涉及较大的典章制度需要作一些历史的说明时，便显得无能为力，更不必期待它能发现什么历史发展的规律了。""乾嘉考据学与胡适的考据学都是提倡为考据而考据，或者说为学术而学术"，"胡适的考据学给乾嘉考据学开出新

局面，实际上也是恢复并发展八股学的老局面。”

作者认为：“中国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几次思想改造运动以后，胡适的反革命政治面目，在史学界里一般是认识出来了。但在学术问题上，还有一些人守住‘纯学术’的堡垒，以为考据是学术、是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只是一种政治论文或宣传文字，不能算是学术。这是完全谬误的想法。也有些人是真心诚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或者是因为还保存着唯心主义思想的老根，或者是因为用考据的方法（乾嘉的胡适的都一样）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形变质不变，或变得不多，依然逃不脱唯心主义的范围。他们虽然主观上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实际上仍不免不自觉地与胡适思想阴沟暗通，这种病症，是我们必须十分警惕的。”

同期还刊登了蔡美彪《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论胡适派反动的历史及其流毒》、梁从诫《胡适不是研究历史，而是歪曲和捏造历史——在批判胡适历史观点讨论会上的发言》等文。

尚钺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

作者认为，不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从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看见明代，特别是明末三五十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已在开始起着本质的变化，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因此，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还在“母胎中”没有出来，直等到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才萌芽出来，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些人虽然承认了在鸦片战争以前，即外国资本主义入中国以前，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明清时代中国有了许多大工商业城市，以及商业资本的活跃等等，但却怀疑当时是否有市民运动，甚至根本否定有市民这个等级存在，这种认识也是有偏差的。

该文观点后来受到范文澜、黎澍、刘大年等人的严厉批判。

尚钺在《教学与研究》第6期发表《清代前期中国社会之停滞、变化和发展》。

第7期连载。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延缓，除了中国社会内部特点以外，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在资本主义萌芽现象出现以后，13世纪落后的蒙古族和17世纪满洲族的入侵，以及到19世纪……更野蛮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各国先后侵入了中国。”

尚钺编《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选集了《历史问题译丛》杂志中有关奴隶社会若干问题的文章，

"以便我国历史学家在处理奴隶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参考"。

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力图凭借卜辞及其他史料重建殷人的社会生活，以证明殷代的奴隶制是处于高级阶段的奴隶制。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1940—1945年间所写文章结集，1947年上海新知书店曾以《中国古代社会史》为名出版。1950年重又修订，1955年出版时改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本书着重探索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自序中说，之所以从事这项研究，一是步王国维和郭沫若的后尘，二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力求在这两方面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作者在研究中坚持了三个原则：首先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其次是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第三是把中国古代散沙般的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律作一个统一的研究。本书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文明发展的多线论，认为"古代文明路径在一般的规律性里，还包含了特殊的规律性"。并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出发，来分析论证中国由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国家的独特路径。本书突破了生硬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面，着力揭示中国历史的具体特征，因而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开创性。

陈旭麓《辛亥革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虽篇幅不长，仅8万多字，但在辛亥革命学术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专著，也被视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体系和观点长期为学界所援用。

《文史哲》第6期再次集中刊登批判胡适的论文。

孙思白等人的文章是《清算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路遥《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历史观》认为胡适派的唯"证据"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寻求证据的方法，是极端反科学的唯心论与唯心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到史学研究中来，一方面就是企图以史料学来代替史学，阻碍人们去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使人们对于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另一方面运用它们的考证方法便可以捏造材料，"创造"证据来曲解历史并诬蔑中国历史。一方面是抹杀并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就可任意地随着主观的要求来曲解历史。胡适用这种方法，来隐蔽地宣传历史唯心论，即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过程，否认历史发展规律的可认识，牵着某些史学家的鼻子到故纸堆中去自

我陶醉。

高昭一编写《吕母与赤眉军》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7月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创刊，翦伯赞任主编。

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组批判胡适的文章，其中冯友兰、朱伯崑《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底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一文认为，胡适的主观唯心论和庸俗进化的观点和方法，不仅是贯穿于他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指导思想，也是贯穿于他的文学史及其他历史研究工作中的指导思想。“五四”运动以后，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有意无意地继承了胡适的反动观点，把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引导到反科学的道路上去，其流毒是很大的。进一步肃清这些流毒，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学术中的领导地位，是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是作者成名作，也是史学界第一部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研究对象的个人论文集。全书共收入论文十三篇，其中除一篇外均系初次刊布。作者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国内诸民族的发展和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对这一时期的典章制度用力最勤。1959年，三联书店又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收入论文八篇，其中六篇初次发表。1983年作者又在中华书局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拾遗》，收入论文十四篇，其中十二篇初次发表；并收“读史释词”八则，其中七则为初次发表。三编所收论文大多于1958年至1963年间起草，反映了作者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前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所取得的三个阶段性的成果。

杨树达《汉书窥管》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校注《汉书》之作，是在作者六卷本《汉书补注补正》基础上，积三十年之功缀补而成。该书大略仿裴骃的集解《史记》例，博采群书，平衡诸说，以品鉴《汉书》诸说。与裴注相异，该书重在释义，兼述古音，对历来注家失误之处，皆加以辨析及厘正。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由三联书店印行。

此为作者所著三部考史专著《骨董琐记》（八卷）、《骨董续记》（四卷）、《骨董三记》（六卷）的合编，所考对象包括宋元明清时期的文物、史事、风俗、诗文等。每篇各有标题，内容短则数字，长则数千言。

该书是现代中国最著名的笔记体著作之一，作者考释文物，钩稽史迹，显示了深湛的考索之功。自出版以来领誉学界，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史料或史裁，也为文物考古、图书文献以及文史爱好者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历史博物馆曾据本书引《孤儿吁天录》所述“张献忠公牍文”条，对该馆展览的中国通史中有关明末张献忠起义的史实进行过修改。人民教育出版社也曾参照此书中一些条目为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进行过修订。本书既是一部专业性较强的史著，也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工具参考书。

此书因是随手摘录，注所引或置于篇首，或置于篇末，且有不完备处；一书数条分置各类，或一条间有两目，内容分散，不相连贯；而且有的内容原案与本案不分，又因是旧式断句，致有某些字句很难读顺。经其子邓瑞整理，2008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除保留原有风貌不动，对个别条目作局部调换，将重复的条目合并为一、较分散的部分略加集中、讹夺之字予以订正外，还仿照辞书体对全书进行了新式标点。另增加了若干新条目，基本上按类编排入书中。此次增补的内容，原为邓氏生前笔录的札记，分散在各处，后经检选整理，名为《松堪小记》，体例与《骨董琐记》略同。

常任侠《中印艺术因缘》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全书共收文十一篇，对中国和印度、印度尼西亚古代和现代的文化艺术交流详细介绍，内容涉及中印古代美术的成就，如麦积山石窟与阿旃陀石窟艺术，我国的杂技、傀儡戏和皮影戏艺术，古代中印间象棋与骰子的交流关系等。

黎澍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组长，任上主持编辑出版《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

王琎、章鸿钊等著《中国古代金属化学及金丹术》由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

傅振伦《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由三联书店出版。

黄元起《中国历史上民族战争的评判问题》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

冯沅君在《文史哲》第 8 期发表《批判胡适的西游记考证》。

8 月

23 日　翦伯赞、周一良到荷兰莱登参加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

归国后，翦伯赞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介绍了参会情况。

25日　华岗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罪名被逮捕。

1954年冬，华岗因拒绝揭发批判而被划入“向明反党集团”，受到《人民日报》等大报连篇累牍地批判。1955年胡风案发，华岗因否定胡风案是“反革命”问题及“袒护”“胡风分子”而遽遭逮捕。1957年，华岗被从青岛看守所解往北京秦城监狱关押。从1954年底开始到1965年，华被整整审查十年，始终没有查清他的“罪证”。其间发愤读书和写作，以惊人的毅力写出近百万字的文稿。1965年3月，华岗被强加罪名，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刑13年。旋即被押赴济南监狱服刑。

是月　嵇文甫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

文章说：胡适的多元历史观始终只是在唯心论、偶然论、个人主义里面转圈子。他所看到的“人”，不是社会历史的范畴，而是生物学上的范畴；也就是说，不是属于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一定阶级的人，而只是各具生物学上各种生理和心理特征的自然人。他所看到的社会历史，不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合规律地、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只是许许多多孤立的个人，一个一个的自然人的偶然聚集。茫荡荡的社会，孤单单的个人，这就是胡适的人生观、社会观、历史观。总括来说，胡适的多元历史观完全是欺骗人民，为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者服务的一种思想工具。说是历史多元论，实际上乃是彻头彻尾的一种历史唯心论。他处处回避根本问题，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好像猫头鹰怕见太阳一样，他最怕提出根本问题，最怕提出历史发展规律。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注定要没落的、垂死的反动统治阶级，面对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发抖。

同期还发表了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张正明《论汉民族的形成》、范宁《论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社会根源》。

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

尚钺编《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介绍了苏联史学理论，收有Б. Х. 格列科夫和Л. В. 切列普宁等著名苏联史学家的论文十篇，前附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书中探讨了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封建所有制问

题、封建社会基本经济法则问题、封建社会各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问题，以及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等，出版后产生较大影响。

尚钺在前言中说："我国史学界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科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

孙祚民在《新史学通讯》第 8 期发表《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引发史学界关于农民政权性质的讨论。

作者认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有些起义和战争曾经成功地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它们既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也不可能使广大农民在经济、政治上获得解放，更没有、也不可能变农民阶级为统治阶级，因此，他们是不可能组织什么"农民政权"的。那些由农民起义军所建立起来的短期性的政权，就其性质说，"基本上还是封建的专制的。它与旧政权之间，只是存在着差别，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与孙祚民观点相同的，还有翦伯赞、蔡美彪、赵俪生、嵇文甫、漆侠等人，"文革"中这一观点受到严厉批判。

严中平、徐义生、姚贤镐、孙毓棠、汪敬虞、李一诚、宓汝成、聂宝璋、李文治、章有义、罗尔纲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由严中平主持编纂，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最重要的一部工具资料书。书中对自 1840 年至 1949 年间的各种遗留下来的经济统计资料第一次进行了系统完整地爬梳和整理，汇集了工业、农业、商业、外贸等各部门各个行业的大量统计数据，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改变了 1840 年以来至 1949 年的百余年间，中国没有遗留下合乎科学要求的统计资料，无法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进行有效研究的局面。该书在经济史学界以及历史学界均产生很大影响，引用率极高。

纪庸编著《汉代对匈奴的防御战争》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方白《郑成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王承祒《中国古代社会史试论》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

收录四篇论文，主要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试论殷代的奴隶》认为殷代是奴隶社会；《试论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兼评郭沫若先生的

〈奴隶制时代〉》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试论战国时代的奴隶与奴隶主》主要论证战国时代虽然存在相当多数量的奴隶，但是奴隶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是十分不重要的；《试论战国时代的土地制度》认为战国时代是地主封建社会，亦即后期封建社会。作者在论述中征引了大量甲骨卜辞。

时希哲在《文史哲》第8期发表《与吴大琨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底标准问题》。

该文是对吴大琨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发表的《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一文的商榷，作者支持范的观点，不同意吴大琨以生产力为划分不同社会的标准，认为中国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是由于剥削方法的变换，也就是因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生产力的变化。吴大琨在该期杂志上发表《再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对自己的观点辩护。

9月

陈梦家在《考古学报》第9期发表《西周铜器断代》。

第10期、1956年第1—4期连载。该文为作者铜器研究的代表作，书中详细记述了不同时代的各类铜器98件，每件都记录了全篇铭文的释文，并加以详尽诠释，有的甚至是逐字逐句地讨论。其中包括许多考释文字、词语，探求语法规则及语义的资料，对研究上古汉语及汉语史很有参考价值。

作者被打成右派以后，被剥夺发表学术论著的权利，已经在《考古学报》上连载六期的《西周铜器断代》被迫中断。

杨向奎在《文史哲》第9期发表《论西汉新儒家的产生》。

李光璧在《历史教学》第9期发表《批判胡适反动实验主义的历史考据学》。

渭柳在《历史教学》第9期发表《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尹达在《考古学报》第9期发表《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

作者认为安特生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的基本论点建筑在“单色陶器”早于“彩色陶器”之上，我国考古学的新资料证明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安特生为甘肃新石器时代的各期所安排的“相对年代”也错了。

最后强调："应当用科学的方法，综合大量的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新资料，早日建立起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来。"

该文廓清了安特生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清除了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负面影响。

杨宽《战国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战国断代史权威著作，对这一头绪纷繁的年代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订和研究，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广泛欢迎。分十二章：绪论、春秋战国间生产的发展、春秋战国间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间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变、战国时代各国集权的地主政权的形成、战国时代各国的国家机构及其重要设施、战国时代封建战争的扩大、合纵连横的封建战争的变化、秦的统一、"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思潮、"百花齐放"的战国时代文化、战国史总论。并有战国大事年表、战国大事年表中有关年代的考订作为附录。

作者初写此书时在古史分期上采用西周封建说，主张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为地主制代替封建领主制，但在该书出版后，作者改从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对全书重新进行修改。修订本于 1980 年 7 月出版，除在观点上做出改动以外，也吸收了考古界部分新成果。

安作璋《汉史初探》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

收录《西汉农官的建置及其作用》、《西汉的西北屯垦》、《关于西汉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从赋役剥削看西汉的农民生活》、《论桑弘羊》、《西域都护的建置及其作用》等论文，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原名《中国棉业之发展》，1942 年出版。此次改版重印，保存了初版的主要论点，补充了一些史料，并对文字进行了改写。1963 年该书被列为高等学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该书依据大量史料，对 1289—1937 年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史进行了研究，并重点论述了 1840—1937 年间的发展史。

樊圃《西北的少数民族》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共三册，对西北地区包括今陕西、甘肃、青海三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的历史进行了概述，内容涉及了各族的起源、发展以及农业、手工业、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经济生活的变迁。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由中华书局重版。

原书1938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印行。重印说明对该书作自我批判云：一、这部书把佛教史仅仅看作一种宗教思想的发展，没有认识到佛教思想的发展和它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二、这部书中没有能够认识作为宗教的佛教唯心主义的本质，没有能够认识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三、这部书过分强调佛教史中个别历史人物所起的作用，而完全忽视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对佛教的发展的决定性的制约；四、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当时其他反佛教的思想斗争是分不开的，这部书在这一方面没有完成它应该完成的任务；五、这部书仅仅在于它供给了关于中国佛教史的一些比较可信的材料，提出了中国佛教史发展变迁的线索，揭示了中国佛教史上某些重要的现象。

周一良《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周庆基《成吉思汗》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10月

傅筑夫、李竞能在《新建设》第10期发表《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1956年2月，该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汇集了作者写于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有关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论文。后记中说：归纳二十年来所写这些论文，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从批判过去的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中，以建立起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体系”。

作者指出，要研究我国氏族制的社会结构，必须重视考古学中新石器时代的资料，要想把氏族制度在我国发展的序列弄清楚，首先应当把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资料的时间序列基本弄清。由于瑞典人安特生在二十年代提出的我国新石器时代“六期说”有着相当的影响，且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和史学研究中造成了混乱。所以本书的重点都围绕对安特生观点的辩驳来展开。《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写于1937年，指出了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河南北部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是作者沟通考古研究同历史研究的最初代表作之一。该文写于1939年，目的在于突破安特生的体系，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比较可信的体系。文中把1937年以前所得的新石器时代的材料作了整理，

审慎地找出各种文化遗存的先后关系，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各种文化遗存的具体内容，大体勾勒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基本体系。1954 年写的《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的补充，《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对 1949 年以来发现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作了综合性的概括叙述，将其大体上归纳为细石器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东南的硬陶文化四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并提出依赖地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来解决我国古代社会历史中的某些关键问题。

1979 年 2 月第 2 版增订时改名为《新石器时代》。

杜国庠《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由三联书店出版。

收入 1943—1944 年间有关先秦诸子哲学的六篇论文，分别对公孙龙子、荀子、墨辩以及礼法的变迁、礼乐的起源进行了独到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为前人未曾语及的创见，对后人研究先秦哲学多有启发。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 1931 出版的《积微居文录》和 1937 年出版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二书合成，全书凡六卷，收文 139 篇，皆为考释金石文字和考证经史诸子之文。卷一、二说字之属 60 篇，卷三音韵之属 4 篇，卷四方言文法之属 4 篇，卷五经子考证序跋之属 59 篇，卷六考史金石之属 12 篇。书前附有杨树达初版自序及增订本自序、章太炎来书、沈兼士序、余嘉锡序。

本书的特色在于以声训学贯穿全书，书中依托深湛之语源学研究，说字解经多精辟之见，且能探本溯原，广采博征。著中颇重视语法修辞的作用，与完全固守传统的学者治学有所不同。

中国科学院、文化部联合组成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赴三门峡水库库区进行古代遗址、墓葬和其他遗迹的全面普查，夏鼐、安志敏任正副队长。

吴承明编《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既有较强的理论性，又有大量具体资料，自出版以后历来为海内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者所重视和广泛引用。20 世纪 50 年代，作者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期间，参与了调查和处理外国在华投资工作，获得了大量调查资料，推动了其对帝国主义在华投资问题的研究。在发表一系列论文和小册子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著作。以往关于外国资本的研究都只限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的情况，本书运用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对 1902—1948 年的外国在华资本进行了比较

详细的理论分析与数量估计。书中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扩张、资本的性质、资本和利润的来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又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把中国变为它们掠取最大限度利润的市场，严重阻碍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书中所选用的材料大部分是外国政府或私人所做的调查和估计，作者在使用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以使其更具可信性。作者在附录中用大量篇幅对本书的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作了详细说明。

吴紫金、洪卜仁《郑成功收复台湾记》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邓广铭《岳飞传》由三联书店出版。

初名《岳飞》，是作者1944年应重庆胜利出版社之约而撰写的，次年8月15日出版。1954年“因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胡风的‘反革命文艺思想’，学校停课甚久”，作者于其间把这部书作了大幅度修改，订正了许多旧史记载的错误，并改名为《岳飞传》。粉碎“四人帮”后，作者又花了五年时间，再次改写《岳飞传》。此次修改的幅度比上次更大，改写的部分占全书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任继愈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

王仲荦在《文史哲》第10期发表《北魏初期社会性质与拓跋宏的均田、迁都、改革》。

作者认为，带有公社性的均田制度，所以能够在北中国树立起来，这是由于当时“土广人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自西晋末年以来，北中国地区长期遭受蛮族的蹂躏和破坏，北中国的农民不是在战争中大量的被屠杀，便是饥馁死亡，或纷纷弃去自己的田园，逃往江南，以及漂流异乡，变为世家豪族大地主庇护下的“部曲”和“佃客”。这样，自然使北中国许多肥沃的土地，变成了荒田。因为这些北中国无主的荒地和牧场，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主权是国家的，所以拓跋宏于太和九年在北中国推行均田制时，也必然会先在这种无主的荒田和牧场上建立起农业生产组织来，然后把这种带有公社性的均田制度推行于整个北中国地区的小农农村。作者着重指出，在均田制土地上，农业很快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因此，均田制度一开始，封建成分已经占主导的地位了，先封建的成

分，只是其残存的形态与末日的境地而已。

同期还刊登了华山《水浒传和宋史》。

翦伯赞在《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

该文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为批判对象，认为胡适把《红楼梦》一书看成与当时社会生活毫无关系、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的看法是荒谬绝伦的，目的是抽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抽出它的时代精神，从而取消它的时代内容。作者从土地集中与阶级分化、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商业与商业资本的活动四个方面来说明红楼梦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认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烂熟的程度，并且在它的内部孕育着从明朝中叶以来就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的因素。

11 月

顾颉刚主编《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丛刊收集了我国前代学者考辨古书古史的材料真伪、时代先后的重要论著，系统编辑，分集刊行。第一集收通论四种，经学三种，子学三种，共十种。为便于研究参考，经校勘标点，汇订成一册出版。顾氏在序中言："古籍考辨的工作已有长时期的历史，在我国旧有学术里比较富于科学性，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优秀遗产。这班古人的创造，萌芽于战国、秦、汉而勃发于唐、宋、元、明，到了清代已濒近于成熟的阶段，这部分文化的发展过程是决不容割断的历史。在将来中国的新文化中，这一部分旧文化定将由于谨严的批判，吸收其精华而淘汰其糟粕，在这个基础上正式建立起史料学来。"

张舜徽《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作者讲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的讲稿。共分十章：第一章历史书籍的范围，第二章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书籍，第三章百科全书式的通史，第四章仿效《史记》写作形式编成的断代史，第五章专详治乱兴衰的政事史，第六章专详文物典章的制度史，第七章以地域为记载中心的方志，第八章和研究历史有密切关系的沿革地理与地图，第九章史评书籍的代表作品，第十章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书籍简目。

本书扼要介绍了地下发现的甲骨、金石，以及历代的史籍，如通史、断代史、专门史（政事、制度）、方志、史评等，就其中更为重要的著述，分别介绍作者生平、撰述过程、编著体例、史料价值及在史学上的地位等，对通史及史评的介绍是其重点。作者认为，《史记》和《通志》两部

书，是通贯古今、无所不包的书籍，故可名之为“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史通》和《文史通义》指出了各种旧史的利弊得失，是史评书籍的代表作。该书最后罗列了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书籍简目，介绍了一些重要的工具书、参考书和常用书。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冯承钧编《西域地名》由中华书局出版。

李季平《淝水之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该书由概述和叙录两部分组成，概述部分系统分析了敦煌石窟自北魏至宋期间壁画的流派与演变，以及唐、宋时期敦煌有关历史方面的考证。叙录部分详细记录了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水峡口三百六十三窟逐窟的洞形、塑像、壁画、供养人题名等内容，为研究敦煌石窟提供了较为详尽的参考材料。

童书业《古代东方史纲要》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由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明代海外贸易研究的拓荒之作。书中简要论述了明代海外贸易的活动范围，指出中国商人所到达的地域，主要有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半岛沿海各地、南洋各地、日本与琉球等，并重点论述了明代海外贸易的基本性质，及其对当时中国及南洋等海外之地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杨向奎在《文史哲》第11期发表《五行说的起源及其演变》。

12月

陈梦家《六国纪年》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录七篇研究六国纪年的论文，其中六篇于1944年至1950年间发表过。作者在掌握详尽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再依据出土文物铭文的记载，推测出西周及六国各王的在位年数。《六国纪年表叙》主要介绍了制作六国纪年表的方法，论述了《竹书纪年》原文的甄别、《竹书纪年》的纪年与周正的关系诸问题；《六国纪年表》罗列前476至前298年周、晋、魏、赵、韩、齐、田、燕、越、楚诸国年世，宋、鲁、郑三国因材料不足故阙；《六国纪年表考证》（上、下）对六国纪年表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考辨。另外三文是：《汲冢竹书考》、《世本考略》、《汉初及其前的纪年材料》。

胡厚宣《甲骨续存》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

钱宏《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通过江南的丝织业、棉纺织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广东佛山镇的铁器业、陕西汉中一带的冶铁业、木材业和造纸业，说明从明至清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些地区手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和成长情况，指出在国外资本主义侵入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并着重论述了封建主义严重地阻挠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一卷出版。

到 1963 年 2 月陆续出到第 39 卷，收录列宁在 1893—1923 年间的绝大部分著作。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作者旧著，1939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此次出版进行了修订。

全书分上下册共四篇。上册两篇。第一篇古代中国：从人与自然的斗争到阶级的尖锐对立（由商以前到西汉末）。第二篇中世前期：封建社会之全盛（自新莽元年至五代末年）。下册两篇。第三篇中世后期：封建社会之持续（自北宋初至鸦片之战）。第四篇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之萌芽（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本书旨在写出统一整体的中国历史，以显示出历史的有机组织和发展规律，以其独创的通史编纂理论和严密的体系，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通史代表作之一。

下册于 1956 年 1 月出版。1957 年 8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新一版。

张维华在《山东大学学报》第 2 期发表《试论两宋封建地主经济的几点征象并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

罗卡子《北朝石窟艺术》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本书为作者据亲赴云冈、龙门、巩县、南北响堂山、天龙山以及渑池鸿庆寺等地考察所获资料写成，对北朝造像艺术作了深入研究，书中对云冈、龙门、巩县、响山堂的石窟艺术作了详细介绍，对其形制的发展变化及造像的作风与特点，都有阐述。

荆三林《中国生产工具发达简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石制生产工具时代（远古——纪元前

2200年前后的夏代)，介绍了生产工具的发生、石制生产工具的初步分化、石制生产工具的进一步分化等情况；中编金属生产工具的发生及发达时代（夏、殷、周——纪元前221年)，叙述了旧金属（铜）生产工具的发生、殷代的生产工具、周代的生产工具等内容；下编机械生产工具的发生与发达时代，按照不同历史阶段叙述秦汉魏晋南北朝劳动人民在生产工具上的创造与发明，唐代生产工具的进步，宋元在机械生产工具上的创造与发明，明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几种生产工具，以及资本主义的发生及封建社会没落时代的生产工具。在史料的选择上，作者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在石制生产工具这一段完全采用考古学上的材料，加以系统地叙述；金属生产工具及发达这一阶段，一部分采取考古学的材料，另一部分采自文献中记载的古传说，加以申述、比较和考证；机械生产工具发生及发达这一阶段，大部分采自古文献资料。

杨志玖编著《隋唐五代史纲要》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该书在授课讲义基础上编成，是1949年后第一本断代史教材。该书事实交代清楚，内容系统概括，文笔清新流畅，立论平实公正，历来受到好评。张国刚在《关于50年代中国史学的点滴认识——重读杨志玖先生〈隋唐五代史纲要〉》中说，“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该书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它属于开创建国后通史及断代史体例的著作之列”。

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

该馆前身是1925年10月10日成立的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文献部。1928年10月，掌故部改称文献馆。1951年5月，文献馆改称档案馆。1955年12月，故宫博物院档案馆划归国家档案局管辖，改名为第一历史档案馆。1959年10月，第一历史档案馆并入中央档案馆，改称明清档案部。1969年底，明清档案部重归故宫博物院管理。1980年4月，更名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该馆是专门保管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和皇室档案的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达1000余万件，共74个全宗。其中，明代档案3000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时期的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时期的档案。清代档案占绝大部分，内容涵盖了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农业、工业、外交、科技、教育、宗教等诸方面。从时间上看，有清入关前天命九年（1607）至宣统三年(1911)，以及溥仪退位后1912至1940年期间形成的档案；从所属全宗上看，有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有管理皇族和宫廷事务机关的档案，有军事机构的档案，有地方机关的档案，也有皇室成员和王公大臣的档案；从文

种上看，有制、诏、诰、敕、题、奏、表、笺、咨、移、札、片、禀、呈、照、单、函、电、图、册等；从书写文字上看，大部分为汉文档案，约六分之一为满文档案，还有少量蒙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以及外文档案。

1956 年

※ 束世澂发文引发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讨论。
※ 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 王仲荦发表《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
※ 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出版。
※ 侯外庐提出西汉封建说。
※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出版。

1 月

6 日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历史考古学科发展规划会议，制定历史考古学科的十二年发展规划。

会议由胡绳主持，翦伯赞、尹达、侯外庐、向达、胡绳、夏鼐、黎澍、范文澜等参加会议。

11 日　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零五周年》。

作者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消灭地主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合乎当时农民的要求，推动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太平天国幻想每个农民都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永远保持一份平均的财产，是一种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空想，在实质上带有反动性。

14 日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是月　束世澂在《华东师大学报》第 1 期发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引发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讨论。

该问题在三十年代就已由吕振羽提出，但没有引起讨论。1954 年，

范文澜发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侯外庐发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商兑之一》，均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有所提及。

束文发表后，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逐渐在学界展开。这场讨论的目的，是要通过历史时期的划分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规律，以及各阶级的具体特点及其相互联系。焦点问题是以什么作为划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1) 范文澜、侯外庐等主张以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作为分期标准。(2) 漆侠、胡如雷等主张以阶级斗争的发展作为分期标准。(3) 束世澂主张以封建国家政权的发展变化作为分期标准。(4) 刘静夫、赵吕甫主张以生产方式的变化为基础，以阶级斗争做线索为分期标准。(5) 周銮书主张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变化作为分期标准。此外，还有人主张根据经济特征（如自然经济盛行、行会制度形成、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等）来划分；有人主张以地租形态的变化作为分期标准等。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具体见解，因各派对封建社会上限认识不一，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划分：(1) 郭沫若、侯外庐、王玉哲、胡如雷等主张划为前后两期。具体又有侯外庐的两期四段说、胡如雷的两期六段说，以及两期五段说。(2) 范文澜等主张划为初期、中期、后期的三分法。具体又有范文澜的三期四段说以及三期九段说。(3) 还有学者主张划分为早期、成长期、发展期和晚期的四分法，以及五分法、六分法、九分法，等等。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著录汉魏南北朝古冢墓遗文的专书。书中辑录了著者目见的上起东汉下迄隋朝的墓志、墓记、椁铭、神坐等新旧拓本612种。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侯外庐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批判梁漱溟反动的历史观点及其复古主义》。

同期还刊登了束世澂《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叶玉华《战国社会封建化过程》等文。

荣天琳在《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唯心史观——中国历史科学中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和斗争》。

作者认为，胡适宣传的“多元历史观”实质上是主观唯心论历史观，他反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用考据方法对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否认阶

级斗争，贬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文章还重点对胡适的“忠实门徒”傅斯年、顾颉刚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派”的代表蒋廷黻、钱穆、梁漱溟、胡秋原、陶希圣等进行了批判。

2月

3日　柳诒徵逝世，终年77岁。

14日　杨树达逝世，终年71岁。

21日　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该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联合召开，出席会议者达180多人，是考古界的空前盛会。在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讲话，文化部副部长兼科学院考古所所长郑振铎作了题为《考古事业的成就和今后努力方向》的报告。会议宣读和讨论了各地考古发掘的专题报告26篇，总结了建国六年来考古工作的成就，讨论了考古工作的十二年远景规划，对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是月　雷海宗在《南开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

文章论述了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600年亚欧大草原的游牧部落与中国、希腊和罗马等地区国家的关系与第三次迁徙，因其创始性而被称为有关文明的冲突和融合问题的先驱之作。

同期还刊登了王玉哲《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

吴晗《读史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

收录作者1931年至1948年所写十一篇札记式史学论文，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并在编选时对个别地方作了修改。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由三联书店重版。

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编著《中国历史概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本通俗、简明的中国通史。全书11万余字，内容包括古代、近代、现代的整个中国历史，从体例上说，本书是1949年后第一部时代完整的中国通史。翦伯赞负责古代史部分，4万字左右。文中，翦伯赞贯彻了自己的西周封建论主张，并采用“让步政策”论来解说农民战争的动力作用，这对后来的中国史学界影响甚大，“让步”论从此大面积流行开

来。该书后被译成德文、法文、英文、日文等，在国外大量发行，“深受国外广大读者的欢迎”。还被译成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发行。

据黎澍回忆，1953 年前后，“由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人合作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交来以后，请示毛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诸如古史分期问题等等。毛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1955 年 9 月或 10 月，陆定一向毛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他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我当时怀疑我听错了，反问说：‘党史也百家争鸣吗？’陆说：‘是的。’语气非常肯定。”

傅筑夫、李竞能《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一、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萌芽，二、唐宋两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三、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萌芽，或者表现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主与雇佣工人，或者表现为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而转化为产业资本。唐代虽谈不上有什么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在形成中国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历史前提。而到南宋，在苏杭的丝织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稀疏地出现了。明清时期，在苏杭一带的丝织业中，松江一带的棉织业中，以及冶铁业、陶瓷业、造纸业、造船业等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的因素已经萌芽和发展。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广大农村仍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因素虽已萌芽和发展，但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历史条件尚未具备，所以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它还没有能够对整个封建制度产生破坏作用。

唐长孺在《历史研究》第 2 期发表《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

该文以精深的功力就均田制的产生、性质及其破坏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系统的看法，推动了对均田制的全面研究。

陈述在《历史研究》第 2 期发表《哈喇契丹说——兼论拓跋改姓和元代清代的国号》

该文发表后产生较大学术影响，其中提出的辽朝自称“哈喇契丹”的

新见解尤为引人注目。

王祖彝《三国志人名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汤用彤、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贺昌群《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探讨了西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状况，对汉初的重农经济政策，汉武帝的时代和汉天子占有土地的扩大、皇权对战国以来强宗大族的打击、“公田”制的动摇、绝对君权与世家大族发展的矛盾、东汉政权的结构、贵戚豪门宦官集团的内讧与土地财富的集中、东汉豪门世族、封建依附形式的发展与封建剥削的加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文史哲》杂志从第2期开始连续刊登大量文章对华岗进行猛烈批判。

3月

14日　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始制订1956年至1967年《发展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

是月　王仲荦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

第4、5期连载。该文系统地论证了“魏晋封建说”，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作品。该文的发表，标志着作者成为中国古史分期魏晋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全文从古代中国原始奴隶制结构，以及生产力的持续增长与封建主义因素逐渐获得发展等方面来阐述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过程。主要观点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魏晋，从殷商一直到东汉，都是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可分为两个段落：从商到春秋是第一个段落，这时期社会上有农村公社和未获得发展的早期奴隶制两种基本结构；从战国到东汉是第二个段落，这时期农村公社已经瓦解，较为发展的奴隶制开始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商品生产的可能性。自汉武帝开始，流民大量出现，奴隶制面临总危机，汉末黄巾大起义等，才摧毁奴隶制，引起封建关系急剧发展。到魏晋时期，封建制终于代替奴隶制而上升到主导的地位，中国就进入封建社会了。

该文与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同为“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作。

1957 年 3 月，该文单行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嵇文甫《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中收录了作者有关历史评价问题的几篇讲演，经整理补充、改写而成。共分四部分：人民性与进步性——历史评价的基本尺度，历史评价中的矛盾性与具体性，历史评价中的现实政治意义，历史评价中常牵涉到的几个理论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曾把讲演记录稿以《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为题出版。

该书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历史评价标准应以人民性和进步性为基本尺度的观点。在论及“阶级立场与历史主义”时，嵇文甫说：作历史评价，首先要明确阶级立场。“立场只能是一个立场——无产阶级立场。历史主义本身就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别的阶级不会有历史主义。资产阶级像胡适之流，虽然好像也标榜什么‘历史主义’，但那显然是一种假历史主义。我们所谓历史主义，是唯物论的历史主义，胡适所讲的是主观经验论的历史主义。”他强调，“只有认识唯物论的历史主义的本质，才能认识历史主义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有些人所以顾到历史主义就顾不到无产阶级立场，顾到无产阶级立场就顾不到历史主义，其原因就是对这两个概念根本没有弄清楚。历史主义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立场。”

1979 年三联书店重版该书。

杨翼骧《秦汉史纲要》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原为作者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秦汉部分的讲稿，广泛参考《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以及当代学者的多种著作编写而成。主要章节为中央集权的秦封建帝国的创建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西汉帝国的建立和西汉初期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西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加强与对外扩张、王莽的改制和赤眉绿林大起义、东汉帝国的建立与发展、东汉社会阶级矛盾的增长和黄巾大起义以及秦汉时代的文化。

岑仲勉《西周社会制度问题》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研究西周社会制度入手来讨论中国古史分期，收录《论周代社会史料的运用问题》、《封建社会的建立应该放在西周初期》、《依据历史试求我国各种新石器文化的可能主人》、《汉族构成的分子》、《对近年历史分期问题的文章提出些疑问或肯定》等论文，从多方面对西周社会制度进行了研究，观点与郭沫若、李亚农、童书业、齐思和、吕振羽、翦伯赞、杨向奎等多有商榷。

万国鼎编，万斯年、陈梦家补订《中国历史纪年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系根据1933年万国鼎所编《中西对照历史纪年图表》补充修订而成，目的是帮助解决文学、史学、文物、考古等科学研究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常遇到的关于历史年代、历代帝王年号、公元甲子推算检查对照、太岁纪年等疑难问题。分上下编。上编包括公元历史年代总表和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2790年的甲子纪年表，表中注明朝代、帝王姓名、庙号和年号纪年。下编包括夏商周年代简表、东周诸侯年表、西周诸侯存亡表、中日对照年表、公元甲子检查表、太岁纪年表以及该书所载年号的笔画索引，其中对西周共和以前的难考年代所作整理最具价值。

1978年中华书局重版。

郭毅生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文章《论新兴市民等级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

文章不同意太平天国是单纯农民战争或农民革命的观点，强调市民等级在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太平天国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而“由于市民等级参加到农民战争中，这就给太平天国革命赋予了时代的新意义，使革命达到历史上空前的规模，成为全部旧式农民战争的顶点，而为现代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作了一次天才的先期预演”。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由此引发了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的讨论。该问题是1949年后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争论最热烈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领域内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

1957年，作者又在《教学与研究》第1期上发表《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一文，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该文从《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农民分化与市民等级的兴起、革命的任务和内容三方面论证太平天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后郭文被作为“错误观点”受到批判。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4月

2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

19日　全国人大民委制定《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开始对境内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

况科学调查。

从 1950 年到 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由学者和专业人员参加的四个民族访问团和两个民族工作视察组，到西北、西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区检查民族工作，调查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及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1956 年春，成立了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和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组成的调查领导小组，在全国人大民委成立了调查办公室，并筹建了云南（费孝通、刘冠英负责，方国瑜参加）、四川（夏康农负责，杨辛、胡庆钧参加）、西北（冯家昇负责，陈家龄参加）、贵州（吴泽霖负责，梁欧第参加）、广东（包括海南岛，岑家梧负责）、广西（黄现璠负责，莫矜参加）、西藏（李有义负责，李安宅参加）、内蒙古和东北（翁独健负责，秋浦专门负责内蒙古）等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搜集和积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必需的资料，即有关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和上述各种社会的过渡形态的具体资料。各组调查了蒙古、藏、维吾尔、壮、苗、布依、瑶、傣、彝、黎、景颇、怒、傈僳、独龙、佤、鄂伦春、鄂温克等二十个少数民族，整理出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末期的第一手资料，约 1500 万字。

1958 年，这一工作改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将调查组由原来的八个增加到十六个，新设了甘肃、青海、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福建八个调查组。调查组的人员最多时达千人以上。至 1964 年，调查任务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写出调查资料 340 多种，2900 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 100 多种，1500 多万字；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几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简史简志合编》初稿 57 本。

1979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重新规划，在上述调查基础上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五种丛书。共计 403 册，7929.5 万字。

是月　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共收录三篇论文：《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及其增长》、《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的停滞、变化和发展》、《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发展及其演变》。作者继续从多方面探讨了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问题，认为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相当发展，到了手工工场阶段或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开始瓦解、崩溃，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代表的市民阶

级正在形成。

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一文中，作者指出："不拘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内容与形式上，我们都可以看见明代，特别是明末三五十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已在开始起着本质的变化。"

上述观点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黎澍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

该文对尚钺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看法提出批评。黎文指出，尚钺等人脱离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把商品生产和非商品生产混淆，把农奴式的劳动当作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把农村副业和行业手工业当作工场手工业，从商业资本引出工业资本主义等等，都是错误的，是把明朝的中国历史近代化的倾向。尚钺等人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在明朝已经成为把汉族联系为民族的纽带，把农民暴动解释为"市民"运动，在上层建筑的许多部分上面一一贴上"市民意识"的标签，这些标签实在贴得太早了，表现了显著的片面性，贴标签的基础并不稳固。

该期还刊登了斯维至的《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以及杨宽的《论南北朝时期炼钢技术的重要发明》。

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印行《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上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中册和下册于1958年1月出版。

该书始于秦之统一，终于辛亥革命清亡，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二千余年的历史。前四卷曾于1934年付梓，受到史学界的重视。

杨宽《秦始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容肇祖编《李贽年谱》由三联书店出版。

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过去哲学史工作底自我批判》。

作者对其旧作《中国哲学史》中所含"反唯物史观"之处进行了自我批判，指斥自己对于历史和历史学的歪曲，是企图否认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学方面所做的变革，否认历史学已成为科学，用以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5 月

2 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本年 2 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4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24 日　范文澜在《光明日报》发表《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

文中推荐了彝族学者刘尧汉用彝族地区社会调查材料研究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篇文章。

作者指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的发展的历史总喜欢与画像上和《诗经》、《书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或者和希腊罗马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未免有些目不邪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

梁作杆在《光明日报》发表《反对庸俗地理解“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原理》。

该文与孙祚民《关于“农民政权”问题》一文进行商榷。梁氏作者不同意封建社会中所有农民起义和战争的矛头，“自始至终总是指向某些为他们所深恶痛绝的统治阶级个别人物”，“没有同封建制度进行斗争”，认为“在封建制度的上升时期，即在封建的生产关系还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的时期……农民起义的主观动机首先是反对过重的剥削，其最高目的只求获得土地，决不想根本推翻封建制度。”但是在封建社会的下行阶段，农民起义在“主观上有了废除封建制度的意识并在客观上起着打击封建制度的作用”。

26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

他说：“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中共中央指出，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同时，中共中央又指示，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

30日　尹达在《人民日报》发表《改进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为毛泽东同志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十五周年纪念而作》。

是月　朱偰编《郑成功——明末解放台湾的民族英雄》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收录了作者1949至1956年间写作的八篇论文，内容涉及历史方法论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结合问题、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和古代农民战争问题以及两汉社会性质问题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1962年，作者又把1956至1961年所写的论文收进这个集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论文增加到三十三篇。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些论文，如《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等都收录其中。

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台湾历史概述》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是1949年后大陆发行的第一部台湾历史读物。作者认为，台湾是中国人民开发较早地区之一，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从主要的因素来看，台湾历史显著地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封建制以前的时期（1661年以前的台湾历史）；（二）封建制度时期（1661年至1840年）；（三）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时期（1840年至1945年）。全书按这三个时期将台湾历史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来进行叙述，重点论述了近代殖民主义者，尤其是美国对台湾的侵略，以及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既有学术性，又通俗易懂。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与北京市文化局联合考古队在夏鼐主持下开始

发掘明神宗万历帝定陵。

赖家度《明代郧阳弄农民起义》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谢国桢《黄梨洲学谱》修订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孔经纬《中国经济史上的几个问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唐朝田制与赋税制的演变》、《唐朝临安（杭州）市民等级经济势力的成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生及其在1937年以前的一般发展过程》、《中国民族市场形成问题》等四篇论文。

杨向奎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有关中国古史分期的若干问题》。

该文要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要多注意苏联的东方学者对于古代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作者用大量篇幅研究了少有人注意的中国古代的农村公社，并对公社瓦解后的土地问题，与土地结合的农民问题，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问题及役使贫民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作者的结论是，两汉社会是封建社会，而从战国开始到西汉末，是一个从宗法封建社会过渡到地主封建社会的时期。家庭奴隶制还存在着，结合到封建社会的体系内，但因为是前封建主义的产物，越来越变成赘瘤了。

童书业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

作者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两个方面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目的在于通过与古巴比伦社会的比较，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

日知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发表《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评童书业著〈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与童文商榷。

李泽厚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

6月

27日　王莹在《光明日报》发表《正确地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是月　《中学历史教学》（双月刊）创刊。

本刊由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办，1959年停刊，1980年复刊。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译《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由三联书店出版。

所收论文都译自苏联《历史问题》杂志，除一篇发表在《历史问题译丛》1954年第1期外，其他论文都选自《史学译丛》1954年及1955年各期。

黄子通、夏甄陶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春秋战国时代的奴隶制》，提出秦统一封建说。

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中国的社会的第三次大分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大分工。商业活跃起来了，金属货币和高利贷出现了，土地也变为可以买卖和抵押的私有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土地、金钱和大批奴隶就日益集中在富有的奴隶主的手中，小农经济容易破产，而奴隶制经济却巩固和扩大起来，扩展到一切生产部门。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由早期的家长奴隶制进入了发达的奴隶制。文章着重从生产关系方面考察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奴隶制。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是1949年后第一部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论文集，收录了1949至1956年论文25篇，内容主要集中在对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上。

李洵《明清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原是大学“明清史”讲稿，出版时对原稿作了较大修改。

作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该书就是他用唯物史观分析、研究明清两代历史的早期代表作，也是“新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明清史专著，开创了明清史研究的新体系”。全书共分九章，叙述了从元末农民起义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的472年的历史，并根据这一时期的不同特点，首次将这一段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十个阶段。

杨向奎在《文史哲》第6期发表《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朱杰勤《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韩国磐《柴荣》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岱年《张载——11世纪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论著。作者以中、拜双方史料互相印证，概述了公元二至十四世纪之间两国之间连绵不断的通使通商关系，从而填补了拜占廷史书有关记载的缺略，驳正了西方史家一向认为的在两国贸易中只是由中国单方面输出蚕丝的偏颇看法，使拜占廷在东西方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得到充分肯定。

戴逸在《历史研究》第 6 期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上，作者同意胡绳所说“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分期标准”，但认为胡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划分没有充分照顾到近代阶级斗争的特点。作者从阶级斗争的来潮去潮、锋芒趋向以及参加斗争的动力三方面来考虑，将 1840 至 1919 年这八十年的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1840 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这个革命形势的基本特点和封建社会历来的农民战争相仿佛，其主要锋芒是对准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参加斗争的是广大农民群众和一部分城市平民，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是发展的最高潮。革命形势的第二个阶段大约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延续到十九世纪末，这个革命形势是由外国掠夺中国邻邦和中国本土的危机所引发起来的，其主要锋芒对准外国侵略者，斗争的主力军仍然是农民群众，但这时已能看到微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它发展的最高峰。革命形势的第三个阶段从二十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这个革命形势的斗争锋芒又是直接对准封建统治者的，但这时的封建统治者已经彻底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所以这个斗争归根到底又必然是打击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动力不仅有农民而且有资产阶级革命派参加和领导，辛亥革命是它的最高峰。

作者说，上述革命形势的三个阶段，可较全面的概括八十年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

齐思和在《历史研究》第 6 期发表《批判胡适派对于世界史的反动唯心观点》。

文章主要对何炳松、陈衡哲进行批判。

朱本源在《历史研究》第 6 期发表《论殷代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

作者认为，要认识殷代的社会性质，必须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入手。但史学界多把注意力集中在殷代直接生产者的社会地位上，热烈讨论殷代奴隶是否可以屠杀或买卖的问题，甚至从殷代殉葬奴隶的数目去推断殷代是否奴隶社会。或者企图仅仅从殷代的生产力状况去解决殷代的社会

性质，而忘掉了生产关系。这些都是方法论上偏差。作者尝试从殷代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来考察殷代的社会性质，否定殷代是封建制之说，认为殷代是由原始公社制到东方奴隶制和专制国家的过渡期。

7月

5日　高教部召开审订文史十八种教学大纲会议。

9日　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地农学、生物学、医学、数学、天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哲学等方面的专家共120人。

是月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对甲骨文出土、研究的历史和卜辞内容本身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大型著作，对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过程、占卜的方法、卜辞和其他甲骨刻辞的体例、商代文字的性质、卜辞的语法、甲骨断代问题以及卜辞中关于历法天象、方国地理、政治制度、祭祀制度、亲属关系、农业田渔、建筑交通、宗教思想、社会性质等都有相当详尽论述，对近代以来甲骨文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全面梳理，被称为甲骨文研究的百科全书。

裘锡圭《评〈殷虚卜辞综述〉》认为："《综述》在很多方面都反映了此书出版时殷虚卜辞研究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在《综述》出版以后的三十多年里，陆续发表了很多殷虚卜辞的新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这些都是《综述》著作时所不及见的。但是这些年来并没有人按照《综述》的规模，重新做总结殷虚卜辞研究成果的工作。在已有的关于殷虚卜辞的通论性著作里，没有一部能在广度和深度上跟《综述》相比。所以《综述》至今仍是甲骨学的初学者所必读的入门书和研究者所必备的参考书。"

郦纯编《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经济措施、官制军制、乡官制度、赋税制度、供给制度、教育考试制度以及天京的社会组织七部分，对太平天国各方面制度进行了初步探索。1963年出版修订版。

任继愈《墨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严敦杰《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由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出版。

范祥雍编《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范文澜在《学习》第 7 期发表《百家争鸣和史学》。

《历史教学》第 7 期发表社论《在历史科学的研究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 1946 年以后陆续写成的，初衷是“想从商人和商业资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地位及其所起作用这一角度来说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规律问题”，以补充正史食货志多偏重国家财政税赋方面的记载而对于私人经济记载极少的不足。该书虽然是为了解决理论问题，但尤重史料，“先从搜集史料着手，作成长编式的初稿，俾在具体的史料里，能够一个一个地来解决问题”。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发展概述，系 1949 年后所写，对其下各章做了鸟瞰式的叙述。其他六章均为 1949 年前所写论文，分别论述了安徽、江苏、福建、陕西等地区商业规模、商人活动，以及商业资本累积的过程及原因。作者以丰富的资料为依据，论证了在封建社会内，中国商业资本最终还是替封建制度服务，以巩固封建制度的统治。同时，由于明清时代中国已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因此，这一时期的商人和商业资本颇具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特点，对于旧生产方式具有分解的作用。

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收录四篇论文，论题均相互衔接，叙述了从远古至宋元时期我国海上交通发展情况。

韩连琪在《文史哲》第 7 期发表《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

该文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对汉代统治者剥削农民的几种主要方式进行了考证。

尚钺在《历史研究》第 7 期发表《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

该期还发表了王天奖的《西晋的土地和赋税制度》。

8 月

6 日　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在京主持召开高等师范学校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审订文史科目的教学大纲。

20 日　翦伯赞率领中国学术代表团赴巴黎参加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

代表团成员包括周一良、张芝联、夏鼐等。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

24日　毛泽东对音乐工作者发表谈话，阐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

毛泽东说道：“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毛泽东认为，对历史的研究和理解，要着眼于“现在”与“将来”，“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

是月　（苏）M. H. 梅伊曼著、朱成光译《封建生产方式的运动》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陶大镛编著《社会主义思想史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顾廷龙、王煦华选注《汉书选》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汉书》中选取十篇，包括一篇纪、九篇列传。所选基本上以最早的景祐本为依据。在注释方面，主要根据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并参考杨树达的《汉书窥管》和日人狩野直喜的《汉书补注补》。

何兹全在《文史哲》第8期发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

该文是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作。作者认为，从西周到秦汉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是问题最多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之不能解决，主要症结就在于对这时期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着分歧。作者同意苏联学者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意见，认为西周春秋还是前期古代社会，或家长制早期奴隶制时期，魏晋时期中国才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具体年代放到196年曹操的许下屯田。东汉魏晋三四百年是中国奴隶制衰落、封建制生长的时期。封建制因素的生长在东汉已经开始，到魏晋时期还在发展，奴隶制的衰落在西汉末东汉初已经开始，到魏晋时期还在继续。在这个时期中，曹操的许下屯田可以看作是封建生产关系在社会生产中取得统治地位的事件，所以就拿这一年代和这一事件作为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线。作者从西周春秋是前期古代社会、战国秦汉时代的奴隶制及其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东汉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何晚年在接受采访时说：“1949年后，西周封建说是中国历史分期的

主导学说，史学界的长者——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都持此说。郭沫若原持秦汉统一封建开始说，后来把封建开始提到春秋战国。毛泽东说，三千年来中国都是封建社会，西周封建说与此最合拍（我不知道是毛泽东受范文澜的影响，还是范文澜受毛泽东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也还勉强，汉魏（魏晋）封建说，便成了反对毛泽东的歪说。尚钺写文章支持魏晋封建说，便成了群起而攻之的靶子。我当然也不敢说话了。但肚里有话，是憋不住的……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气氛活跃起来。我一高兴就写出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那篇文章，先送《历史研究》。据说，尹达（时任《历史研究》主编）曾拿给郭沫若（时任《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召集人）看，也不知是郭沫若还是尹达下了一句评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呗！’后来，我拿到山东《文史哲》发表了。”

为了活跃学术空气，本期《文史哲》特别发表编辑部文章——《开展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再次发起古史分期问题论战。

黎澍《近代史论丛》由学习杂志社出版。

北京学术界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90 周年学术讨论会。

侯外庐在《历史研究》第 8 期发表《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提出了西汉封建说。

在作者看来，确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线，“应该从固定形式的法典来着手分析”。自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开始，中国社会封建因素萌芽。至秦统一天下，奴隶社会的经济构成被封建经济构成所代替，再经过汉初一系列法制形式，如叔孙通制礼、萧何立法、张苍章程等，直到汉武帝的“法度”，封建构成才典型地完成。秦汉时代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形式是土地国有制，秦汉时代的直接生产者是编户齐民的小农。

该文被称为“西汉封建说”的代表作。

李埏在《历史研究》第 8 期发表《论我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提出中国封建土地制度“诸制并存说”。

该文长达两万五千言。其观点既不同于侯外庐、贺昌群等所持封建土地国有制主导论，也不同于胡如雷、杨志玖等所持封建土地私有制主导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包括几种形态：封建土地国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小农土地所有制、残余的农村公社所有制。几种形态性质不同，但同时并存。此文一出即受到史学界普遍重视，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有关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流观点。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7 世纪至 19 世纪 40 年代》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作者抗日战争期间所撰《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补充修订而成，1958 年又作为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五卷修订再版。全书共分三篇十七章，分别论述了十七、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想的发展，对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朱之瑜、傅山、李颙、颜元、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阮元以及魏源、龚自珍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具体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启蒙思想开始于十六七世纪之间，正值“天崩地解”的时代，因此思想家们具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

（苏）依列里兹基著，谭善余、丁文安译《别林斯基的历史观点》由三联书店出版。

9 月

8 日　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关于古代分期问题的一个关键》。

文章认为，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主要关键当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去追求。生产力的提高使旧有的生产关系不能相适应，因而突破了旧有的关系而产生新的关系。在古代，铁的出现和使用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作者指出，战国以前的铁器如果能够大量出土，那就可以使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种看法，即以春秋战国之交为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界限，获得更多的铁证。

13 日　胡如雷在《光明日报》发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

文章不同意侯外庐“皇族土地所有制”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由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构成的，而占支配地位的却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是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历史现象，只是后者的补充形态。作者在《新建设》1960 年第 2 期又发表《如何正确地理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一文，对这一观点作了补充，指出：如果把土地国有制当作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就无法说明地主阶级占有地租的社会根源，也无法根据土地所有制这一基础来明确划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当然也就无从论证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了。

是月　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作者所著《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姊妹篇，收论文十篇，并附载

讨论史学的信札十件。主要讨论了研究历史的方法以及处理史料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处理史料方面，多为独得之见，指出了过往历史书中的纰漏和人们较少注意的问题。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是：《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材料问题》、《关于历史材料运用中的若干问题》、《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博大气象及替后世学术界开辟的新途径》、《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考古学者王国维在研究工作中所具备的条件、方法与态度》。信札中主要讨论了西周是否奴隶社会、《禹贡》的时代背景、《汉书·地理志》的读法、历史考证工作所应走的路等。作者认为，如不得已而有所考证，也必须在考证中讲大体，推其大本大原，以简驭繁，收融会贯通之效，从而取得科学的系统的知识。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附《殷商氏族方国志》）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写于 1947 年，1948 年修订，《殷商氏族方国志》为其姊妹篇。两书皆根据甲骨文来研究殷商氏族制度，意在通过这一研究确定殷商社会仍旧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作者从殷墟甲骨的非贞卜文字中确定各辞所共见之字的字义，发现大量氏族徽号，认为由此可以基本确定此一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性质。为了追寻殷商氏族的渊源及其地望，作者又写了《殷商氏族方国志》以为前书之补充，唯此稿未全部完成。前书十六节，后书计列方国四十三，两书广泛涉及殷商氏族问题的各个方面，试图将文献与甲骨文资料相结合，以说明“殷商后半期的国家组织以氏族为基础”。

湖北长阳县下钟家湾的一处洞穴堆积中，发现属于早期智人的“长阳人”上颌骨化石。

詹剑锋《墨家的形式逻辑》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自三十年代初起讲授大学逻辑课，为驳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之说，发愿研究墨子的形式逻辑。从 1952 年冬始，历时四载，三易其稿，撰成此书。

书中批判了胡适有关《墨经》的观点，认为历史上并无宗教的墨学，也没有后期墨家。创辩学（逻辑）者是墨子，《墨经》亦基本上是墨子自著，由此确立了研究《墨经》的基本原则，即把《墨经》和《墨子》全书的其他部分融会贯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经》、《经说》、《大小取》为主要材料，参以《尚贤》、《耕柱》等篇，整理出一套规模初具的墨家的形式逻辑，并按照传统形式逻辑教学大纲的顺序加以叙述。

安志敏率黄河水库考古队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三里桥新石器时

代遗址。

发掘工作延续到1957年，确认了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发现了属龙山文化较早阶段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庙底沟与三里桥的考古发掘，再一次证明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也基本上明确了二者的文化性质。在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上，发掘者认为，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这一主张对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发掘报告《庙底沟与三里桥》由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

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由三联书店出版。

共收太平天国有代表性的文物图像89幅。包括玉玺、碑刻、兵器、腰牌、田凭、预知由单、完粮执照、田赋附加捐收照、业户收租票、门牌、结婚证书、工业照凭、商凭、关票、路凭、钱币、建筑艺术、印刷艺术等。每件文物或数件同类文物之后加有基本情况简介，间或附有著者考释跋文，评价其历史价值。

张维华在《历史研究》第9期发表《试论曹魏屯田与西晋占田上的某些问题》。

10月

1日　太平天国纪念馆在南京成立。

该馆是收藏保管、陈列宣传、调查研究太平天国文物史料的专题性博物馆，由罗尔纲等主持筹建。1961年1月11日，改名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成立。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对亚非地区特别是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的研究。该所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也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成立初期创办了《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1996年南洋研究所改称南洋研究院。此后，各高校陆续成立了一些国际问题的研究机构。

25日　范文澜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1956年7月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近代史讲座所作报告稿》。

该文同意把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为划分阶段的可靠依据，指出帝国

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中国近代史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这一时期各个事件的一条线索。因此，中国近代史可分为四大段：1840—1864 年，1864—1895 年，1895—1905 年，1905—1919 年。

是月　胡滨《戊戌变法》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收入论文八篇，对中国农民战争的原因、性质、特点、作用、转化规律、“农民政权”及其与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和宗教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独具新意、离经叛道的见解，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在学术界引发了关于农民战争性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农民战争的“破坏性”问题》指出在驳斥对农民战争的恶毒诬蔑时，不能掩饰在个别情况下农民起义军会发生“纪律败坏”的情形，不能否认农民战争有着“残酷性”、“恐怖性”。《中国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认为唯有透过统治者受到农民起义的深刻教训，不得不向农民让步，实行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来看每一个封建王朝初期的生产发展与经济繁荣，才能够彻底理解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关于“农民政权”问题》认为农民起义领袖在起义过程中所建立的短期性政权，不能称之为“农民政权”，其性质基本上还是封建的、专制的，它与“旧政权”之间并无实质上的不同。《中国农民战争和统一战争的关系》指出从反封建压迫性质的农民战争转化为建立与维护新封建统治的统一战争，虽然在性质上已经改变，但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中仍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的因素。《中国农民战争和“流寇主义”问题》认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流动作战”与现代的“运动战”是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性质决然不同的战争方法和形式。前者是“流寇主义”思想的反映。《中国农民战争和种族战争的关系》认为农民战争和“种族”战争的政治目的和阶级实质是相同的，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人物及其群众，能否一定程度地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复杂的关系，就往往成为决定这一起义和战争历史意义的关键。《中国农民战争和宗教的关系》阐明农民起义和战争所结合的宗教，不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和欺骗劳动人民的上层宗教，而是在宗教分化过程中分裂出来的、不同内容的、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生根长大的农民自己的下层宗教，它起了组织农民、鼓动农民、在农民战争失败时掩蔽和延续起义力量的作用。《关于中国农民起义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指出评价非农民阶级、非被压迫阶级阶层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应当根据他们在实际参加和领导农民起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能把“阶级分

析法”简单化、庸俗化。

高亨在《文史哲》第10期发表《周代地租制度考》。

该文从《左传》、《国语》、《诗经》等考察周代的地租制度，并从周代的地租制度上考察周代的社会性质，得出周代是封建社会、西周阶段通过实行劳役地租制度来体现庄园主与农奴对立的封建生产关系这一结论。

吴大琨在《文史哲》第10期发表《怎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考察古史分期问题》。

作者认为要认真解决中国的古史分期问题，非首先弄清楚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经济特点不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应当着重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具体地阐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这一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究竟是怎样体现在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没落的过程中的；第二个问题要研究在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究竟有哪些特点。

黄约斋《汉字字体变迁简史》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邓拓在《历史研究》第10期发表《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

作者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京西门头沟一百多处明万历到清乾隆年间的民窑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收集到大量的文书、契约，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经过深入的研究分析，作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期就在明朝万历到清朝乾隆年间。

文章发表后产生了较大影响。

《华东师大学报》第4期发表总题为《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商榷》的文章。

包括年子敏《评罗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和束世澂《评罗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读后记》等文。年文以司法部法医研究所对李秀成笔迹鉴定为据，做出李秀成供词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结论，认为罗尔纲为之笺证，实为“诬罔先烈”。束文对年文表示支持。年文和束文发表后，招致学术界众多反对之声。

11月

15日　首都学术界举行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

《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社论，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推动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是月　胡绳在《历史研究》第 11 期发表《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论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观念》。

文章认为，很多现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著作试图答复历史学是不是一种科学和怎样才能成为科学的问题，但是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错误的观点：一种是根本否认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有客观的规律，因而否认历史研究能够成为科学；一种是把历史学说成就是史料学，从而取消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求；还有一种是认为历史学乃是一种“主观”的学问，是没有客观标准的“科学”；最后还有一种观点是企图把生物学引导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以为这样就有了历史科学，但实际上却是破坏了历史科学。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对这几种观点进行分析，并对梁启超、何炳松、傅斯年、顾颉刚、常乃悳、朱谦之等人的史学观点进行批判。

文中写道：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会把史料学工作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无论是史料的“内部”的考证还是“外部”的考证，目的都应当是提供对历史的科学认识的可靠基础；如果脱离整个史学的科学研究而孤立地进行，就会迷失方向，无目的地沉溺在史料的海洋中。诱使史学家走到这条路上去是反动史学观点的目的。

该期还发表了李泽厚《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纪念中山先生九十生辰》。

梁启雄《荀子简释》由古籍出版社出版。

李亚农《西周与东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书是作者《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姊妹篇，主要研究了前书中没有弄清的问题，对一些理解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要的问题如“夏政”、“商政”、“周索”、“戎索”以及周宣王“不藉千亩”和“料民于太原”等进行了诠释。

王仲荦《曹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较早对曹操进行全面评价的一本著作，许多论断令人耳目一新，如认为曹操所以能够统一北方，除了他的军事才干以外，在于他取得了一部分握有武装的豪强和有政治潜力的士族的支持，在于他“挟天子而令诸侯”和推行屯田，使他在政治上、经济上占优势。这些观点多被史学

界采纳而成为学界共识。

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运用大量中外史料，对法显西行的路线、古代中国与西域的商业交通和文化交流、西域的地理环境和汉晋间佛教东传的情况作了全面论述，书中采用日本学者足利喜六对《法显传》的研究成果，也参考了纳缪沙、克拉卜罗斯、兰德塞诸人的考证，在中西交通史和佛教史研究中具有较大影响。

邓广铭《辛弃疾（稼轩）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多方采征，辨析考证，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辛弃疾这个在宋代政治史、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作者代表作之一。

朱谦之《李贽——16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赵俪生在《文史哲》第11期发表《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

文章认为："历次农民起义所表现出来的，起义规模的大小，战斗力的强弱，坚持时间的长短，其内部凝聚力的大小，都与其参加农民的身份有关。"

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

1958年6月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78年1月改名上海古籍出版社。该社以出版古典文学、历史、哲学、语言、科学技术等古籍的整理和学术研究著作为主，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2月

6日　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史分期争论中的又一关键性问题》。

作者认为，不能因为汉代"依然局部地在使用奴隶从事生产"，就断定"西汉和东汉都还是奴隶社会"，并"提出一个新的质问"："如果汉代是奴隶制，两汉的政府为什么那样严厉地打击使用奴隶从事生产的工商业者"？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而只有"承认汉代已经是封建制"，"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1957 年 2 月 25 日，日知在《人民日报》发表《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谈到汉代政权的本质》对郭文进行批评，郭沫若又在 1957 年 3 月 5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略论汉代政权的本质》予以答辩。郭文再次表示不同意“汉代奴隶制”说，认为租佃关系或者雇佣方式在奴隶制下虽“也可以有，但那只是萌芽状态”，而到了汉代，这种关系早已成为“地主经济”的“农业的普遍生产方式”，汉代确有奴隶，然而那是“封建制度下的家奴”，而不是“奴隶制度下的生产奴隶”，至于汉代“重农抑商”的政策，更证明了它是在“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权”。文章最后批评了日知处理史料的态度“不大严谨”，希望探讨问题“不要从假设出发，而是从占有广泛的资料出发”。

7 日　傅筑夫、谷书堂在《天津日报》发表《中国原始资本积累发生迟缓的原因》。

作者认为，“封建剥削的残酷加固了自然经济，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障碍，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存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又不足以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的刺激力量”，“所以封建制度依然长期保存下来”。作者指出：“欧洲许多国家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以后，到十六七世纪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却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裹足不前，显然这一现象是与我国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迟缓分不开的。由于我国封建制度的特点和封建剥削的残酷，使封建的自然经济具有坚强的稳定性，而自然经济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停滞不前，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发达，从而也就使原始资本的发生失掉了它的客观基础。”

是月　刘节在《中山大学学报》第 4 期发表《西周的社会性质》。

1957 年第 1 期连载。文章认同西周封建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在西周到战国末年这一阶段中打定了的。这一事实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与文化史各方面都可以看出来的。不只是西周与东周不能截然分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就是秦汉两代也不能够与周代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因为社会发展有它的一贯性，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是有它们之间的基本区别的。不能把土地私有制作为划分这两种社会的界线，因为奴隶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也会出现土地私有的。

尹焕章编著《华东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主要依据科学考古发掘调查资料，对华东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状况、文化类型及其尚待解决的问题进行论述。书中按华东各省市的南北次序，介绍了每一个地区古遗址的所在位置、发现经过、器物类别、文化层

堆积及其相互关系、当时发掘人的推断等，并对华东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作了初步综合分析。作者还提出了尚待探究的龙山文化与殷商文化的关系及印纹硬陶文化与吴越文化的关系问题，供学术界思考。

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编《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上、下）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李四光主持编撰，在八千余种文献资料基础上编成，记载了我国1955年以前有据可查的大小地震八千余次，成为世界上跨年最悠久、内容最丰富的地震史料巨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出版。

到1974年11月先后出完39卷，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39年到1895年7月期间的著作。

史念海在《西安师范学院教学与研究文辑》发表《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

《史学集刊》创刊。

该刊由吉林大学主办，初时为半年刊，至1957年出版四期，1958年休刊，1981年复刊，改为季刊，自2006年起改为双月刊。

黎澍在《新建设》第12期发表《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社会基础》。

沈灌群《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周谷城《古史零证》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收文七篇，皆从文字方面研究古史。

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普及读物，全面展示了敦煌的绚丽文化宝藏。内容大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敦煌简史、敦煌石窟形制和建筑史、敦煌学及其在中国学术上的价值四个方面的简要介绍，另一部分是对敦煌的造型艺术、佛教经典、道教经典、儒家经典、史地材料、语言文学材料以及科学材料的基本内容和学术价值的分类介绍，附有数十幅敦煌绘画和写本图片，图文并茂，从各个角度阐明了敦煌石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丰富内涵。

牟安世《洋务运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是年

杨向奎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一所任研究员。

南开大学历史系成立明清史研究室，郑天挺任主任。

1957 年

※“反右运动”展开。
※ 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出版。
※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出版。
※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出版。
※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出版。
※ 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出版。

1 月

4 日　陈垣为《历史研究》审查罗尔纲撰《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写作《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审查意见》。

该文为考据学做了辩护，反对将旧考据一笔抹杀，对那种从教条主义出发、盲目否定史学传统和遗产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作者认为：“旧考据有不科学的，但也有科学的，不能一笔抹杀。故此文题目只能说科学的考据与不科学的考据不同，不能说‘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在指出罗文提法的不妥之后，陈氏再言：“诚如此文所标志，容易令人误会，以为旧考据都是要不得的。引言中又提到‘顾炎武的《日知录》完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骂农民革命为盗为贼’。这都是时代的关系，无可苛求。如果说这些都是要不得的，那我们就无历史可看，更无前人文化遗产可继承。”

10 日　“敦煌艺术展览会”在波兰华沙开幕

2 月 10 日至 3 月该展览会又先后在捷克斯洛伐克俄斯特拉发和布拉格举行。

《学术月刊》在上海创刊。

该刊是一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史学研究占据其重要篇幅。1958 年 3 月上海市社联成立，该刊成为该机构机关刊物。1966 年

因“文革”而停刊，1979 年 1 月复刊。

是月　郭毅生在《教学与研究》第 1 期发表《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

该文不同意范文澜于前年 1 月 11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零五周年》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具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进步性的农民土地纲领。

本文发表后，引发了史学界关于农民战争中平均主义的大规模争论。

贾兰坡、王建在《科学通报》第 1 期发表《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

该文仅 1100 余字，发表后引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有关北京人及其文化发展水平的争论。

作者认为，北京人的石器制作技术已经相当进步，不可能是人类最初使用的石器，“显然与中国猿人时代相接的泥河湾期还应有人类及其文化的存在”。因此提出要在中国寻找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及文化遗物，应到更新世初期的泥河湾期（距今 300 万—100 万年）的地层中去寻找，因为这样的地层里才会有最古老的人类遗骸和文化遗物的存在。

文章发表后，裴文中在 1961 年《新建设》第 7 期发表《“曙石器”问题回顾》，对贾、王二人的观点不表赞同，认为中国猿人石器之前有人工打制的“石器”这种说法难以成立。吴汝康又与裴文中商榷，在 1961 年 9 月 6 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从“曙石器”问题谈到中国猿人是否是最早的人》，相关讨论就此展开，断断续续长达五年半之久，直到 1962 年第 8 期《历史教学》发表《关于“曙石器”问题争鸣的现况》报道才告一段落。参加争鸣的人，有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王建、吴定良、梁钊韬、夏鼐、邱中郎和张森水等人，基本上分为两方，一方赞成北京人之前还有文化存在，另一方则认为北京人文化最原始，北京人是最早的人。这次学术讨论共发表长短文章 22 篇。

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是粮长制研究的奠基人，该书为其代表性作品，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名著，写作时间长达二十余年。书中扼要叙述了明代粮长制度和里甲制度的密切关系，着重论述了粮长制度的产生、演变和破坏过程，并分析了粮长的职务、特权和经济掠夺方式，阐明了粮长制对人民的祸害。其中既有细密的考证，又有宏观的概括，是研究明代经济史的必读之作。

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俄文版在莫斯科出版。

《安徽史学通讯》创刊。

该刊系由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创办。1959年，与该所主办的另一史学刊物《安徽历史学报》合并，更名为《安徽史学》杂志。1960年停刊，1984年复刊。

于省吾在《东北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商代的谷类作物》。

汤志钧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

该文对李泽厚《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大同书》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是康氏晚年"麻痹群众""反对革命"，"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像李文认为的那样具有早期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进步思想。李泽厚又在《文史哲》同年第9期发表《〈大同书〉的评价问题与写作年代——简答汤志钧先生》，对汤文进行反驳。张玉田也在该期杂志上发表《关于〈大同书〉的写作过程及其内容发展变化的探讨——兼与李泽厚、汤志钧二位先生讨论关于〈大同书〉的估价问题》，从而在《文史哲》杂志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康有为评价的讨论。

彭泽益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

广东十三行的起源一直是一个历史悬案。作者依据大量历史资料，对十七世纪后半期清代海禁时期和海关设关之初广东对外通商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并着重对广东洋货行和洋行制度产生的由来及其创设年代进行了多方考证，对中外学者在这一问题研究中所出现的错误进行了驳正。

金毓黻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关于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再商榷》。

文章对年子敏《评罗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和束世澂《评罗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读后记》两文提出反驳，认为年文所举出的李秀成自传为伪的证据都不正确，违反了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说服人的力量。而束文不考此事的原委，轻信年文的论断，助长了年文轻率、武断的工作作风。

2月

6日　北京图书馆开始与英国剑桥大学交换敦煌遗书写本缩微胶卷。

1954年9月13日，英国剑桥大学以布莱伯兰克、穆尔、魏莱、李约

瑟四人名义，联名致信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提出用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写本缩微胶卷交换北京图书馆等处收藏的中亚写本缩微胶卷，特别是敦煌写经的缩微胶卷。双方达成协议。历尽曲折，北图终于制作出部分敦煌写经缩微胶卷，于 1957 年 2 月 6 日向英方寄出了第一批缩微胶卷。分装 5 盒共 35 卷，从第 0001 号到第 3420 号，数量约占北图藏敦煌写经的 40% 左右。剑桥大学图书馆于同年 11 月 4 日，将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 105 卷 6980 号（翟里斯整理出了目录的部分）分成四包，海运寄至北图。1958 年 2 月和 1960 年 5 月，北图又将写经的第二、第三批胶卷共 51 卷寄出。1960 年 5 月，北图寄出所藏敦煌写经缩微胶卷的最后一批共 35 盒（卷），交换工作宣告完成。北图共收到大英博物馆藏品的缩微胶卷 105 卷 6980 号，寄给对方北图藏缩微胶卷 86 卷 7749 号。两年后，剑桥大学图书馆将北图寄来的缩微胶卷与《敦煌劫余录》对照，发现北图寄来的并不齐全，还缺近千号。即向北图追询此事。北图立刻派人调查核实，发现“确有一部分胶卷未曾拷贝”。但由于北图经费紧张，无力继续进行摄制，只得决定“所欠对方一小部分日后照好再寄去”。1976 年 11 月 11 日，北图将剩下部分的胶卷 8 盒（卷）寄给了剑桥，至此，历时近二十年的敦煌遗书缩微胶卷交换正式结束。

27 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是月　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是一部具有较大影响的辛亥革命史专著，日本学者中村哲夫称：“这部著作对日本的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两湖即湖南、湖北两省的社会经济背景入手，通过翔实的考证去把握武昌起义爆发的整个过程的研究方法，即是李教授影响的结果。”

田汝康《17—19 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论述了古代的中国帆船、17 世纪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的活动、被封建政权所束缚的中国帆船业、华侨在暹罗航运上所做的贡献、中国帆船业发展停滞的原因、19 世纪 20 年代前后的中国帆船、五口通商与中国帆船等问题，指出中国古代船舶制造在世界造船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中国船舶制造在船舶设计上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船舶图样”；17、18 世纪即使在封建势力严厉束缚下，中国帆船的发展，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仍占有重要地位。

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历史教学问题》创刊。

该刊为综合性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教学的专业刊物。1959年5月停刊，1981年6月复刊，1982年起改为双月刊。

华山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

第3期连载。该文对宋代的茶叶生产和茶贸易情况进行细密考证，认为由于文字史料的缺乏，虽还不能断言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在宋代发生，但从宋代社会各方面的条件看，这种萌芽的出现有极大可能性。但它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这不仅由于连续几次的落后民族的入侵，在某种程度上打断了它历史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封建国家对若干主要工商业的垄断政策，使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大为缩小，并受到严密的控制。所以它的发展就显得非常迟缓，要超过西欧国家几倍的时间。

李光璧、钱君晔编《中国历史人物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嵇文甫《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一些讲话，包括《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1951年2月18日在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上的讲演)、《关于历史评价中的几个矛盾问题》(1953年4月12日在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上的讲演)、《对一些历史问题应该怎样看法》(1953年8月29日在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上的讲演)、《关于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历史教育与爱国思想》(1951年5月13日在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座谈会上的发言)、《胡适唯心论观点在史学中的流毒》(1954年12月19日在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举办的报告会上对开封市大、中、小学历史教师的报告)等。

柯昌基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

文章通过对宋代雇佣关系的分析和考察，论证了我国晚期中世纪与资本主义准备阶段开始于宋代，中国社会若无帝国主义侵略，也可以正常、合乎规律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该期还发表了侯外庐的《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同政治思想的联系》。

3月

6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会上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2日，毛泽东到会并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他指出，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并明确宣布：整风先在党内整，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批评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克服错误，造成自由批评的环境和习惯。而整风的方法，要像延安那样，研究文件，批评错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方法。

25 日　范文澜在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座”作《关于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报告。

该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由翦伯赞主持，是 1949 年后学术界第一次举行大规模学术讲演，先后来讲学的包括郭沫若、侯外庐、胡绳、尚钺、刘大年等著名史学家。

范文澜开始第一讲，听众达三千多人。范提出学习马列应当“神似”，反对“貌似”；强调研究应勇于独立思考，不要怕权威，要以“我”来批判；教师在课堂上应致力于讲出自己的见解，不要讲“自以为是”的东西。范在讲演中还点名批评了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认为这本书是用西欧历史作蓝本的。西欧怎么样，中国也就跟着怎么样，这是有意无意地依西欧历史的样来画中国历史的葫芦，是在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史之履。

是月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辑《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分上下两册出版。

该书共收录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三十二篇论文和一篇综述性的报道文章，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全貌。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 1955 年毕业的研究生韩大成、王方中、黄佩瑾和李之勤四位研究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变化与发展的四篇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萌芽及其增长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进行了探讨。

尚钺为该书作序，提出：“关于明清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将影响到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某些传统看法，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或中国社会停滞论，乃至中国社会一直到 1840 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后，中国社会基础还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等等，而且也将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究竟以什么时期

作为起点的问题。因为，不拘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或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继续和发展上，以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线，都是不很妥当的，而且有着斩断历史发展线索的毛病。”

这一观点后来受到刘大年、黎澍等人的激烈批判。

张岱年《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该书通俗、简要地论述了从周秦到明清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对各个历史时期内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思想作了系统阐述。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由三联书店出版。

共八册，至1959年出全。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译《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关锋《王充哲学思想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北魏至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度的渊源、产生、发展、变化和衰微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府兵制度研究上有诸多创新，提出了不少异于他人的新观点和看法。

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由作者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4期的《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和1956年第3、4、5期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两文合并而成。全书分八个部分：一、古代中国早期奴隶制阶段的两种基本结构；二、公社的解体，较发展的奴隶制开始占统治地位；三、两汉私有奴隶的发展与债务奴隶；四、生产力的继续增长与封建主义因素的逐渐获得发展；五、奴隶制危机的加深与总崩溃时期；六、封建关系的形成；七、曹魏屯田制与西晋占田制；八、封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到了南北朝时期才显露出来。

束世澂《中国的封建社会及其分期》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李光璧编《明清史论丛》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选编了十八篇明清史研究论文，内容包括明清两朝土地和田赋制度、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农民起义、明清之间的民族关系、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科技文化等。

谢国桢《顾亭林学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丁云青在《文史哲》第 3 期发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

第 4 期连载。文章不同意年子敏《评罗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和束世澂《评罗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读后记》等文所持李秀成自传原稿“显然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伪造的”的观点，对年文和束文观点进行了逐条商榷。作者认为，鉴定自传原稿有无、真伪，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而不空洞、全面而不片面、本质而不表面的给忠王李秀成以正确的人物评价，如果不搜集详细的材料，历史地、辩证地去理解分析忠王李秀成，只是强调唯成分论和动机论的反历史主义的论点，甚至孤立地胶着在自传原稿上，采取形式类比的方法，在纯技术上打圈子，打来打去，很难拿出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正确结论，并且可能导致颠倒是非的荒谬结论的。

郑鹤声在本年《文史哲》第 4 期发表《忠王李秀成自传真伪问题商榷》，对丁文表示支持。

4 月

6 日 《北京日报》刊登郭沫若复北京大学学生信，谈如何研究历史。

郭指出：“首先是应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其次“是要占有大量的资料”，而且“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然后“从中揭发出历史的发展规律”，再“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来改造社会”。信中还鼓励大学生要像“毛主席那样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历史上问题”，“把这作为史学的高峰而努力攀登”。

雷海宗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

1957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会后，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到天津传达会议精神。天津市委邀请了部分党外人士参加会议、听报告并进行小组讨论。雷海宗应邀作了发言。

他说：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说法，我们基本上仍是一切遵照办理，并且在谈中国史时，也尽量去找材料来印证

在一百年前的条件下他关于欧洲史所下的论断，无证据处硬要找证据，实在说不通时，就说中国是例外，好像我们的祖宗在创造历史时曾经故意地不遵守历史发展规律似的。

在发言中，雷海宗还谈到1949年前后历史学的不同。他认为：在1949年前，为一个字，为一句话，为不相干的一个小题目，可以写出几千字以至上万字的文章，并可展开争论。这虽不见得都是无谓之争，但钻牛角尖的成分的确不少！今日这种文章不能再写，不是不敢写，不是怕人扣帽子，而的的确确是对这类文章不再感兴趣。今天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自己要求甚高，意义不大或谈不到什么意义的文章他们不愿再写。所谓有意义的文章，就是在掌握充分材料的条件之下，尽自己力之所及用新观点新方法（当然是新立场）写出来的东西。但问题也就在这里了。观点方法不见得完全有把握，但每个人都愿意试一下，问题是在材料。

雷海宗的此番发言成为其后来被划为右派的主要罪状。

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毛泽东与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及曹操评价。

毛说：“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4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在天津邀请十位教授座谈关于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

4月21日、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次座谈的记录。雷海宗在座谈会上又作了和上次座谈会主旨相同的发言。《人民日报》特意为雷海宗的发言加了“编者按”和“编者注”。“编者按”云：座谈的发言不能像写论文那样严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发言里看出知识界的一些思想动态和他们迫切关心的一些问题。其中雷海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我们在他的发言的后面加注了一些意见，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编者注”说：雷先生认为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而为了发展社会科学，这就需要反对教条主义，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

雷海宗看到《人民日报》的报道，当天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表示对于《人民日报》“编者注”中的话“完全同意”，并对文章中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人民日报》4月28日刊登了他的信，并同时发表季陶达的《马克思主义停留在1895年吗?》一文。该文“认为

马列主义停留在 1895 年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不合逻辑的”。

16 日　《人民日报》学术文化部编辑袁佑铭访问雷海宗。

谈话内容刊登在中宣部主办的专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1957 年第 44 期。雷海宗主要谈了对教条主义的看法。他认为，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什么在学术界站得住脚的著作出来，就是吃了教条主义的大亏。苏联教条主义到了极点，不论什么杂志也好，小册子也好，都是教条主义的东西，都是找一点材料，套上早已过时的结论。他说，这些东西哪一本是经得住学术上推敲的？

对马恩列斯的著作，他也作了大胆的评论：学术著作就是那种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东西……在革命运动中，应付当前问题的东西，那不能算是学术著作。比如说“物质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千古不灭的道理，不管什么国家、什么人，都得承认它。这就是真正的东西，让你不得不认识。比如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是一本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书……但是，列宁的《经验批判论》就不同了，就差得多了。为什么呢？……做学问是要有学问的基础的……马克思人家读过正规大学，学问的基础原来就好。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上对现实情况材料的研究，自然就不同。而恩格斯就差了，虽然也读过大学，但后来干了别的了，不像马克思那样。至于列宁，一直在干革命活动，原来的基础就不好，只是在被赶到国外以后，革命指导不上了，这才只好读点书，但是研究也很有限。因此，列宁的学问比起恩格斯来，又差得多了。所以，基础学问要紧……你说到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其实，这本书算不上是个什么学术著作的。好几十年来，因为斯大林个人的关系，谁也不敢对这本书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动一个字就是不得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最坏。教条主义的统治势力就是这样来的。斯大林死了以后，大家也认识到这个道理了。

此篇谈话成为雷海宗的主要罪状。

17 日　应郭沫若邀请，原田淑人率领日本考古代表团来华访问。

21 日　王崇武病逝，终年 46 岁。

27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是月　王伯祥选注《史记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当代影响最大的《史记》选本之一，选注《史记》人物传记

二十篇，书前有《序例》，对司马迁生平及《史记》的成就、《史记》的主要传本和本书的校释考订工作做了介绍。选本注解详明，对有关的音读、字义、语汇、地名、人名、官名和器物都加以注解，方便读者理解原文。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编辑《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一部《史记》研究的重要工具书，搜集了古今中外研究《史记》的专著、文章、笔记、论文等，分类排比，以供索引。分十类：版本、目录、解题、关于《史记》全书的研究、关于《史记》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的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稿本及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目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学术期刊中有关《史记》的论文及专著目录。

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认为，两宋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统一帝国的再建，构成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也是我国经济重心完成其南移行程的时代。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我国完全进入南盛北衰的新阶段。因此，这一历史事件，成为我国南部发展历史中的划时代关键。作者还从总的方面考察了我国历史上南北经济发展的形势，认为大略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远古直至西晋末年为第一阶段，北方经济发展远远超过南方，是北方的全盛时代；从东晋建立至北宋末年为第二阶段，南方经济有了很快的发展，形成一个新的经济中心，是南北对立时代；从南宋渡江至鸦片战争为第三阶段，经济重心完成了南移的过程，南方经济发展水平完全超过北方，是南方的全盛时代。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是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的名著，也是作者的代表作，共辑录作者1926年至1954年间所撰论文23篇。全书根据论文内容分为四个部分。有关唐代历史的4篇是第一部分，包括《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代刊书考》、《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南诏史略论》，所论集中在唐代中外文化关系史和国内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提出了很少为人注意的南诏史上与民族、文化及史料有关的若干问题。有关“敦煌学”的10篇是第二部分，包括《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论唐代佛曲》、《唐代俗讲考》、《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反映了作

者在“敦煌学”方面的成就。有关佛教石刻和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的 3 篇是第三部分，包括《摄山佛教石刻小纪》、《摄山佛教石刻补记》,《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有关目录学的 6 篇是第四部分，包括《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方玉润著述考》、《明清之际之宝卷文学与白莲教》、《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记巴黎藏本王宗载〈四夷馆考〉》。

书中所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是 20 世纪唐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传世之作，迄今仍为研究唐史、中外关系史者所重。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是作者所撰中国古代经济史系列著作的第三部，凡八章。第一章为总叙，以后各章依次叙述农业、手工业、货币、商业（上下两章）、土地与农民之关系和赋役。

傅筑夫、谷书堂《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论述了原始资本积累的一般原理、意义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关于原始积累过程的两种类型，以及中国原始积累发生迟缓的原因，重点分析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作者还追溯了中国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叙述了自然经济的分解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货币资本的形成，以及中国原始积累过程的特点。

朱师辙《清史述闻》由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以《清史稿》撰修者的身份叙述了《清史稿》的修纂过程，披露了《清史稿》成书过程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全书正编五卷十篇，主要讨论了《清史稿》的体例、史料、撰述、修撰人员以及其书利弊等问题，并兼及清史馆的遗闻佚事，对《清史稿》的修史经验进行了细致总结。

王叔武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关于白族族源问题》。

5 月

14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当前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

15 日　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他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

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

6月12日，此文印发党内。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于1977年4月第一次公开发表。

17日　陈梦家在《文汇报》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

作者不赞成废除繁体字实行简化字以及实行汉字的拉丁化，说：“首先肯定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汉字为我们过去许多朝代服务过，也为革命服务过，现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也还是可以的。”

由于章伯钧曾经赞同作者的观点，作者便被定性为“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的急先锋”，被划为“右派”，此篇文章也被扣上“反对文字改革”的帽子。

是月　历史研究编辑部辑《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收录了十一篇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代表性论文，汇集了各家观点。主要有：(1)汉民族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其后不断得到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仍未占据统治地位，因而汉族到近代不属于资本主义民族，但也不能据此称为部族；(2)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汉族成为民族，应在1840年以后中国产生资本主义的时期；(3)汉民族的形成应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相伴随，有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明末清初，有人认为唐宋时期已出现这种萌芽。

张秀民、王会庵编，金毓黼校订《太平天国资料目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的附录，可视为书目文献导读。内容分四类：(1)太平天国文献400余种，含官书、文书杂件、诸王自述、金石文物及佚书、伪书两附录等；(2)清朝官方记载600余种，含一般记载和地方记载等；(3)近人论著370余种，含专著、论文、文艺等，列甲、乙两部，甲部收录1949至1955年底以前之

书刊，乙部收录1949年前的资料。（4）外人论著70余种，含译本、原著等。各条下注明书名、卷数、著者、版本，或附以简单说明。书后附天地会资料。该书搜罗宏富，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重要参考材料。

蒋孟引《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海若编著《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徐中舒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

文章对殷代的奴隶制进行详细的论述，并将殷代奴隶制与西周封建制加以比较，论证了西周是封建社会。

该期还刊登了王玉哲的《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入作者1946年至1956年十年中所写十篇有关中印文化关系的论文，《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文，为我国学者研究中印文化交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雅俗共赏的突厥史著作，简明扼要地叙述了突厥族的起源、分布和汗国兴亡的历史，专题论述了突厥汗国的社会经济变革。

邓广铭在《新建设》第5期发表《论赵匡胤》。

杨向奎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孔子的思想及其学派》。

作者给予孔子较高评价，认为孔子是一个博学多能的人，在中国教育史上，他是一个不朽的人物，他扩大了知识的传授对象，使官学变成私学。他是一个主张来者不拒的人，提倡“有教无类”，在他的时代，这是破天荒一人！他也注重实践，他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儒家后来分裂为许多学派，其中显学当然是思孟和荀卿两家。在孔子之后，当新的学派创立的时候，儒家最主要经典是《大学》《中庸》。《中庸》发挥了唯心主义的宇宙观，而《大学》的作用是在方法论方面。清代乾嘉以后，儒家再没有发展的余地，只剩下文字训诂了，虽然他们弄清了古书原意，然而过去的幽灵，没有什么作用了。

6 月

1 日　裴文中应邀去民主德国讲学。

2日　天津市社科联组织数个学术团体联合举办争鸣论坛，雷海宗在论坛上作了题为《世界史分期与世界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的讲演。

雷海宗不同意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五种生产方式，认为从生产工具的发展来说，人类社会应该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第四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后来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没有争论。问题在于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他认为经典著作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唯一较有系统地谈过的是马克思。而马克思所根据的也只是当时欧洲科学所掌握的材料。恩格斯、列宁也在几个地方谈到这个问题，但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般的不提了。他强调，今天掌握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材料比较多，因此，应该根据新的材料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雷氏指出：把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前一段称为奴隶社会，铁器时代的后一段划为封建社会的习惯性分法是不科学的。这样就把生产工具基本上相同的时期看成是两个社会阶段，同时又把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时期看成是一个社会阶段，违反了生产工具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至于有一定生产经验和技术并使用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的人，他认为在研究历史时不必过分强调，因为在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许多经验、技术，今天没人知道。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讲演以铜器时代发展相当高的巴比伦为例，提出了“奴隶制度在世界史上是不存在的”观点。雷氏认为，只有罗马的情况在世界史上是一个例外。罗马当时经常向外侵略，每次俘虏大量的人，因此，才有了大规模的奴隶制度，这种情况只有海上国家才有可能产生。他还提出了对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社会性质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时代，是个独立的社会阶段，与后来的古典社会（后来叫奴隶社会）根本不同”，“奴隶社会”，也就是铁器时代前一段，他主张仍然使用马克思一百年前用的名词，叫古典社会，不叫奴隶社会，“因为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度只在雅典、罗马很短时期有”。他认为，使用奴隶与奴隶社会不能混为一谈。他举例说：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大量使用奴隶的是罗马；第二次是西欧国家大量使用非洲人做奴隶，而这已是16、17、18世纪的事情，如果说这是奴隶制度的残余，也不能有这么大的残余，这也可以说明就全世界的历史来说，没有奴隶制度这个社会阶段。

6月5日，《人民日报》介绍了这次讲演的内容。《历史教学》第7期刊登了讲稿。

8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

分子进攻的指示》，“反右斗争”大规模展开。

全国共有 55 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知识分子占了绝大多数。

9 日　翦伯赞在《北京日报》发表《拥护大放大鸣，反对乱放乱鸣》。

是月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 1949 年后第一部系统研究黄河历史的专著。

1953 年中央人民政府提出根治黄河的规划，作者对此甚为关心，收集了大量有关河源、河道变迁等方面的资料，开始进行多方面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历代治黄的经验及其利弊的论文，颇得各方好评。以此为基础，1955 年撰成该书，共 60 多万字。全书由十六节组成，依次为“黄河重源说的缘起”，“重源说经过长期而后打破”，“《禹贡》是什么时代写成的”，“商族的‘迁都’对黄河有什么关系”，“周定王时的河徙还存着疑问——不是春秋时代”，“‘禹河’是什么，经行哪些地方”，“东周黄河未徙以前的故道”，“两汉的黄河”，“隋唐的黄河”，“五代及北宋的黄河”，“金代的黄河及关于河徙的许多问题”，“元代治河的概略”，“明代河患的鸟瞰”，“清代的河防”，“自辛亥革命至抗战前”，“结论”。书中概括了元代以前黄河变迁的历史，阐析了历代治黄的经验及措施，并做出了切合历史实际的概括和总结。该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例证得当，见解精到，为治理黄河水利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与借鉴，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初，日本学者河野通博撰写《黄河河道之变迁——岑仲勉氏之新说汇编》一文，赞誉岑氏的研究极富卓识。

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册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下册 1958 年 2 月出版。本书记录了从 1919 年 5 月至 1956 年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初稿成于 1954 年，在高等教育部政治教育司的指导下，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钢铁学院、北京俄语学院的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教师们共同编写。初稿写成后，由何干之增订、修改、补充。

郑振铎《汤祷篇》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研究古史的五篇旧作之结集，以第一篇《汤祷篇》的篇名作为书名。被称为利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等来研究我国远古时代人们生活及思想的范例，为研究古史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汤祷篇》阐发了君、师的关系和人祭的习俗，《玄鸟篇》阐发了食物与伟人诞生关系的迷信，《黄鸟篇》说明农业社会里赘婿的地位，《释讳篇》解释了人们隐讳名称的由

来，《伐檀篇》揭示了周初农奴被剥削、被压迫的生活状况。

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作者生前所撰《两汉交通西域史》一稿后半部分资料整理而成，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经济之间交流，对中国使者的西去和西域商人的东来、南道的华丝西运和北道的毛皮东来，西域输入的毛织品、瓜果、蔬菜、豆类和其他特产等进行了叙述。第二部主要介绍了文化艺术之间的交流，叙述了汉族文化的西传、西域人犍陀罗艺术和大秦艺技之东来，梵典翻译与婆罗门书的传入、梵典中譬喻文艺的传译及其转变、雕铸图像上所出现的西域题材、西域传入的乐器与乐曲等。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上编）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下编于本年12月出版。本索引主要依据《国学论文索引》等现成的索引编制，收录清末至抗日战争前（约1900—1937.7）国内出版的1300余种期刊上发表的中国史学论文篇目3万余篇。按类编排，分成上下编两册。上编收中国历史、人物传记、考古学、目录学；下编收学术思想史、政治社会生活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论文。每条著录题目、作译者、期刊名称、卷期、年月日等。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时改称第一编。

《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二编、第三编仍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由中华书局分别于1979年、1994年出版。第二编收录抗日战争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37.7—1949.9）国内960多种期刊上发表的中国史学方面的论文3万余篇。仍分上下册出版。第三编收录1949年10月至1976年12月之间国内期刊上发表的中国史学方面的论文。

三书在时间上互相衔接，是查找中国史学研究论文的重要工具，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史学论文索引。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原为作者在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座第一讲的讲话稿，曾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书中论述了历史研究中的四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学习理论的问题，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第二是关于掌握资料的问题，指出使用资料要忠实、准确，这是起码的原则，其中对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一书提出批评。第三是关于文字表达的问题，认为史学工作者写出文章来，应该切实些、清楚些、简要些、生动些，一方面能够适当地表达自己所要说的话，另一方面使人看了不讨厌。第四是关于言行

一致的问题，提出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是理论与实际全面联系的关键。

李纯一《我国原始时期音乐试探》由音乐出版社出版。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 1938—1947 年间所写魏晋玄学论文九篇，除《言意之辨》一篇外，都曾发表于当时国内的报刊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一篇，曾由奥地利汉学家李华德译成英文，载于 1947 年美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

作者自叙，该书的价值在于提供了若干可以注意的资料，指出了这一时期思想史的一些突出问题。《读刘邵人物志》一文追溯了魏晋玄学思想的源流，《言意之辨》在综论魏晋玄学方法论的同时，比较了过去烦琐的“汉代经学”与新起“魏晋玄学”的根本不同点，《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对魏晋玄学思想发展史做了扼要的评述，是全书的纲领。书中还对“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王弼的思想，以及向秀、郭象的思想做了具体分析。附录《魏晋思想的发展》，是根据作者学术演讲的记录整理而成，是一篇全面总结性的著作，对中国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否受到外来佛教影响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郭沫若校订《盐铁论读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盐铁论》进行了分段、标点、校订，并汇集了一些重要的校注，加了些简单的注释。

黄现璠编著《广西僮族简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较早运用新方法全面讨论墨子思想的论作，收录 1922 至 1932 年研究墨子的十篇论文，论述了墨子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并就墨经等墨子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与多篇文章的观点进行商榷，对《墨子》一书的传本、内容也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林干编著《清代回民起义》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有关清代回民起义的专著。

(苏) 纳·皮鲁莫娃著、郭从周译《赫尔岑的历史观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于廑在《历史研究》第 6 期发表《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权说到日尔曼马克公社的残存》。

7月

9日　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讲话中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

14日　夏鼐在《人民日报》发表《用考古工作方面事实揭穿右派谎言》。

文章对陈梦家等人的言论进行批驳，认为考古学虽然技术性较强，但仍是社会科学一部门，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号召考古工作者要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中，要对他们继续加以批判和揭露，乘胜逐北，以求取得全面的胜利。要在斗争中锻炼自己，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

文章改写后，又发表在《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是月　中央召开全国省（市）委宣传部部长、文教部部长会议，康生要求批判雷海宗。

康生在小组会上当面指斥天津市委文教部部长梁寒冰，严厉批评天津市委是右倾，说："你们南开大学的雷海宗还没有斗，反右就结束了？天津不斗雷海宗就是右倾，天津反右要重搞！"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在大会上提出严厉批评："天津市委再不批雷海宗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市委不得不立即行动，把雷海宗定为右派。

雷海宗在《历史教学》第7期发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

该文提出部民社会的概念，并认为奴隶社会不是人类历史必经的一个普遍性的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该文特别强调生产工具在生产力概念中的地位和在决定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自有人类以来，生产工具曾经过四大阶段：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

作者被打成右派后，该文被当成用生产工具决定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的代表作。

荣孟源在《新建设》第7期发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后历史资料》。

文章主张借鉴传统史书的编撰体例，以编年史、纪事本末、录、志、表、传、资料汇编、图谱等多种形式，编写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以纠正章节体的缺陷。文中说："目前辛亥以来的历史，除去原始资料之外，多是夹叙夹议的论文。论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论文来代替一切，那就妨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还说："研究历史如果只限于写论文，许多人势必搁

笔；如果撰述各种体裁的著作，编辑各种资料，整理各个具体问题，那就有许多人可以发挥力量。”又说：“为了严肃认真的研究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首先应该继承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撰述各种体裁的史书。”“我国传统史学的各种体裁都是一种花，都要和论文体裁的花一起开放。”

该文被曲解为妄图“推翻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取消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使旧史学复辟”，作者由此被打成右派，受到严厉批判。

(苏) 西多罗夫等著、王九鼎等译《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收入 А. Л. 西多罗夫、Б. А. 雷巴科夫和 Н. М. 德鲁日宁等 1955 年 9 月在大会上的报告七篇。内容包括史学理论及苏联史、世界史的断代史或专史研究，西多罗夫在报告中谈到苏联史学发展的基本问题，指出：“苏联的历史科学是在 1917 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形成的。它承继着在马克思主义中获得最彻底和完善的表现的唯物主义传统。苏联史学是新的历史科学，因为他的任务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立场独立地、创造性地研究祖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一切根本问题”。在苏联，“唯物主义地认识历史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为年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所公认”。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继 1956 年编辑出版《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后，《历史研究》编辑部又将 1955 年 8 月到 1956 年 8 月一年刊载于全国各刊物上的有关古史分期讨论文章再次汇编成册。全书共录文章十七篇，基本包含了一年间这一讨论的主要代表性文章，几乎容纳了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所有观点。如束世澂的《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徐喜辰的《商代奴隶制特征探讨》、戚其章的《关于西周社会性质问题》、吴大琨的《关于西周社会性质问题》、尚钺的《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王仲荦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杨向奎的《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若干问题》、侯外庐的《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等文章分别代表着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封建说、汉代封建说、魏晋封建说。书末附录《关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问题的讨论》综合报道，将各家观点作了简的介绍。并附有 1949 年 10 月至 1956 年 8 月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文目录。

陈梦家《尚书通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内容包括：“尚书通论”（讨论先秦引书、汉世传本、篇目、书

序，以及孔传本古文和西汉古文等问题）、“尚书专论”（讨论古尚书作者、《尧典》为秦官本尚书，“王若曰”等问题）、“尚书讲义”（讲述《甘誓》、《汤誓》、《般庚上》、《大诰》四篇）三部分。1985年10月中华书局增订再版时，增加第四部分“尚书补述”，进一步讨论孔传本、书序、体例和逸文等问题。

此书既深入浅出，又富有创见。作者较多地利用出土铜器的长篇铭文和战国、汉代简册资料，从体例上探索《尚书》由若干个单篇形成一书的过程，并对每一篇进行断代，从而使《尚书》研究由过去的“经学”研究转变为古代书籍学或古典史料学的研究，因而具有开创作用。

束世澂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论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国有制问题》。

针对侯外庐土地国有制的观点，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土地私有制。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即领地制）走向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在作者看来，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的基础，经过封建（分封）以后领主占有的土地归根结底是归私人所有，“封建”和“国有”是相互对立的，所以，就连“土地国有制”这一概念本身也是不能成立的。

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代表作，对隋唐实施均田制的条件和办法、隋唐的租调力役制、隋唐均田的情况和作用、唐代均田制的破坏进行了深入研究。

杨树达《盐铁论要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生前未及审定稿本，经科学出版社编辑部和杨伯峻整理加工而成。

该书对《盐铁论》逐句加按，进行疏证。意在用其作“材料”，以徐德培的《盐铁论集释》为依据，参以陈遵默的《盐铁论校记》抄本，然后进行加工，使桓宽的书有一个较为完善本子。

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根据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的藏品，以及20世纪以来各地古钱出土的考古报告，并参考各种钱谱，对我国秦以前的货币，特别是金属货币的发生、发展作了简要介绍和分析。作者叙述了我国最早的货币——贝，以及布钱、刀货、圜钱、楚国的货币——爰金、“蚁鼻钱”等货币的演变过程、分布区域、刀货区域的扩大，以及各种货币的单位及其重量的递减情况。

作者在对我国古代货币制度进行初步整理的基础上，详细论证了我国货币的起源问题，证实了马克思货币起源的理论。

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兵器史专著。历经三十余年，成书于抗战时期。分为石兵、铜兵、铁兵三章，记述原始石器时代至清代包括边疆各族攻守作战的各种器械武器，对中国兵器的变迁沿革、铸造的嬗变、形式的更易及受外族影响、对外族的传播等都有论及。书后附128器插图854器图版，总计982器，其中一部分兵器属首次摄影公之于世，为中国兵器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书成后，作者未及修改即逝世，后经郭宝钧审阅删削定稿。

邓广铭《辛稼轩年谱》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初稿完成于1939年，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后随着新材料的发现，作者开始对该书陆续修改和补充，渐臻完善。

本书搜考所及，凡当时可征之南宋一代重要文献，如史籍、文集、方志、笔乘，均旁征博采，以资参证发明，不分主辅。体例上虽分年隶事，亦兼用纪事本末写法。内容上与作者所著《稼轩词编年笺注》互为呼应，详彼略此，详此略彼。该书独得之处在于以“比类推求”的方法，从宋人文集中搜罗出丰富的旁证，间接地确定了许多辛氏行事的年份月日，从而否定了若干以讹传讹的旧说。

胡厚宣在《历史研究》第7期发表《说贵田》。

8 月

14 日　天津科协举行会议开展反右派斗争，会上雷海宗被打成右派。

随后，对雷海宗的批判大规模展开。雷海宗夫人张景茀回忆说：“天津市内开反右大会，会上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十分沉痛地对我说‘对不起你’。这突如其来的恶讯，对他打击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

是月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马承源《仰韶文化的彩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详细介绍了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过程及仰韶式、马家窑式、半山式、马厂式彩陶的特征，并对安特生有关仰韶文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引用宋代官私撰著、文集笔记二百多种，对宋代钞盐制度的产生、发展变迁与时代环境的交互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这一制度在宋代各个时期所起的作用与影响进行了分析。

杨翼骧在《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发表《三国两晋史学编年》。

该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最早的中国史学史作品之一。

1956年，《史学译丛》第2期发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社论《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作者从中体察到史学史学科建设将要兴起，于是撰写了该文。后来，作者又在《南开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发表《南北朝史学编年》，以为接续。

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详尽叙述了明代倭寇侵扰中国各省的历史，主要以考述事实为主。

朱谦之《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由音乐出版社出版。

初稿作于1940年。主旨在于考辨中国古代乐律与希腊的相互影响，尤其注重揭示希腊乐律所受中国之影响。作者从文献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个角度论证了公元前十一世纪起中国与希腊已有交通，而穆王西征对中国音乐文化的西传有不少贡献。

日知在《历史研究》第8期发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

尤中编著《南诏史话》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郝建梁、班书阁编《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陈国庆编著《古籍版本浅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学术论坛》第4期刊登“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所写《批驳右派分子雷海宗的反动史观》。

关锋《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研究》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乔志强编《曹顺起义史料汇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蒙文通在《四川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

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

赵俪生由山东大学历史系调往兰州大学历史系执教，任教授。

赵俪生、高昭一《历史上山东农民的起义》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9 月

18 日　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大会在北京举行。

郭沫若主持会议，翦伯赞在会上作了题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长篇发言。在发言中，翦伯赞批判史学界“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们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尚有所顾忌，在章罗联盟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后，就明目张胆地发表了各种谬论，并假借学术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性的攻击活动，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

发言批判的对象主要是雷海宗、向达以及荣孟源三人。翦伯赞抨击雷海宗有关建国后学术发展的言论是“带着旧史学所属的阶级利益和最恶毒的敌意，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疯狂的公开的进攻”。翦着重揭发了同校同系执教的向达对中共领导的攻击性言论，如揭发向达把中国科学院一些行政干部比喻成“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说“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翦伯赞重点批判了向达提出的所谓1949年后“历史学只有五朵金花”的观点。翦伯赞抨击向达之所以讨厌这五朵花，“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来的花朵”。翦伯赞举例证明说：“北大老教授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做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了则说：‘这是降低身份。’”翦伯赞对荣孟源也进行了激烈批判，认为如果说雷海宗和向达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企图用买办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荣孟源则主张复古主义，企图用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翦伯赞最后说：“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进行的活动，实质上不是学术活动，而是章罗联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不是学术上的唯物与唯心之争，而是为了根本改变历史科学的方向替资本主义的复辟铺平道路。”翦号召对史学界的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无情的反击，消灭他们在历史学上留下来的恶劣影响，粉碎他们企图改变历史学路线、夺取历

史学领导权的反动阴谋。

翦伯赞的发言后来刊登在10月4日的《人民日报》以及《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上。

19日　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须进一步深入》。

是月　李棪《东林党籍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于1949年前，旨在对东林党人事迹进行考证。李氏博采众书，广罗东林党人事迹，撰成此书，以补《明史》之舛误。邓之诚为该书作序。

王钟翰《清史杂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清史研究八篇论文，部分文章曾刊于《燕京学报》、《史学年报》和《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等。主要包括《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度的过渡》、《达呼尔人出于索伦部考》、《清初八旗蒙古考》、《清世宗夺嫡考实》、《胤祯西征纪实》、《清三通纂修考》、《辨纪晓岚手书四库简明目录》等文章。该书反映了作者五十年代清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其中，《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主要是为了解决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如何划分的问题。文章着重论述了满族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认为大约在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20年代（1577—1627年）的50年期间，即在努尔哈赤进入辽河平原的初期，满族社会生产关系是奴隶占有制。《清初八旗蒙古考》是国内第一篇对八旗蒙古进行多方面研究的文章，对八旗蒙古设置的缘起、经过、编制，以及在八旗下的蒙古人的成分等问题都做了论述。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共收论文二十九篇，内容涉及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及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

韩国磐《隋炀帝》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蒋星煜《海瑞》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商承祚编著《石刻篆文编》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编写历三十二年方告完成。全书选收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吴、晋各朝代石刻中的篆文共2921个字，其中独体字1231个，

异体字 1680 个，无法写正其笔画的字共 10 个收入附录，所收字按《说文解字》部首次序排列，绝大部分字从碑刻、碑额、题字中选辑，以汉石刻篆文居多，据大影本或旧拓本双钩，太小的字则摹写。每字下各注明出自何碑、何石，并收录与此字有关的原句。

钱无咎《古钱考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我国从殷商到明清各代的钱币进行了考述，尤其对历代币制的变迁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论析。

张舜徽《顾亭林学记》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考古通讯》第 5 期刊载编辑部文章《斥右派分子陈梦家》。

文章对身为《考古通讯》副主编的陈梦家进行了猛烈批判，抨击陈梦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反对党的领导，明目张胆地要科学院的党下台，要取消党对考古事业的领导。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辑录了作者研究明代经济史的部分论文，包括《明代江南富户经济的分析》、《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明代江南的纺织工业与织工暴动》、《明代后期江南城镇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等。这些论文集中探讨了明代社会经济的性质，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期的江南市民经济等问题。作者认为，明代社会经济所呈现的现象是复杂的，新旧东西经常交织在一起。新的东西是在同旧的东西进行斗争中诞生的。旧东西不会自愿让出阵地，所以明代社会既有新的东西的萌芽，但旧的东西仍在那里起着阻碍作用。作者依据这一论点，力图从明代封建社会内部，找出刚在发芽的新东西；同时，又从动的观点指出在新的力量的压力之下，旧的东西已处在变化中，明代的江南经济恰恰反映着这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

顾颉刚在《历史研究》第 9 期发表《战国策之古本与今本》。

《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 1 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收入郭沫若《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翦伯赞《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陈垣《科学事业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等七篇反右文章。

10 月

11 日　刘大年在《人民日报》发表《驳一个荒谬的建议——批

判荣孟源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

刘大年指责荣孟源《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后历史资料》所言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认为该文“清楚地表明荣孟源所说的‘论文’，是指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写出的论著，而‘各种体裁的史书’指的是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历史述作”。“荣孟源是再一次认定马克思主义只是百花齐放中的一朵花，并没有指导作用；研究历史不是要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是首先继承传统，照他的理解，也就是恢复一切旧的东西。”“荣孟源的‘建议’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至少用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或者说它是消极抵抗马克思主义，积极提倡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观点。”文章最后断定荣孟源的言论是“资产阶级右派在学术领域内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一部分”。

对于批判荣孟源一事，刘大年后来有过多次自我反省。1986 年 7 月 25 日，刘大年在给荣孟源著《史料与历史科学》一书所作序言中，对于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中的这一事件作了检讨。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批判史学界右派向达、雷海宗、荣孟源、陈梦家座谈会。

本次座谈会连续举行三天，参加会议的有京津史学工作者近 300 人。在三天会上，发言批判右派分子的共有 31 人。座谈会结束时，范文澜对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区别再一次作了阐说，指出反右派斗争是严重的阶级斗争，百家争鸣则是发展科学文化的正确方针。反右派斗争决不会影响百家争鸣的展开，今后百家争鸣的园地将会越加宽广自由。翦伯赞作了总结发言。

向达、荣孟源、陈梦家都在会上作了检讨，北京大学历史系杨人楩也因具有右派思想言行受到了批判。

是月　杨宽在《历史研究》第 10 期发表《关于西周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讨论》。

白寿彝等编著《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胡滨《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由三联书店出版。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唐史研究名著。唐书兵志是“正史”中以叙述军事制度为内容的第一个志，是研究唐代兵制的重要资料，作者引用大量历史文献，去伪

存真，对唐书兵志存在的诸多讹误和疏漏进行了校补。

丁守和、殷叙彝、张伯昭《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振铎应邀赴捷克斯洛伐克讲授文学和考古学。

李光璧《明朝史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严中平编著《清代云南铜政考》由中华书局出版。

《史学月刊》从第10期开始设“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历史科学上的谬论”专栏。

“编者的话”云：“要彻底打垮历史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因为它“关乎祖国的生死存亡，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乃至子子孙孙的幸福，也关乎国际和平与社会主义的事业问题”。从是期开始，直到1958年第6期，《史学月刊》共发表19篇批判文章，对雷海宗、罗祖基、黄元起等进行批判。

蔡美彪在《新建设》第10期发表《荣孟源的反动的历史学“建议”的剖析》。

李鸿哲在《文史哲》第10期发表《“奴隶社会”是否社会发展必经阶段?》。

该文对社会发展五阶段说提出挑战。作者指出，“奴隶社会”是否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尚有商榷之余地。首先，“奴隶社会”说于经典著作中无根据，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这个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五阶段划分的文字。相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却找到了不少与五阶段说不同的意见。因此，认为人类社会必须先经过奴隶社会，然后才能进入封建社会的五阶段说，并非马克思的学说。其次，奴隶社会说在理论上存在多方面困难，检查奴隶社会说理论的本身，可以发现它含有很多矛盾与破绽，不能自圆其说。奴隶社会说在理论上至少有以下窒碍难通之处：该说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存有矛盾，且在奴隶社会形成和维持的必要条件方面，理论上存有很大的困难。奴隶社会说的历史发展顺序是谬误的、不合历史事实的。再次，奴隶社会说不符合历史事实，大略考察一下古代各国历史，就可发现真正有成为支配生产方式的奴隶制存在的只有地中海沿岸的少数国家，这些极少数国家发展的情况，应把它当作例外，而不能认为是一般的情形。因此，人类社会都经过一个奴隶社会的阶段，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规

律。作者断言，奴隶社会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不符合历史事实，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多年来为人所信从，实在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偏向。但这一种教条却不是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得来的，它是由郭沫若等提倡起来的。由于这一种教条的存在，苏联和我国史学家们曾花费很多力气在古代各国历史上找寻奴隶。假若奴隶社会说本身根本不能成立，那么这些工作和争论岂非徒劳无功！

本文发表后，有读者来信揭发作者为苏北师范专科学校一名“右派分子”。为此《文史哲》杂志在第 11 期刊登“编者的话”，指斥该文是借着学术讨论的幌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恶意攻击，具有阴险的政治企图，并在第 12 期上推出文章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顾颉刚在《文史哲》第 10 期发表《息壤考》。

11 月

2 日　毛泽东与胡乔木、郭沫若等谈论曹操。

毛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20 日　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着重进行思想改造——驳斥右派分子向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该文为作者 10 月 11 日在科学院召开的批判史学界右派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摘录。文中对向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了猛烈批判。

在谈到史学改造时作者说：“向先生曾说过现在举旧史学界，都只举二陈，言外大有为什么不举我向达的意思。我听了很惊异。二陈之说，不知从何而起。我觉得在全国解放八年的今天，如果史学界仍存在新旧之分，这是我们大家的努力不够，这不是什么光荣，这是惭愧。我正痛恨我自己闻道太晚，积习较深，旧染未洗除，知新不容易进去，真所谓‘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我们不能让史学界长期存在新旧之分，因为旧史学家经过思想改造，接受了新的世界观，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学术的研究，他就逐渐成为新史学家了。每一个旧史学家，都应当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使自己尽快地改造成为新史学家。不想向先生很怕人不称他为旧史学家，似乎希望永远保持旧史学家的头衔，而反引以为荣一样。”“尽管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很晚，尽管我因为年龄的限制，耳目已不聪明，学习上有很大的困难，但是自从我有了认识，就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尽我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思想改造，学习政治理论。八年以来，我虽谈不上有什么成绩，但是我的信念甚坚，从来没有丝毫动摇，就是因为我找到了多年

来梦寐以求的最正确的最光荣的道路。因为我相信的是科学，我拥护的是真理。因此，我不愿作旧史学界的旗帜，我愿作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队伍中的老兵，我不愿作旧史学界的大师，我甘心作新史学界的小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降低身份’，实际上一个人能向真理投降，是最光荣的事情。”

是月　张维华《论汉武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穆烜编写《刘六刘七大起义——明代中期的一次农民革命战争》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是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妇女著述专门书目。所收之女作家，起自西汉，止于清末，凡见于正史艺文志、各省通志、府州县志艺文志、列女传、各种藏书书目、题跋、诗文词总集、诗话及笔记者，均在采收范围之内，共计收入女作家四千余人。凡采收之作家均依时代先后为序，首列著作名称，次列朝代及作家姓名，再列作者小传、作品存逸及版本款式、卷数篇帙、序跋题识、编校评阅者姓名等。

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册由三联书店出版。

共三册，第二册 1958 年 1 月出版，第三册 1961 年 10 月出版。

《文史哲》杂志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辑录了发表在《文史哲》杂志的 14 篇关于古史分期讨论的文章，包容了古史分期问题上各派不同的意见。

杨向奎在《新建设》第 11 期发表《批判雷海宗反动的历史观点并论历史分期问题》。

祝瑞开在《历史教学》第 11 期发表《从雷海宗的历史分期论和工具决定论来看他的反动政治目的》。

《历史研究》第 11 期发表一组批判向达、雷海宗、荣孟源的文章。

包括胡厚宣、杨向奎《批判向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邓广铭《评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孙定国《揭穿雷海宗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樊百川、贾维诚、李瑚《批判荣孟源在对待史料上的恶劣作风》。第 12 期继续刊登吴廷璆《驳斥雷海宗反马克思主义反

社会主义的谬论》、尚明轩《揭穿荣孟源抄袭剽窃的丑恶面目》等文章。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在当代辛弃疾研究领域有重大影响，初稿完成于1937至1939年间，1941年曾由香港商务印书馆排版付型，但因纸张缺乏而未果。该书甫一问世便引起学界关注，1962年进行首次增订，并于1963年和1978年两次重印。此后，作者又花了十四年的时间，继续进行增订，于1993年推出增订三版，篇幅比初版增加了一倍以上，达60余万字。作者去世前还一直在修订这部著作，改动的地方又有百余处。作者去世后，2007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稼轩词编年笺注》（定本）之名出版。该书学术价值向为士林所重，自问世以来，行销甚广。

金克木《中印人民友谊史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考古通讯》第6期刊载《西北大学考古班驳斥陈梦家在西大的反动谬论》。

文章对陈梦家应邀到西北大学讲授古文字学课时的言论进行揭发，说陈利用上文字学通论这门课的机会，大肆攻击文字改革："文字改革不能用行政命令，现在因为用行政命令，把文字改革搞乱了，我们要团结起来，反对文字改革"。"文字改革有渐变，有突变，历史上只有渐变。有人说秦始皇是暴君，我不同意，因为他没有搞过文字改革"。陈梦家还说："1949年后理论水平提高了，可是对古书的研究水平确实仍然停留在十年之前"。他还把史学界分成二种人：一种是学马列主义的人，也就是所谓只有"钱串子"的人；另一种人是不学习马列主义的，是有"本钱"的人。他自认是第二种人。

孔经纬《中国工商业史上的几个问题》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中所收《批判过去中国社会发展史研究上一种反动的商业资本"理论"》一文对陶希圣商业资本理论进行了批判，并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严重阻碍作用"进行了阐述。

童书业在《文史哲》第11期发表《批判雷海宗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

文章说：右派分子雷海宗在《历史教学》上所发表的《世界史分期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是一篇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史观"来反对马列主义历史科学的极端反动的文章。他的"世界史分期"法，就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五种生产方式的科学理论，他们否认有奴隶社会，反对用生产方式来划分历史阶段，而把某些经济现象或

政治、文化现象来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在雷海宗这篇文章中，看不见人们生产劳动的重要性，看不见生产劳动的实践对于生产力提高的作用，看不见整个生产力的作用，更看不见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经济史观”的表现！

12 月

王荫铎《孔子的学术思想》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对孔子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综合研究，将孔子的学术思想与中国古代学术的发生和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系统阐述了孔子的天道鬼神观、心性说、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六艺、历史学说以及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并对孔子学派发展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提出自己的看法。

作者的结论是，孔子的思想，基本上是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即不发达的奴隶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以村公社制为经济基础与宗法制为上层建筑的反映。孔子思想是代表宗法的，而不是封建的，是氏族关系发展到父系家长制阶段下的产物，而不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它是伴随宗法制度在中国社会的长期残存而留在封建社会里的。

1982 年增订再版，易名为《孔子学术思想新探》。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新一版。

童书业《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凭据深厚的国学根底，花费数年对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理论及苏联学者古代东方史研究成果以及古代东方各国相关史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中国封建社会早熟的古史分期观。该书反映了作者这一方面研究的成果。书中共收录 3 篇论文，《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1956 年 5 月发表于《历史研究》，从生产关系中封建性的一面来阐述古巴比伦社会的封建性；《论奴隶在巴比伦的地位和待遇——兼答孙道天、日知二先生关于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一文发表于 1957 年 5 月、6 月的《学术月刊》上，主要是从奴隶的地位和待遇来说明巴比伦社会的封建性；《巴比伦的家族形态》一文完成于 1957 年 6 月，从家族形态来说明巴比伦社会制度的复杂性。另附录 1957 年 3 月发表于《文史哲》上的《与苏联专家乌·安·约瑟夫维奇商榷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讨论了中国战国秦汉时代社会性质的文章，也是作者所写专门讨论战国秦汉社会性质的唯一一篇文章。

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明言：“我们讨论巴比伦社会的性质，是想帮助解

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尤其是想帮助解决战国秦汉社会性质的问题；同时讨论战国秦汉社会的性质，也可以帮助解决巴比伦社会性质的问题”。这些文章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的论争，直接推动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研究以及古代东方史的研究。

马衡《汉石经集存》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线装一函二册。由唐兰、赵万里、傅振伦、陈梦家等组成的马衡先生遗书编辑委员会组织整理编定。原稿基本完成，由陈梦家拟定条例并负责全书的最后复核。

书中搜集宋代及近代于洛阳出土的东汉熹平石经的残石，加以缀合，考释文字，并与汉以后传下来的经本互相校勘。出土汉石经残石基本收罗齐备，并且是第一次依拓本刊行于世。全书分概述、释文、附录、图版四部分。《概述》对汉石经的由来、基本面貌、出土情况作了扼要阐述。《考释》依七经分为七部，每一经中分为四项：一为经文知其属于何篇而可考定其在碑图位置者，二为石经原有的校记，三为不知属于何篇的残字，四为著者的说明，为一经之小结。《图版》为石经拓本，依考释编号，别为一册。《附录》包括碑图跋语及眉批、参考书目、各经释文起讫号数表，陈梦家撰编辑后记、拓本、释文页数对照表。

谢国桢《南明史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综合其《世经纪年考》（1950年稿，1952年修订，未刊）、《论星岁纪年》（195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吕览〉涒滩舆〈服赋〉单阏〈淮南〉丙子之通考》（《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内容并加以修改撰成此书。书中主要依据《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甘石星经》等大量资料，对中国古代星岁纪年法的发生和演变进行了系统探讨。书中对照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颁行的三统历来推定岁星在纪年上的递次相应规律，并对三统历在岁星纪年上的舛误、伪脱进行了校正，指出秦汉间实际行用太岁纪年与后人推定的干支纪年历有一、二年之差，对于后世学者在星岁纪年问题中的家系及其争执与差失的原委，也进行了讨论。

古史中多见星岁纪年，故此书对于古史研究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王毓瑚编《中国农学书录》由中华书局出版。

20世纪初，学术界已有揭示农书目录的作品问世，而对中国自古以

来农学典籍种类进行全面清理，并给出评说介绍，却是本书的创造性贡献。作为一部中国古代农学专题书目，该书著录了先秦至清末历代讲述农业生产（包括农耕、园艺、蚕桑、畜牧、渔业）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知识的著作。所收 542 种农学典籍均以成书年代先后编排。每书除著录书名、卷（篇）数、作者时代、作者外，对作者生平事略以及存佚源流略作介绍和考订，对过去目录典籍中一书误为二书、有名无实、时代错移、著者不清、刊刻讹误，做了许多订正，为中国古代农书典籍、农业史、农学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日本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学者天野元之助教授对《中国农学书录》甚为推崇，并在其所著《中国古农书考・序》中称赞《中国农学书录》的“解题实在写得很好。”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史》第六分册《中国科学史・农学卷》的撰写者 F. Bray（中文名白馥兰）称赞《中国农学书录》为她研究中国农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她在《中国科学史・农学卷》的扉页上书写：谨以本书纪念石声汉、王毓瑚、天野元之助三人，并称没有他们开创性的中国农学史著作，本书是无法完成的。

1964 年改由农业出版社出版，1979 年增订再版。

金家瑞《义和团运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 1949 年后第一部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专著，引起学界广泛重视。作者依托唯物史观，在辨析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试图澄清国内外数十年对义和团运动的歪曲和混淆，还义和团运动以本来面目。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由中华书局出版。

收作者晚年发表在各种杂志或报刊上的论文 22 篇，因年时逾久，不易寻觅。由向达辑录并为之序。

刘知渐《王则起义》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贾兰坡《旧石器时代文化》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作者主要学术成果之一。分五部分：一、“序言”，介绍了旧石器文化研究的历史；二、“旧石器的制作”，叙述了原料，打击石片法和修整法，以及石片的使用；三、“自然力破碎的石块和石器的区别”；四、“旧石器时代”，介绍了中国和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皆分作初、中、后三期分别叙述；五、“发现和发掘”。

王永兴在《历史研究》第 12 期发表《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

该文在以下两个方面为人们所称道：一是将过去误称的“丁籍簿”定名为“差科簿”，二是首次对唐代色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文一经刊

出，即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为敦煌学研究的必读之作，影响了几代学人，并推进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后作者又撰该文姊妹篇《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和其他问题》，不仅对这四件敦煌文书作了较为准确、系统的排列和录文，解决了过去遗留的疑点，而且进一步探讨了差科簿所收反映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早已涉及到的色役制度，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指出了色役制度的种类、特点、性质及其发展消长的历史过程，反映了唐代前期色役制度的基本概貌。

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同时使用中英文两种语言书写，对1951年在四川资阳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人类头骨化石和一个骨针进行了综合研究。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化石发现的经过、发掘地点地层的概况以及各种化石的一般性质；第二部分介绍资阳人头骨化石的特征及其在人类进化系统上的地位以及它的意义，并附有资阳骨针的研究简单报告。第三部分介绍了对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结果。第四部分为全部内容简单总结。

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从魏晋至隋代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态入手，对地主、农民、佃客、各类依附者以及其他劳动生产者在生产中的身份地位、劳动收获物的分配、封建地租形态，尤其是佃农的复杂身份和分配及地主对其超经济剥削的情况等均作了详尽的阐述，从社会经济领域的角度论述了魏晋封建说。

李家骥在《历史教学问题研究》第6期发表《斥雷海宗对历史科学的歪曲和反对中国史分期问题研究的谬论》。

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是较早系统开展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之一，该书是其中国古代经济史系列著作的第一部，被称为“关于这个时期最好的综合性经济史著作”。

抗战前及抗战期间，作者在武汉大学和蓝田师范学院讲授中国古代经济史，曾类辑较易得到的基本资料，加以排比整齐，编成讲义。书稿按西周以前、东周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元明时期的顺序分为5编，于1943年基本完成。在校内油印供教学使用。1943年，前3编由湖南蓝田新中国书局以《中国经济史讲稿》之名出版，是为《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的前身。20世纪50年代，作者应武汉大学历史系师生的

要求，将讲稿稍加整理（此时作者已双目失明），由北京三联书店分 3 册出版。第一册就是《先秦两汉经济史稿》。

本书从殷代商后期开始，下以东汉末年为限，共 3 编（殷周之际及周代前期、周代后期、两汉）18 章。每编前有一长短不等的总叙，概述该时期经济的主要特点，然后按照生产、流通、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次序分别予以论述。

岑仲勉《隋唐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考据方面的成就，脱胎于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多年所授隋唐史课程的讲义。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隋史，共有 19 节，并有附录一“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之一节”及附录二“论陈亡之必然性”两篇。下卷为唐史，共有 68 节。另有图 14 幅，书末附有参考书目 10 类，约 400 余种。该书采用文言文写作，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广泛论述了隋唐两代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各方面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发前人所未发。注释尤多精辟，考据异同，辨别真伪，对各家意见不同的，有剖析，也有自己的见解。该书是作者三十多年隋唐历史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也是其代表性作品，历来受到学术界重视。出版之后，广为国内各高等学校用作教材，备受好评。1982 年，中华书局将此书改版重印，分上下两册出版。

来新夏、魏宏运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论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郭霭春《颜习斋学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范文澜提请中宣部批准，自己集中精力写书，由刘大年负责近代史所的日常工作。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古脊椎动物学报》创刊。

该刊英文刊名为 VERTEBRATA PALASIATICA，创办后逐渐成为全英文版，1959 年该所又创办全中文版《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为前者的中文版。1961 年两刊合并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7 至 1972 年停刊，1984 年更现名，为季刊。

本刊是我国乃至亚洲唯一专门登载古脊椎动物学及相关领域研究论文的学术期刊，在国际同类期刊中历史最为悠久，编委会成员均为国内外古脊椎动物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

1958 年

※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点校“二十四史”工作启动。
※ 史学界展开“史学革命”。
※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出版。
※ 郭沫若发表《关于厚今薄古问题》，号召赶超陈寅恪。
※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出版。
※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出版。
※ 岑仲勉《突厥集史》出版。

1 月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郭沫若家主持召开会议，《中国史稿》编撰工作启动。

1955 年 7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向郭沫若提出，为县团级干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经有关方面商议，于 1956 年 2 月提出一份《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计划草案》，拟定由全国史学家 36 人组成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郭沫若、陈寅恪、陈垣、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刘大年组成该编委会的编审小组，负责组织撰稿和审稿。1956 年 7 月 1 日，郭沫若邀请 50 多位史学家和哲学家座谈编写中国历史和哲学史教科书的问题，会上确定编写历史教科书作为高教部的任务，委托科学院负责。此为《中国史稿》的酝酿阶段。

参加本次会议的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尹达等人。据《翦伯赞传》记载，周扬讲话内容主要包括：该书是替一般干部编写的历史课本；请郭沫若做本书主编；组织一个以郭沫若为首的编写领导小组，尹达协助郭沫若主持编写工作；中国历史分期采用郭沫若的主张，即采用“战国封建论”。

是年底，筹备工作大体就绪，各部分开始编写提纲。

该书的编写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郭沫若是该书主编，但主要由“尹达主持全面工作并具体负责分量最大的古代史部分”，“除在古史分期问题上采用主编观点外”，其他历史问题“并不要求与郭沫若的看法一致”，而是“选择较妥当的观点编写”。指导这部书编写的三个关键性文件都是尹达起草的。2. 在编写队伍的构成上，大兵团作战，突击赶写，而且以中青年为主，甚至“还有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学生中选出的高材生”。编写人员多达 80 多人，所谓“组织规模之大，投入人力之众，历时之久，到目前为止，均属罕见。”3. 采取了一个“完整的崭新的体系”和编撰体例，最引人注目的，是“用农民战争开路”，“把大规模农民战争作为篇、章之首”，以凸显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的地位。

刘大年在《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评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

该文是作者 1958 年在翦伯赞主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讲座上所做的批评尚钺的报告。文章把尚钺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提到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的高度来进行批判，说尚钺在“序言”中极力夸张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大大提前，改变明清之际的社会性质。为了这个目的，就不仅否定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开始，也一并否定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在明清以后，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还存在着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个特点。按照尚钺的见解，明清之际开始了中国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明末清初是近代历史事实的关键，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

刘氏认为，无论从事实、从理论上讲，尚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主张都是站不住脚的，不正确的。

《人民日报》于 1 月 28 日“学术动态”栏目以《批评尚钺的历史观点》为题对论文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

该文受到范文澜的称赞，在范文澜的直接支持下，当年 8 月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尚钺得悉刘大年批评后，写成《与刘大年同志谈学术批评》长文，一方面承认“过去我在‘序言’中所说的：近年来的学术讨论，将影响到中国近代史自 1840 年开始的起点问题，显然是不确切的，甚至有错误”；另一方面作了自我辩解：“至于像刘大年同志说我有什么意图‘推翻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观点’，却是没有的，这有大量事实的证明，并非空言。”并说“刘大年同志的历史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也不一致”。他指出，“我唯一的希望是刘大年同志把自己的见解‘凭客观

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具体地阐述出来，而不再是或仅只从概念出发，因为这种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

1997年，刘大年在纪念翦伯赞的一篇文章中写道：1958年，他（指翦伯赞）主持的北大历史学讲座，邀我讲过评尚钺同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问题。但我的评论带有教条成分。

郑天挺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关于徐一夔的〈织工对〉》。

文章发表时正值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热烈之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有的人认为在宋代，有的认为在明代，有的认为在清代，多数人以元末明初徐一夔《始丰稿》中《织工对》所反映的情况作为明初资本主义萌芽的明证。作者从《始丰稿》一书的编排体例、语言用词、元明的钞法制度入手，结合徐一夔的生平以及元明的钞值、物价、工资等史实，确认《织工对》是徐一夔在元末所写，记录了元末的情况，应为元末之作。《织工对》中的“日佣为钱二百缗”一句中的“缗”字，是元代对一千钱的习惯称呼，而明初称一千钱为一贯，它反映的是元末杭州丝织业的情况而不是明初的情况。此文一经刊出即获得学术界广泛称赞，创造了以考证来参与重大理论问题讨论的典范。

因此文以101条史料、1万多字说明一条史料，后被作为唯史料论的典型。

高亨《墨经校诠》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素称难读的《墨经》进行逐句校勘和诠释，代表了当时《墨经》研究的最高水平。原文悉依孙诒让《墨子间诂》定本，引用前贤时人校释书目25种，或斟酌旧说，择善而引，或自行考订，间出己见，尤多创获。先校正文字，后诠释义蕴，有与他家学说有关者，亦加以阐述。

杨向奎在《谈墨经的研究》中写道：“梁任公之《墨经校释》初步以近代科学解经，使读者耳目一新，后来遂多于此方努力，于是沉没已久之‘墨经’逐渐发出光辉。及高亨教授之《墨经校诠》出，遂使墨学达到一个新高峰。”

吕思勉《燕石续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继1949年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燕石札记》之后的又一本读书札记，共收札记82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每篇都在综合史料的基础上断以己意，历来为学界所重。

童书业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西周春秋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入作者1950年至1957年所作7篇有关哲学史的论文和学术报告。全书贯穿了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历史这一哲学史观，认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中各时代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对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作者认为，近几年来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

1962年重版时改名为《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初集》，增加了原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中的5篇关于近代思想史的文章。1962年6月，作者又汇集1958年至六十年代初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论文，编成《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科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2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社会科学界反右斗争座谈会发言集，收录了郭沫若、于光远、吕振羽、侯外庐、金岳霖、罗常培、关锋、齐燕铭、陶孟和、马寅初、孙冶方、陈翰笙、翦伯赞、周建人、竺可桢、王亚南、骆耕漠等人的发言。

刘毓璜在《江海学刊》第1期发表《批判何炳松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

2月

9日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规模宏大的点校“二十四史”工作启动。

会议讨论了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和任务，决定在10至15年内，把我国古代、近代以至“五四”以前的重要学术著作有计划、有系统地整理和出版。确定了古籍整理和出版6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规划小组成员共19人，由齐燕铭负责；下设哲学、历史、文学3个分组，各由潘梓年、翦伯赞、郑振铎负责。历史组的召集人是翦伯赞，成员有于省吾、尹达、白寿彝、吴晗、吴泽、汪篯、周予同、周云青、周谷城、邵循正、金兆梓、金毓黻、范文澜、徐中舒、徐炳昶、徐森玉、翁独健、夏鼐、宿白、张政烺、陈垣、曾次亮、贺昌群、傅乐焕、齐思和、邓广铭、邓拓、顾颉刚、阎文儒、聂崇岐等30人。

点校“二十四史”是小组成立后进行的一个重大项目。此前，酷爱读史的毛泽东曾指示要把前四史标点出版，后经吴晗、齐燕铭、金灿然共同商定，扩大为点校“二十四史”。承担此项工作的或为个人，或为高校历

史系。具体分工如下：《史记》，顾颉刚；《汉书》，西北大学历史系；《后汉书》，宋云彬；《三国志》，陈乃乾；《晋书》，吴则虞；南朝四书和《南史》，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负责）；北朝三史和《北史》，武汉大学历史系（唐长孺负责）；《隋书》，汪绍楹；两《唐书》，中山大学历史系（刘节、董家遵）；两《五代史》，刘乃和、柴德赓（陈垣指导）；《宋史》，聂崇岐、罗继祖、邓广铭；《明史》，南开大学历史系（郑天挺负责）；《辽史》，冯家昇；《金史》，傅乐焕；《元史》，翁独健。整理工作自1958年开始，1966年被迫中断。1967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要求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随着戚本禹的垮台，点校班子解散。1971年点校工作恢复，根据周恩来的安排，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点校组长为白寿彝，副组长为赵守俨和吴树平。参加工作的人员也有所变动。到1978年春，点校出版工作全部完成。

这项工作历时20年，先后组织了20多家高校和科研单位，动用了数百位学者。这套3000余卷、40000余万言的史书采取了统一的体例标点、分段，经过了全面的校勘，真正做到了超越前人，成为最具权威的定本。日本学者这样评价道：它"肯定超过乾隆殿本，将成为今后研究者的标准本"，而且，"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作为学术史上旷古未有的事业，意义十分重大"。

是月　孙定国在《历史教学》第2期发表《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第3、4期连载。本文受苏联理论影响，较早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命题，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错误理论；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三、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建设条件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四、正确地估计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五、在实际工作中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为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而斗争；六、在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必须大力贯彻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原理，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反动理论而斗争。

同年11月，该文单行本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节《古史考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书为作者代表作，辑录作者1928年至1949年所发表论文20篇，内容分为古史、古籍、古器、古代语文及诸子思想等类，主要有《洪范疏

证》、《好大王碑考释》、《周南召南考》、《寿县所出楚器考释》、《大诰解》、《说彝》、《老子考》、《辨儒墨》等。

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作品，是作者依在大学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的讲稿修订而成，全书依体例和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即“三国和西晋”、“东晋和胡汉王国分立时期”以及“南北朝时期”，各成单元。“三国和西晋”部分叙述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发展和西晋的兴亡过程的历史发展线索，凡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民族关系、农民战争等都有论述。“东晋和胡汉王国分立时期”部分，以淝水之战为界，分别叙述了此战前后偏安于江南的东晋王朝和中原十六国的兴废存亡，对这一时期的玄学、儒学、道教、佛教以及史学、文学和艺术等思想文化的发展做了重点揭发。“南北朝时期”部分主要论述了这一时期的朝代更替、南北对峙、政治经济改革、农民和农民起义、门阀豪族状况及寺院经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

江应樑编著《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叙述了明代云南地区土官、土司的源流等情况，探讨了明代云南大量设置土职的用意，土官土司的来历，他们的族系问题及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所起的经济作用等问题。书中搞清了一些前人未曾搞清的问题，对明代在云南境内设置的土官与土司数量进行了确切考证，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通过本书，可以看到明代土司制度的一个基本轮廓。

胡节在《历史教学问题》第 2 期发表《关于我国封建社会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

文章说，把商业资本不肯投向生产而用来购买土地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停滞的主要原因，显然是错误的。我国封建社会停滞的基本原因是与产生于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危机分不开的。在恢复发展与繁荣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停滞，而在危机阶段，不但生产力不能继续发展，而且还遭受着严重的破坏与摧残，原来在繁荣时期已经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这时又萎缩下去。等危机阶段过后，又需要经过相当的时期来医治危机所造成的创伤，只有在长期恢复的基础上，生产力才能有新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危机的不断袭击又打断了这种进程。这种周期性的发展就使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异常迂回曲折的道路。

方孝岳《尚书今语》由古籍出版社出版。

收文5篇，分别为《尧典今语》、《皋陶谟史迁读》、《禹贡今语》、《洪范古文说》、《大诰汉读举正》。书中会通音韵、训诂、文字、考古等多个学科，对《尚书》中历来深奥难解的问题提出创新解读。

谭戒甫《墨辩发微》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书成于1928年，为《形名发微》姐妹篇，是研究《墨辩》（包括《墨子》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全书分3编，第1编论证墨辩正名及名墨参同，第2编校释《墨辩》6篇，为全书主干，第3编阐明墨辩轨范和论式源流。作者对《墨经》中的辩学和自然科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将墨家辩学和因明三支、西方逻辑作比较研究，提出了对中国辩学的独立见解。

罗根泽《诸子考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徐绪典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驳斥荣孟源的资产阶级反动史学纲领》。

同期还发表了华山《元代赋役制度考略——兼评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元代赋役之变态”一节》。

吴雁南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试论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

针对罗尔纲等认为太平天国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观点，该文详加驳议。作者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仍然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不可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彻底反封建的土地纲领，无论从太平天国本身的史实和其他方面的记载都较准确的证明，太平天国是允许地主存在但限制其收租，并未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该期还刊登了龙盛运《太平天国后期土地制度的实施问题》。

3月

3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开始“大跃进”运动。

10日　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5次会议上作“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史学界随即展开疾风暴雨式的“史学革命”。

陈伯达指出：“现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缺点是‘言必称三代’，

脱离革命实践的繁琐主义；有一批知识分子逃避社会主义现实政治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欢讨论几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主要地应该从现代开始到古代，应该克服目前那种偏重研究古代的倾向。”在谈到“边干边学时”，陈伯达批判了那些自高自大、翘起尾巴、瞧不起工人阶级、瞧不起劳动人民、瞧不起老干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陈伯达的讲话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倾向，郭沫若在《关于厚今薄古问题》中说：“‘厚今薄古’本来并不是伯达同志个人的意见；毛主席早就提出过要我们重视近百年史的研究。今年二月，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批评共产党的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加以指正，说共产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正是‘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就是所谓‘厚今薄古’。不仅历史研究应该以这为方针，任何研究、任何事业都应该以这为方针。”讲话发表后，除郭沫若外，史学界的权威人士如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蒋捷夫等纷纷发表文章迅速响应。《历史教学》1958 年第 4 期在“历史科学和历史教学也要来个大跃进”的总目下，发表了叶圣陶、郭沫若和林砺儒的题词，同时还有陈垣、翦伯赞、吕振羽的文章。在《历史教学》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有影响的报刊，纷纷刊发文章拥护“厚今薄古”的口号，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著文表示支持。随后，全国史学界和高校历史系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高潮。

17 日　章彬在《光明日报》发表《对〈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的几点意见》，打响批判孙祚民的第一枪。

其后，作者又连续在《光明日报》推出《黄巢、李自成的“政权”是封建政权吗？——再论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的几个重大错误之一》、《农民战争与种族战争性质问题——再论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的几个重大错误之二》、《孙祚民在〈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中是如何歪曲农民的——〈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的重大错误之三》，对孙祚民展开更猛烈批判。

是月　科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 3 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收录史学界批判向达、陈梦家、荣孟源文章 24 篇。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罗尔纲《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内中收录《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等文。

《李秀成自述》的真伪历来是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人认为这是曾国藩之流为某种目的而伪造的，或者认为是曾国藩等根据李秀成的口供而篡改成文的。50年代初，罗尔纲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提出了“原稿”确系出自李秀成之手的观点。1956年，《华东师大学报》第4期发表了年子敏、束世澂的《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商榷》一文，称经过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笔迹专家审定，《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字迹与确知是李秀成手书的《谕李昭寿书》的字迹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所以《李秀成自述》乃是曾国藩伪造的。此文发表后，迅速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讨论。为了辨明是非，罗尔纲请教书法家，学习宋、明、清代的书法著作，运用“书家八法”理论，把这两份文献的笔画拆开来进行对照研究，最终考证出这两份文献上的笔迹出自同一人之手，再次肯定了忠王自传原稿确是出自李秀成之手。罗尔纲将这一发现写成《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一文，得到了书法界和史学界普遍承认，从而彻底地解决了《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

翦伯赞等著《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郦纯《太平天国官制军制探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论述了太平天国前期朝内正职、朝内杂职官、地方官和乡官，前期军中正职、杂职官兵以及铨选升降和勋位制度，并依据零散史料，对太平天国后期的官制军制进行了初步梳理。1963年，作者另一著作《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再版时，将本书内容全部收入，并增写了“另王育制”一目，使之更趋完善。

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5篇论文，对明代官手工业的基本内容和发展线索作了概括性论述，对明代官手工业的组织和演变、物料的供应和管理、明代的工匠制度、灶户和盐的生产以及明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等都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吴枫《隋唐五代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向奎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墨子的思想与墨者集团》。

马长寿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

变革》。

第 4 期连载。

4 月

1 日　西安半坡博物馆正式开放，为我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

会议提出，历史科学必须厚今薄古，学术研究要同政治相结合。

11 日　蔡尚思在《文汇报》发表《厚今薄古是个最正确的方针》。

12 日连载。

12 日　束世澂在《文汇报》发表《今古厚薄谈》。

14 日　周谷城在《文汇报》发表《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文章提出："要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讲个清楚"，使人们"知道今日的祖国和今日的世界是怎样来的，今日的社会主义道路何以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要使人们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获得阶级斗争的教育，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必须重写很多历史书，也必须新编很多历史书，以为祖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

杨宽在《文汇报》发表《坚持"厚今薄古"　发展历史科学》。

15 日　翦伯赞主持召开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史学组"历史学大跃进问题"座谈会，侯外庐、翁独健、白寿彝、周一良、尹达、刘导生出席会议并作发言。

翦伯赞说："最近以来，我们史学工作者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跃进，我们还要更大的跃进。只要在思想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历史学的全面大跃进的高潮时代就会到来。"他号召大家"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为争取做一个又红又专，更红更专，以至红透专深的史学家，为提前完成十二年的科学规划中规定的历史学的任务，为培养一支红色的历史科学的青年队伍而战斗。"侯外庐提出："厚今薄古是世界观的问题，是思想方法的问题，是一个两条路线的问题"。他着重谈了古代史如何"厚今薄古"的问题。翁独健提出加强民族史的研究，白寿彝建议加强教学与科研的协作，加强科学院与各高校之间的联系问题。周一良、尹达结合各自单位存在的实际问题，探讨了坚持"厚今薄古"方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7 日　陈旭麓在《文汇报》发表《厚今必须薄古》。

28 日　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该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大建设的今天，还保持学术脱离政治的想法是错误的。学术不能独立，学术一定要为政治服务。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开展百家争鸣，史学界领导干部要种试验田。

该文发表后，立即在史学界、理论界产生巨大反响，并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肯定。毛泽东在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到该文，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稍后，他又指示说："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全国史学界遂开始对这篇文章的学习和讨论。

30日　陈垣在《文汇报》发表《谈"如何厚今薄古"》。

是月　岑仲勉《西周文史论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著《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由三联书店出版。

王毓瑚编著《中国畜牧史资料》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取材于百余种畜牧、兽医古籍，是一部有影响的畜牧兽医学史资料汇编，自问世以来一直为农史研究者所重视。上编《历代养畜业概况和牧政》按时代划分，下编《畜牧兽医知识和技术》分总论、各论阐释。

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著录中国有关我国边疆之古今专著及舆图近万种，初稿完成于1939年，所收资料截止于1934年。内容共分35类，即：一般论著、边疆舆图、中国边界关系、西夏史料、契丹及辽代史料、金源史料、元代史料、明代边墙史料、明倭寇史料、丛书及期刊、东北资料、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蒙古资料、察哈尔、绥远、西北资料、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古西域资料、新疆、西藏、西康、西南资料、西南各民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台湾及海防（附江防）资料。先依地区再以时代先后排列。每书著录书名、卷数、编撰人姓名、版刻及其他有关事项。各类之书著录存佚，有传本者，就编者访查知见所及详列版刻，其罕见之写本、刻本或绘本舆图均标明馆藏，以便访求，其亡佚或未见有传本者悉入存目，并载出处，凡一书多名或署别名者，均就所知悉为参见。

该书为研究少数民族、边疆地理、疆域、历史、文化等方面情况提供了有利条件。

沈起炜编著《宋金战争史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楼祖诒编著《中国邮驿史料》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本书对我国自殷商至清代"裁驿归邮"之间三千多年邮政通信情况做了研究，结合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发展，分别介绍了历代邮驿的组织管理、邮驿律令、邮驿牌符、邮驿发展与交通发展的关系等内容。

陈垣在《历史教学》第4期发表《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史学工作者》。

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上、下)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体系完整，史料丰富，奠定了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地位。该书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识，将中国近代80年历史划分为3个时期（1840—1861年、1861—1901年、1901—1919年），是"建国后第一部采用分期办法全面研究和叙述中国近代通史的著作"，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大学教材"，出版之后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

李瑚在《读书》杂志1959年第2期发表书评，称赞该书"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作了综合的探讨，既改变了不分阶段而以重大事件为主、兼及其他方面的类似纪事本末体的叙述方法，也改变了基本上以政治、军事为主的革命史或政治史的体裁，以避免各个阶段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紊乱和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割裂，从而使读者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获得比较全面的和系统的理解。"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作者5篇有关秦汉经济史研究的文章，多引用旧金石著录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写成。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以清张敦仁复刻涂本为底本，并校以明涂祯本、攖宁斋抄本、倪邦彦本、九行本、张之象《注》本、沈延铨本、胡维新《两京遗编》本、太玄书室本、金蟠《辑注》本、清黄丕烈旧藏乾隆乙卯（1759年）传录华氏活字本、卢文弨《群书拾补》所引《永乐大典》本，以及类书、古注等文献资料，对《盐铁论》进行了校注。

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由三联书店出版。

著者从事古钱的收藏和研究四十余年，鉴于史志谱录中有关货币记载错误太多，遂尽力搜求，作《中国古币考》。此考遍观藏家，审慎鉴别，去伪存真，详察文制，分别时代，参考古史，辨论诸家学说，据实物以证其是非，溯源流以立其系统。凡四集，七十八卷，六十余万言，列图万余品，合谱志而一。因其图说浩繁，故将上古货币另行编纂，为《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凡十四章，对氏族社会后期货币起源至战国时期的货币发展状况进行了概要陈述。

宇同（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分上下二册，写成于三十年代，1943年曾在北平私立中国大学印为讲义，为作者成名之作，也是其代表作。该书写法上自成一格，是第一部以哲学问题为纲来论述中国哲学的发生、发展的哲学史著作，试图通过哲学问题的演变来厘清中国哲学的固有条理系统。全书分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大部分。“人生论”占全书二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详细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人生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伦理哲学等，对中国哲学的特点和体系做出了迥异于前人、极为大胆的衡断。作者还着力阐明中国哲学固有的哲学概念、哲学范畴和哲学命题的本义以及它们的发展和演变，不仅准确、客观地分析中国哲学范畴的本来意义，而且寻踪追迹，本着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对中国哲学范畴的源流进行深入探索。同时通过中外哲学范畴的同异对比来凸显中国哲学独特秉性。该书亦可称为一部中国哲学范畴史。书中征引原始资料丰富，选择准确而精当，并在论述中做到了“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通过对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进行概括和比较，清晰而全面地勾勒出中国哲学基本范畴发展和演变的轮廓。书中所概括的中国哲学的六大特点、六点精华、六点糟粕，为后人反省和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提供了思路。

198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修订出新一版。

张西堂《尚书引论》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5月

16日 《人民日报》刊登《厚今就要重视研究毛泽东著作 上海史学界座谈厚今薄古问题》报道。

报道说：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近日来连续举行座谈，争辩厚今薄古问题。大家深刻地揭露了历史学界存在的厚古薄今的思想实质，并且进一步

明确了厚今薄古是当前历史科学工作的正确方针。提出厚今薄古就要重视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到会的历史教师认为，历史教学中厚古薄今倾向，不仅表现在教材内容的比重上，教学思想方面的问题也是很突出的，例如有人强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作用，以为这样可以提高民族自豪感；甚至把唐太宗的纳谏，说成是能够正确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这种美化古人，歌颂帝王将相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在青年学生中起了很坏的影响。座谈会着重对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的实质进行了分析。李亚农的发言，批判了把学术和政治对立起来的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既有强烈的政治性，又有高度的科学性，有人说古史学术性强，今史政治性强，实际上是企图否认今史的高度学术性，完全抹杀古史的政治性，这种论调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借口，是想抗拒思想改造，保存资产阶级思想。周予同说："古史研究没有政治性，是一句骗人的话；反动学者钱穆是以古代史为蒋介石王朝服务的，胡适在古代史研究上是以实用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的历史研究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吴泽认为以史料学代替历史学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确实是史学界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它使史学工作者钻到烦琐的考证工作中去，脱离现实，为古代而古代，从而大大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史学界必须彻底予以批判，必须学习毛泽东著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历史。座谈会主持人、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主席周谷城说："在历史科学研究和历史教学中，政治必须挂帅，马克思主义必须挂帅。老年史学家要克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馁情绪，这是一个基本方向问题；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才能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否则必然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17日　李亚农在《解放日报》发表《厚今薄古与兴无灭资》。

23日　蔡尚思在《解放日报》发表《"从今到古"是"厚今薄古"的关键》。

24日连载。

是月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由作者所著《中国地理学史》有关地图的两章扩充而成，初稿完成后未及修改，作者即因病逝世，遗稿文字脱伪错乱处或引用史料未详注出处者，均由顾颉刚等代为核对修订，插图由黄盛璋选定并撰写文字说明。卷前有谭其骧撰写的弁言，称赞该书与《中国地理学史》对中国地理学史学科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和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

《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研究历史应当厚今薄古》笔谈，刊登

郭沫若的题词以及范文澜、陈垣、侯外庐、吕振羽、刘大年等人拥护厚今薄古的文章。

这组文章包括：范文澜《风气与条件》、陈垣《厚今薄古是今日史学界必需走的道路》、侯外庐《古史领域中“厚今薄古”方针的斗争意义》、吕振羽《坚决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刘大年《需要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

韩国磐《北朝经济试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在充分吸收近代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北朝社会经济发展演变状况进行概括性论述，为北朝社会经济的构成及其演变、各种经济制度的内容和变化勾勒出一个线索清晰的轮廓。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为第一部系统论述清代科举制度的专著，填补了我国在科举考试制度方面研究的空白，也是有关明清科举制度研究最为著名的一部著作，为国内外研究明清科举制度者广泛称引。作者是清朝最后一榜探花，从童年至壮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历生员、举人、进士各级”、“层累而进，悉所身亲”，为他撰写本书提供了很大便利。作者遍览各家著述、杂记、文集关于清代科举制度之记载，对有清260余年科举考试进行了详细叙述，史料丰赡，考订周密。全书共分八章，前七章主要介绍了“童生之考试、生员及生员系内之各种考试”、“举人及关于举人系内之各种考试”、“进士及关于进士系内之各种考试”、“停科举后之各项考试”、“武科、翻译科之考试”、“附属于科举中之各项考试”、“八股文、试帖诗概纪及举例释义”等各种科举制度，可谓“网罗荟萃，巨细兼赅，约已详尽”。第八章“科场案件与轶闻”，搜集了正史野纪中有关科场轶闻的记载。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编《历代各族传记会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由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发起和主持编纂，主要取材于二十四史、《清史稿》中所载现在中国境内各族传记，兼采前人对各传记的注释、校订和补充。参编者有翦伯赞、陈述、孙钺、楚明善、汪公量、吴恒等。最初的编纂计划比较庞大，后来由于人力的限制，一再缩小编纂规模，最后缩小到只编纂《历代各族传记会编》。整部《汇编》的编辑，费时两年全部完成，只出版了从《史记》到《隋书》部分的两编，其余各编未见出版。

童书业、史学通《中国瓷器史论丛》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由童书业在 1949 年前所写论文和札记修订而成，其中一部分是出版前由山东大学历史系史学通搜集资料撰写初稿、由童书业修改完工。

全书包括 7 篇论文和 1 篇补遗。其中《中国瓷器史概论》是根据童书业所写《中国瓷器史》的导言初稿修改而成，对中国瓷器史进行了概括说明，尝试创建一个中国瓷器发展史的系统。

童书业《唐宋绘画谈丛》由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

作者自三十年代初开始研习绘画史，1931 至 1934 年曾做两厚册读画书札记。1937 年闲居安庆期间依此札记写成近十万字的《中古绘画史》初稿。1939 年在上海美专讲授中国绘画史，以此稿作为讲义。后来又数次修订。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帝国主义侵华的通史性著作，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奴役中华民族的历史。该书的撰写由丁名楠主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参加。计划出四卷。第一卷出版后，1961 年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因故研究组被撤销，编写中断。1972 年，人民出版社重印第一卷，除个别地方略有增删外，基本上没有改动。1978 年，研究室重新成立，编写工作再次上马，第二卷于 1985 年出版。

翦伯赞在《历史教学》第 5 期发表《义和团运动》。

该文为作者 1956 年 4 月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举办的《中国近代史讲座》讲演稿，发表时作了一些修改。该文从史论结合的角度论述了义和团兴起的国际与国内的社会环境，认为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带着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义和团在组织上继承的是八卦教的形式，有禁欲主义的宗教意识，但在宗教迷信的背后，却隐藏着现实的革命狂热”。义和团主要打击洋人和外国侵略者，所表现出来的偏狭的排外和仇教是可以理解的。义和团的阶级成分复杂，并“在清王朝可耻的欺骗、出卖和帝国主义强盗的联合进攻之下失败了”，但它的爱国反帝精神永不磨灭。这些论点基本上成为五六十年代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主流观点，成为称誉一时的义和团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在该书《跋》中，再次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旧考据学进行批判。作者从六个方面论述了旧考据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新考据不同：旧

考据方法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旧考据方法是从现象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从本质看问题；旧考据方法是‘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旧考据方法是静止地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发展地看问题；旧考据方法是无视或掩盖阶级斗争，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正视和揭露阶级斗争；旧考据方法是无视或蔑视群众，只有新考据方法才会有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下册于1981年11月出版。

周予同在《学术月刊》第5期发表《“厚今薄古”与历史科学大跃进》。

刘尧庭在《史学月刊》第5期发表《坚决走“厚今薄古”的道路》。

陈旭麓在《历史教学问题》第5期发表《论“厚今薄古”》。

夏纬瑛校释《管子地员篇校释》由中华书局出版。

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书中介绍了“北京人”的发掘、发现和研究情况，重点描述了“北京人”的生活情景和自然环境。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第一部研究北朝胡人姓氏问题的专著。作者根据旧史纪传、姓氏诸书之记载，参以文集说部、碑铭石刻、方志图谱的材料和近人的研究成果，对《魏书·官氏志》所载的胡姓和两汉以来的降胡质子、隋唐的蕃将胡商，逐一考证其“原义、种族、居地以及改姓之人证”。除凡例、绪言、后记外，正文分作内外两篇。内篇考证《魏书·官氏志》所载诸胡姓，外篇考证未见于《魏书·官氏志》的诸胡姓。

该书填补了我国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对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和少数民族史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6月

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

1958年5月25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陈伯达任《红旗》主编，初始为半月刊，1965年1月改为月刊，1980年1月恢复半月刊。许多对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如《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等都出自该刊，是五六十年代史学界进行论战的重要阵地。

1988年7月1日，由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创刊，《红旗》杂志停刊。

9日　梁作杆在《光明日报》发表《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缓和束缚论”的错误》。

10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文教、科学等小组，并规定这些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副组长：康生。组员：陈伯达、林枫、胡乔木、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子意。其后，文教小组增加刘志坚、徐冰、荣高棠、徐运北、胡克实、张修竹、罗琼为组员。

《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生的一封信》，号召在资料上赶超陈寅恪。

其中写道：“假使没有‘厚今薄古’的精神，那就只能是古人的俘虏，古文物的俘虏，一群老古董和书呆子，既无补于实用，也说不上什么学问。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旧学界是沉浸在崇古的空气中的，言必称唐虞三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请问究竟出了多少了不起的人才？‘厚古薄今’的方向是应该老早转换了。”

信中特别提出，“搞历史是要掌握资料的，但这不是目的。我们不能成为资料的俘虏，要掌握它，据有它，成为资料的主人或支配者。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

虽然该信勉励北大师生在研究历史中重视史料，赶超陈寅恪，并无鼓动批判陈寅恪之词，但此信发表后，客观上鼓励了全国范围内对陈寅恪的

批判。

6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

是月　何兹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从城乡关系看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的变化》。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由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于1948年，为《墨子》书中“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十一篇兵书所做的注释。注释注重对内容的理解，有意避开关于文字或名称的讨论。

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分上、下两卷，根据古代典籍及金文、甲骨，对有关中国历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释。文章包括《月建法与求日至法之源流沿革》、《殷人祀岁星考》、《殷人祀北斗考》、《武王克殷年考》等文章。其中《武王克殷年考》考订武王克殷年代为公元前1055年。

广东韶关马坝乡狮子山岩洞发现属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被命名为“马坝人”。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

该机构主要负责主持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抢救、收集、整理民族地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农奴制度下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资料。

岑仲勉《隋书求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王佩诤编著《盐铁论札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以札记形式对《盐铁论》进行校释疏证，选录有关的注释、札记、史书数十种，排列于《盐铁论》相应句下，驳误订正。所录之文多出群经、诸子、四史之外。

黎澍在《哲学研究》第3期发表《发扬马克思的伟大独创精神，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纪念马克思诞生140周年》。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被称为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学者整理研究敦煌写本“四部书”的总结性著作，收录了作者本人早年在伦敦和巴黎等地摄制敦煌古籍照片时所获资料以及散见于报刊的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等有关敦煌古

籍写本的题跋、论文，共录有文书 199 卷，研究题跋、论文 27 篇。全书共五卷，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卷一为经部，卷二为史部，卷三为子部上，卷四为子部下，卷五为集部。每种古籍的著录，先著书名及著者姓名，次著原藏号码，再著该古籍的各种影印或排印本。每种古籍的题记，一篇以上的，均依编写年月排列。有关敦煌古籍的论文，或全录，或节录，不录者则注明原文所在。

1986 年 6 月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黄永武《敦煌古籍叙录新编》，共 18 册，将《敦煌古籍叙录》所收各篇叙录拆散，先影印原文，再补充编者所见中日学者新的研究文献目录，最后影印敦煌原卷照片或摹本、排印本等。

李时岳在《历史研究》第 6 期发表《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反洋教运动》。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论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夏鼐在《考古通讯》第 6 期发表《考古工作也要厚今薄古》。

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

7 月

15 日　翦伯赞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作者认为，厚古薄今，好像是兴趣问题，实质上是路线问题。从五四以来，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就负担了这样一个政治任务，即诱惑青年脱离政治、脱离革命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提倡厚古薄今的历史学方向，引导青年离开自己的时代，把青年从时代的激流中引导到时代的后院，引导到古史的象牙之塔，让青年悠游于羲皇上世，作一个现代的古人。当然有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也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只是好古成癖，但是在客观上，被他们过分强调的那些断简残篇、破铜烂铁就遮蔽青年的眼睛。资产阶级的教授和论客们是想把古代史当作他们最后的堡垒用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他们失败了。对社会主义采取对立的态度，至少采取消极的态度；这就是厚古薄今的实质。

作者指出，过分地夸大史料的作用也是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特点。好像一个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搜集史料，而且是搜集偏僻的史料，搜集别人不曾用过的史料，至于史料的分析，在他们看来，就不是史学家的任务。并且认为对史料进行了理论的分析就不算史学。不论资产阶级史学家怎样以

掌握史料自负，却赤裸裸地表现出自己的虚弱，以致不得不极力回避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理论分析。腐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已经丧失了分析问题的能力。不论史料怎样重要，总不能说“史料即史学”。史料之于史学，正像砖瓦之于房子，布帛之于衣服，我们可以说，没有砖瓦盖不起房子，没有布帛做不成衣服，我们能够说砖瓦即房子，布帛即衣服吗？

作者认为，资产阶级的史学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过分地强调考证，他们之中有些搞土考证，有些搞洋考证，还有洋土混合的考证，不论是搞哪一种考证的人，他们对于考证的认识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考证是历史学研究的正统、上乘，一切其他，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内都是旁门左道，用资产阶级史学家常用的一个名词来说都是海派。其实真正的海派，不是别人，正是那些从海外贩运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自己。资产阶级史学家之所以强调考证不能认为是方法问题，应该说是阶级性的表现。无产阶级的史学家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史学家就用考证的方法来隐蔽和遮盖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会说明他们所属的阶级的灭亡的必然性，会说明他们的霸权将随着自己的阶级的灭亡而消灭。因此，他们就割裂历史，把历史切成无数互不相关的碎片，而把这些碎片作为与其他历史事件无关的问题孤立地去考证，把人们的思想从历史发展的主流引到支流，引到狭窄的死胡同，引到牛角尖里去。让人们看不见历史的全貌，历史的骨干，脉络，看不见历史的发展和发展的动力，听不到历史跳动的脉搏，更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规律。

是月　在“史学革命”中受到猛烈批判的陈寅恪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坚决不再开课，从此退出教坛。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

该书为作者早年旧作，小部分曾在《禹贡》上发表过，主要考察了从西周末年至战国末年我国少数民族的居处相互关系和迁徙情况，对周民族之南移、西戎东侵、南方民族之移动、赤狄东侵、白狄东侵、东北貉族之移动、秦西诸戎之移动的情况作了全面介绍。

李光壁等编《中国农民起义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科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厚今薄古》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孔经纬《中国经济史略（明清至抗战前）》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简要说明了从明清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演变状况。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1956年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见习训练班”讲义。由基础知识、专题报告和考古技术三部分组成。基础知识部分讲述了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至宋元考古以及考古学简史。专题报告部分分两种，一种是可以按时代分散开来的专题，另一种是考古工作的辅助知识。考古技术部分，主要讲述了田野考古方法及其所需测量、绘画、照相和修整等技术方法。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1分册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共四册，为作者所撰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第二、三分册1962、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0年8月，中华书局将全书四册配套出版。首册辑述三国魏晋南北朝史事，第二、三、四册分别辑述唐宋辽金元、明清和近代时期史事。1938年沪宁沦陷，作者由之江大学回余姚乡居之后开始撰写本书，前后七易其稿。从体例上说，该书是一部偏重历史考据的读书笔记，征引宏富，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学术、艺文、风俗、典礼、山川、舆地、名物、度数、天文、历法等无所不包。考辨既博且精，多发前人未发之覆。虽重在史料的收集、分类和编排，实际上是一部汉以后的中国通史。

袁仁林在《考古通讯》第7期发表《考古学也要“厚今薄古”吗?》。

湖北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史哲》杂志集中刊发一组批判厚古薄今的文章。

这些文章包括:《从山东大学历史系围攻“厚古薄今”所暴露的问题再驳“教授治校”》、《山东大学中文系必须彻底扭转厚古薄今的倾向》、《山大中文系语言教学中的厚古薄今、脱离实际》、《山大中文系文学史教学中的“崇古非今”》、《彻底清除“厚古薄今”的思想影响》、《从厚古薄今到厚今薄古是史学界的革命》、《必须彻底粉碎世界史教学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等。

8月

16日　文化部在郑州召开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文物、博物馆工作跃进现场会。

18日　徐柏林在《光明日报》发表《“厚今薄古”对史学工作者的指导意义》。

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术批判是自我革命》，提出高等学校的领导者要大胆地发动群众，帮助资产阶级学者们进行学术思想批判。

是月　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选录1949至1957年底发表的鸦片战争史研究代表性论文24篇。内容涉及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史料和史实的考证、中外关系以及人物等诸方面。论文共分四组。第一组为鸦片战争爆发的背景与影响，收有齐思和的《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烟贩们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主谋》等8篇论文。第二组为列强对华的侵略活动，收有余绳武的《1858年以前美籍传教士在中国的侵略活动》等5篇论文。第三组为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收有戴学稷的《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等6篇论文。第四组为人物研究，收有冯友兰的《魏源——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先进思想家》等5篇论文。

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宁靖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选录1958至1984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23篇。内容有史实考证、人物述评、社会状况和中外关系等诸方面。论文共分三组，第一组为鸦片战争爆发前诸问题的研究，第二组为鸦片战争过程中请问题的研究，第三组为林则徐、魏源研究。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探讨汉武帝到唐玄宗九百年间的公田制、均田制以及和均田制有关的府兵制等问题。作者认为，公田制即封建的国有土地制占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主导地位，均田、屯田、占田、名田、限田等田制、田令的规定，都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个时期的兵制、赋税也和封建的国有土地制有着血肉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这个时期的上层建筑——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无论直接间接也都脱离不了国有土地制的支配力量的影响。这段时期各时代的历史发展虽然有差异，但这个封建的国有土地制形式是贯穿着的，一直到安史之乱以后，两税法施行，才逐渐改变或缩小了它的形态。

莫东寅《满族史论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研究明初女真族的社会形态、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八旗制度、清初满族的萨满教等问题。

方国瑜编撰《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

侯外庐主编《中国哲学史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参加了编写。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中有关戊戌变法的奏章、举贡生监的条陈等300余件，按问题分为12类。反映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戊戌变法中的政治、思想概况。

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清除厚古薄今思想，贯彻厚今薄古方针》。

张忠培等在《考古通讯》第8期发表了一组“厚今薄古”笔谈。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厚今薄古辩论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蒋捷夫、朱作云在《文史哲》第8期发表《厚古薄今是历史教学与研究中的资本主义道路》。

该文以山东大学历史系为例，认为厚古薄今主要表现为重视史料，鄙弃理论，把掌握史料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懂不懂历史的标准，作为考核教师学术水平高低和学生成绩好坏的唯一尺度；烦琐考证，故作高深，引导别人钻牛角尖，脱离现实，脱离政治，脱离社会主义建设，使历史科学丧失科学性、战斗性，不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斗争服务，而为没落衰亡的阶级服务；重古史，轻现代；崇拜“英雄”，轻视群众；脱离政治，不务实际。

该期还发表了《评童书业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对“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一文中若干论点、论据的初步批判》，对童书业和王仲荦展开批判。

9 月

28 日　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在北京召开纪念戊戌政变60周年纪念会议。

会议由范文澜主持，吴玉章、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陈垣、潘梓年、章士钊、康同璧、梁思成等六十多人参加了集会。

会议论文结集为《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是月　欧阳惠林等《学术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翦伯赞主编，齐思和、聂崇岐和刘启戈合编《中外历史年表》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长达134.8万字，历时五年编撰而成。编者认为："历史年表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必要的工具书，特别是我国历史悠久，年代遐长，史籍浩繁，事迹错杂，更需要把头绪纷纭的历史事件，提纲摘要，编次年月以备检阅。"本书上起传说中的远古时代，下迄1918年，采用中西对照式的编排方法，把几千年来中国的和外国的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按照年代顺序，提纲摘要。对于历史事件的选录，着重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和重要法令的颁行，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要的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国际和民族间的相互关系，著名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试图通过年代的顺序和中外历史的对比，显示出历史事件自己的发展和它们彼此之间的交错关系，从而揭示出历史事件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脉络。

本书"内容上相当全面，而叙述则比较简括有条理"，"叙述扼要，文字简洁"，在同类书中，"它算是最有水平的一种"。

1961年改由中华书局重印。

田昌五《王充及其论衡》由三联书店出版。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利用10世纪以前古藏文金石刻辞、木简写本、汉文资料以及11世纪以后的藏文典籍等对《新唐书·吐蕃传》作了笺证。全书以《吐蕃传》体例编排，增补其缺，考证其事，笺其所出，正其讹误，尤其重视汉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及吐蕃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

邓拓由人民日报主编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同时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

《史学月刊》从第9期开始设立"拔资产阶级教学中的白旗"专栏，对部分学者公开点名批判。

黄石林在《考古通讯》第9期发表《关于考古工作中的厚今薄古问题》。

杨寿南在《安徽史学通讯》第5期发表《历史研究工作要厚今薄古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大跃进》。

广西柳江县通天岩洞穴发现属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被命名"柳江人"。

10 月

1 日　“黄河水库考古展览”在故宫博物院开幕。

17 日　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终年 60 岁。

27 日　《光明日报》之《史学》专刊发表《告别读者》，准备停刊。

毛泽东看到《告别读者》后，指示不能停刊，因此《史学》专刊得以继续。

是月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目录学名著，包含《序录》一篇及论文 489 篇，每篇论文都是针对《四库全书》的某一篇提要而作的考据性的评论，纠正《四库提要》的错误或补充其不足，具有重要价值。全书凡 24 卷，经部 2 卷（61 篇），史部 7 卷（108 篇），子部 10 卷（217 篇），集部 5 卷（103 篇）。

1980 年，中华书局重排出版。

殷涤非在《考古通讯》第 10 期发表《考古学必须“厚今薄古”》。

贺次君《史记书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意在从版本的角度，广集众本，详细比勘，恢复《史记》原著真相。书中著录了作者所亲见六朝至民国时期《史记》的各种抄本、刻本、排印本 60 余种，介绍了各版本的基本情况，并详述其源流。

钟向凡在《争鸣》第 10 期发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束世澂在《华东师大学报》第 4 期发表《以毛泽东学说为纲研究古史分期问题（在修改教学大纲中学习毛泽东学说一点体会）》。

尹达在《考古通讯》第 10 期发表《考古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作者看来，在考古学中存在着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考古学受胡适、傅斯年的影响很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认为考古学可以不要理论，不要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研究工作是拼命地钻向支离破碎的小问题，使研究工作永远陷入烦琐不堪的境地。作者提出，在考古学中固然有某些技术性的工作，更重要的却是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应政治挂帅，明确考古工作的政治目的性，大力

开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综合研究。

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

许顺湛《商代社会经济基础初探》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入3篇论文，《商代社会经济初探》、《对“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一文的意见》和《商代墓葬的阶级反映》，主要根据安阳和郑州的考古发掘材料，并结合文献记载，探讨商代的社会性质。作者认为：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商代应是奴隶社会的中期，夏代不是早期奴隶社会，而是原始社会末期。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书汇集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著名大学历史系学生批判“厚古薄今”的大字报文章，一大批从民国史坛走出的著名学者如陈寅恪、岑仲勉、邓广铭、童书业、徐仲舒等成为批判对象。1959年1月人民出版社又出了续辑。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在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的基础上重新编写而成，吸收了从1941年至1958年之间有关青铜器的新发现与新成果。全书共十章，分别对青铜器的发现和制作、形制和纹饰、类别和用途、铭文考释和断代分期、铸造工艺和仿造辨伪等作了全面论述，最后对历代著录青铜器的重要书籍作了评价。本书的青铜器分类法是按日本水野清一《殷商青铜器编年之诸问题》中的分类法改定的，计分4部11门50类，相比《商周彝器通考》，该书有些章节内容更加丰富，但图片大减，甚不便于读者。

岑仲勉《突厥集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书稿撰于40年代后期，因故延宕多年，至50年代中期完成。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共17卷，85万字，对我国史书、杂著以及碑志中有关突厥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搜辑、校订和考证。第1至第10卷为编年史料，起自西魏大统八年，下讫唐天宝十四载，体例略仿戴锡章《西夏纪》、吴广成《西夏本事》，以系年先后编次，说有同异者加以考证，取其较可信者。如果连属多年，就参酌始言或终言之例编排。偶遇少数不可确定的，便附于相近年代之末。系年采西魏、北周、隋、唐纪元为连贯，次附东魏、北齐及南朝年号，最末乃记公元。第11至第13卷为突厥本传校注，第14卷为突厥属部校注，第15卷为突厥部人汉文碑志及列传校注，第16卷为突厥文碑译注，第17卷附录，辑录了作者有关论文及译文。作者广阅博览，

将中国古籍、文集、杂著、笔记和碑志中凡与突厥有关之资料逐一摘出，按系年先后或类别编次，并运用突厥文物和资料互证的方法，详尽考释了突厥时代的史事、人物和地理及突厥和隋唐的相互关系等，对古代突厥汗国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采摭丰富，取舍有据，为研究突厥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是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突厥学研究者的普遍重视，称其对中国突厥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苏联 1961 年第 3 期《亚非民族》杂志发表《岑仲勉著〈突厥集史〉》的书评，指出是书的出版，使得“突厥史汉文史料在科学上第一次得到了完整的汇集”。

童书业在《文史哲》第 10 期发表《初步检查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自我批判。

文章检讨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方法根源在反动的阶级意识和 1949 年前的反动政治思想上，长期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和研究，使其厚古薄今，对近代、现代史丝毫不发生兴趣，只会大搞考据，写堆砌史料的论著。由于其过去是胡适派的支派古史辨派的成员，所以他的“考据癖”也是很严重的。而重视史料和考据，轻视理论，是资产阶级史学观点的突出表现。作者表示要改造自己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真正接受马列主义，服从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好好为人民服务，认真的、严肃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做个新人。

11 月

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谈为历史人物翻案。

月初，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11 月 20 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在武汉座谈，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这些讲话，成为为曹操翻案的直接推力。

陈柏泉在《史学月刊》第11期发表《评陈寅恪历史科学研究的方向》。

文章说："摒弃以至于反对阶级分析方法是陈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陈既然反对以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去对待史料，那么在著作中即使是句句话有史实为凭，个个论点有史料为证，结果也只能是给读者摆下迷魂阵。让人家进阵不得，出阵更难，以致混淆了别人的耳目而对阶级斗争产生迷惘。同时作者本身也只能是堆积史料而不能做出科学的分析和总结。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也就必然是不能去伪存真去糟取精了。"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两书所收由汉到隋的诗文作品为主要资料，并参考同时期字书、音义书、训诂书中有关语音资料，探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617年共八百余年间汉语韵部演变的历史。所收材料极为丰富，论述十分详尽，素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

仅完成第一分册。

《历史研究》第11期发表一组批判文章。

包括戎笙《批判雷海宗反动的历史观点》、王忠《驳向达、潘光旦关于土家族历史的谬说》、蔡美彪《〈国史旧闻〉应该批判》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批判雷海宗、李鸿哲的反动史学观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关梦觉《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初步探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和阿拉伯人民的友好关系》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2月

7日　毛泽东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印发的《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撰写批语。

其中说道："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

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12 月 10 日，毛泽东又为这份材料写了第二条批语，认为：“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向中央全会印发《张鲁传》及两条批语，反映了毛泽东受到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

顾颉刚在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长篇检讨《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

顾氏在发言中说：思想而能改造，在我的旧脑筋里简直是一件不能想象的奇事。我一向自信，在学术上，在道德上，都是站得住的；况且我的学术工作只是客观地整理古史、古籍，写些考证文章，没有什么阶级性可言，也似乎没有改造的必要。到现在想来，这与其说是羞于改造，毋宁说是抗拒改造。1954 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招我到京供职。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可是到京不久，领导干部就对我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我听了骇然。那时我反领导的情绪十分高涨。要不是反右派运动救了我，我必然是一个右派分子无疑。直到今年整风运动里，认识到自己一直坚持着反动立场，无怪乎那位领导同志要对我怀疑和憎恶。我读了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使我认识了真正的学问是要从书本的知识结合亲身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中得来，我的知识只是片面地在书本里钻来钻去的一知半解，况且我从来不曾用马列主义为基础去研究，更没有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实践过，那岂不是愈钻研就会愈错误吗？因此，我知道确实为这几百箱书所害了。我又认识到，我多年的工作，主观动机是纯学术的，脱离政治的，而客观效果则确是为反动政权服务，既为反动政权服务则思想体系即可与蒋介石集团连接起来。这位领导同志站在革命立场上给我以当头棒喝，要我自己想出这道理，根本划除两面性，这原是最好的帮助。

顾在最后表白：要以政治思想为统帅，工作岗位为基地，参加业务实践和劳动实践为基础，发挥我的潜力，走上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顾氏作此发言时内心极为痛苦，在本年 12 月 4 日日记中写道：“一篇发言稿写了四次，今日略定，甚矣江郎之才尽也。”发言摘要刊登在 12 月 18 日的《光明日报》上。

该文的发表，标志着从民国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彻底臣服。

18日　吴晗在北京师范学院作《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报告。

报告的主旨在于纠正“史学革命”中出现的偏差。

报告说，薄古不等于无古、灭古，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古为今用。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一方面必须坚决反对那种厚古薄今，以至是古非今的偏向和错误，另一方面，也不能只讲人民大众的历史，不讲不研究过去时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作品，或者把过去时代的历史，讲成漆黑一团，一无是处，那也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违反历史实际的有害偏向。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作者认为，对厚今薄古方针的贯彻，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种看法认为厚今薄古是只要今不要古，研究古代史，开古代史的课，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有一种看法是是今非古，认为过去时代的一切活动，凡是没有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标准的都是不正确的。他们没有认识到过去的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彼时彼地的社会情况来衡量，而不应拿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作者以为，近代史、现代史要厚，要组织必需的人力来研究，而且一定要搞好；古代史也要讲，也要研究，也必须有必要的人力参加，并且也一定要搞好。是古非今要不得，片面地是今非古，隔断历史，弄得“前无古人”，也是不合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讲话稿刊登在《文史教学》1959年第1期。

是月　《历史研究》第12期刊登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三班研究小组写的《关于隋唐史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评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论”观点》。

该文从民族融合、阶级学说和阶级斗争三个方面对所谓陈寅恪的“种族——文化观”进行政治批判。文中写道：“和一切唯心主义历史学家一样，陈寅恪不但千方百计地贬低物质生产、阶级斗争和革命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且也敌视劳动群众、认为他们是文明和文化的敌人，认为精神文化的创造、持续和传播，只是具有‘德业儒素’、‘门风优美’和保持‘家世专门之业的少数士大夫和精神贵族的事情。”“陈寅恪关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论著，贯穿着反动的唯心主义文化史观这一条白线。他否定物质生产、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历史作用。与此相反，他极其片面地夸大精神文化的社会历史作用、夸大个别人物的社会历史作用，这样，也就不可能不歪曲历史真像。这就是陈寅恪关于隋唐史研究中所标榜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实质。”

文化部、中国科学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合召开长江流域文

物考古工作会议，决定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

李泰棻《老庄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对老庄的生平事迹、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等作了全面的解读和剖析，在老庄研究界产生重要影响。

吴玉章主编《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由三联书店出版。

云川《方腊起义》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是一部西突厥历史资料汇编，对研究西突厥历史和北方其他民族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法文原版于1903出版，汉译本曾于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次中华书局增订再版。作者以中文史料为根据，结合西方人的记载编撰而成。内容分为4篇：第1篇为绪论；第2篇转录隋唐诸书中西突厥列传及注释；第3篇收辑分析正史和玄奘记传中属于同一问题的其他史料；第4篇为西突厥史略。译者对原书错误和遗漏均作了考订补正，增订本又添加沙畹原书地图1幅。

1958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缺及考证》，该书共收论文17篇，目的在于补正沙畹《西突厥史料》一书的缺略。岑著除已见于沙畹书中的材料不再移录外，凡我国史书及石刻碑文等有涉及西突厥的资料，都一一收录，依年分列。对于疑难史料则详加考证，复杂问题则专篇探讨。

《文史哲》第12期发表一组批判赵俪生的文章。

该期刊发的文章有《批判赵俪生在农民战争问题上的谬论之一——对农民和农民起义的歪曲和诬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赵俪生“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反动本质》。

此后，《文史哲》停刊。

是年

《故宫博物院院刊》创刊。

开始为不定期刊物，继创刊号后，1960年出版了第2期，后因“文化大革命”停刊。1979年复刊，为季刊。2000年改为双月刊。

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主办《中国第四纪研究》创刊。

1981年更名为《第四纪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国际共运通史。

《科学史集刊》创刊。

1966年"文革"开始后停刊，共出版九期。"文革"以后，又继续编出地学史专集和数学史专集两期（第十、十一期）。1982年改为定期刊物《自然科学史研究》（季刊）。

《民族研究》杂志创刊。

1966年前为月刊，"文革"开始后停刊，1979年复刊后改为双月刊。

1959 年

※ 郭沫若、翦伯赞等发文为曹操翻案，引发史学界大论战。
※ 翦伯赞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
※ 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问题》。
※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始发掘。
※ 甘肃武威出土大量汉简。
※ 徐旭生率队探查“夏墟”。
※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开始出版。

1 月

25 日　郭沫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 245 期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提出为曹操翻案问题。

文章主要论证了蔡文姬是《胡笳十八拍》真正的作者。郭沫若在文章中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继承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由黄巾农民组成的青州军，是他的武力基础。他的屯田政策也是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树立的。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整个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使北部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要求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调剂。自殷代以来即为中国北边大患的匈奴，到他手里，几乎化为了郡县。他还远远到辽东去把新起的乌桓平定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又说：“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该文写作的背景与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有关。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使当时沉闷的学术界为之一振，掀起了评价历史人物的高潮。该文被看作

是清算“史学革命”的开端。

28日　陈垣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79岁。

是月　吴晗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开始陆续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在一次北京市中学历史教师全体大会的讲话中，吴晗倡议为青少年学生编写一套比较全面系统的课外历史通俗读物——《中国历史小丛书》。吴晗邀请了一批热爱普及历史知识的专家、教授，组成了《中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全面计划和分工审查稿件，吴晗担任这套小丛书的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的读者对象是初中乃至高小文化水平以上的广大文史爱好者，编写要求史实准确、内容丰富、文字浅显、通俗易懂，每种用一万多字或两万多字说明一个主题。

1959年1月，《中国历史小丛书》的第一种《清代苗民起义》出版，到当年12月共出版35种。小丛书在开始的半年内一般每月发稿一种，以后选题逐渐扩大，除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以及旅行家等历史人物外，对我国古代著名战役、历代农民起义以及著名历史事件、名城、古迹、经济、文化、古代著名典籍等均列有专题，到1962年12月，小丛书已出满100种。为此，编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带有纪念性的扩大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的介绍、评论文章，一时形成了较大的声势。这套小丛书定价低廉，每种发行量少的四五万册，多的十几万册。读者普遍反映这套小丛书通俗易懂，富有故事性，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从195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一共出版147种。

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赵纪彬《论语新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书主要对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以及孔门哲学思想体系进行了讨论，分上、下两部，收录《释人民》、《君子小人辨》、《原贫富》、《自然稽求》、《知能学习论》、《两端异端解》、《说知探源》、《崇仁恶佞解》等文。

该书曾于1948年以《古代儒家哲学批判》为名在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经大改动和新增后再版。为配合批孔，1974年又作较大修订后出第三版。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作者代表性作品，主要根据殷代的甲骨卜辞和铜器题铭，运用

联系地名而加以系统考证的方法，以安阳即殷这一肯定的事实为基点，论述了殷代的历史地理及有关的历史问题。本书试图解决的问题皆关涉重大，主要有：（1）商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是怎样的；（2）殷代中国（商王国）的疆域有多大；（3）商王国主要城市的位置和山川的名称；（4）商王国以外有哪些方国，他们与商的关系怎样；（5）殷代商王国对外战争的地理问题。全书共三章：一、殷、商与商西猎区；二、帝乙十祀征人方路程；三、殷代多方。书末附殷代王卜辞分类表。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短期考古训练班参考教材编写小组编《考古教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各时代的遗迹和遗物”介绍了一些做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常识，按田野工作的实际情况，分遗址、墓葬、遗物来编写。共分石器时代（包括旧、中、新三个时代）、商代到春秋、战国以后（包括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以后）等阶段。第二部分“怎样调查和发掘”是本书的重点，介绍了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基本要求和操作方法。

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于1953年开始编撰，主要是为了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界学习中国革命史以及高等院校培养中国革命史教师的需要，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史学著作和优秀教科书。1962年再版时，作了部分删改和补充。“文革”开始后遭到禁印，修订本于1979年9月和1980年5月出版。

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袁英光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战国策派”反动史学观点批判》。

2月

19日　翦伯赞在《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第152期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曹操论战爆发。

文章赞成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意见。说：“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又说：“像这样一个中国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却长期被当作奸臣，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

张寄谦回忆说："回想当时正是反右之后以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史学》稿源奇缺，只好向主编翦老汇报，因之由翦老想出曹操这一主题。"毛泽东注意到这场关于曹操评价的讨论。他看过翦伯赞此文后，表示赞同翦的观点，并说"这个案要翻"。

其后，《史学》专刊继续组织刊发讨论文章，并以"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讨论"的刊头加以突出。这场关于曹操评价的讨论，遂在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为首的全国报纸上展开。讨论主要围绕曹操对黄巾军的态度，曹操杀人多与寡，曹操进行的几次战争的性质等问题来进行。

这次大规模讨论，扭转了当时沉闷的史学风气。

是月　马念祖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太平广记》、《一切经音义》、《水经注》、《世说新语注》、《三国志注》、《文选注》等八种古籍征引书目的一个索引式的综合目录，按照所引书籍名称笔画顺序排成检索表，所辑八种古籍引书，《水经注》375种、《三国志注》203种、《世说新语注》395种、《文选注》1551种、《艺文类聚》1431种、《一切经音义》780种、《太平御览》2579种，《太平广记》526种，共7840种。除去相互重复者，实为6001种。每种下面分别标明见于上述八种古籍中的哪一种或哪几种。该书对了解北宋初以前流行的书籍名称助益颇多，也利于作古籍校勘、辑佚之用，其价值可与《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相匹配。

束世澂在《历史教学问题》第2期发表《关于中国史上封建社会起讫时期的争论》。

何竹淇《岳飞抗金史略》由三联书店出版。

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此书讨论了汉字的起源问题，认为"结绳说"、"仓颉造字说"、"起一成文说"、"手势语说"、"所有权的记号说"皆为主观唯心的说法，并叙述了汉字从图画文字到形声文字的发展过程以及简化繁化的两种趋势、汉字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等。

3月

19日　吴晗在《光明日报》发表《谈曹操》。

文章说，历史上有许多许多问题都需要翻案，应用新的观点，从历史事实本身，重新估价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肯定他在历史上的作用，从曹

操这个人物的重新评价开始，将会引起历史上其他人物的重新评价。

23 日　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替曹操翻案》

该文对《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提出的论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全面评价了曹操在历史上的功过。全文共分五节：（一）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二）曹操平定乌桓是反侵略性的战争，得到人民的支持；（三）关于曹操杀人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重新考虑；（四）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五）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材，在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

作者提出，评价一位历史人物，应该从全面来看问题，应该从他的大节上来权其轻重，特别要看他对于当时的人民有无贡献，对于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无贡献。作者认为，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曹操在这些方面的贡献，比起他同时代的人物来是最大的。作者还提到要为殷纣王、秦始皇以及“一切受了委曲的历史人物”翻案。

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等报刊纷纷刊发文章参与讨论。

《光明日报》3 月 24 日全文转载此文。

31 日　谭其骧在《文汇报》发表《论曹操》。

该文为本月 26 日作者在复旦大学“学术讲座”所做的报告。文章对郭沫若给曹操翻案的观点表示反对，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是是非非，尽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不应该恶之则恨不得把他打入地狱，爱之则唯恐捧不上天。在郭沫若的笔底下，似乎曹操简直没有什么不是，即便有也算不得什么大不是。这种看法在许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比如郭沫若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又说，“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好像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曹操竟代替黄巾军做到了他们自己所未能达到的目的，竟成了农民军的领袖、农民阶级的代表人物，这样的提法实在很不妥当。作者认为“对曹操的功和罪要进行全面的评价”，“既不能把曹操打下地狱，也不能把曹操捧上天”。

是月　翦伯赞在《新建设》第 3 期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

针对“史学革命”中有人提出为了打破王朝体系连王朝的称号和王朝本身的历史也要从中国通史中削删的做法，作者认为，“不管按照什么体系编写中国通史，都不应该从中国历史上删掉王朝称号”，“王朝的称号不

是历史学家任意臆造的一种名词，而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而尊重客观存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

该文是最早从正面批评“史学革命”的一篇名文。随着该文的发表，史学界展开关于“打破王朝体系”的讨论。周谷城、范文澜等撰文表示了与翦文不同的意见。

翦文经补充后，又发表在3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

黎澍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中国近代史始于何时?》。

文章再次对尚钺等人主张中国资本主义关系萌芽于明清之际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并全面否定。

针对刘大年和黎澍的批评，尚钺又在《历史研究》本年第6期发表《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二三事》予以答辩，承认刘、黎二人的意见都是对的，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即在他们批评的文章中，缺乏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与中国丰富的具体历史实际相结合，把1840年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与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行具体的阐明。因之，我的某些主观性片面性的缺点，虽然暴露出来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也使刘、黎两同志在解决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封建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间联系问题的时候，就很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方法，特别是学习运用毛主席在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时，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密切结合起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光辉成就，来给以令人信服的说明。”

漆侠《王安石变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等方面对宋朝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描绘了王安石变法的社会背景，并对变法的内容、实质和变法过程中的复杂曲折的斗争进行了系统论证，首次廓清了王安石变法的历史真相，多发前人之未发。

冯家昇《辽史证误三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由《辽史源流考》、《辽史初校》、《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等三篇校正《辽史》的论文组成，首篇考证《辽史》修撰及取材情况，次两篇为相关校勘之记录。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以《敦煌变文集》为主释对象，取敦煌变文中某些现已不易理解的难词加以考释，分为六篇：释称谓、释容体、释名物、释事为、释情貌、释虚字，绝大部分都是词义的说明，极少部分只说明文字的假借。所

据材料，上至先秦，下至现代，举凡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语录随笔、民谣、佛经、诏令、奏折等，无不在采摭之列。在方法上发扬了清代朴学的传统，以“诂训音声，相为表里”为原则，着意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词义、词源，力求找出它们的来龙去脉，进而把语词的断代研究纳入词汇史和语言学史的范畴，连带解决了不少其他古籍中存在的训诂、校勘上的问题。

该书出版后，作者不断进行修订补充，至 1962 年已出 3 版，1981 年第四次增订再版，篇幅比第 3 版多出一倍。

胡绳武、金冲及《论清末的立宪运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4 月

16 日　方明在《光明日报》发表《也谈替曹操翻案》。

文章认为“曹操残忍好杀，是历史事实，没有重新考虑的余地”。曹操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种惨状的“制造者之一”。

21 日　杨柄在《人民日报》发表《曹操应当被肯定吗?》。

他认为曹操是镇压黄巾的“首恶之一”，而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所以曹操是反动的。曹操制造的“血腥大屠杀”，“即令同现代各色反动派用‘现代化’杀人工具所制造的某些屠杀事件比较起来也并不逊色”。杨柄认为，评价曹操主要应该根据曹操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因为曹操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全都是服务于战争的。在他看来，曹操进行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反人民的，内战是“封建阶级内部的争权争霸”，打黄巾更是“反革命”。至于打乌桓，情况比较复杂，但也不是正义的战争。所以他是“三国人民的第一号敌人”。

22 日　郑天挺在《文汇报》发表《关于曹操》。

作者认为:“今天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进行研究，立场、观点、方法都和过去的历史学家完全不同了，因此结论的本质自然也变了，新结论和过去不同的固然是翻案，新结论和过去相同的，由于本质上有了变化，又何尝不是翻案。”因此，“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来的结论，就可以算作是翻案，而不必管结论”。

是月　翦伯赞在《北京大学学报》第 2 期发表《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该文主要对“史学革命”的极端做法进行纠正。文章主要谈了四个方

面的问题：一是关于古与今的问题，认为不少人对厚今薄古的理解有偏差，把厚今薄古当作分量问题或先后问题。认为过多地削减古代史在通史中的比重，以及先教现代史，再教近代史，最后才教古代史的方法是不对的。二是关于历史必然性与个别历史人物的问题，作者指出，过分地强调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以至把他们说成是不受历史规律的支配，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可以为所欲为，这是唯心主义者的胡说。但是如果不承认个别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一定作用，乃至避免提到个别历史人物的名字，也是一种严重的片面性。全面地讲述历史，应该是在肯定历史必然性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原则下，承认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一定作用。因此在讲述历史时，就不必避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名字，包括帝王将相在内。三是关于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问题，作者认为，为了清除封建正统主义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避免讲述统治阶级的活动是不对的。阶级社会的历史总是有敌对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活动，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活动，阶级社会就由这敌对的两个阶级构成了阶级斗争的两个方面，去掉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全面地说明阶级斗争的内容。四是关于理论与资料问题，作者说，反对把史料当作史学的说法，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史料本身。不重视史料，或者企图不通过史料的分析来说明历史，是不对的。研究历史必须从实在的具体的史实出发，不能从空话出发。

该文同时在《红旗》第10期发表。

刘开扬《秦末农民战争史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郭沫若在《新建设》第4期发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答〈新建设〉编辑部问》，提出为众多历史人物翻案。

文章就历史研究的方向、打破王朝体系、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及史料、考据和历史学的关系等问题，一一作了论述。认为今天研究历史，应该打破封建王朝体系，但打破王朝体系，并不是要求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抹掉。要打破的是旧的历史观点、封建正统观点、专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地把王朝抹掉。如果立场、观点不对头，即使抹掉了王朝，也依然写不出为今日所需要的历史著作来。从新的历史观点出发，固然应该着重写劳动人民的活动，但以往的社会既是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活动也就不能不写。统治阶级的活动对当代的人民有利，对整个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利，就肯定它；相反的，就否定它。

关于史料、考据和历史学的关系，作者认为，考据工作是不可少的，但它毕竟是历史研究的初步阶段。没有史料固然不能研究历史，专搞史料

也决不能代替历史学。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用大量的史料来具体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史料虽不能代替历史学，但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对搜集、考察史料的工作，不能一概加以否定。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作者指出，如同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一样，应该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进行研究。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他们翻案。殷纣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如此。

该文同时刊登于 4 月 8 日《人民日报》。

李春棠、林顺曾、方早成在《史学月刊》第 4 期发表《陈寅恪教授和元白诗证史》。

文章批判陈寅恪作为资产阶级的权威学者，在历史研究中采用了厚古薄今的态度，反映的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其研究方法是烦琐主义的考证。

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谢成侠《中国养马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清代地震档案史料》由中华书局出版。

丁守和、殷叙彝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五四新文化运动》。

夏鼐在《考古》第 4 期发表《关于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在全国的逐步展开以及大量前所未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过去惯用的几种文化名称已经难以概括。正确进行新的文化区分和命名，便成为考古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该文对什么是考古学文化、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以及定名的条件和方法等问题，均给予明确回答。文章指出，考古学上的“文化”是指某一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观察的一群东西的总称，用以表示考古遗迹中（尤其是原始社会的遗迹中）所反映的共同体，通常以第一次发现典型遗迹的小地名来命名。这样命名是想用简单的名称来表示一种特定的含义，以便大家在共同使用时互相了解，不致产生误解。作者认为，确定新的“文化”名称需要具备三个条件：（1）必须

是有一群具有明确特征的类型品。这种类型品，经常地共同伴出，而不是孤独的一种东西。（2）这种共同伴出的类型品，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3）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至少有一处遗址或墓地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该文统一了我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尤其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布、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5月

3日　黎澍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五四运动》。

4日　《人民日报》刊登《从一个大迷梦里醒过来了——顾颉刚委员谈两年中思想的转变》。

此文是顾颉刚在政协三届第一次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主要谈了两年来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文章说，反右运动中，称我辈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示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两个范畴，并作严厉的批评，我看了起了反感，觉得政治思想固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别，至于客观性的科学知识则并不因人的阶级而有不同，何必一起加以否定。直到后来红与专的问题提了出来，才使我渐渐明白：一切学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科学研究者应当先红后专；只有红透专深，才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们再能不问政治，不接受改造吗？再能不服从党的领导吗？旧机器和废品尚且可以经过了修理和加工而返老还童，为什么我这个人和我的知识不能经过了改造而返老还童呢？我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只要坚决服从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只要加强改造自己，否定我过去的人生观，端正我的治学方法，并争取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提高我的理论水平，通过劳动实践，转变立场，我就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我就真的返老还童了。固然改造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但是我有决心接受，也有信心实现。

11日　木羽（杨翼骧）在《天津日报·学术专刊》发表《曹操打乌桓是反侵略吗?》。

文章针对史学界普遍认为曹操打乌桓是反侵略战争的观点，借助于丰富的史料和精辟的分析，证明了此论不能成立，有力地纠正了过分拔高曹操的倾向，在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22日　何兹全在《文汇报》发表《论曹操》。

是月　郭沫若著历史剧《蔡文姬》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序中作者声明："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

1958 年 3 月，郭沫若出席周恩来为欢迎杨勇、王平等人自朝鲜战场归来的宴会，席间郭沫若谈到历史上的曹操无论在文学还是政治方面都是有建树的，周恩来就说："那你写出戏为曹操翻案吧。" 1959 年 2 月 14 日，郭沫若致信周恩来，说："你让我写戏为曹操翻案，我写了，但不知写得如何，请你指教。"

在该书序言《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文中，作者明确地把我国农民战争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封建制度的上行阶段，即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唐末黄巢大起义，这一阶段里的农民战争"都不曾提出过土地问题"，"他们都是'取而代之'主义者，是学统治阶级的办法来打击统治者"。第二阶段是封建制度的下行阶段，即从北宋到清，这一阶段里的农民战争开始提出"均贫富"、"均田"等要求，而且有的一时还见诸实施，这在事实上是反映了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这一看法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容庚编著《金文编》校补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此次重印，除编者又加增订外，唐兰、于省吾、刘节、梁方仲、张政烺等多所参赞，内容经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校订。全书分正、续两篇，正编为殷、周金文，续篇为秦、汉金文。集采以彝器款识为主，兵器、镜鉴附后。共收金文一万八千余字，据历代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三千多器的铭文卷本或影印本临摹。内中确可肯定或编著者以为某家考释可从的，有 1894 字，依《说文解字》分部排列。有疑义或不可辨识的，有 1199 字，作为附录。

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对自己过去四十年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彻底否定，该书扉页上题有作者所作四首绝句，其中两首云：

奋笔当时信自由，根源一一细搜求。
不堪往事重回顾，四十年间作逆流。
马列道高北斗悬，淫词一扫散如烟。
明月不虑老将至，一悟昨非便少年。

红旗灿烂东风遒，禹域嘉名自古留。
赤县果然成赤县，神州真个是神州。
一日便如二十年，卫星直上九重天。
乘风无限飞腾意，急取轻装赶快先。

《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稿》载，是书出版后，作者曾寄呈康生，康生回信："承寄大作《四十年的回顾》，谢谢。接书后，重读了题词，粗阅了序言，觉文章甚茂，责己谨严，多引人入胜之感。"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汇集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至二十六年闰八月间，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的上谕、廷寄、奏章、电报等重要档案，计760余件。书中所录上谕与伪满影印的《德宗（光绪帝）实录》相比，不仅内容比《实录》多，而且将《实录》中窜改了的地方作了纠正并加以说明。所录反映了义和团的兴起和发展、清廷政策的对应和演变、列强干涉及出兵中国，以及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等多方面的史实，为研究义和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由中华书局于1990年8月出版。该书对《义和团档案史料》进行了补充和拓展，共辑录档案文件1600余件，以及近百件清代义和拳等民间会社的档案文件。

两书基本上公布出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全部官方文件。

吕振羽在《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哲学战线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为纪念"五四"四十周年而作》。

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是作者所撰中国古代经济史系列著作的第二部，系统地论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介绍了农业、手工业、货币、商业等方面的发展，阐明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趋向的主要特点。原稿作于1943年，曾油印供蓝田师院历史系同学参考。抗日战争结束后作者回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又搜集魏晋南北朝史料，进行改写补充，未能完成。50年代中期由彭雨新根据原稿及增补材料代为整理修改，并重撰第六章，隋唐部分系从原稿。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1958年由南开师生共同编辑而成，从《清实录》4363卷、《宣统政纪》70卷中选出有关农业、工业、经济、财政等原始材料，汇编而成。全书分12辑：总类、农业、畜牧、手工业、近代工业、交通、商业及高利贷、对外贸易（附外国资本的侵入）、财政、赋税、盐务、漕运。

韩国磐在《历史研究》第 5 期发表《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

党晴梵《先秦思想史论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6 月

10 日　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木棉的广泛种植和传入朝鲜》。

12 日　翦伯赞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谈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结合问题》。

该文为《北大史学集刊》创刊而作，重点谈了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历史研究的新成果加入历史学的讲稿之中，要想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是办不到的。如果不进行科学研究而只是用修改讲稿乃至重编讲稿的办法来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是徒劳而无功的。这种办法只能把原有的内容加以新的编排而已，并不能增加什么东西。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有计划地开展科学研究。

16 日　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海瑞骂皇帝》。

1959 年初，毛泽东在上海观看湘剧《生死牌》，戏中出现了海瑞。毛泽东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1959 年 4 月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海瑞的精神。其后，在胡乔木的邀约下，吴晗发表了这篇《海瑞骂皇帝》，文中歌颂了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此后，吴晗又连续发表了《海瑞的故事》（《新观察》1959 年 7 月）、《论海瑞》（《人民日报》1959 年 9 月 21 日）、《海瑞》（《新建设》1960 年第 10、11 期合刊），并在 1961 年 1 月发表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继续对海瑞赞扬和歌颂。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北京京剧团上演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是月　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 1949 年后第一部系统研究两汉与西域关系的专著，内容涉及两汉统一西域的经过和西域都护的设置以及西域各国的概况，以及两汉时期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状况。书中还用大量资料考述了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用不容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自西汉中叶设置西域都护以后，今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就归入了中国版图。该书的出版对我国西北史地研究有重要贡献，在国内外史学界包括当时的苏联史学界曾引

起很大反响。

郭沫若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使一度因1957年反右派、1958年“史学革命”而沉寂的古史分期讨论再度活跃。

文章探讨了中国奴隶社会的特征以及古史分期问题，进一步论证战国封建说的合理性。

同期还刊登了王毓铨《明代军屯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其特点》。

杨筠如《尚书核诂》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车载《论老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老子思想研究论文集，包括《老子书谈道和德》、《老子书谈常》、《老子书谈反和弱》、《论老子书的道法自然》、《论老子的道与物》、《论老子书的观妙与观徼》等，对老子的辩证思想多有阐发。

孙常叙《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泰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始发掘。

山东省文管处、济南市博物馆合作，杨子范主持，在大汶口附近宁阳县堡头村发掘了130多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红、灰、黑、白和绘有彩色花纹的各类陶器一千多件，还有大量精致的石器、骨器、玉器和象牙器等，代表着一种前所未知的新的文化类型，被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它是龙山文化的前身，主要分布于山东及苏北一带。它的发现，使得黄河下游的原始文化由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向上推进了两千多年。

发掘报告《大汶口》197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白寿彝在《红旗》第11期发表《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

该文主要与翦伯赞《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进行商榷和补充。文章认为，古为今用，首先是要阐明社会发展规律。能不能全面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是无产阶级史学和剥削阶级史学的根本分歧点。反动文人也何尝不要古为今用。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是要古的糟粕、古的假象以及他们对古的编造，为他们的今——反动阶级的利益——辩护，给自己的反动面貌搽粉。作者认为，应该把历史人物的作用包含在历史发展规律中来考虑，不应该把它们看作是对立的东西。翦伯赞说“不能只讲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要讲唯心主义的思想家”，讲异端的思想也要讲统治阶级的思想。但应该注意，在历史教学中，还不是不讲唯心主义思想家的问题，而是对唯心主义思想家讲的不少，讲唯物主义思想家还不是真多。

7月

1日　吴晗在《历史教学》第7期发表《从曹操问题的讨论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该文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要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而不要凭自己的爱憎，美化古人或丑化古人。应当把今天和历史上的昨天前天有所区别，但是又应该把它联系起来，历史的发展不能切断。不这样看，就会把祖宗的脸完全给抹黑了。有人认为打破王朝体系就是把王朝和封建统治者都从历史上抹掉，这样做就不对了。

2日　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后期进行对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并由此开展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

17日　翦伯赞在《光明日报》发表《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

文章认为，整理古典文献和厚今薄古的方针没有矛盾，要反对那种认为凡古皆好而否认正当批判的右的复古主义，也反对那种认为提倡厚今薄古就可以对历史遗产、文化遗产问题采取粗暴的态度，甚至否认对于文化的继承的“左”的幼稚病。在整个学术文化领域中应该有一部分人可以着重从事资料的搜集，文献的整理，工具的准备，外国著作和古代著作的翻译，名物的考据，版本的校勘等等。整理古典文献不是一种没有思想性的纯技术工作，它的任务不仅是标点断句、拾遗补阙，还有校勘、注释、辑佚、序跋等工作，在这些工作中都可以加进整理者的思想意识和观点。对于这些工作，不但用得着马克思主义，而且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原则。真正的古典文献整理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研究工作。

20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范文澜任主任委员。

政协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是在周恩来倡导下开展起来的。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在招待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会茶话会上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更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个方面记载下来，他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并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工作组时，其中要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即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也相继成立文史资料工作机构。

1988年4月，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改称文史资料委员会。

是月　陈伯达在《红旗》第13期发表《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

此文意在进行自我纠偏。陈对前一年3月10日的讲话作了自我批评，说："有人对厚今薄古这个提法作了错误的理解，在思想上有点混乱。例如，有人曾经认为提倡厚今薄古，就可以对历史遗产、文化遗产采取粗暴的态度，这就完全不符合我们原来的意思了。"

宁可编写《黄巢起义》由中华书局出版。

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作者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上古史的讲义整理而成。作者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先秦史有关问题，阐述了自"中国猿人"至秦统一这一漫长的中国上古历史发展演进的基本过程，包括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初期封建制度的发生、发展和转变等，尤其是在商代王位继承、西周土地制度及春秋华夷关系等问题上多有创见，为研究中国上古史的重要著作。

刘节在《理论与实践》第7期发表《自我批判和答辩》。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居延汉简甲编》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930年4月西北科学考查团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尔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所发现的汉代木简一万余枚被掠往美国。劳榦曾著有释文和考证，并将原简照片一同发表。中科院考古所依据这些材料收集到部分居延汉简照片，计约2000余条，并写成释文刊行。全书共分六部分：（一）图录正编和附录，（二）额尔济纳河流域图，（三）释文，（四）有关简牍参考书目，（五）本编简册索引，（六）编辑后记、补记。图录正编共有图版183面，2555条，附录有图版7面，41条。释文除《永元兵器簿》据马衡释文外，其他多依劳榦释文，并依据照片将其中错字、漏字、错号等一一改正。索引系按原简号排比，注明发现地点，以便检录。

韩儒林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

四川省博物馆发掘巫山县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大溪文化"。

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县开始发掘汉代古墓，发现大量汉代木简。

在武威磨嘴子6号墓发现了469枚《仪礼》木简以及11枚日忌木简。

《仪礼》简是当时所见《仪礼》一书的最古写本，是经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在版本校勘上有较高的价值。

1959 年，武威磨嘴子 18 号汉墓又出土王杖诏令简，计木简 10 枚，史学界称之为“王杖十简”。录有西汉本始二年（公元前 72 年）和建始二年（公元前 31 年）诏令。出土时简次已乱，对 10 简的排列顺序曾有争议。1981 年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又征集王杖诏令简 26 枚，据说亦出土于磨嘴子汉墓，简次顺序明确，内容包括建始元年（据“王杖十简”，或为建始二年之误）、元延三年（公元前 10 年）关于高年授王杖及关于汝南郡王安世等坐殴辱王杖主弃市的诏令。上述诏令涉及对高年鳏寡残疾人的优抚，是研究汉代养老制度的重要资料。

1960 年，在陈梦家主持下，对这些汉简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撰写叙论、释文和校记三篇，编为《武威汉简》，1964 年出版。

1972 年武威旱滩坡汉墓又出土医药简牍，内容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这些医药简牍是研究中国古代医学，特别是汉代医药学的重要资料。

徐旭生率工作队奔赴豫西地区开展“夏墟”探查工作，揭开以田野考古为主探索夏文化的序幕。

徐氏根据传世文献中有关夏墟的记载进行了这次实地考察，先后调查了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等遗址。调查结束后，徐氏写出《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发表在 1959 年第 11 期《考古》杂志上。根据徐的“夏墟”调查结果，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工作队，于是年秋季对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了试掘工作。1960 年以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对偃师二里头遗址又进行了长时期、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8 月

1 日　吴晗在《新观察》第 15 期发表《关于历史知识的普及问题》。

10 日　尚钺在《光明日报》发表《踏实钻研与坚持真理》，招致大规模政治批判，成为史学界“修正主义”的典型。

作者认为：“为了使我们的工作进行得更好些，对于如何进行学术批评和学术论争，态度和方式，都有进行研究的必要。现在我国历史科学领域，是否还有两条道路斗争的残余存在，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与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斗争残余呢？我想，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还有这种斗

争残余存在，仅仅是学术问题的争论，那只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非有长期冷静的钻研，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批评与论辩，是不能彻底消除的。”这一观点显然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的“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的论断相抵触，更与“反右”和“史学革命”以来对史学界强调阶级斗争的大环境相冲突，于是此论一出，当即受到猛烈批判，被扣上宣传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调和论的帽子。

使尚钺深陷祸端的还包括另外两篇文章，即分别于10月1日和11月1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发扬学术民主》及《中国史学工作应如何跃进?》两文。在《中国史学工作应如何跃进?》一文中，尚钺提出：“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科学建立的过程中，而且在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阐明中国历史时，将来还必然有许多‘新冒出来’的问题，如近年来史学界提出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及中国民族形成问题之类。这是需要史学界以最大的关怀、宽容来考虑和帮助的。这些新冒出来的问题，可能与旧的传统史学体系不尽符合，但却是有助于更完满、更全面地阐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时所必须予以考虑和解决的。”

尚钺几篇文章的发表，主要是针对反右以及“史学革命”中史学界愈演愈烈的粗暴批判的学风，也带有为自己1956年以来所受批评辩护的目的。

是月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9月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译《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探寻清代山东各地农民分化的基本倾向和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的专著。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山东三个经营地主的典型调查材料，对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作了分析。作者认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体属于我国资本主义萌芽范畴，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国当时已经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形成时期。

该书是1949年后最早翻译到海外的历史学专著。“文革”期间，该书由英国伦敦大学威尔金森译为英文，并于1978年列入哈佛大学费正清主编的东亚研究丛书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发行。

张家驹《黄道婆和上海棉纺织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邦怀《殷代社会史料征存》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殷墟卜辞为根据，并结合古代典籍对殷代社会及制度进行了考证。书分二卷，卷上5目，卷下66目。每目专论一个问题，长短不一，最长者二千余字，短则百余字。编排上大体先集列相关卜辞后，或进行材料的辨析，或讨论各家之说，然后再进行简短总结。作者在自序中对书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如卜辞里关于殷代防御水灾、工业、教育、刑狱、军制、马政、宫室宗庙的记载等进行了综述。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中译本开始出版。

该书由苏联科学院召集众多科研单位编纂而成，目的在于出版一部与西方史学通史体系迥然不同的新的世界通史。中译本共13卷，第1—8卷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第9—10卷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1—13卷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至1990年出齐。

该书建立了全新的史学体系，贯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编纂理念。在历史分期上，该书采用了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四分法”，以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作为分期标准，特别突出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在这种转变中的作用。

中译本出版后，对中国史学尤其是世界史研究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被中国史学家作为“苏联体系”的范本来指导历史研究和教学。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很多模式都与这本书的示范效应有关。1962年，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4卷本）就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该书的一个缩写本。该书的影响延续到改革开放后，这一时期出版的二十多种世界史教材，仍难摆脱该书的影响，在章目编排次序、体系格式、标题上仍然与该书如出一辙。

论者认为，该书的出版，强化了中国史学界业已存在的公式化、简单化与教条主义倾向。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隋唐断代史研究篇幅最大的著作，凡22章，约102.8万字，是作者继《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之后第四部断代史。同前三部断代史一样，也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是政治史，按照历史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分门别类进行叙述。该书特别重视

对社会生活的记载，举凡婚姻、族制、风俗、饮食、服饰等等皆录其中，包罗万象、巨细靡遗。在史料的搜集排比上，作者也下了大功夫，主要史料来源皆注有出处，有的还有注释和考订，尤其是下册，原来各种制度的史料十分分散，经作者搜集、排比、考订后井然有序。中华书局编辑为该书写了出版说明，对作者在这部书中的指导思想和编纂方法进行了着重分析。

顾颉刚校点本《史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为标点本二十四史第一本。

陈直《汉书新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汉书》史料的考订之作，也是奠定作者学术地位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书中仿《三国志》裴松之注的体例，“以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大量使用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汉铜器、漆器、陶器，以及封泥、汉印、货币、石刻等文物资料。全书考订条目达两千多条，其中百分之八十取证于出土资料。新材料的运用使许多千古聚讼的问题得有定谳，使作者在确定《百官公卿表》未载之官名，考证州郡县属吏名称，考证地理名称之误字，考证姓氏，订正人名，印证宫殿名称，确定汉代物价，疏证典制，揭示《汉书》古字奥秘，考订避讳义例，考证习俗语，考证军事设置，考订颜师古注文错误等方面，皆言前人所未言，对推进题无剩义的《汉书》研究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为秦汉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1959年，作者受中华书局委托，主持《汉书》的点校工作，又写成《续证》两卷。于1960年10月，合并两编，汇为一书。此后一再续补，1979年又出增订版，内容扩充两倍多。

杨宽在《学术月刊》第9期发表《论〈太平经〉》。

作者认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常常“不得不利用宗教作为他们宣传活动和组织的方式，同时他们的理论也不得不穿上宗教的外衣”。

该文发表后，引起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讨论。

吕振羽在《新建设》第9期发表《论两周社会形势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关于中国社会完成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问题的探讨》。

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黄盛璋、任美锷编著《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出版。

全书约 18 万字，选释《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四种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意义的地理名著。书中对所选著作的基本内容、作者及其在地理学上的价值作了简明介绍，方便读者对全书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并对这些著作选段中有关地理知识进行了注释。注释重在地理内容的阐发上，同时利用地图弥补文字说明的不足。

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

郭沫若作《影印〈永乐大典〉序》。1986 年，中华书局又将其后查访到的《永乐大典》加上是书共七百九十七卷印刷出版，为目前收集最全的《永乐大典》影印本。

（日）加滕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 1 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共 3 卷，第 2 卷于 1963 年出版，第 3 卷于 1973 年出版。

胡厚宣在《历史研究》第 9 期发表《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

第 10 期连载。该文对卜辞中有关上帝的内容作了系统而又全面的解说。在融合前人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作者依托众多新材料，明确提出了"上帝是商人至上神"的观点，广为学界接受。后这一观点遭受质疑，如 1990 年晁福林在《论殷代神权》一文中认为在殷代尚未出现至高无上的王权，天上也未出现至高无上的神。1993 年朱凤瀚在《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一文中，亦根据卜辞资料与宗教学理论提出上帝虽在商人神灵系统中地位崇高，但并未与祖先神、自然神形成明确的上下统属关系，故并非至上神。

徐兆奎编著《清代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 月

2 日　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建成，开始对外预展。

29 日　邓广铭、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在《光明日报》发表《十年来的中国史研究概述》。

文章认为："正像哲学社会科学其他部门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十年来的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巨大辉煌的成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使史学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方向；二、遵循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方针；三、进行了关于各族人民的研究；四、注意到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新途径。

是月　刘大年在《历史研究》第10期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文中第一个问题谈中国近代史始于何时，实际上是再次针对尚钺的观点进行辩驳。作者再次强调"从鸦片战争揭幕的时代是一个完全新的时代"，"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第二个问题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作者反对郭毅生太平天国是"市民运动"的观点，坚持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战争。第三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作者基本同意胡绳的观点，认为分期标志不外乎三个方面：一、基本上从阶级斗争表现来划分，二、从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来划分，三、从外国侵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来划分。这三者应当是统一的，不是互相排斥的或彼此平列的三种东西。它们的实质"都是阶级斗争"。因此，"只有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做为划分时期的标志，才能最可靠地区别出中国近代史的各个不同阶段"。依照这个标准，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农民战争时期，即从鸦片战争至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第二个时期是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并行时期，即从1864年至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第三个时期是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失败时期，即从1901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同期还发表了侯外庐《十六世纪中国的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金景芳《奴隶社会的阶级机构》等文。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了纪念梁思永而编，汇集了梁氏对蒙满草原细石器文化以及对仰韶龙山殷代文化关系研究的成果。共收梁氏遗文八篇（含附录一篇），梁氏平生所著，除"城子崖"报告中的几章以外，基本上都收编在内。篇目包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原文为英文）、《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原文为英文）、《昂昂溪史前遗址》、《小屯龙山与仰韶》、《后冈发掘小记》、《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附录一篇为《殷墟发掘展览目录》。书前有尹达《悼念梁思永先生》及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对梁思永的考古学贡献、学术思想所受的影响与局限，以及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或意见进行了分析评价。

马汝珩、李文海在《教学与研究》第10期发表《十年来我国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巨大胜利》。

牟安世《太平天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1 月

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由三联书店出版。

收录作者从 20 世纪 30 至 50 年代所撰写的九篇代表性文章，主要是关于 30 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以及 50 年代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的研究。包括《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等，其中多数产生过重要影响。

巫宝三、冯泽、吴朝林选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资料书。

罗常培、蔡美彪编《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一部八思巴字对译汉语资料汇编。正文由两部分构成：绪论部分叙述古代蒙古文字的发展史、八思巴字的创制经过和推行、使用情况，并对现存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文物做出概括介绍。资料部分整理了陆续搜集的八思巴字对译汉音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作了考订和说明。该书对蒙古族历史、语言、文字和汉语史的研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由明清史研究的单篇文章汇编而成，由孟氏门人商鸿逵整理并作序，大部分曾刊布于报章并收入《心史丛刊》和《三大疑案考实》，内容分为两部分，一为历史事实之论述，二为文献资料之考订，并将著成但未收入之文章列标题作为附目列于书末。所收文章包括《八旗制度考实》、《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科场案》、《字贯案》、《三朝辽事实录评》、《选刻四库全书评议》等。

1986 年 1 月，中华书局出版《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也由商鸿逵整理并书写前言，并附其所撰《述孟森先生》于书末。

秦佩珩《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讨论有关明朝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城市经济问题的论文十

二篇，包括《明代城市经济论略》、《明代户口问题的研究》、《明代互市开置小史》、《明代手工业问题的考察》、《明代制酒述要》、《明代陶瓷业的发展及其世界影响》、《明代的制茶业及其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试述明代财政问题兼论一条鞭法》、《明代朝贡贸易初探》、《明代物价辑录》、《关于明代的矿业及其他》、《明代云南肥币考释》。该书对明代经济史的研究是从地方志与《明实录》着手的，因此文中征引材料非常丰富，也吸收了国内外史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一些头绪繁多的问题诸如市场、米价、银价、贡品贡期、人口等则用表格来说明。

汤志钧在《历史研究》第11期发表《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

文章对康有为《大同书》作了较低评价，认为《大同书》反对革命的飞跃，主张循序渐进，这就在理论上否定民主革命，暴露了他的改良主义面目。《大同书》虽描绘出一个“大同”图景，但其现实目的，却是宣传中国必须“小康”——君主立宪。这样，《大同书》就成为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主张君主立宪、保皇复辟的理论根据。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较大争论。

同期还发表了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等文。

12月

1日　吴晗在《历史教学》第12期发表《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提出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当时当地”标准。

作者对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第一，评价历史人物，应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他的作为对当时当地人民是好是坏，对生产起促进还是起破坏作用，对文化艺术是起提高还是摧毁作用。不能拿要求现代的人的标准来衡量古人，那样就没有一个人会及格了，这样做，是非历史主义的。第二，要区别史料。凡是在当时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物和事件在当时及以后都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见，要看说话的是什么人，什么立场。第三，阶级出身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条件。一个地主官僚阶级出身的人可能成为坏人，但不一定都是坏人，决不能为这些历史人物的阶级出身而片面否定他们的历史成就。第四，评论人物应从政治措施及作用来衡量，而不应单纯从私人生活出发。第五，不能拿今天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评价历史人物应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而不能拿今时今地的道德标准去评价彼时彼地的历史人物。第六，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第七，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第八，评价历史人物还应从整个历史发展

出发。从当时当地，也要从整个历史，几千年来多民族共同大家庭的历史来衡量。

是月　贺昌群在《历史研究》第 12 期发表《秦汉间个体小农的形成和发展》。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为大型目录书。第二册 1961 年 7 月出版，第三册 1962 年 12 月出版。

收录北京图书馆等全国 41 个主要图书馆所藏丛书 2797 种（不包括“新学”和“佛学”），子目书名 7 万余条，包括古籍 38891 种。第一册《总目分类目录》，分为汇编和类编两部分。汇编又分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五类；类编分为经、史、子、集四类。书后附《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丛书书名索引》。第一册介绍《中国丛书综录》收录哪些丛书，每部丛书有哪些古籍，图书馆收藏情况等问题。第二册《子目分类目录》，根据所收丛书包括的古籍，按四部分类法编排起来的子目分类目录，可解决按子目类别查找古籍及其所属丛书的问题。第三册为《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分别按四角号码编排。书后附有《索引字头笔画检字》和《索引字头拼音检字》。第三册专供检索第二册丛书子目使用。

此书收录古代丛书丰富，是各种丛书目录之集大成之作。但是收录丛书不够完备，仍有讹误之处。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印《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丛书目录初稿》补未收丛书 130 种，可供参考使用。

伍丹戈编著《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由中华书局出版。

陶鸿庆《读诸子札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是 1949 年后第一部历史气候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秦汉时期气候研究专著。书中从冷暖和干湿两大气候要素的变动方面对秦汉时黄河中下游的气候进行了探析。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著《中国农学史》（上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谢承仁、宁可《戚继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编《中国大同思想资料》由中华书局出版。

《三国志》整理标点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是年

谭其骧创办国内第一个历史地理研究专业机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任主任。

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献》开始陆续出版。

由罗尔纲指导整理，包括《太平天国艺术》（1959年出版）、《太平天国印书》（1961年出版）、《太平天国文书》（1991年出版）、《太平天国文物》（1992年出版）四大集，被称为国内外整理太平天国文献最全面、最完整、最权威的集大成者。

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成立世界史组。

该组由张椿年、程西筠、陈启能等一批从苏联学习归来的留学生组成。年底，时任学部副主任的刘导生召见程西筠和张椿年，指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了解世界。毛主席指示要成立一个世界历史研究所，开展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帮助人民和干部去认识世界。世界历史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筹建世界历史研究所。1962年，根据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指示，世界史组扩建为世界历史研究室，并任命学部委员、时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的陈翰笙兼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室受学部直接领导。

1960 年

※ 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一、二、三所重组。
※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出版。
※ 朱希祖《汲冢书考》出版。
※ 义和团 6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
※ 黎澍接替尹达任《历史研究》主编。

1 月

6 日　邓之诚逝世，终年 73 岁。

26 日　《人民日报》发表黎澍《百家争鸣和思想斗争》，拉开批判尚钺的序幕。

文章批判了前一年尚钺发表的《踏实钻研与坚持真理》，指责尚钺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私人科学的制造者。此后，大规模批判尚钺“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史学体系”运动开始。尚钺被当成史学界错误倾向的代表人物，被定为全国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批判的矛头主要集中在他的“魏晋封建说”。

是月　《曹操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汇集了 1959 年史学界有关曹操历史评价问题讨论中影响较大的文章。书末附有报刊论文目录（1959 年 1 月—1959 年 7 月）。

吴泽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 1 期发表《关于奴隶制的下限和封建制形成的标志问题》。

吴泽、谢天佑在《学术月刊》第 1 期发表《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译《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所收为选译自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刊登的讨论俄国农民战争问题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阐释了俄国农民战争的特点，描述了俄国历次农民运动发展的趋势，总结了农民战争对俄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所起的深远影响，探讨了俄国农民战争的起讫年限、它的参加者的社会成分和各阶级阶层在这次农民战争中的作用和意义以及有关的具体军事活动。

该书的出版对我国史学界讨论农民战争问题产生了一定影响。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部发行。

2 月

2 日　李文海在《光明日报》发表《坚持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批判尚钺同志〈踏实钻研与坚持真理〉一文的修正主义观点》。

3 日　李光灿在《光明日报》发表《反对从资产阶级观点理解“百家争鸣”——批判尚钺同志〈踏实钻研与坚持真理〉一文中的错误观点》。

4 日　华山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我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一些意见》。

该文将封建土地所有制讨论中“土地国有制”和“土地私有制”两种观点折中，认为春秋以前是土地国有制，土地不能买卖。商鞅变法后“废井田，民得买卖”，标志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兴起，而完整的国有制从此遭到破坏。国有制和地主私有制之间尽管经常发生斗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国有制还曾占据过支配地位，但自唐中叶均田制破坏之后，土地买卖再没有限制，私有制占了主导地位。

黎澍在《人民日报》发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私人科学?》，再次对尚钺的史学观点进行批判。

黎文说：“尚钺同志自认为是独创的‘魏晋封建论’就是当时的‘食货派’头子后来的汉奸陶希圣的得意之作。”“至于明代乃至宋代资本主义萌芽论，陶希圣也有版权。……所有这些谬论都是为了淆乱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以此反对党的革命路线。这些谬论在当时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受到了中国革命实践的有力的驳斥，到 1939 年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表以后就完全破产了。”

黎文实质上是对尚钺进行政治批判。

该文还刊登在本年度《历史研究》第 1、2 期合刊上。

18 日　漆侠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中国农民战争性质问题》。

本文主要对孙祚民等农民战争不反封建制度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爆发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自始至终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无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爆发在封建社会前期或后期，上行阶段或下行阶段，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无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提出或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也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无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打击的矛头指向皇帝、贵族、地主等个别的人，或指向封建国家、封建制度的某些环节，也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

26 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并为中国历史研究所，郭沫若兼任所长，尹达、侯外庐、熊德基任副所长，免去陈垣兼任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职务。原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仍任所长。

是月　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辑《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选编了 1956 年 10 月至 1959 年 7 月之间发表的 20 篇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文。书末附有最近三年来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著目录。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团结跃进大会。

主持人潘梓年说，今后应当重视资料工作，不把资料工作者视为低一等的人。

吴恩裕在《新建设》第 2 期发表《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

作者依据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利用考古资料，结合古史传说，论述了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文中详细论证了“夏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黑陶文化”，认为夏人的主要生产工具是石器，夏代以家庭集体劳动的个体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部门，夏代还有畜牧业和渔猎业，个体经济与交换的发展使夏代的私有制不断壮大，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原始公社制逐渐解体，奴隶占有制日渐形成。但是夏人仍处于石器时代，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他们仍徘徊于国家的门槛之外。文献所传禹传位给启的世袭制的确立，不是国家产生的标志。文献记载不能说明夏代已经“按地域划分国民”和“驾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已经产生。而生产力较夏人进步的

商人在灭夏前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有了发达的个体农业经济。汤伐夏前已是部落联盟首长了。他领导的伐夏战争把战俘变为奴隶，奴隶数量的大增使奴隶、奴隶主两大对立阶级形成。阶级矛盾的发展促使“和大众分离的社会强制力”产生。灭夏后，商人是按地域而非氏族来统治国民。商汤建立的国家是奴隶占有制国家，巫、卜、尹这些僧侣阶层辅佐商王进行神权统治。

胡如雷在《新建设》第2期发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提出地主所有制是主要形式说。

文章认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由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地主所有制构成，后者居支配地位，前者是后者的补充形态。证明地主所有制存在的是地租。

同期还刊登了贺昌群的《关于封建土地国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

南开大学历史系在《历史研究》第1、2期合刊上发表《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

该文实由郑天挺所作。文章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以国有制为主，“地主只是土地的占有者，耕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则是土地的租佃者，国家才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

同期还发表了杜德风《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几个问题》、华山《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等文。

3月

3日　吴示模在《光明日报》发表《农民阶级是否没有推翻封建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要求——兼与孙祚民先生商榷》。

该文对农民阶级在主观上没有推翻封建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要求的观点以及孙祚民提出的农民革命根本就没有同封建制度进行战斗的观点进行反驳。作者认为，农民阶级不能推翻封建制度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与农民阶级要求推翻封建制度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两回事。它是由两种历史原因所决定的。前者是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使其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后者则是因为，农民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封建制度给他们带来了重大灾难，这就使他们不能不要求推翻封建制度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孙祚民在同年8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中国农民战争打击封建制度的问题——兼答吴示模先生》，为自己辩护。

31日　高敏在《光明日报》发表《我国封建社会没有土地私有

制吗?》。

作者认为，在均田制严格执行的时期，封建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地位。但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商品经济的发展，高利贷的盛行，土地买卖日益盛行，土地私有权的法权观念日益加强，这样，地主土地所有制就完全确立了它的地位。

是月　徐旭生在《新建设》第 3 期发表《略谈研究夏文化的问题》，对探索研究夏文化提出指导性意见。

朱东润《陆游传》由中华书局出版。

张晓晨编写《扁鹊华佗孙思邈》由中华书局出版。

岑仲勉《唐史余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是书成稿于 1944 年，为考据唐史之作。全书四卷 242 条。卷一至卷三按庙号排列，高祖 7 条、太宗 18 条、高宗 15 条、武后 13 条、中宗 4 条、睿宗 4 条、玄宗 38 条、肃宗 2 条、代宗 5 条、德宗 17 条、宪宗 21 条、穆宗 9 条、敬宗 1 条、文宗 12 条、武宗 6 条、宣宗 8 条、懿宗 4 条、僖宗 5 条、昭宗 7 条。卷四为杂述，46 条。

该书研究的范围，除“正史”外，还包括杂史、金石诗文以及近代新发现的各种史料，作者对它们作了互相印证和切实的考订。书中考史，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据“别史”以补“正史”，二、据“正史”以考证“别史”，三、据唐史以考制度，四、据唐史以考证它书之误。

杜国庠《便桥集——哲学论文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作者 20 年来发表的有关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问题研究论文 16 篇。包括《论“理学”的终结》、《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玄学不是人生的道路》等，后两篇文章对冯友兰“新原道”进行了批评。

翦伯赞在《历史研究》第 3 期发表《“新冒出来”的史学体系还是“旧的传统史学体系”的翻版》，标志着史学界对尚钺的批判进一步升温。

翦文认为，尚钺“所说的‘新冒出来’的史学体系是指他自己创立的史学体系”，他“所说的‘旧的传统史学体系’就是指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体系，而这种史学体系在尚钺同志看来，却不代表真理，至多只能是‘被暂时认为真理’”。因此，“应该严肃地指出，尚钺同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或阶级斗争调和论已经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滚进了修正主义的泥坑，然而他还不觉得他已经走到了一个不干净

的地方，还要站在这个不干净的地方大放厥词”。

同期还刊登了钱宝琮的《从春秋到明末的历法沿革》。

4月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第一卷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共三卷五册，迄1977年出齐。所选材料来源于1901至1911年间出版的期刊，兼收当时出版的影响较大的革命书籍，广泛反映了这个时期里各派别的政治、道德、文化、哲学观点。第一卷自1901到1904年；第二卷自1905到1907年；第三卷自1908到1911年。每卷卷首有介绍该卷内容的序言，卷末有书刊简介。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

作者根据甲骨文、金文所见，参讨古代典籍，旁及诸家解说，论述了商周两代主要是商代史料中的一些问题。全书依时代顺序列举了12个专题，计为殷虚考古之鸟瞰、洹、滳与商墟、盘庚迁殷以前商族踪迹之追寻、盘庚迁蒙泽武丁始居小屯、神话时代商人生活之推测、传说时代的王号与传统、武丁之武功、武丁的内治、武丁以后的诸王积年、孝巳康丁之间世系补证及其大事、武乙死于河渭之间。

作者生前未及定稿，故文字及资料征引中有缺漏之处，有些看法待斟酌。

朱希祖《汲冢书考》由中华书局出版。

书成于20世纪30年代末，为作者晚年之巨著。包括五篇对汲冢书有关问题的考证。《汲冢书来历考》确认得书在咸宁五年（279年）；盗姓“不”系“平”之省文；谓冢主为襄王或安釐王皆属武断。所附《魏哀王魏令王考》、《周赧王周隐王考》，考订了《史记·魏世家》“魏哀王”是“魏襄王”之误，《周本纪》“周赧王”和《纪年》“周隐王”都不是谥法上所用的名称，此外还讨论了古代竹简素丝编的书籍制度。《文字考》辨证了“小篆”、“科斗文”、“古文”之异同，认为《诏定古文官书》为晋卫恒所写。《篇目考》详考了汲冢书十六部七十五卷的内容，指出《纪年》有和峤初写本与束皙改定本之别，《穆天子传》有荀勖本和束皙本之别，驳正了《竹书纪年》和《周书》是伪书的说法。《校理年月考》把汲冢书的编校写定分为三期：第一期（281—287、288年）以荀勖、和峤为

主，第二期（290 年）以卫恒为主，第三期（296—300 年）以束皙为主，并详述各期工作的进展和成绩。《校理人物考》分别考证了整理编校汲冢书诸人物的事迹及其对汲冢书的贡献。

安志敏主持发掘安阳小南海洞穴遗址，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小型石器为特征的文化遗存。

刘观民主持发掘赤峰夏家店遗址，将发现的时代和文化性质都不相同的两种青铜文化区分为相当于夏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相当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印《尚钺批判》(第 1 辑)。

内部发行，收入 9 篇批判尚钺的论文，并附录尚钺文章 6 篇和讲话记录 1 篇。编辑说明中说："尚钺同志的这些文章中，突出的观点是：否定当前历史科学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否定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在学术领域内应该长期并存，'共同提高'；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外衣下，恶毒地反对党对历史学科地领导，反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中国历史地一些基本论点称为'旧的传统史学体系'"。

该书收录的文章有《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范文澜)、《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刘大年)、《中国近代起始于何时?》(黎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刘大年)、《百家争鸣和思想斗争》(黎澍)、《坚持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李文海)、《反对从资产阶级观点理解"百家争鸣"》(李光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私人科学?》(黎澍)、《"新冒出来"的史学体系还是"旧的传统史学体系"的翻版》(翦伯赞)。书后收尚钺的几篇文章以为附录，包括《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序言、《与刘大年同志谈学术批评》、《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二三事》、《踏实钻研与坚持真理》、《发扬学术民主》、《中国史学工作应如何跃进?》《关于研究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讲话记录）等。

韩连琪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春秋战国时代的农村公社》。

本文阐述了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和破坏，着重论述了春秋战国时代作为村公社的书社制度。

俞旦初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为在历史科学中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政策而斗争》，对尚钺进行批判。

同期还发表了师东明《高举列宁主义旗帜，保卫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

5月

26日　谢本书在《光明日报》发表《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是月　佟柱臣在《考古》第5期发表《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历史的几个特征》。

作者认为，“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生产呈现出地域特征。黄河中下游是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长城以北草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狩猎经济保持了相当的持续性，以后才出现了畜牧业”，及至细石器文化晚期才出现辅助性农业；长江流域稻谷种植较普遍，渔猎经济占很大比重。另外，原始社会晚期各地文化发展表现出连续性和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当黄河中下游地区已进入夏商奴隶社会时，其周围诸部落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甚至有的地方直到1949年前仍处于原始公社制解体阶段。同时，各地氏族文化的不断影响和融合构成了我国原始社会晚期历史的另一个特征。作为华夏族前身文化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及进入夏、商、西周奴隶制的中原文化对其周边原始氏族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且这种影响要大于周边原始文化对它的影响。作者认为一文化共同体在空间上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融合的过程，融合的过程也表现在文化共同体在数量上由多到少的变化。

郭沫若在《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四幕历史剧《武则天》。

作品“根据尽可能占有的史料和心理分析”，塑造了一个开明的女政治家形象，为武则天翻了案。此剧完成后，作者又陆续写成《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关于武则天的两个问题》等文章。1962年7月8日，作者在《光明日报》发表《我怎样写〈武则天〉》，主张勿受旧史观的束缚，对“一切受了委曲”的人物包括帝王重新评价，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

1962年9月，该剧单行本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韩国磐在《新建设》第5期发表《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几点意见》。

6月

吴晗《灯下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收辑了36篇文章，多数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内容丰富，所谈涉及商业、农业、战争、戏剧、服装、学习、烟草、称呼、阶级斗争、资本主义萌芽、统治阶级内部矛

盾、历史人物评价等等，多是知识性小品文，利于读者接受，但并没有因此减少这些文章的学术含量。

贾兰坡主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掘山西芮城县匼河一带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7月

胡如雷在《史学月刊》第7期发表《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

该文较早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唐宋变革论”，在国内外影响巨大。

《史学月刊》第7期发表一组专题讨论历史主义问题的论文。

包括刘尧庭的《必须批判地对待历史遗产》、李国俊的《主要地是引导人民向前看》、任重的《坚持历史主义 反对客观主义》、权海川的《评价历史人物必须从今天出发和用“六条标准”作尺度》。这是1949年后史学界最早组织的历史主义问题讨论。

谢国桢编著《明清笔记谈丛》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介绍了明清笔记及有关明清其他史料，是作者数十年间于明清史籍收集、整理的成果。全书分两部分，《明清笔记谈丛》是该书的主体。另一部分是对明清史料及有关作者的考据、研究，共有10篇。

《明清笔记谈丛》为48种明清笔记做出提要，详细地介绍了它们的成书年代、作者生平以及卷数、内容、版本等情况，并对某些稀见抄本注明了所藏之图书馆。作者对以往将笔记稗乘作为茶余酒后“谈助”的看法进行了批驳，指出明清两代很多笔记稗乘可以补史乘之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所撰提要突出介绍了反映明清时代阶级矛盾、社会风俗、农业生产、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8月

25日　义和团6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

这是第一次全国性义和团讨论会。《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次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是月　梁启雄《韩子浅解》由中华书局出版。

万绳楠编写《文成公主》由中华书局出版。

9月

吕振羽著《史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辑录作者1955至1960年间发表的论文13篇，所论述的都是当时理论界、史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涉及范围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及哲学史。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哲学战线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五四”后历史哲学上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侧面》、《贯彻哲学史研究上的厚今薄古方针》、《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等，其中《论两周社会形态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关于中国社会完成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问题的探讨》系统论述了“西周封建论”。

白寿彝在《新建设》第8、9期合刊上发表《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特点》。

针对中国农民战争具有皇权主义的看法，作者认为，中国农民战争与俄国农民战争不同，中国农民不只反对地主、贵族以及贪官污吏，还不断反对皇帝；不只把战争的矛头指向地方封建政权，还不断把战争矛头指向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朝廷。农民战争推翻秦汉隋唐元明各朝代的历史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农民战争并没有表现出皇权主义的性质。

介凡在《史学月刊》第9期发表《必须坚持历史主义观点》。

10月

陈述《金史拾补五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收金史拾补的五种论著，包括《金史氏族表》六卷、《女真汉姓考》二卷，以及《金赐姓表》、《金史同姓名表》、《金史异名表》三种。均用辽、金、元史和当时碑志诗文等相关史料纂辑而成。每种各有范围，篇幅各异，但相互联系。

吕振羽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历史科学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前进——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出版三周年》。

该期还刊登了田昌五《为保卫历史科学的党性而斗争》，对尚钺进行严厉批判。金冲及、胡绳武也在这期发表了《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大面积夯土建筑遗存。

宁可在《新建设》第10、11期合刊上发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农民政权问题》，对农民政权问题做出系统论述。

该文认为，农民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夺取政权，农民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农民能够建立起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农民政权，也就是农民的专政，这个专政和资产阶级政权有根本的不同，而和无产阶级政权相似，即是群众性的革命专政，但农民由于阶级与历史的限制，不可能巩固与长久地保持自己的政权。

11 月

10 日　王思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评孙祚民先生的观点》。

该文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孙祚民提出的农民"没有和封建制度进行战斗"、"只打击了统治阶级中的个别人物"的主张和论点的反驳，第二部分则对孙祚民提出的农民的阶级地位和局限性问题做了回答。

15 日　谭其骧在《文汇报》发表《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

文章探讨了上海地区陆地形成过程。此后作者又发表《再论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1961 年 3 月 10 日《文汇报》）、《再论历史时期上海市的海陆变迁》（1972 年 8 月 29 日《文汇报》）以及《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考古》1973 年第 1 期）等文章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根据古海岸"冈身"和古代的遗址、墓葬、建筑、海塘等分布，以及出土文物的 C14 年代测定，作者突破了长期以来所公认的上海地区成陆速度以每年若干米平均推进的传统说法，提出了新的论断。

21 日　黎澍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

是月　上海博物馆发掘青浦县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崧泽文化"。

12 月

9 日　黎澍接替尹达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

黎澍《记〈历史研究〉杂志》一文述及接任缘起："《历史研究》杂志的创刊确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开端。因为它是我国第一个宣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的刊物……但到 1960 年，显然开始受到政治运动特别是"拔白旗"和知识分子下放劳动的影响，稿源减少，月刊在未经宣布

的情况下，改成双月刊。整个1960年，《历史研究》虽然注明为月刊，实际上只出了六本。从内容到纸张印刷，质量显著下降。两位主编向中央宣传部提出由我担任主编。经好几位同志的劝说，我在犹豫了近一年的时间以后，错误地认为学术刊物，无非是发表些研究工作者的论文，内容说来说去，总在学术范围以内，可以各说各的，事务简单，终于同意从1961年第1期起接手担任主编。当时，编辑部人手很少，连我在内共五个人。其他四人为：丁守和、张允侯、俞旦初、胡柏立。丁守和是实际的主编，杂志内容全由他管，我只看几篇主要的稿子。由于历史学界的支持，杂志内容较有起色，发行数量略有增加，但始终停留在一万四千至二万之间。”（《〈历史研究〉四十周年纪念》，历史研究编辑部，1994年）

刘大年回忆说：“尹达和我几年中各自忙于历史所、近代史所的行政事务，无法把精力投到刊物上去。1960年秋天，我们几次议论，觉得刊物内容越来越单薄，不像样子，难以向读者交待。要办好，必须有专人负责。黎澍是最理想的人选。恰恰这时黎澍找我征求意见，说他想走动走动……事情很快由中宣部决定，黎澍调任近代史所副所长和《历史研究》主编。”（《怀念黎澍同志》，《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9日　《人民日报》报道：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将《三年至八年（一九六〇——一九六七）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下达到全国有关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

根据“古为今用”和有选择、有批判的原则，《规划草案》中所列的重点项目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供具有大学和中等文化水平的干部和学生阅读的普及读物，另一类是供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用的参考资料。

是月　黄云眉《史学杂稿订存》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1931至1936年发表的史学论著的合编。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邵二云先生年谱》，第二部分是《明史编纂考略》，第三部分是八篇杂论。

1961 年

※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出版。
※ 范文澜发表《反对放空炮》。
※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
※ 纪念太平天国 11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 刘大年发表《论康熙》。
※ 辛亥革命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
※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出版。
※ 翦伯赞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1 月

3 日　白寿彝在《文汇报》发表《愿史学争鸣园地万紫千红》。

杨荣国在《文汇报》发表《要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7 日　齐思和在《光明日报》发表《略论开展世界史研究工作》。

其后，《光明日报》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 年 2 月 7 日）、吴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1961 年 4 月 9 日）、王春良《试论世界史以什么为中心》（1961 年 5 月 7 日），其他报刊也起而响应，在全国掀起了世界史体系大讨论。讨论涉及世界历史的中心问题、世界历史分期问题、东西方社会（主要是古代社会）的异同等许多问题，核心是反对西欧中心论。

12 日　杜国庠逝世，终年 72 岁。

是月　吕振羽在《新建设》第 1 期发表《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大力开展创造性的历史科学研究工作》。

郭沫若《文史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作者 1949 年至 1960 年 3 月期间所撰论文 49 篇，内容包括史学理

论、历史专题研究、文物考古方面的考释之作等。

2月

20日　邓拓在北京市历史学会学术报告会上作《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的报告，强调实事求是。

报告说，毛泽东的许多著作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库中的重要武器，同时也是中国历史科学的无价之宝，是对于中国历史科学的伟大贡献。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学习到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找到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锁钥。只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努力抓住中国的历史特点，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问题都不难得到比较完善的解决。必须在理论上大立大破，先立后破，大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革命的历史科学理论，大破资产阶级的反动历史学理论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荒谬理论。

25日　吴晗在《光明日报》发表《“神仙会”和百家争鸣》。

是月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

本书为作者遗著。作者运用比较语文学与比较神话学的方法对商周史前神话进行了深入分析，意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来源，并对中国远古的宗教与神话的发生和政治、历史的演变，中国古代多神教的特点等进行了概括。书中引用了大量文字学、文献学、训诂学和甲骨文材料，其对史前神话分析数量之多，考证程度之深，皆为罕见，其文献价值尤为学界称道。

白寿彝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性质的商榷》。

文章从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矛盾、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地位、中国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推动三个方面来论证了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作者认为，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封建制度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是这个时代农民阶级跟封建制度斗争的结果，是在矛盾中前进的结果。农民战争虽不能完全打倒封建制度，却一次一次地打击了封建制度，或一次一次地多少“改造”了封建制度下更为野蛮的方面，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农民战争是推动了封建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推动了封建制度的发展；是打击和“改造”了封建制度下更为野蛮的方面，而不是发展了或“完善”了封建制度。

同期还刊登了蒙默、孙达人合写的《关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形成

问题》。

3月

4日　国务院公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同时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

全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有180家。计有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33处，石窟寺14处，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77处，石刻及其他共11处，古遗址26处，古墓葬19处。

16日　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谈文风和资料工作》。

该文是作者1961年1月23日在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的后半部分。文中说："对科学研究工作来说，资料工作是很重要的。解放以来，已经出版了大批资料，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所以我们还要大搞资料工作。有人认为，资料工作是为别人服务的，本身不是研究工作，所以就看不起，并且不愿做资料工作。我认为不管资料工作算不算科学研究，我们也不能不重视，看不起这种'服务行业'是错误的，我看至少是缺乏全局观点。学术理论是为人民服务，资料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研究和著述，离不开资料，我们史学工作者提不出史实，就无法论证。我曾在《中西回史日历》一书序里谈到资料工作和工具书时说：'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资料工作总是要有人去做；不做，资料就不能很好地被利用。依我看，理论是作战方针，资料好比弹药。只有弹药，作战方针错误，打枪没有方向，则不能取胜。但如果只有正确的方针指导，而枪炮没有弹药，作战也难以取得胜利。供应弹药，是后勤工作，是为作战有利。搞资料工作就是为编书，为写著作服务。认清这个明确的目的，就会知道任务的重要。但是要搞资料工作必须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要政治挂帅。以正确的思想来指导资料工作，才能作为资料的主人，才能掌握资料，使资料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不然，就会跟着资料跑，做了资料的仆人。"

18日　吴大琨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神仙会"和百家争鸣——与吴晗同志商榷》。

21日　吴晗在《光明日报》发表《再谈"神仙会"和百家争鸣》。

中国史学著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与会者有范文澜、郭沫若、吴晗、翦伯赞、黎澍等。会上，与会者对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初稿提出意见。黎澍指出：“（这本书）成了农民战争史，经济讲的多，政治讲的少，知识少了，没有了。战国有几国都没有说。人物也少了。材料也少了。康熙也没有了。整个清朝讲的少。清朝其实有许多积极的东西。对农民战争只讲优点。黄巢写的有点像红军，也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对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少分析。”“周扬同志在上海说‘要以毛泽东思想作红线’，但不能完全只有红线，那就成了块红布。不能只有灵魂，而没有肉体。”

“文化大革命”中，这次座谈会被指责为“史学界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是“史学界的一次‘鸿门宴’”。

27日　吴晗在《光明日报》发表《漫谈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

31日　杨荣国在《光明日报》发表《对百家争鸣的体会》。

是月　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

该会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成立，其任务是研究和制定民族研究工作的方针，组织力量搜集整理民族历史资料，制订培养民族历史研究工作干部的规划。

刘春任主任，翦伯赞、翁独健任副主任，向达、白寿彝、范文澜、吕振羽等任委员。

侯仁之编写《徐霞客》由中华书局出版。

高亨《诸子新笺》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书为作者旧作，包括《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五书有关字句的校释。自序中云：“写此书乃承受前儒的启发，遵循朴学的方法，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工具，来研读先秦诸子的遗著，从而抒录个人的心得”。

4月

1日　张国藩在《光明日报》发表《也谈“神仙会”与百家争鸣》。

4日　郑天挺在《光明日报》发表《历史科学是从争鸣发展起来的》。

文章认为：“历史科学上的争鸣，必须有论点、有论据，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必须从历史的具体情况出发。应该从具体材料引出结

论，观点和材料统一，而不是以理论代替历史，或者先找好理论然后套上史料。”“要根据详细材料引出理论性的结论，就要求一定的理论修养和材料积累，最低限度不能忽略理论的完整性和材料的完整性。”“我们今天重视掌握事实，掌握资料，是为了便于深入地正确地分析历史，认识历史；不是走回罗列现象、堆集史料的老路。所以我们必须把资料工作提高到调查研究的高度来重视，并用对待调查研究的态度、方法来处理资料。选择两三个有代表性的突出的事例，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详细的分析研究。要审核来源，甄别真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利用。”

7 日　范文澜在纪念巴黎公社 90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做《反对放空炮》讲话。

讲话主旨是要求历史研究工作者认真研究史料，不要光说空话。这篇讲话曾由黎澍仔细修改过，发表于当年《历史研究》第 3 期。

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据黎澍《记〈历史研究〉杂志》一文回忆说：“4 月 7 日讨论会上，范文澜同志做了最后发言，题为《反对放空炮》。他的发言稿经过反复修改删节，发表于 1961 年《历史研究》第 3 期。当然，他的话不是无所指的。只是在经过修改删节以后，已不明显，甚至也近于放空炮了。可是居然引起一场风波，《历史研究》办公地点竟被勒令迁到了近代史所，最后还被告到了中央：范文澜反对放空炮，被认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说法。林彪乘机煽动说：‘这是阶级斗争。’这场风波，一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还是一桩重大的公案。”

12 日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由周扬主持，主要目的在于纠正“大跃进”中学生所编教材的缺陷。翦伯赞任历史组长，周一良、邵循正、齐思和、邓广铭、张芝联、郑天挺、韩儒林、尹达、黎澍、金灿然、白寿彝、何兹全、唐长孺、吴于廑、黄云眉、蒙思明、马长寿、冉昭德、金应熙、胡绳武、金冲及等参会。会议制订了历史专业教学方案及历史教材编选计划，提出，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建设中国自己的教材，决定请部分历史学家主编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断代史教材。

会议制定的教材编写计划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和《史学概论》（黎澍主编）、《中国史稿》（郭沫若主编）、《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主编）、《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世界通史》（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选》（郑天挺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吴于廑主编）、《中国史学史》（白寿

彝、吴泽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世界通史参考资料》（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等等。

28日　嵇文甫在《光明日报》发表《在历史研究中深刻地贯彻阶级斗争观点》。

该文为作者学习《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体会文章。文中云："毛主席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核心，把它深入贯彻到历史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去，无论讲什么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文化遗产继承问题……都一贯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

是月　杨荣国《初学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收录作者20世纪50年代末在报刊上发表的11篇文章，内容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以及对胡适、刘节等人的批判文章。包括《种族奴隶制的殷周社会》、《从曹操的历史时代看曹操》、《春秋战国时代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关于"五千言"老子的思想》、《韩愈思想批判》、《李翱思想批判》、《邵雍思想批判》、《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胡适的反动观点和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歪曲》、《批判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讲稿〉》、《"五四"给予我们的教育和启示》等文。

周谷城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

作者试图建立中国世界史新体系。文章批判了欧洲中心论，认为世界历史从最初起就因各地的交往联系而形成完整的统一体，只是在15世纪前后其范围才有了较大的改变，即由亚非欧三大洲扩展到整个世界。欧洲在此之前并不曾在世界史中占有特殊地位，地理大发现后才因海外活动的成功而一跃成为世界主宰，在数个世纪内直接改变其他地区的发展进程。欧洲毋庸置疑是近代史的重点所在，但并不能当成世界的中心。

《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一组纪念巴黎公社起义九十周年论文。

这组文章包括吴江《中国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纪念巴黎公社起义九十周年》、刘宗绪《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张子凡《巴黎公社和国际主义》、李光灿《巴黎公社和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发展》、谢琏造《巴黎公社和法国社会各阶级》等。

5月

13日　郭沫若致信《辞海》编辑所，为《辞海》试行本校样提意见。

关于乾嘉学派，信中云："解说没有从发展来看问题，没有从比较来

看问题，没有用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看问题，而是用五四时代的立场来侧重否定。”其实“乾嘉学派的业绩是必须肯定的”，所谓“多数脱离实际”，这“不能归罪于经学家，应归罪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在高度的政治压力之下”，“经学家搞考据，在当时是对政治的消极反抗。应该用来和埋头于科举，终身陷于帖括之学而不能自拔的比一比”。

20日　《光明日报》刊发记者访问记《学无止境，业精于勤——陈垣老人谈治学》。

文中云，陈垣的治学特点第一是“竭泽而渔”，就是要较全面地占有材料，力求治学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第二，他认为，治学要持之以恒，要有韧性。孔子说欲速则不达，我们说，“欲速则不达”不是不要速，而是反对漠视科学研究的规律，一味盲目地图快取巧。第三，陈垣的治学又讲究朴实谦虚。他写文章，一字一句，绝不苟且，改一遍、两遍，甚至许多遍。他说文章写完要请三种人看，一是给专家看，二是给同辈朋友看，三是给学生看。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30日　纪念太平天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范文澜在会上发言，指出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针对有人高喊“打倒帝王将相，打倒王朝体系”的口号，范文澜指出：“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他认为，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人民，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当受到大家的反对”。为此，他提出要“保”一些帝王将相和“保”一些封建王朝的问题。由于这番话是在首都史学界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10周年学术讨论大会上所讲，因此产生强烈反响。

31日　彭明在《人民日报》发表《谈观点和史料的统一》。

是月　李亚农《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重点讨论了战国封建地主社会经济情况，共七章：一、中国古代的公社制度；二、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广泛使用和普遍使用时期；三、西汉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四、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和土地所有形态的关系及其变革；五、商鞅变法；六、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七、从管子

的几篇文章来看战国时代的社会。

梁世清编写《廉颇和蔺相如》由中华书局出版。

6月

18日　翦伯赞在《人民日报》发表《跋〈宋司马光通鉴稿〉》。

该文被认为是对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的批评。

1961年3月初，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卷初稿《中国历史》征求意见稿出版，翦伯赞于当月两次当面向尹达、一次向郭沫若表示了对该书的不满。翦伯赞认为这一书稿会在学术上毁了郭沫若的学术声誉，于是发表了这篇文章。文中以《资治通鉴》为例，说明集体撰史应该怎样进行。在作者看来，《通鉴》这部书至今"仍然是一部最成功的集体写作的通史，而且替集体编写历史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其成功在于，编写集体不大，每一个成员都是主编自己邀请的具有专门研究而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是成功地编写《通鉴》的主要条件之一。但不管参加集体的成员怎样强，如果主编置身事外，那么写出来的书，也不过是一床最好的百衲被，如果要使集体写作的书变成一个完整的连针线的痕迹都看不出来的锦绣文章，那主编就必须对全书的体例以及各段落之间的联结、贯通负起责任。司马光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很好的模范。作者认为，司马光对于《通鉴》的编写，不只是在事后修改润色，而是一开始就抓提纲，不仅抓总提纲，而且抓每年的提纲，至少抓重要年代的提纲。这一点就大大地值得我们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负责态度和治史的严谨精神，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特别值得集体编写历史的同志们学习。

该文发表后，引起《中国历史》实际主编尹达的强烈反应，导致了他们之间严重的冲突。后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调解下才告平息。

是月　刘大年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论康熙》。

作者依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康熙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的特点做出了评价。作者将康熙帝与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对照，以为康熙政绩不亚于同时代的法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正值开展"史学革命"之际，"打破王朝体系"和"打倒帝王将相"思潮泛滥，因此该文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应。随后，该文又引起苏联史学界的批判。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63年10月号发表苏联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等人的文章，说那样评价康熙，"在刘大年以前，中国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提出过"，并认为它所表现出的错误倾向是同中国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协调一致路线有密切关系的。其后苏联报刊多次

举出《论康熙》加以批驳。

刘大年认为："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决定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物质资料生产者决定的。但是帝王将相的活动可以在一定范围里对物质资料生产、生产力水平起促进或阻碍作用。评价帝王将相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根据他们的行动在物质资料生产和生产力水平方面产生的实际结果，判定这个人物是应当肯定还是应当否定。"

2007 年 3 月 13 日，在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刘大年来往书信选》出版座谈会"上，戴逸指出："《论康熙》是建国以来第一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研究清代前期历史的重要文章，纠正了长期以来对清朝历史地位的片面的观点，是一篇经典之作。"

该期还刊登了李埏等所写的《试论殷代奴隶制向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以及杨向奎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问题》。

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学报》第 3 期发表《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

该文从文献上以及各种社会习俗诸遗制论证了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后期封建经济的干涉。文章从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论证长期以来阻滞中国封建社会前进的一些因素，说明中国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主要根源。

吕振羽在《学术月刊》第 6 期发表《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

作者认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一面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统治阶级和其本民族的人民及其他各民族的人民间的关系，一面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的统治阶级或上层集团各自和其本民族人民及其他各族人民间的关系，一面是处于不同地位的各民族的统治阶级或上层集团相互间的关系，一面是各民族人民相互间的关系，但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以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统治阶级为中心构成的统治阶级和各民族人民间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是一部影响广泛的隋唐五代断代史专著，原系作者在厦门大学讲授隋唐五代史的讲义，1953 年被定为交流教材，后经修改补充而成此编。全书分五编：一、统一南北的隋朝；二、强盛的唐朝；三、安史乱后的唐朝；四、黄巢大起义和夺取起义果实的五代封建割据；五、隋唐五代文化。书后附有隋唐五代中西历对照表。全书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和中外交往，再现了魏晋南北朝

历史演变的场景。作者试图从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入手来探讨这一复杂多变、动荡混乱的时代的发展规律，探寻它的主要发展趋势和特点。作者对该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给了更多的注意，并辟专章对这一时期的文化进行论述。

1977年6月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在内容材料上增加了若干次农民起义的史实，并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对某些史实作了增补，编次上也做了调整。1979年5月又出修订二版。

史筠在《实践》第6期发表《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

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由中华书局出版。

贾兰坡主持发掘山西西侯度更新世初期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一些人工打制的石块。

河南郑州发现商城遗址。

7月

1日　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

共展出文物资料九千多件。陈列从约170万年前的原始人群时代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止，按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四个时期，以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为基础，并附以图表、模型、文字说明以及其他辅助展品，系统地、形象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概貌。

该陈列从1959年10月开始预展，当时用哪一种古代史分期的观点来布置陈列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范文澜、翦伯赞主动提出以“战国封建论”的观点来布展。

8日　黎澍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中国历史科学》。

该文指出，中国历史科学最根本的方向是以中国历史为依据，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它们在中国历史中反映出来的特点。愈近的历史与现状的关系愈密切，也愈足以使人清醒。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先把近百年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几个部门的历史认真加以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一部综合的近代史来，是中国历史科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14 日　陈垣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时不待人，努力读书——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对该校历史系应届毕业生的谈话》。

这是作者 5 月 27 日与历史系毕业生座谈的纪要。在谈话中，作者回顾了自己读书、治学的经过，提出两点宝贵的治学经验：一是从目录学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这就是涉猎，有大批的书可以不求甚解”。二是要专门读通一些书，这就是专精，要求甚解，“经部如论、孟，史部如史、汉，子部如庄、荀，集部如柳、韩，清代史学家书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等，必须有几部是自己全部过目常翻常阅的书”。

28 日　靳德行在《河南日报》发表《试谈史料和观点的关系》。

是月　景珩、林言椒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以探讨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为主题，选录了 1956—1961 年间 24 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涉及和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太平天国革命的任务、动力和对象，太平天国的文化、思想、宗教及工商政策，《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的评价，太平天国与外国列强的关系。其中，郭毅生的两篇文章作为“错误观点”的代表被列入“附录”。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下册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出版。“文革”后，作者对上册进行增订修改，写成《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种。过去的史著，往往把南北朝写成一片混乱和黑暗，王著则着重写这一时期的光明面，南方着重写经济发展，十六国北朝着重写民族融合。史家所公认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主流为南方经济大开发和北方民族大融合这一判断，实为王氏所提出。该书叙述三国分立到隋统一前这一时期的历史。在叙述史实时除采用夹注的形式以外，还在每一节后面作注，以丰富的征引来作为叙事的依据，有时征引文献和正文叙述文字，篇幅几乎相当。另外，本书文化部分篇幅很大，共二十多万字，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这也是本书一大特点。

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由中华书局出版。

由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组收集整理作者遗文编成，共收书跋 82 篇，关于明季史籍的题跋 68 篇，其他书籍题跋 14 篇，多数发表于前《北大图书部月刊》、重庆版《图书月刊》、《文史杂志》等期刊，小部分是从作者未刊稿和日记中摘抄的。所收题跋，多重史实的考订和论证，对于研究明

末清初的历史多有裨益。

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绍华编著《大运河的变迁》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8月

蔡美彪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作者赞成孙祚民在农民战争政权性质上的观点，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所论几乎涉及到农民战争史讨论中所有的重要问题。作者认为，在农战史讨论中，有些人把农民战争看成是农民阶级自觉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它的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甚至认为古代农民也能建立起“和无产阶级政权相似的”“农民专政”。这实质上是一种中国古代史近代化的倾向，古代农民理想化、无产阶级化的倾向。在作者看来，农民战争可以说得上是革命，“但它是不同于社会革命的另一种性质的革命”。它不是革封建的命，而是在封建范围内革命。中国农民战争只是在封建社会内打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至多是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推翻旧的统治集团代之以新的统治集团。每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促使当时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多少有一些改进，即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始终不曾超越封建制度的范围。农民战争只是自发的运动而不是自觉地发动的运动。起义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却不曾自觉到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反抗，作为一整个的地主阶级来反抗。农民群众的“均贫富”、“均田”的口号，在历史上始终并不曾成为现实，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也并没有消灭过封建的社会制度。

关于皇权主义和农民政权的性质，作者认为，起义农民领袖建立的那些所谓短期的政权，是不能看作“农民阶级政权”、“农民专政”的。从它统治地区的社会状况说来，从它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说来，从它的斗争目标和发展前途说来，都只能是封建性政权。起义农民领袖所追求和向往的，就是推翻腐朽的旧王朝，推翻地主贵族的黑暗统治势力，而由自己去充当“好皇帝”，建立“好王朝”，实行“好政治”。起义农民的领袖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以封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的指南，不能不以封建王朝的体制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蓝本，因为当时还只有这样一个蓝本。

此文发表后，遭到了猛烈批判，触发了新一轮农民战争史讨论的高潮。

实际上，该文由黎澍约写，戴逸回忆说："当时山东历史学家孙祚民因发表农民战争的文章受到批判。"黎澍认为："孙祚民的意见符合马列主义，没有什么错误，为什么要挨批判，这是左的思想作祟……革命是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只能打乱某些封建关系，并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关系，农民阶级也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统治者。所以，农民战争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当年，左的思想盛行，说农民战争不是革命，这种主张实闻所未闻，可说是石破天惊之论。"

同期还刊登了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徐旭生《井田新解并论周朝前期士农不分的含义》、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等文。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由中华书局出版。

明宣德五年（1430）巩珍随太监郑和等出使西洋，往还三年，归后参考马欢《瀛涯胜览》等书，于宣德九年（1434）撰成《西洋番国志》。此书亡佚已久，1949 年后周叔弢以其家藏"彭元瑞知圣道斋钞本"捐献北京图书馆。书中共录二十个国家，内容与《瀛涯胜览》大致相同，但有些材料可补其不足，为研究 15 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最初史料之一。

向达在校注此书时尽量根据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诸书，加以注解。对于事实、地名、则采取各家说法，加以注释。附录一收录了《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知圣道斋读书跋尾》中有关该书的提要和题跋三篇。附录二收录了有关郑和家世、郑和下西洋的六篇史料。附录三收录了《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三书篇目对照表及 16—17 世纪之东西洋略图。

《文史哲》复刊。

9 月

邓拓、吴晗、廖沫沙在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开设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

"三家村札记"介绍古人读书治学、做事做人、从政打仗等方面的历史知识。文章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对时弊有所批评和讽刺，深受读者欢迎。"文革"初，"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被姚文元、关锋等人批判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成为"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

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根据明茅元仪《武备志》卷 240 整理，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

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整理时从省称。正文前有整理者序言，叙述了原图格式、版本和原序作者以及以往学者的研究情况。并用今图和《航海图》对照，推究了以往未涉及的马来半岛以至非洲东北部的一些地名，并加以初步的说明。附录新编郑和航海图地名索引，每条下都有简单解说，原图的误字，也在解说中加以校正。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海道针经（甲）《顺风相送》和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两部书的合集。作者已不可考，据推测，前者成书于16世纪，后者成书于清康熙末年，即18世纪初。两书都从英国抄录回来，原钞本藏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

该书对于研究地理学史、航海史、中外关系史以及亚洲各国关系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价值。

吴玉章《辛亥革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在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出版，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阐述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不但在国内影响重大，也受到国际史学界的重视，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法、德、日、越南文版。

吴晗在《人民教育》第5期上发表《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文章对当时史学界出现的种种非历史主义倾向提出批评。他说："似乎在历史学界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有了怕犯错误，左一些问题不大。"他认为，这是一种"非科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学风，这个苗头很不对头，……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他指出："并不是如有人所说的，一部二十四史都是人吃人的时代，应该说历史上曾经有过黑暗时代，也曾经有过光明的时代。光讲一面，是不全面的。"现在历史教材的"编写人看来极力想避免对帝王将相的歌颂，以免丧失立场，结果除秦始皇而外，对象汉武、唐宗、康熙、乾隆等这样比较全盛的时代的领导人物不写或很少描写，于是，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

在谈到当时许多教材把一部历史归结为农民战争史时，吴晗说："在许多种教材中，都强调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他认为这是非历史主义的。"第一，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少写农民所反对的一面，这样一来，阶级斗争几乎只剩下一面了"；"第二，由于特别强调农民起义，势必压缩其他方面的叙述，农民起义史有代替中国通史的趋势"；"第三，要强调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就非相对地刻划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活动不可，……于是，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写在书上的尽是这个皇朝如何坏，农民起义

推翻了它，另一皇朝起来了，又如何坏，农民起义又推翻了它，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

童书业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论孔子政治思想的进步面》

该文是对作者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的《孔子思想研究》一文的补充，认为孔子在理论外表上虽明白主张恢复西周的旧制度，但他的政治实践和某些政治主张发展下去，会走上新路。孔子的革新倾向固然不见得完全自觉，而有些地方似乎是自觉的，他的主张确带有“托古改制”的成分。

同期还刊登了高亨的《上古乐曲的探索》。

10月

14日　徐旭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对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的看法》。

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迟滞，与我国统一时间特别长和中央政府权力特别大有关系，并着重从重农抑商学说对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抑制作用进行了论述。

16日　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

讨论会由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举办，是中国史学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会议。会上，中国史学会副主席吴玉章、范文澜等就树立历史主义的学风等问题做了讲话。

吴玉章指出：为了提高学术水平，必须树立严肃的学风。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成果。史实可信是科学的最基本的要求。一切正确的理论都是从可靠的事实中引出来的。如果史实错误，不管议论多么宏伟，也是站不住脚的。历史要求事实完全可靠，不允许有任何的虚构和夸张。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不仅必须要有正确的立场，而且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如果不经过努力，不肯刻苦钻研，不认真地去做考证和辨异的工作，也还是不能说明历史的真相。范文澜也发表了《有关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强调树立严肃学风的重要性，要大家在研究历史时“对事实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肯放过，一定要考察清楚”，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工作。

会议论文集《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围绕这次纪念活动，还出版了《辛亥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首义回忆录》等著作。

是月　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收录作者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发表的关于中国史前考古学和汉唐时代考古研究的十篇论文，依文章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我国原始社会遗存的调查和发掘的报告，是作者在抗战期间于甘肃东部所作田野工作的成果，共三篇：成名作《齐家期墓葬的发现及其年代的考订》纠正了安特生的错误看法，批判了当时盲目崇洋的学风，《临洮洼山发掘记》提出将出土遗物和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另外一篇是《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址》。第二部分是根据出土的古物所做的专题研究，共六篇：《新获之敦煌汉简》、《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西安唐墓中出土的几件三彩陶俑》。作者对汉代的一些问题做了考证，对吐谷浑晚期的历史作了综合论述，对当时我国和波斯以及东罗马的关系与中西交通路线进行了研究。第三部分附录《十年来中国考古学新发现》，通论新中国成立十年的考古学的发展。书后附黑白图版38 面。作者把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了严谨的论证，提出了一些创见，对考古学历史学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吕振羽在《历史教学》第 10 期发表《怎样学习历史》。

耿淡如在《学术月刊》第 10 期发表《什么是史学史》。

文章指出英、法、德、俄文中的概念含混以及英美等国与苏联历史学家的现有不同定义，并结合苏联学者的意见着重论述了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

作者认为，史学史应是历史科学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家的传记集和目录学；史学史应和历史哲学或社会思想史有区别；史学史应包括历史编纂学与历史研究两者在内；史学史应结合其他有联系的科学来研究；史学史应总结过去的成绩；史学史应以研究历史的同一方法论来研究；史学史应对资产阶级伪史学进行坚决的斗争。

孙祚民在《历史研究》第 5 期发表《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中皇权主义的问题》。

11 月

28 日 《文汇报》刊载《上海史学会讨论史学史对象、任务和编写原则》。

会上形成了三种意见：一种意见强调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学派的斗争，另一种意见强调史学史的对象是研究史学发展、变迁、递嬗的历史，还有一种意见强调史学史的首要任务在于阐明史学及史著本身的发展

规律。

是月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汇集了作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所写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的一部分论著，内容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关于农村社会经济构成部分，一是关于阶级斗争部分。该书是中国史学界第一本引用民间契约文书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的著作，又因大量采用调查残余的遗俗、遗例等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广受中外人类学家的重视，被称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先驱著作。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认为："战后历史学界对明清契约文书研究的浪潮，则可以说发端于社会经济史学者傅衣凌的福建文书研究。"

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由中华书局出版。

分上下两册，约 65 万字。分"文选"和"解题"两部分。所选篇目，根据 1956 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国历史文选教学大纲（草案）》所订目录加以修正补充。选文始自《武丁卜辞》，迄于《史学之界说》，共 67 篇；解题介绍历史要籍，自甲骨文至《新史学》共 44 种。两者相得益彰，大略上展示了从殷商至近代不同历史时期重要的史书体裁与体例，同时也给读者介绍了经、子、集及地下文献的部分常识。该书校勘精良，选文典型精粹，解题系统严谨，注释简明准确，在史学界享有盛誉。

该书在诸多历史文选书籍中流行最广，出版后多次修订印行。

贾兰坡、王择义、邱中郎《山西旧石器》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为纪念中国猿人第一个猿人头盖骨发现 30 周年而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年间的山西旧石器考古进行了全面总结。作者对当时已发现的山西境内（包括临近的河南、陕西部分地区）旧石器进行了概述，并在对各地点群地层与石器性质进行研究和对比的基础上，将山西及其邻近地区新发现的石器文化划分为三类："红色土系统中的文化"、"黄土底部砾石层中的文化"和"黄土系统中的文化"。

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制度的著作。作者简要评介了太平天国的考试程序、规则、试题及应试诗文、策论的体裁风格，以及"育才馆"、"招贤榜"等。书中对多名太平天国的科名人物进行了考证，指出傅善祥不是"女状元"，而是东王簿书，上书太平天国的黄畹即是王韬，但王韬不是太平天国"状元"。

《文史哲》第 3 期刊登一组讨论孔子的论文。

车载《孔子论仁》认为，一面把仁看作是精深博大的道理，另一面又把它看作是平易近人的道理，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这两方面的见解是统一的。“克己复礼为仁”，反映着封建剥削阶级统治者的政治要求，是孔子谈“仁”思想体系的核心。钟肇鹏《略论孔子思想的阶级性》不同意孔子的思想代表奴隶主阶级，认为孔子是新兴的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李景春《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整理、传授和发展》则对孔子对古代典籍整理方面的贡献做了梳理。

12月

6日　杨翼骧在《天津日报·学术专刊》发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

13日　翦伯赞在《人民日报》发表《内蒙访古》。

1961年7月，应乌兰夫邀请，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率领由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16位委员组成的学术代表团访问内蒙古自治区，前后历时近两个月，行程15000里。访问结束后，翦伯赞写下这篇著名的散文史论。全文共6节：第1节“哪里能找到这样的诗篇”，第2节“一段最古的长城”，第3节“在大青山下”，第4节“游牧民族的摇篮”，第5节“历史的后院”，第6节“揭穿了一个历史的秘密”。文章依据实地考察和历史研究，以寻访古迹的所见所闻为线索，把对自然环境、古迹文物、历史人物及民族关系的记叙以及评论融合在一起，表达了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充满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促进民族大团结的强烈愿望。另外，在这次访问中，翦伯赞还作了《关于历史研究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报告。

21日　傅衣凌在《文汇报》发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若干问题的商榷——附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

文章认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和乡族势力对于封建经济的干涉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是以地方的农业经济为其基础的。可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其早期即采取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封建地主阶级为巩固他们的统治，始终无法克服贯穿着历史长流的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他们除通过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农民的被奴役状态和超经济强制等方面，以维持封建经济的长久存在，还利用上层建筑和前社会残存物等等来加强封建的统治，结成一整套的严密的统治网。凡是有利可图的生产事业，差不多都掌握在封建国家的手中，大大地限制了民间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为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稳定，常采取

种种对策限制商人的活动。封建国家又支配了城市，中国城市的行会制度，绝大部分是替封建主服务的，成为专制政体统治城市的得力工具。

中国封建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乡族势力的牢固。它是封建政权的补充工具，是中国地主经济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乡族势力拥有雄厚的物质条件——公田、义仓等，也操纵了地方的经济事业。为保证地租的安全、封建秩序的安宁，以防自然经济的动摇，禁止开矿、烧灰，禁种谷物以外的作物，特别是作为工业原料的烟、茶等，这样，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扩大，既受到限制，又妨碍工业原料的供给，使得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得到农业生产的支持，成为资本的发展基础。这就在相当程度内影响资本的发展基础，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长期性和缓慢性，而不可能沿着直线上升的道路前进。

22 日　翦伯赞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该文是翦伯赞在主编《中国史纲要》期间写成的，先在内部刊物《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创刊号（1961 年 11 月 1 日）刊出。翦伯赞在介绍这篇文章写作情况时说："这篇稿子写得很快，一下笔便不停地写出来了。我没有用多少引文，但是我每一个论点都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根据，都有卡片在抽屉里，他们如果批判，我都可以反驳。"《光明日报》社认为这篇文章很有分量，应该放在正版，没有放在《史学》双周刊刊出。

文章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将农民的反抗概括为三反三不反，即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封建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封建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这些观点与当时历史学界的主流思潮形成尖锐对立，后来成为戚本禹批判翦伯赞的主要罪状。

文章还就"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理论、史料与文章"谈了自己的观点。

该文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

28 日　姜铎在《文汇报》发表《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

1962 年 1 月 12 日和 21 日，作者又在《文汇报》连续发表《试论洋

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两篇文章。作者认为，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这是1949年后史学界首次承认洋务运动有正面作用。

这一观点发表后，引起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起因、性质、分期、失败的原因、洋务运动与民族资本的关系、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大讨论，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作者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数人坚持对洋务运动全面否定，不同意作者的两点论。

是月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对黄册制度的具体内容、建立经过、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以及它最后败坏的过程、原因等各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作者对黄册制度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就规章制度而研究规章制度，而是与总的社会状况结合起来，把黄册制度放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中去考察。如书中就从黄册制度出发来探讨了明代官僚政治所导致的严重的贪污舞弊现象。作者还在书中研究了黄册制度与其他典章制度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黄册制度与军户世袭兵役制和匠户徭役制度、里甲制度、鱼鳞图册制度等之间的关系进行揭剖。在材料的使用上，作者除注重搜罗抄录孤本、善本外，还引用了大量明代历史档案文件，如各种题本、图册、户帖、供单、契约等珍贵材料。

（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原作1866年于伦敦出版，名为《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包括作者亲身经历的叙述》，1915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该书的节译本，由孟宪承翻译，书名为《太平天国外记》。王维周据英原本重译后，改为现名。书中大量记载了1860—1864年间作者在太平军中的亲身见闻，对太平军的作战方法、妇女与婚姻、税收与外贸、法庭制度以及人物群体等方面，都有切近的记述，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书中还引用了一些英国官方文件。据罗尔纲考证，书中也存在若干史实不确的地方。

张习孔编写《官渡之战》由中华书局出版。

（苏）康恩著，乔工、叶文雄等译《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帝国主义时代历史哲学批判纲要》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对西方历史哲学主要流派进行了批判，但从客观上说，中国历史

学界也能够从中侧面了解年鉴学派等西方现代史学潮流。

夏鼐主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原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编写，概括地介绍了这一时期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全书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部分：一、原始社会，分为早期原始社会、原始氏族社会，原始氏族社会再按黄河中下游、黄河上游、长江流域、华南地区、北方草原地区、东北地区等不同文化区域逐一介绍。二、奴隶社会，分为商殷、西周春秋。三、封建社会，分为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该书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助益甚大，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证据，有助于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社会性质，对历史学界商讨我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状况、阶级关系的变化都有重要的支持作用。

书中附有 130 版图版和 53 幅插图，可以帮助读者了解那些有代表性的遗迹遗物。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罗尔纲率领下，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组成太平天国史料调查团，开展了大规模搜集、出版太平天国文献资料的工作。历时七年，共辑录到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有刻本、稿本和抄本 925 种，方志 730 种，凡 1655 种 15274 册，基本上都是以往研究中没有利用过的，同时向全国征集有关资料，并到太平天国曾经统治过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搜访史料。经过整理，编成 800 万字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和 400 万字的《太平天国参考资料》，因篇幅浩大，一时难以出版，遂从中抽出最重要的资料，编成 140 万字共 6 册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该书的出版，为太平天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全书至 1963 年出齐，由六部分组成：一为“专著”，收《粤寇记事纪实》等 9 种；二为“纪事”上，收《粤寇纪略》等 20 种；三为“纪事”下，收《从军日记》等 14 种；四为“时闻”，收《粤匪杂录》等 3 种；五为“奏稿”等，收《僧格林沁奏稿》等 12 种；六为“诗歌”，收《山中草》等 19 种。内中所收皆为未刊稿本、孤本、抄本、稀有的刻本及从其中选出的重要文献，史料价值突出。

该书后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发行。

（苏）维诺格拉多夫著，何清新译，谢琏造、张书生校《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由三联书店出版。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修订本由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对本书1934年版进行了修订增补。原书论点、论证和内容无大改变，仅在文字上有所修饰，并核对了引文。修订版吸收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和全国各地的出土资料，新增加了《地下出土的远古遗存和我国原始公社制时代的历史过程》、《我国若干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或其残余》两文，作为补编。

作者为新版写了序言，强调本书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托派、“新生命”派（包括“食货”派）及其他流派做斗争的成果，也和胡适“反动的历史观”进行了斗争。

是年

吴晗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开始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

《中国历史小丛书》出版以后，周恩来对吴晗说：“你们还应该编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出国人员渐渐多了，对外国的情况不大了解，读一点这种书多好。”于是吴晗和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翰伯商量，请商务印书馆承担出版任务。不久，《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成立，仍由吴晗担任主编。商务印书馆成立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室。

《外国历史小丛书》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后，和《中国历史小丛书》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到1966年上半年，一共出书59种，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而中断。1979年，商务印书馆恢复丛书的编辑出版。

1962 年

※ 吴晗提出“论从史出”，否定“以论带史”。
※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1册出版。
※ 翦伯赞发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出版。
※ 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新一版出版。
※ 朱谦之、罗荣渠就是否中国人发现美洲展开争论。
※ 顾颉刚发表《〈尚书·大诰〉今译（摘要）》。
※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出版。
※《文史》创刊。
※ 山东省历史学会、历史研究所主办孔子学术讨论会。

1 月

4 日　吴晗在《光明日报》发表《如何学习历史》，最早提出“论从史出”的观点，否定“以论带史”的口号。

该文是对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同学的讲话，分四部分。作者认为，“以论带史”强调理论是对的，但是提法却值得考虑，因为从字面看，先讲理论，后讲史实，结果是论多史少，甚至是有论无史，把个“带”字改为“代”字，成为“以论代史”了。所以重要的问题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学习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我国历史研究，而不是用他们的理论来代替中国的历史实际。所谓史论结合，应该是统一的，不应该是一段史一段论。理论是从具体历史实际中来的，离开具体历史实际的所谓理论是空洞的、主观的、臆想的，因而也是无用的。要使“论”通过“史”的叙述表现出来。通过掌握大量的史料，经过分析、研究、审查、理解，从中引出新的理论。作者还就如何学习理论和运用理

论、如何搜集史料和掌握史料、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问题谈了看法。

20日　朱元兴在《甘肃日报》发表《浅谈史与论的统一问题》。

21日　翦伯赞在《文汇报》发表《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

文章说，掌握了理论和史料，才能谈得到史与论的结合问题，有些同志轻视史料，甚至认为重视史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史料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画上一个等号，这是非常错误的。史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任何阶级研究历史都需要掌握史料，不仅资产阶级要掌握史料，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也要掌握史料才能写出历史，为什么无产阶级就可以不掌握史料呢？把史料和资产阶级思想等同起来，这就无异说，只有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才根据史料说话，才是言必有据，而无产阶级的史学家反而可以信口开河，随便乱说。过去曾经流行过“以论带史”的提法，这样提问题的人，动机是好的，他的意图，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统帅史料，反对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反对“唯史料论”、“史料即史学”等错误思想，因此在当时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但不论怎样，这种提法带有很大片面性，是一种不正确的提法。因为这种提法很容易令人误会研究历史要从理论出发，而不要从史实出发。一般的理论或概念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不是出发点。理论和概念是研究具体史实得出来的结论。如果从理论和概念出发，那岂不是先有结论，然后按照结论去武断历史？岂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这种研究方法，不是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2月14日《光明日报》转载此文。

24日　刘大年、白寿彝、谢琏造等出席巴基斯坦历史学年会。

30日　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论《红楼梦》产生的历史背景。

他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是月　侯仁之在《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历史地理学刍议》。

该文在国内最早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进行了阐述，认

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人的活动所带来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对历史地理学来说，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要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

唐兰在《考古学报》第1期发表《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

作者以金文中的“康宫”为康王之庙作为立论依据，以此来建立周初铜器的断代体系。

刘节在《学术研究》第1期发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

刘文发表后，杨荣国发表《刘节先生历史观的哲学基础的剖析与探源》，认为刘节用“天人合一”说去论述中国思想史上的问题，是明白把自己置于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的地位。

白寿彝《学步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收入作者1949年后撰写的十二篇史学论文。民族史方面的四篇：《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传统友谊》、《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手工业史方面的二篇：《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与王毓铨合作）、《明代矿业的发展》；史学史方面的三篇：《谈史学遗产》、《刘知几的史学》、《马端临的史学思想》；历史教学方面的一篇：《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批判“旧史学”二篇：《胡适对待祖国历史的奴才思想》、《钱穆和考据学》。

其中《谈史学遗产》一文影响巨大。该文阐发了研究史学遗产的三条意义，分析了六个“花圃”。三条意义是：“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有它的不同的特点。”“第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六个“花圃”实际上是研究史学遗产中六个重要的方面。作者认为，对史学基本观点的研究应该是第一个花圃，这里可以有三种花，第一种花是对历史观的研究，第二种花是对于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究，第三种花是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和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是紧紧靠近第一个花圃的两个邻近花圃。讲究历史编纂学，就不能不讲究历史文学。但历史文学不是历史编纂学所

能包括得了的。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可以另辟一个花圃。史学遗产的研究的第五个花圃是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第六个花圃是对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这个花圃里的花，在品种方面基本上是由上列几个花圃中的品种选择集合而成的，只是在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上跟以上各姐妹花圃有所不同。

1981年，作者又连续发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继续探讨史学遗产问题。1982年，作者又撰写了《再谈历史文献学》。作者谈论史学遗产的六篇文章开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并将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之先河，并从理论上和研究对象上奠定了探讨这一领域的学术基础，发表后均产生较大学术影响。

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共收有关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讨论的论文39篇，分上下两编。上编收论文22篇，主要讨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般理论或史实；下编收论文17篇，主要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时期或朝代的土地所有制的具体研究。

郭圣铭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

文章认为，汤因比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在许多根本性的问题上提出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相反的说法，竭力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范围内，汤因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敌，是当前史学界最大的一面白旗，他的徒子徒孙着实不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为了保卫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就必须对汤因比的反动史观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批判。作者提出，汤因比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家，他的“文化形态史观”是一种毫无科学根据的胡说，他关于“挑战”和“应战”的理论，不过是要为走向崩溃的美、英帝国主义集团提供一个“自救”的方针。

吴则虞编著《晏子春秋集释》由中华书局出版。

张宗洽、方文图编写《郑成功收复台湾》由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

2 月

24 日　胡适在台湾逝世，终年 71 岁。

是月　胡如雷在《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

文章从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出发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形态，并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古史分期问题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作者认为，我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停滞，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特殊形式的辩证法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有周期性，正是这种周期性历史发展的特点使我国的历史迈着退一步、进两步的步伐前进，使我国的经济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螺旋式地前进。

该文可以看作作者后来出版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的提纲。

秋浦等著《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由中华书局出版。

全书 8 万余字，是国内第一部关于鄂温克人的专著，系统地描述了鄂温克人的原始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并介绍了鄂温克人由原始公社制度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具有较大影响。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对古史分期这一当时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进行集中探讨，在中国奴隶社会的特点及其上、下限问题上都提出了有代表性的看法。作者认为中国奴隶社会是由夏初开始，中间经历夏、殷、周三代，到秦统一全中国而告终，前后历时 1774 年。书中选取从西周初至春秋末作为典型来揭剖中国奴隶社会，一方面从横的方面详细地阐述了这一时期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另一方面又从纵的方面阐述了整个发展过程及其每一阶段的具体矛盾与具体情况。作者认为，中国的奴隶制是以直接生活资料的生产为目的而不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因此，中国的奴隶社会应属于东方的奴隶制类型，而不属于典型的、古典的奴隶制类型。

史绍宾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收录报刊上有关农民战争理论问题重要论文 34 篇，内容涉及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思想、平均主义思想、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农民政权

的性质等问题。

陕西省文管会对临潼秦始皇陵进行考古调查。

谭其骧在《学术月刊》第2期发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

该文提出了与前人迥然相异的结论，认为以牧业为主的民族迁入中游地区和人口锐减造成的农垦区缩小，客观上减少了水土流失量，是黄河长期安流的决定因素，并指出黄河中游地区农牧业交替发展、其植被状况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下游河道的决徙，从而基本上找出了各个历史时期河患轻重不同的根本原因，为治理黄河提供了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理论根据。

3月

22日　朱伯康在《文汇报》发表《试论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规律》。

文章说："封建社会有一基本经济规律存在。这个规律，似乎可以表述如下：'封建主在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基础上，进行封建剥削，以满足封建主寄生性的各种需要。'"

作者认为，正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使封建社会发展迟滞。

23日　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论历史人物的评价》。

文章说："把我们的祖宗全说成是坏人，祖国的历史漆黑一团，我们全是坏人的子孙，我们的历史只是今天才从头开始，把历史切断了，这有什么好处呢。"在谈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历史人物时，吴晗说，一些人"把阶级分析片面化了，庸俗化了"，变成"唯成分论"了。"如果光拿阶级成分来评价历史人物，那就糟了，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几乎所有卓越的历史人物都要被否定了。""试问过去的大政治家，哪个不出身于地主阶级?"

是月　高亨《周易杂论》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探讨了周易的哲学思想，为学界所重视。共收录五篇论文，分别是《〈周易〉卦象所反映的辩证法观点》、《〈周易〉卦爻辞的哲学思想》、《〈周易〉大传的哲学思想》、《〈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

作者认为，八卦可能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六十四卦至晚产生于殷代，《周易》产生于西周初年，易传产生于东周。《周易》卦象反映的辩

证观点是朴素的、不完备的、不系统的，而且带着巫术色彩和神秘意味。《周易》是最古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散文作品，它的文学价值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西周时代的王朝诰命与铜器铭文都高一些。

孙祚民在《新建设》第 3 期发表《试论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性质——再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

作者认为，农民起义军对明王朝揭露和批判的，仅只是王朝政治的腐朽和黑暗，而不是封建的皇权制度；农民起义军主张和宣传的，仅只是对封建政治的刷新，而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民起义军具体施行的经济、政治纲领和措施，仅只是相对减轻农民一些剥削和压迫，而不是根本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这些都足以证明，大顺政权的性质只能是封建的，而不是所谓“农民阶级专政”的“农民政权”。

作者提出，在判断某一个政权的性质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其一，政权的构成形式，即政体，虽不是判断政权性质的根本标志，但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二，决定政权性质最根本的依据，是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亦即国体问题。要判断某一政权的性质，仅仅根据某几个人或某一些人掌握和支配这个政权的领导权，是不够的。而是要根据它在实际上代表了哪些阶级的要求和利益，保障了哪些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其三，还要具体考察农民起义军的经济政治纲领和措施，是否引起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变革。

任继愈在《文史哲》第 2 期发表《墨子生卒年简考》。

作者考证墨子的生卒年大约是公元前 480—前 420 年，活了 60 岁左右。

4 月

5 日　吕集义在《光明日报》发表《曾国藩为什么删改〈忠王李秀成自述〉》。

文章提出《李秀成自述》原稿经过曾国藩删改，删掉 5000 多字，改动之处亦复不少。

是月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 1 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是高等学校中国通史教学参考资料的汇编，由全国各高等学校分工编选，主要目的是围绕中国通史教学中提出的问题，系统地选择比较完

整的原始资料。在选录时，注意材料的阶级性、真实性和典型性，尽量多选原始资料，部分有删节，资料原文不作任何改动，只对某些少数民族称呼的用字按照1949年后通用汉字作了改变，引用书籍尽可能选用了较好版本，必要时附加校勘，篇末附录引用书目版本表。除汉文原始资料外，还有少量译文，并附录几篇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报告。所录资料都经标点分段，并有必要的说明和注释。资料有确实年月日期可考的也尽量注明。

古代史部分凡八册，第一册主编何兹全，内容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第二册主编何兹全，内容为封建社会（一）——战国到东汉末；第三册主编唐长孺，内容为封建社会（二）——魏晋南北朝；第四册主编董家遵，内容为封建社会（三）——隋到五代末；第五册主编邓广铭，内容为封建社会（四）——宋、辽、金；第六册主编韩儒林，内容为封建社会（五）——元；第七册主编傅衣凌，内容为封建社会（六）——明；第八册主编郑天挺，内容为封建社会（七）——清（鸦片战争前）。至1981年出齐。

近代史部分由龚书铎主编。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出版，对于高等学校历史教学及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

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外三种）》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抗战前攻唐史，见唐人诗文喜以行第相称，取常见者记录于纸。1938年入滇，于《全唐诗》、《全唐文》两大巨著，有见必录，资料已得十之九。蓄箧二十年，取此稿重新整理出版。

唐人诗文集中，经常有以行第相互作称呼的例子。在当时是通行的习惯，在后世则颇费考索，往往导致误解：本为史传有名之人，一用行第，不能得其主名，一人行第可能由于讹传，有几种不同，遂误一人为数人，行第之数字易于传误，亦可能引起张冠李戴，同姓同行第之人易于混乱，即使有行第而兼有姓名，亦可能因一二字之差误而发生疑问，很难找到旁证，只可阙疑的，更不胜屈指。该书的出版，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书中所据，除《全唐文》、《全唐诗》、两《唐书》、《太平广记》及唐人专集、唐人笔记等之外，《唐文续拾》、《唐文拾遗》、《敦煌抄本》、当时出土墓志，均就所见，尽量采入。

书后附有《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三种。

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下册1964年8月出版。

该书为通史型专题研究著作，上册主要讨论宋代以前的问题，下册则涵盖了自北宋至鸦片战争前这一段时间。上、下册均把古代社会部分称作甲编，古代思想部分称作乙编。上册甲编重点论述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等问题。下册甲编中，有重点地探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等问题。在乙编古代思想的研究中，作者着重说明了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并把儒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段落：儒家、经学和理学，认为儒家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始终为巩固封建社会秩序起着巨大的作用。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三册，120 余万字，中册、下册分别于 1963、1981 年出版。

该书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通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从西周到鸦片战争前夕长达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对从秦汉到鸦片战争之间两千年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刘昭豪编写《半坡村遗址》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简略介绍了半坡村遗址的居住区和建筑遗迹，生产工具、生产活动、生活用具、文化艺术和氏族公共墓地及葬俗。

丛翰香在《历史研究》第 2 期发表《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

于耀文编写《漕运史话》由中华书局出版。

5 月

18 日 《文汇报》刊登《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翦伯赞在上海所作的两次学术报告的摘要》。

关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翦伯赞不同意吕振羽的看法，认为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民族矛盾，但是这不等于要把民族矛盾说成阶级矛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当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民族矛盾有时退到次要地位，但民族矛盾还是存在，阶级矛盾并不能代替民族矛盾。

针对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翦伯赞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基本矛盾永远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主要矛盾有时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有时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有时是民族矛盾。写敌对阶级间的矛盾，要着重写革命也要写反革命。封建统治阶级包括帝王将相在内不但可以写而且应该写，如果不写封建统治阶级怎能说明农民为什么革命，革谁的命呢？农民

军的缺点不但可以写而且应该写。关于农民战争反对什么，翦伯赞不同意下面的三种说法：即农民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把封建当作一种制度来反对，农民把皇权当作一种主义来反对。关于农民的政权问题，翦伯赞说农民能够并且曾经建立过政权，但他不同意有些人所说的农民可以建立一种非封建性的政权。

是月　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实由王重民主持编纂，所收书目包括北京图书馆的《敦煌劫余录》、王重民在巴黎编的《伯希和劫经录》、刘铭恕根据缩微胶卷编的《斯坦因劫经录》，以及散在日本各处和我国私人手中的十几个散目录，共著录敦煌遗书22500多卷，除苏联藏品外，几乎将中、外、公、私所藏敦煌遗书目录网罗殆尽，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完整的一部目录，为研究敦煌学必备参考书。

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思想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上起殷商西周奴隶社会、下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中国思想意识的发展作了论述。作者认为，思想意识领域内的斗争是同阶级斗争紧密相联系的，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代表社会反动力量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成为各个历史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内容。该书自始至终贯彻阶级分析的观点，认为先秦时代尊天神与反尊天神的论争，“名”与“实”、“命”与“力”、“礼”和“法”的论争，秦汉至隋唐期间谶纬与反谶纬的论争，“无”与“有”的论争，神不灭与神灭的论争，以及“天”与“人”的联系的论争，宋至明清，“理”与“气”、“道”与“器”、“天理”与“人欲”的论争，“理学”与“汉学”的论争，以及“理学”“汉学”与“经世致用派”的论争，鸦片战争以后，“反理学”、“反名教”以至“反孔教”的论争都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及其特点。

翦伯赞在《江海学刊》第5期发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本年1月，翦伯赞率编写人员到苏州讨论修改《中国史纲要》。4月，应江苏师范学院的邀请，在该校做了《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

文章着重讨论了四个问题：史与论的问题、政策与理论的问题、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问题、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作者认为“以论带史”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以论带史”的提法，意味着研究历史要从理论或概念出发，不从具体史实出发。经典著作变成了历史科学

的标签。

关于政策与理论，作者认为，历史研究中是要贯彻政策的精神的，但贯彻政策只是贯彻这种精神而已，并不是把我们今天的政策，都塞到古代史中去。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上来一个什么运动，历史上就要塞进这个运动。而是为一定的阶级在一定时期的需要服务。

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作者提出，历史学是具有阶级性的科学，任何阶级的历史学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但是除了阶级观点之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做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文章列举了滥用阶级观点的种种现象。

翦文发表后，针对翦伯赞有关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问题的论述，林甘泉等撰文提出不同意见，从而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论战。

刘节在《学术研究》第3期发表《孔子的“唯仁论”》。

戎笙等编写《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由三联书店出版。

嵇文甫《王船山史论选评》由中华书局出版。

向达《蛮书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校注精辟，是研究云南民族历史特别是南诏史的重要资料。

刘仙洲编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1编）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齐思和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

本文是本年3月6日作者在山东大学作的学术报告稿。作者认为，欧洲的史学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希腊、罗马时期，即奴隶制时期；中世纪时期，即封建主义时期；近代时期，即资本主义时期；现代时期。与中国历史学传统比较，欧洲历史学传统开始时是在古代东方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一开始便出现了比较完整的历史著作。在历史著作的体裁方面，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人受到荷马史诗和以前故事家的影响，创立了叙述体，以后成为欧洲历史著作的正规体裁。从历史的内容方面来看，欧洲传统历史学不如中国传统历史学那样广博丰富。从历史著作家看来，欧洲并没有像中国那样，自古以来，就有由国家任命史官负责修史的

制度，而主要是由私人历史家来编写历史，虽然其中有些人也得到国家的支持与帮助。

6月

14日　林甘泉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史论结合问题》。

文章主要针对吴晗、翦伯赞在史论关系上的观点进行商榷。文章认为，“以论带史”这一提法所包含的片面性，就在于它只强调了理论的指导意义一个方面，而忽视了详细地占有材料这另一重要的方面。但在强调重视史料的同时，决不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有任何忽视。有人在反对“以论带史”时提出了另一个“论从史出”的公式来，这个公式所表达的史与论的关系也是值得商榷的。对一个问题的正确的理解，不仅依赖于有足够的确实的材料，而且依赖于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材料和观点的关系说，材料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观点也会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一个历史工作者要从具体历史事实中间引申出理论性的结论来，不能不受到本身立场、观点、方法的支配，不是受唯物史观支配，就是受唯心史观支配。正因为这样，历史工作者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要自觉地把这唯一正确的理论运用到研究工作中去。如果按照“论从史出”这个公式的逻辑，就没有办法表达出理论的指导意义来，它在实践中很容易导致削弱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

针对有人认为只要掌握大量的、充分的、可信的史料，加以合理的安排，通过对史实的讲述，就能把观点体现出来这一观点，作者认为，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来做指导，这样得出来的观点究竟是否是合乎历史真实的科学的观点，是很值得怀疑的。

是月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书凡七册，从1956年开始规划撰写，1958年11月正式启动，直到1995年4月出版第7册，历时近四十年。

1961年4月教育部文科教材会议建议把这部书作为大专院校历史系的试用教材，该书的编写工作由郭沫若主持，尹达、田家英、刘大年、侯外庐、田昌五等共同组织，分成三个编写组，第一组负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部分，第二组负责近代史部分，第三组负责现代史部分。参编单位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等。书中关于古史分期问题，采用了郭沫若“战国封建说”的观点，以商周为奴隶社会，春秋战国之交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折点。

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流行最广的中国通史著作之一，影响

巨大。

漆侠等著《秦汉农民战争史》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是1949年后第一部系统研究秦汉农民战争的专著，属拓荒之作。作者全面总结了秦汉农民战争的社会历史背景、农民战争的具体进程、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及其基本特征等等。书中通过对秦汉三次农民战争的考察，对农民战争和封建统治之间的关系提出这样一种概括，即"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这一观点在当时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

1979年9月再版。

沈元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急就篇〉研究》。

以往对《急就篇》的研究，从未超出考订笺注。作者不落窠臼，以深厚的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功底及新颖的视角，对《急就篇》展开整体考察，着力从蒙学课本来探讨汉代的社会生活及思想状况，令人耳目一新。文章对《急就篇》在教育史上的意义及其文学和语言形式，以及版本流传情况都做了论考。

作者为年轻学者，借此一举成名。郭沫若、范文澜、周予同、黎澍等众多名家对该文倍加赞赏。郭沫若甚至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作者自幼卓有奇才，1955年以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因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而在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并被开除学籍，发配农村劳动改造。1961年回京，摘掉右派帽子。后得黎澍等人识拔，得以发表此文，并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

韩儒林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论成吉思汗》。

作者认为，过去有些历史学家完全否定成吉思汗，强调蒙古人在战争中的屠杀和破坏，无视成吉思汗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本文就成吉思汗在蒙古民族历史上、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考察，充分肯定了成吉思汗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戚立煌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政权"的两重性及其向封建性政权转化的必然性》。

文章认为，农民受阶级意识、生产地位诸条件的限制，所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利用现成的封建政权的形式，正因为"农民政权"本身具有革命和封建两重性质，所以在旧形式的束缚下，不是革命的新内容，经过斗争，改变了封建的旧形式，而是革命的内容逐渐消失，至多是变成一个剥削较轻的"好王朝"而已。

周一良编写《明代援朝抗倭战争》由中华书局出版。

《汉书》整理标点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7月

18日　吕振羽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问题》报告。

报告认为，中国不仅仅只有春秋战国那一次百家争鸣，而是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并分别论述了我国春秋战国、两汉时期、两晋南北朝、唐朝、两宋、明清、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共七次百家争鸣的概况。

是月　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新一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6年春，高教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李新、彭明等起草中国现代史大纲。是年秋，高教部指定李新、彭明和山东大学孙思白等组成中国现代史编写小组，根据草拟的大纲编写讲义。后又有北师大王真等参加。1958年冬，初稿完成后，征求了意见。高教部再指定李新、彭明、孙思白、王真、蔡尚思（复旦大学）、陈旭麓（华东师大）等对其补充、修改。在修改过程中，又有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湖南师大、甘肃师大、郑州大学、北师大、山东大学等校多人参加工作，集结了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力量。1959年8月修改稿完成。1959年10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书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二、三、四卷1960年、1961年、1962年相继出版（出版社略有变化）。

该书叙述了1919至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应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的历史才是中国现代史。所以这一时期的，既不能称为中国现代史，称中国近代史又不合适，称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最合适，故而未使用“中国现代史”之名。此书是作为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来编写的，故又加“通史”字样。此书第一、二卷的第一版为内部发行。出版后又征求了意见，再进行了修订。1962年7月，此书的第一、二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第一版”。至此一至四卷都公开出版。“文革”期间，此书遭到批判。“文革”结束后，1978年以后，此书多次重版。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在《广校雠略》一书的基础上写成的，为作者所作《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的续篇，主要介绍了一些校读史籍的方法和经验。由通论、分论、附论三大部分组成，通论论校读古代史籍的基本条件，分论则分叙书籍为什么必须校勘、校书的依据、校书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怎样进行校书及如何读书，如了解古人写作中的一般现象、认识古人著述体要、怎样阅读全史、整理史料的一般方法，附论则主要谈辨伪和辑佚。

《杜国庠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集辑录了作者一生关于中国哲学思想史方面的论作，主要由已发表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便桥集》组成。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作者执笔部分也收录其中，另有单篇文章若干。郭沫若、侯外庐分别为该书写了序言，回忆了他们与杜国庠的交往，并对其学术活动作了评价。本书编辑小组也在书后著文详细介绍了杜氏的学术历程、主要学术观点及治学方法。

朱楔编《中国运河史料选辑》由中华书局出版。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考释为主，阐释为辅，对府兵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共分七章。前五章，主要叙述府兵的由来和演变，以及府兵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后两章，主要阐明府兵制与均田制及封建国家职能的关系。本书为进一步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历史，提供一些论证和资料。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实为作者读书笔记，主要内容是关于清代货币金融的史料摘录。作者根据其掌握的史料，分类排比，按问题性质和时间顺序，编为七章，为了解有清一代的钱制、银两、通货膨胀、典当业、票号、钱庄和银号、官银钱号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有关人员编写，力图把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放到社会发展的历史环境中，来阐述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全书共四章，第一章论述原始公社和奴隶社会时期的地理学，介绍了我国最古的地理著作《山经》、《禹贡》和《管子·地员篇》。第二至四章按照朝代顺序对《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制图六体”、《水经注》、《佛国记》、《元和郡县志》、《海内华夷图》、《大唐西域记》以及沈括的地理学思想、宋元舆图、郑和的远航、西洋制图学的输入与清初全国地图的测绘等进行了论述，并重点介绍了徐

霞客、顾炎武、刘继庄、顾祖禹和孙兰等我国古代地理学家的事迹。

(苏)康恩等著，张书生、乔工等译《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共收录七篇文章，从多个方面评述了现代西方史学中的各种思潮、流派及观点，其基本出发点是对西方史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但对中国学者认识和了解西方史学帮助甚大。

翟忠义编著《中国古代地理学家及旅行家》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谦之、罗荣渠分别在《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及《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就是否是中国人发现美洲展开争论。

朱文认为，中国古籍中的“扶桑”即今墨西哥，中国人在商代时就已抵达美洲。罗文则从地理位置、物产、社会组织和风俗、佛教和慧深、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等五个方面对朱文进行反驳。

二文发表后，各有支持者，引起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长期争论。

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再论孔子》。

文章认为，孔子是当时新出现的地主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代表，但还是个改良主义者，他的思想有新的一面，这是主要的，维护旧制度的一面不是主要的，所以孔子基本上是当时的一个进步人物。

作者特意在文前加了附记，称该文代表其关于孔子的整个看法。

同期还刊登了任继愈《孔子——奴隶社会的保守派，封建社会的“圣人”》一文，认为孔子是春秋时期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子的思想中保守方面是主要的。

8月

张国淦编著《中国古方志考》由中华书局出版。

初稿曾于1935至1936年间在《禹贡》半月刊上连载，后屡有修订。书中对秦汉至元代方志，不论存佚，一概收录。首列总志，次分省排列，每省前为通志类，后为府县志类，共著录地方志书2271种。

该书对了解我国地理学以及方志的发展过程，对研究我国方志和从事地方志编纂，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梦家编《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由科学出版

社出版。

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规模较大的青铜器图录，由于编者当时被划为右派，出版时署名“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该书是 20 世纪 40 年代编者旅美期间艰苦收集的流落在美国的中国青铜器资料的汇集，共收有 845 件青铜器。全书分三部分，一是器物的图像，二是器物的铭文，三是记录各器尺寸、铭文、年代、著录等方面信息的说明。该书序言说：“本集所收的 845 件殷、周青铜礼器，是我所工作人员陈梦家先生十余年前在美国搜集的。当时，他曾将在美国各博物馆、大学和古董商肆所能见到的中国铜器，都摄了照片，拓了铭文，记了尺寸，并考查了来源。其中大多数皆加以观察并作了去取，少数的未见实物。”

《中华文史论丛》创刊。

该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出版，罗竹风、李俊民和陈向平担任主编，为不定期连续出版物，以刊发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高质量研究论文而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瞩目。“文革”期间停刊，1978 年复刊，由朱东润、李俊民、罗竹风任主编。1989 年取消刊号，改为丛刊。2006 年正式恢复刊号出版，改为季刊。

顾颉刚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尚书·大诰〉今译（摘要）》。

1959 年，顾颉刚奉中共高层之命研究和整理《尚书》，先从最难读最重要的《大诰》篇着手，1962 年已写出《大诰译证》初稿，因篇幅过大，就择其要点精练成《〈尚书·大诰〉今译（摘要）》。该文共分校勘、解释、章句、今译、考证五个部分，对《大诰》进行了周详、细致、深入的研究。这是对《尚书》按篇进行校释整理的试作，也是顾颉刚研究整理《尚书》的样本，受到学术界普遍重视。

李平心对此文极为推许，认为顾氏研究和整理《尚书》的法式，有下列几个特点：（一）把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有机地综合起来，组成一个研究体系；（二）据广泛搜集的材料从事校释，吸收各方精华，丰富《尚书》学内容；（三）打破经学史上门户之见，择善而从，并以自己研究心得加以发展，不囿于一隅一格；（四）把各种问题的专门探索同《尚书》的一般研究结合起来，能使专门知识和特殊材料为校释服务；（五）能从历史角度进行考索，以求全面地具体地弄清楚《尚书》各篇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脉络。李平心认为，顾颉刚的《今译》大大超过了译述范围，是在对《尚书》进行总结性的整理工作，力求对三千余年来的《尚书》学做出新的估价。不仅他的校订、考释、训诂、译文有助于研究古

史，他的别具一格的著作体例，更值得借鉴。

同期还发表了三篇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文章，分别是吴传启的《关于资本主义发生的历史和逻辑》、罗耀九的《再论明朝万历年间雇佣劳动的性质》、刘永成的《论清代雇佣劳动》。

9月

24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此后学风为之一变，学术批判蜂起。

是月　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所著《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西周与东周》、《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五本著作的合订本。书首有作者的总序，书末附录本书征引诸家甲骨文著作简称表。结集出版时，杨宽和唐长孺分别校阅了古代史部分和拓跋族的前封建制部分。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四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从人类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世界的历史，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部多卷本综合性世界通史著作，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作为一部高校教材，它的出版是我国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世界史学科开始脱离苏联的世界史模式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1972、1980年该书先后两度修订再版，发行数十万册，对我国高等学校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书还被排成大字本，供国家领导人使用。

吴汝康《巨猿下颌骨和牙齿化石》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广西进行调查发掘所得的大量巨猿化石材料进行系统研究的结果，被认为是中国古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著者根据巨猿下颅骨和牙齿的特征，结合世界各地有关古人类化石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对于人科分类系统提出了新的看法。

杨树达《积微居读书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系杨伯峻根据作者《积微居读书记》遗稿整理而成，共收十一种读书笔记（读《尚书》、《左传》、《国语》、《后汉书》、《庄子》、《荀子》、《商君书》、《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的笔记各一种，读《说文》

的笔记两种，即《说文求是》和《声训杂记》），按原稿顺序略加整理。这些笔记中，作者引据了较为丰富的资料，或对原书举出了校订意见，或对诸家解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侯仁之《步芳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收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文章26篇，关于历史地理的有9篇，包括《北京城的沿革》、《八百年来劳动人民改造北京地理环境的两件大事》、《郦道元与〈水经注〉》等。

林增平《辛亥革命》由中华书局出版。

袁世硕编著《孔尚任年谱》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何兹全编写《祖逖北伐》由中华书局出版。

关锋《求学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黎澍组织《史学概论》编写小组，成员有宁可、胡绳武、李时岳、谢本书等。

《文史哲》第5期刊登一组研究孔子的论文。

这组论文包括高赞《非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林琳《关于孔子思想的几个问题——与杨荣国先生商榷》、李景春《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王仲荦《对孔子评价的一点意见》、安作璋《略谈孔子与季氏》、王先进《孔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庞朴《也得注意点训诂工作》、卢南乔《〈论语〉中的仁和人》、者山《希望古汉语学家起来参加孔子问题的讨论》、朱活《孔子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教育家》、李天佑《试谈孔子的军旅之学》等。

10 月

《文史》创刊。

该刊由中华书局和《新建设》编辑部合作出版，由吴晗、冯定、何其芳、金灿然和吉伟青等人组成编委会，不定期连续出版。创办初衷是为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却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开辟一块发表的园地。第1辑的《编者题记》中说，“所收辑的文章大抵偏重于资料和考据”。认为“积累和辨析资料”是学术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只有“大量占有资料，才能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考据同样是必要的。因此，“不应该夸大资料工作和考据工作的作用，但是必须充分重视它们的作用”。办刊宗旨是“崇尚实学，去绝浮言”。该刊经常发表顾颉刚、陈垣、

游国恩、于省吾、杨宽等人的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属于其他刊物不愿接受的考据或史料方面的。该刊创刊后引起学术界的瞩目，受到专家们的青睐。1965年6月印行第4辑后因“文革”爆发休刊，从1978年第5辑起，改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林耀华等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对我国藏族、维吾尔族和傣族部分地区1949年前农奴制度的初步研究》。

作者在亲身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比较研究方面具有开拓之功，发表后得到民族学界的好评，亦受到史学界重视。

王忠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论西夏的兴起》。

该文利用大量汉文和藏文史料，系统地勾勒了党项族的发展和西夏的建国，对西夏史的研究有重要影响。

同期还刊登了吴泽《魏源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论》、戴园晨《论我国封建土地国有制的生产关系》、贺昌群《东汉更役戍役制度的废止》等文。

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由中华书局出版。

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由中华书局出版。

11月

6日　山东省历史学会、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孔子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

本次大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全国性孔子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十六个省市的老年和青年专家学者160余人。冯友兰、吕振羽、周予同、于省吾、赵纪彬、杨荣国、吴泽、蔡尚思、束世澂、唐兰、刘节、李青田、赵一民、金景芳、关锋、林聿时、高亨、高赞非等众多在史学界、哲学界、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出席了大会。如何继承孔子思想遗产成为整个会议争论的中心问题。有关孔子的阶级归属、孔子的中心思想、孔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也是讨论的重点。

是月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对乌桓、鲜卑二族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研究，对乌桓、鲜卑二族在中国史上的地位、特点和作用，以及他们的起源、兴衰、迁徙、与汉族等族的关系等都有论述，形成了对乌桓、鲜卑发展史比较完整的系统性看

法。作者认为，自春秋战国以来，我国北方的阿尔泰语系诸族与中原汉族发生关系最早且最多的，除北狄与匈奴外便是乌桓与鲜卑，他们分别起源于东胡部落联盟中两个最大的部落集团，其历史比较复杂，与汉族的关系也比较长久，因此有关二族起源的地点和年代、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的区别、诸部落部族间的融合和各部族在不同时期的汉化、鲜卑诸政权的性质以及燕国和北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等问题都是需要认真探讨的课题。

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由中华书局出版。

为作者研究甲骨及金文字之结集。分三卷，共释文字 181 个。作者新识之字，甲骨文 41 个，金文 18 个，其余皆意在纠正旧说，另创新解。

12 月

20 日　第一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至 1963 年 1 月 11 日结束。会议审议了《全国文史资料工作概况》、《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北洋政府时期史料征集工作的意见》、《征集辛亥革命史料工作总结》等文件，并讨论了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任务、意义和作用。这次会议最显著的成就是，促进了全国文史资料工作网络的形成，为形成全国性的文史资料工作体系打下了基础。

25 日　雷海宗逝世，终年 60 岁。

是月　冯友兰编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写初衷为给初学中国哲学史的人介绍史料，提供参考资料。共十四章，第一、二章集中谈了对史料学的看法，对史料学的范围、内容和目录都做了论述。作者认为，史料学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部门，为历史学的研究做准备工作，是关于史料的方法论。怎样收集史料以求“全”、怎样审查史料以求“真”、怎样了解史料以求“透”是史料学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其余各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历代哲学史料。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为历史地理名作，共收辑作者三十年间所写的有关文章六十余篇，分上下二册，内容大体可分为八类：（一）重要古地的证定，（二）西北两方的陆路交通和南方的海道交通研究，（三）建置及区域考述，（四）边远史地考证，（五）汉籍记外国地理之误会考释，（六）外文记中国地名称谓考释，（七）地理书辑佚，（八）不经见的外地名称考定。所

收文章长短各异，长者至万言，短者数百字，在古地名的溯源、交通路线的追索及史事的考证等方面创获甚多。

洪焕椿《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对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背景、发展阶段、各个阶段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并就学术界讨论的一些问题，诸如明末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和觉悟性、明末农民政权的封建性和革命性、李岩等知识分子在农民军中的作用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编纂组编《柔然资料辑录》由中华书局出版。

所收资料上起西晋，下迄唐代，取材以二十四史有关各史中的记载为主，旁及时人的文集碑传，皆以初见为主。征引唐宋两代所成之书，范围限于《建康实录》、《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五种。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柔然传，收录有关柔然的专传和附传；第二部分人物传志，辑集柔然人物的传记，按年代顺序编排，不属柔然而与之有关人物的碑传附录于后；第三部分编年辑录散见资料，无从编年者附录于后。

汤用彤《往日杂稿》由中华书局出版。

内容多为1949年前所写有关宗教史的论文及书评。包括《读太平经书所见》、《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胜宗十句义论解说》、《南传念安般经译解》等文，还有附录两篇。

（苏）德门齐也夫等著、黄巨兴等译《近代现代美国史学概论》由三联书店出版。

冉昭德、陈直编选《汉书选》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为郑天挺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选》丛书之一种。丛书共有六种，另外五种是缪钺选注的《三国志选》（1962年12月出版）、徐中舒编注的《左传选》（1963年9月出版）、王仲荦等编注的《资治通鉴选》（1965年12月出版）、束世澂编注的《后汉书选》（1966年1月出版）以及来新夏编注的《史记选》（1990年2月出版）。

该丛书是根据1961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规划推出的，主要是为高等学校历史专业课程史学名著选读编选的。目的在通过选本训练学生阅读古典历史文献的能力，并略知我国古代著名历史著作的各种体裁和基本内容。体例不要求一致。或按年代先后，或按原著卷帙次第，或按问题性质分类，编次成书。选本重点选录名著中的代表作品，包括它所

反映的这一特定时期的主要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杰出人物的活动、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文化思想的流派和民族关系等内容，以及著者的历史观点。各选本对于选录的名著都做了说明，简单介绍它的内容、体例、写作经过和通行版本，以及著者的生平、重要著述和学术影响，并说明选本的选录原则。

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该书是我国古代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著作，共收文章18篇，主要有《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附穆天子传疑）、《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春秋王都辨疑》、《从地理上证石鼓文时代》、《春秋楚郢都辨疑》、《春秋末吴越国都辨疑》、《古燕国辨》、《古巴国辨》、《春申君的封邑》等。作者以深厚的学术功力，综合使用古史考辨的方法，对晋、秦、楚、吴、越等国的历史地理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多发前人之未发。书中据《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考证春秋时周敬王迁都是一种流传的讹说，复据彝器铭文及群籍考定成周即东都、王城即在成周之中，又考证古巴国在汉水流域，今陕南川陕间有大巴山脉，并有巴水，当为古巴族活动之地，川陕之间皆为巴族的根据地等，都为学界瞩目之新说。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开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上古部分（1962年出版）由林志纯主编，中古部分（1981年出版）由郭守田主编，近代部分（1964年出版）由蒋相泽主编，现代部分（1980年出版）由齐世荣主编。

郑天挺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

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原理，利用“满文老档”等众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对学术界争论已久的明末清初满族社会性质进行了细致的探究。该文提出，满族在努尔哈赤时期已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成为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封建说的代表。作者又发表了《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续探》，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同期还刊登了李光灿的《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以及几篇考证文章，如王毓铨的《明黔国公沐氏庄田考》、陈玉书的《关于土族的来源问题》、陈直的《汉晋过所通考》、胡思庸的《林文忠公家书考伪》等。

广西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了1959—1960年在两广17个县（市）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有关太平天国起义的文献、碑记、口碑资料。内容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前夜的广西社会、拜上帝会组织的群众基础、太平天国的制度与纪律、太平天国与少数民族、金田起义的斗争情况以及碑记等。

是年

刘起釪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档案整理处调至北京，协助顾颉刚进行《尚书》整理工作。

《文物工作资料》创刊。

1978年改名为《江西历史文物》，后改名为《江西文物》，1992年起改名为《南方文物》，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主办。

1963 年

※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 3 册出版。
※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出版。
※ 林甘泉、宁可等就“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展开争鸣。
※ 戚本禹发表《评李秀成自述》。

1 月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 3 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共 4 册。1964 和 1965 年，第 4 册和第 2 册又相继出版。由于“文革”爆发，第 1 册的编写工作直到 1979 年才得以完成。1979 年夏，全书 4 册由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

该书是一部简明扼要的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是 1961 年由高教部召开的文科教材编选会议规划编写的。秦汉部分和魏晋南北朝部分由田余庆负责，隋唐部分由汪篯、吴宗国负责，五代十国宋辽金部分由邓广铭负责，元明清部分由许大龄负责，近代部分由邵循正、陈庆华负责。翦伯赞撰写西周至战国部分。1983 年再版时，合为上下两册。全书结构严谨，内容连贯，前后贯通，叙事完备，重点突出，语言凝练，考辨严谨。在许多重要学术理论问题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接受周扬建议，采用了翦伯赞历来主张的“西周封建说”，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分庭抗礼。

该书凝结了几代学人的心血。出版后影响巨大，几十年来历久不衰。

吕振羽在《学术月刊》第 1 期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

吕振羽参加长沙纪念王船山逝世 270 周年学术讨论会后回京途中被秘密逮捕。

逮捕吕振羽的目的就是要他作伪证，证明 1935 年 11 月国共两党在南

京谈判合作抗日时，刘少奇充当了内奸。1967年1月被正式逮捕，1975年1月被无罪释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冤案得以平反。

关押期间历尽磨难，共遭到审讯800多次，其中700多次都是关于那次南京谈判的。吕振羽坚决不作伪证。

身陷牢狱期间，吕身边只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但仍潜心于学术研究，写出二十万字的史学评论。

《余嘉锡论学杂著》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收录作者论文、书序、题跋等三十篇，读书随笔三十条，多为1945年以前所撰。内容包括古籍的流传、古代书册的制度沿革、历史人物的事迹和生卒年月、重要历史文献中所反映的史实以及目录书籍的源流和校勘的方法等，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考证周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2月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据抗日战争期间发表于《责善》半月刊的《浪口村随笔》增删订补而成，凡54篇，主要有：《畿服》、《职贡》、《牧誓八国》、《骊戎不在骊山》、《秦与西戎》、《氐》、《天山南路之羌》、《甘肃秦长城遗迹》、《河洮间之明边墙》、《古代兵刑无别》、《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女子服兵役》、《高宗谅阴》、《夫为妻服三年》、《赘婿》、《"周道"与"周行"》、《明堂》、《九鼎》、《黄帝》、《蚩尤》、《颛顼》、《楚、吴、越王之名号、谥》、《司马谈作史》、《三代世表》、《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史》、《论毛诗序之作者》等。附图片23幅，地图10幅。作者在书前《小引》说，该书虽兼及古代文学，但所提出的都是文学史上的问题，仍属史的范畴，故名"史"，谓史学园地广漠，自己仅徘徊于其一隅，故名"林"，各篇性质不一，无系统可言，故名"杂"，所得均为个人一时之见，有望贤者纠弹勘正，故名"识"，望之他日续成二编，故此辑名为"初编"。各篇内容考辨充实，又能参证以边疆史地的实地勘察，故创获甚多，学术价值尤大。

吴晗《学习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收入49篇文章，包括作者从1961年3月至1962年8月之间的文章和讲演稿。约三分之一是史学方面的文章。分为三类，一是关于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原则和方法，二是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三是介绍历史知识的。其中《论历史知识的普及》一文阐述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呼吁大家都

来做历史普及工作，并对轻视普及工作的观点提出批评。

吕振羽在《文史哲》第 1 期发表《孔子学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在山东历史学会、山东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孔子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文章讨论了关于孔子思想的阶级性问题、关于孔子的世界观问题、关于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其对历史的作用问题、关于研究孔子思想中史论结合的问题、关于孔子研究成果的批判继承问题，对孔子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作者认为，如果对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其对历史的作用完全否定，是和孔子以后的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况不相符合的，或解释不通的。几千年来，关于研究孔子的著述汗牛充栋，即从近代、从鸦片战争以来，或从“五四”以来，关于孔子研究的著述也有很多创造性的成果，应该对既有的成果批判地继承。

马曜、缪鸾和在《思想战线》第 1 期发表《从西双版纳看西周》。

第 2、3 期连载。作者将“民主改革”前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与西周社会进行对比研究，认为西双版纳的份地制与西周的井田制性质是相近的。这一研究方法与材料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1989 年 12 月，作者又出版了《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

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上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下册 1964 年 1 月出版。

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自序称，该书是把西汉时候司马迁的《史记》所依据的典籍和他对于这些典籍所做的评论，加以申述阐发，也就是对司马迁著作《史记》所凭借的各种典籍，加以探讨，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作者从 1932 年开始发表散论，到 1962 年结撰成集，历经 30 年，用力甚勤。

全书 64 篇，第 1 篇《叙论》为全书总纲，悉数罗列作者所考司马迁所见书名，总计 82 种，并辨析出今存 36 种，残 6 种，亡 40 种，又列表将《汉书・艺文志》与司马迁所见书有差异的 61 种进行对照，以表现从司马迁到班固的两汉之际二百年间的典籍变化。其余各篇散论，着重评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考释《史记》中所述书，司马迁时有无此书？二、司马迁所见书是真书还是伪书？三、论列某些书籍的历代流传情况，说明今本某书是否即司马迁所见之书。书中还对司马迁作史取材方法进行了研

究。该书所用方法多样，有论、说、考、证、考征、解释、释义、推测、考察等方式，集目录、勘误、辨伪、注疏之学于一炉，成就卓荦，开拓了《史记》研究新领域，即《史记》取材的新课题，极富启发意义和实用价值，是研修《史记》的必读书之一。

是书存在一些疏失。据郑之洪《史记文献研究》，《史记》所述司马迁所见书有103种，不止82种；有的论证疏略，如"论《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已为考古发现所否定。

沈元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

该文长达五万余言，以恢宏的视野和扎实的理论功底论述了洪秀全思想的形成、基督教对其观念的影响、《天朝田亩制度》的历史背景及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运动的局限、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剿杀等问题。

此文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2月12日《人民日报》率先用整版发表该文的压缩版《论洪秀全》，引起轰动。据刘志琴《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回忆："建国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青年学者的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黎澍曾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其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周扬亲自发话要学部就此进行调查。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泽东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黄逸峰、姜铎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

该文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具有较为明确的反封建、反外国侵略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目标，并逐步加以贯彻，这是它所以能够获得基本成功的决定性原因。明治维新不是在基本保持原有封建统治基础上的局部改良，而是基本上破坏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革命。这是明治维新获得基本成功的主要历史经验。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始终没有改变维护封建统治这个基本要求，尽管它的经济活动是采取了近代生产方式，有极其微弱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是它一直坚持贯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根本方针。它仅仅利用了西方近代生产方法，而不是真正希望发展资本主义，

他们妄图在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旧的经济基础所借以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统治下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同期还发表了林甘泉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

3 月

吴大琨《中国的奴隶制经济与封建制经济论纲》由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作者认为，古史分期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是还不能完全掌握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特点。要研究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占有制生产关系和封建制生产关系所赖于发展的生产力情况，同时还要注意研究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发生的变化情况。书中论述了建立在青铜器时代的奴隶占有制国家的经济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指出夏代、商代和西周都是建立在青铜器时代的奴隶占有制国家，并对这一观点进行详细阐发。作者还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三个方面阐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封建国家的形成及其经济特点。

刘节在《学术研究》第 2 期发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

作者认为，不能把古为今用简单化。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不能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的。

文章发表后受到严厉批判。

缪钺《读史存稿》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收录 14 篇文章，内容皆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包括《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陈寿与〈三国志〉》、《北魏立三长制年月考》等。

周萌编写《义和团运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戴逸《北洋海军》由中华书局出版。

林汉达编写《春秋五霸》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讲述了春秋时期最著名的五个诸侯先后称霸的故事，包括齐桓公会合诸侯、宋襄公不擒二毛、晋文公退避三舍、秦穆公称霸西方、楚庄王一鸣惊人等。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理论为指导研究契丹的社会经济史，综合运用民族学说、社会经济学说、阶级学说和国家学说，对契丹的国家性质、社会经济结构、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等进行了系统论述。

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证》由中华书局出版。

郑天挺任南开大学副校长。

4月

17日　文化部颁布《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是月　张舜徽《广校雠略》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仿效宋人郑樵《通志·校雠略》的体例，广搜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以及子目之分支派别，稍加铨次而成。全书共分5卷，凡19论，100篇，著者首正校雠之名，次辨著述之体，复析儒学大小深浅之故。同时论述部类分合之际，书籍散亡之原，以及校正伪讹之术。内容涉及目录、版本、校勘、著述体例、古籍存佚、学术流别等诸方面。书末附释例三种：《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故训传释例》、《世说新语注释例》。

1945年曾出版自刊本。

刘叶秋《中国古代的字典》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简要地介绍了我国古代一些重要字书的作用，编制体例，总结了它们的优缺点，说明其版本流传情况，并指出哪一种版本容易得到，哪一种版本最好。对于不是字书但有着字书作用的一些书也作了介绍。

韩席筹编注《左传分国集注》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彭泽益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从明代官营织造的经营方式看江南丝织业生产的性质》。

5月

8日　柴德赓在《光明日报·史学》发表《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

30日　蔡尚思在《文汇报》发表《历史研究不能离开阶级分析》。

是月　林甘泉在《新建设》第 5 期发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

该文主要针对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文而发，是批评翦伯赞历史主义观点的第一篇文章。林文否定历史主义独立存在的价值，强调只能以阶级观点为指导。

文章指出，在批评非历史主义倾向的时候，历史研究中又现了另一种不健康的倾向：某些同志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对立起来，在讲“历史主义”的时候，离开了阶级观点，从而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作者反对把非历史主义倾向的出现归咎于“只有阶级观点”的说法。指出无产阶级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它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完全一致，因此它最关心历史真实的认识。在历史研究中，越是能够贯彻阶级观点，就越能把历史的真相揭露得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相反，如果离开了阶级观点，就不可能历史主义地看问题，就会被历史的一些非本质的现象所迷惑，乃至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作者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统一性、一致性，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存在没有历史主义的阶级观点，也不存在没有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

(波) 沙夫著、郑开其等译《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由三联书店出版。

钟师宁在《哲学研究》第 3 期发表《阶级分析是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

6 月

13 日　简言在《文汇报》发表《阶级分析方法完全适用于古人》。

是月　庞朴在《文史哲》第 3 期发表《也谈古为今用中的简单化》。

关锋、林聿时《春秋哲学史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韩国磐《南朝经济试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北朝经济试探》一书的姊妹篇，共分五部分：一、南朝的等级编制，二、南朝的田制和农业，三、南朝的户口和赋役，四、南朝的手工业和商业，五、南朝的寺院经济。

陈旭麓、李道齐在《学术月刊》第 6 期发表《论“史论”》。

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对五四时期思想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资料繁富、论述精辟，在结构上既有纵的叙述，亦有横的剖析，做到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对当时的各种思想文化、社会思潮和人物等作了全面地评析，是研究该领域最早最具权威性的著作，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一年后，该书被康生诬陷为大叛徒陈独秀翻案，是利用历史研究反党，是本大毒草，被禁书毁版。作者因此在“文革”中遭到迫害。

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中收录了作者1951至1961年发表的11篇论文。

关锋在北京展览馆发表《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讲演，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

关在讲演中直接以翦伯赞的观点为靶子。关说，在批评非历史主义倾向过程中，有些意见又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脱离阶级观点的倾向。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甚至就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

关特别对翦伯赞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观点做了批判。关说，批判历史人物评价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正确理解之下的历史主义，而不能用脱离阶级分析的、抽掉阶级内容的所谓历史主义去纠正，否则，不但不能纠正非历史主义倾向，而且会造成脱离阶级分析的、客观主义的倾向。历史唯物主义同非历史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同客观主义也是根本对立的。针对翦伯赞有关农民战争评价的观点，关认为，否认农民革命战争是反封建的，是反对地主阶级的，也就是否认它的革命性，否认它向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认为起义农民只能以封建的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农民战争并不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农民战争建立起来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性政权，农民向往和追求的是发家致富、使自己成为地主……如此等等，实际上否认了封建社会两大敌对阶级——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否认了农民革命战争是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说，它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去考察农民战争。

关锋的这篇讲演，实际上把翦伯赞推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观点的对立面。

讲演稿发表在当年《历史研究》第6期上，《人民日报》1964年2月22日转载。

刘大年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中国近代史诸问题》。

该文主要对近代史研究如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研究近代史，就是要通过对这个时代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具体研究分析，揭示出这个时代的历史发展、阶级斗争规律来为当前斗争服务，满足当前斗争需要”，“人们研究历史，寻找规律，寻求知识，总结经验，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要求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映当前时代需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党性原则，就是最可靠地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最可靠地坚持两者的结合”。关于史料、现实斗争、理论的关系，作者指出，首先，“考证史实、整理资料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近代史研究根本不存在要不要史料考证的问题，只存在一个用什么观点从事史料考证的问题”。其次，“占有资料、考证史实，都是讲过去的东西，研究近代史，还需要花更多功夫来熟悉当代历史，熟悉现实生活”，“要熟悉现在有些什么斗争，也要知道它们的背景和来龙去脉”，这就“要求我们温故知新，博古通今”，“从实际斗争吸取思想、感受时代脉搏，辨别工作方向”。再次，三者之间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

同期还发表了江地《论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黄烈《五胡汉化与五胡政权的关系》等文。

刘仙洲编著《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7 月

杨翼骧在《历史教学》第7期发表《刘知几与〈史通〉》。

第8期连载。该文介绍了刘知几的生平及著作以及《史通》的内容，论述了《史通》在撰著上的几个特点，并总结了刘知几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贡献。

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充分发挥其在考古学方面的专长，将大量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相结合，分别考察了中国青铜器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及宗教、文化、艺术诸方面的情况。该书记述平实，尤重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以大量篇幅考察了先秦时期人们的衣食住行及婚丧、娱乐等向为史家所忽视的历史。

陈彭述编写《地图史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蓝田县陈家窝村发现“蓝田人”下颚骨化石。

8月

3日　钱君晔在《天津日报》发表《略谈材料和观点的关系》。

郑天挺在《天津日报》发表《必须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

27日　文化部颁布《革命纪念建筑、历史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修缮暂行办法》。

是月　宁可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

该文由黎澍约写，是对林甘泉《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一文的反驳。作者认为，在分析事物的发展过程与各种复杂的历史条件时，应当始终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而运用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时，又始终应当以对事物的历史发展及其各种条件的具体分析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者来说，科学的客观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与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革命精神是统一的。研究问题的历史主义原则与阶级观点应当是内在地、有机地联系着、统一着的。阶级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的内容之一。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像林甘泉那样，把阶级观点等同于历史主义，也是不正确的。因此，研究历史问题，不能用阶级观点包括或取代历史主义。

文章着重指出，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根源在于不以历史主义态度对待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

1963年8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该文。

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戚文开宗明义，认为李秀成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虽然“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军将领，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但“忠王不忠”，“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针对罗尔纲的“伪降”说，戚文断言李秀成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并断定李秀成投降变节并不是偶然的，“在他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倡导的太平

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时，就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文章最后宣称“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续彪炳于革命的史册”。

戚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毛泽东看到该篇文章后批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表示对戚本禹文章的支持。

作为对戚本禹文章的回应，罗尔纲在该期杂志发表《关于我写李秀成自述考证的几点说明》一文，简要介绍了他的“伪降”说提出的经过，仍认为李秀成自述中“那些自污的话是李秀成对敌人的策略”。

关于戚文的发表，当时负责《历史研究》编辑工作的丁守和在《李秀成自述的争论》中回忆：“文章可能是那年元旦前寄来的，并附一信，说看了有关太平天国的话剧，认为对李秀成被捕后的描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而写了此文。从信封上看作者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文章主要是评论李秀成被捕后写的自述，认为这是李秀成明确表示的投降书，是其投降变节的有力证据。所谓与罗先生等商榷，实际是批评他们的看法。我看后觉得文字清楚，讲了些道理，可以发表，进行讨论。黎澍同意我的意见，并说戚本禹既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打字后送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也送罗尔纲一份，听听他的意见。以后我曾打电话给田家英，问他对此文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些探讨，总是有益的。还说戚这个人不好，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所以拖到第 4 期才发表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应不一。不久，听说中宣部一位领导看了此文有意见，认为对农民革命英雄人物不要轻易否定，并要近代史所开个会澄清一下。会议是在近代史所会议室开的，有二三十人参加，林涧青、刘大年都讲了话，也有些人发言，多认为不宜轻易否定，应该慎重，也有少数不同意见。当时黎澍感到压力，准备写检讨，说自己是办报出身，容易追求轰动效应等。可是不久又听说毛主席有‘忠王不忠’的话，或曰‘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究竟是否这样，没有寻问，也无必要。只是此事就不了了之了。然而戚本禹却由于发表这篇文章而走了红运，被陈伯达所看重。”

傅衣凌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考察》。

该文提出“公”、“私”两大体系的分析方法，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国家政权，可以视为“公”的体系，而各种形式的乡族势力，则可以视为“私”的体系，这两大体系之间既有矛盾又相互补充，共同组成了完整牢固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或资本主义萌芽难以顺利发展的原因，应该同时注重对“公”、“私”两大体系的研究。

9月

史念海《河山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此书为作者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论文集，收文12篇，主要有《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开元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农业发展》、《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三门峡与古代漕运》、《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等，对唐代以前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主要经济区域的历史经济地理变迁过程，包括农业、工商业、交通运输，以及聚落、都邑等各个方面的重要问题进行了阐述。

该书名称由作者好友白寿彝命名。作者十分珍重这一命名，后将自己的论文集以此名顺序排列，共九集，1963至1999年，先后由三联书店（一集，1963年9月；二集，1981年5月）、人民出版社（三集，1988年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四集，1991年12月；七集，1999年1月；九集，2006年12月）、山西人民出版社（五集，1991年12月；六集，1997年12月）、中华书局（八集，即《中国古都和文化》，1998年7月）出版。

《河山集》九集收录了作者绝大部分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各个分支学科如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民族地理等学科的开创之功及其作为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的卓越学术成就。以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黄河及其支流泥沙含量变化过程为核心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是史氏成就最为卓著的研究领域，多已成为经典性著述。这些论作特别注重人类活动影响自然环境经验教训方面的探索，引起了整个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河山集》同谭其骧《长水集》一样，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史上的里程碑式著述。

王嘉荫编著《中国地质史料》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在方法论上对历史自然地理学在中国的兴起产生重大影响。书中广泛利用自唐迄清类书中有关地质现象的记录资料，内容上包括历史自然资料（即地质史料）和认识史料（即地质学史料）两部分。该书并非单纯辑录资料，而是对史料进行了一定的分析、统计或解释，在分析方法和理论解释方面均有新颖独到之处。

中国科学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坡》由

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享有盛誉的考古发掘报告，也是研究仰韶文化及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参考书，详细记载了西安半坡遗址发掘的考古发现。书分六章，分别论述当时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凡居址的地理分布和自然环境，聚落布局及房屋、窑穴、葬地和工场等建筑遗迹的结构、特点和演变，以及农业、家畜饲养、狩猎、捕鱼和采集等生产活动情况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等都在报告之列。对于各项生产活动的工具、武器以及日常生活所大量使用的陶器也做了详细叙述，并专门对各项工艺制作技术做了解说。对于氏族的埋葬制度和习俗、艺术、装饰及其有关的宗教仪式，以及当时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仰韶文化的分期、居民的人种及其他相关的问题也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10 月

10 日　嵇文甫逝世，终年 67 岁。

24 日　林杰在《文汇报》发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没有必然联系吗》。

该文把阶级斗争强调到极致，认为文明社会的历史，每一瞬间都存在着阶级斗争。

31 日　田昌五在《光明日报》发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探讨》。

该文把历史主义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具体含义和特征归结为三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具有彻底的全面的阶级观点"；"第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要求人们明确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一切历史问题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第三，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明确宣布，历史研究的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它渗透着唯物主义的精神，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

是月　尹达在《新建设》第 10 期发表《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回顾和展望》。

该文长达 5 万多字，对我国新石器时代研究进行了全面检视和系统总结。在文中，作者根据主持《中国史稿》编写工作时对新石器考古新资料所做研究，概括地总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华南一带、北方草原地带及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和新问题，并针对各地考古工作很不

平衡的情况，提出一些尚待深入钻研的问题，对新石器时代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详细阐发。作者文中虽然未明确使用“聚落考古学”这一晚近流行的概念，但有关论述在内容上和方法上都与今天所言“聚落考古学”并无二致。

该文还发表在《考古》第11期。

林甘泉在《新建设》第10期发表《再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对宁可进行反驳。

文章说，宁可在他的文章中，尽管也承认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统一的，但他实际上是想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分别纳入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两个不同的框框。这种把唯物史观原理的联系分割开来的做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是统一的，它们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也同样，它们作为唯物史观统一的观点和方法，有着不容分割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当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时，我们所指的实际上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的科学的历史观。而阶级观点，正是它的基本核心。

任继愈《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收作者1955至1962年间发表的研究汉唐时期中国佛教思想的论文七篇，包括《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天台宗哲学思想概论》、《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禅宗哲学思想略论》、《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等。

1973年作者又对本书进行了增订，易名《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苏金源、李春圃编《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史料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汪敬虞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十九世纪外国在华银行势力的扩张及其对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控制》。

吴玉章《历史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1月

6日　袁良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

漆侠在《天津日报》发表《谈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23 日　张友渔率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

团员包括侯外庐、刘大年、夏鼐等。

董作宾在台湾逝世，终年 68 岁。

是月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为清人文集提要，分上下册，共二十四卷，共著录清人文集六百种。每种以文集名、卷标题各为叙录。叙录考作者行事，记书中要旨，究其论证得失，核其学识深浅，辨章源流。

作者自序中对有清一代的学术进行了综述，将清代学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开国之初。诸儒多明季遗民，大抵博学笃行，有志匡济，为学原本经史，不忘经世，不同于宋明理学的空谈，也不同于后来乾嘉经师的琐碎，体用兼赅，气象博大。第二为康、雍、乾时期。这时文字狱迭兴，学者相率不治近史，也不敢论涉政治，举世心思才力，一窜于穷经考礼，产生了乾嘉朴学。第三为嘉道时期。这时禁网渐疏，学者才逐渐作论政之文。自鸦片战争后，外侮迭乘，志士欲以致用自见，于是依附公羊今文学，张微言大义之绪。后来鼓吹变法维新者，都依托于此。

孙祚民在《江海月刊》第 11 期发表《有关中国古代农民战争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几个问题》。

文章指出，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是自在的阶级，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只能是自发的斗争，不可能有推翻封建制度的自觉认识，进一步发展了对农民政权问题的观点。

师宁在《文史哲》第 6 期发表《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文章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或编写中国史学史的工作，不但不能和过去旧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绩截然脱离，而且必须对于过去旧的中国史学史加以重新估价，尤其要对于梁启超的资产阶级史学加以批判的总结。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作者建议开展中国史学史有关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在编写中国史学史教科书的过程中逐步加强专题研究，加强开展中国史学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

12 月

10 日　关锋、林聿时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

是月　朱永嘉等在《学术月刊》第 12 期发表《论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主义及其应用——和宁可同志商榷》。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按其内容和体裁，可分作三类。第一类是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论文，有十一篇，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与军事制度、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等方面多有创获，如揭示出魏晋的兵士须和其家室所在地隔开这一个值得注意而又未为中外学者所论及的现象，以及南朝一代南士政治地位的变迁及武位不逮文职、文职亦有清浊之分的状况等情况。第二类是关于佛教文献考订的文章，有十二篇，其中半数以上是研究敦煌写本的，考订至为精详，多见前人所未见。第三类是读书札记，有四篇，主要是述及魏晋南北朝史的。该书集中体现了作者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和敦煌文献学的学术成就。

邓广铭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唐宋庄园制度质疑》。

该文不同意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所持唐宋庄园制度说，并从理论和史料上论证了唐宋庄园制度说之不能成立。

作者说，《中国历史纲要》用很大的力气替唐宋两代虚构了一个庄园制度出来，除了在理论上有种种扞格难通之处，对于史料的运用和解释也颇多曲解和附会。《中国历史纲要》中所举述描绘的唐宋两代的皇庄、官庄和官僚地主的庄园，也就是其中所大谈特谈的所谓庄园制度，事实上是完全属于子虚乌有的一种东西，因而它是难以成立的。

同期还刊登了丛翰香《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罗荣渠《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等文。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外国历史资料》创刊。

该刊是不定期非正式刊物，由陈翰笙创议设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组编辑，张椿年和陈启能具体负责，内容主要是摘录国外史学期刊的各类资料和信息，供内部参考使用，"文革"爆发后停刊。"文革"后期，又编辑出版了内部铅印的《世界史动态与资料》。这两项工作为后来《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的创办创造了条件。

1964 年

※ 陕西发现“蓝田人”头盖骨化石。
※ 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
※《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罗尔纲、戚本禹文章，引发李秀成是否变节投降大讨论。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著《武威汉简》出版。

1 月

21 日　杨向奎在《文汇报》发表《“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

是月　吴于廑在《江汉学报》第 1 期发表《谈研究历史的古为今用》。

胡玉缙撰、王欣夫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由中华书局出版。

全书包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60 卷、补遗 1 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2 卷。从乾嘉以来大量的藏书志、读书志、笔记、日记、文集里搜集有关考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失误的材料，按《四库提要》的原来次序，汇为一编。对清阮元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也一并按此方法处理。全书共订正书籍 2300 余种。作者间在文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考辨结果，或补前人所未及，或就争论的问题表达己见。

《外国史学动态》创刊。

内部刊物，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内容以报导外国修正主义历史学动态为主，同时也报导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学的有关情况”。刊行 9 期后停刊。

2月

27日　孙祚民在《人民日报》发表《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

文章对关锋、林聿时对蔡美彪的批判进行激烈反驳，认为他们的批评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文章发表后招致更为激烈地批判。

29日　白寿彝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

作者指出，中国史学史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其次要批判地总结中国史学成果。研究规律与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其中包含对古代史学遗产的总结，也包含对近现代历史著作的总结。所谓批判，是有肯定，有否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研究要详细占有资料，还需要研究有关的外国资料。

作者认为，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中，还需要研究有关的外国资料。首先，是要注意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以提高我们研究工作的水平。其次，我国近百余年的史学受到外国不少的影响，不探本溯源，不易进行深入的分析。再次，中外史学的发展应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也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特点，不研究外国史学，就没有一个综合比较的研究，也就不能认识各国史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我国史学的民族特点。最后，还应该注意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该文是史学史研究理论探讨方面一篇重要文献。

是月　师宁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

作者认为，二千多年来长期积累下来的史学遗产，是整个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最为丰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批判地继承中国过去的史学遗产，更好地发展今天的历史科学，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二千多年来，中国无论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自己灿烂的成绩和创造性的发展，其中很多东西，对历史研究工作仍然有它们有用的科学价值。通晓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的历史，对于每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说，应是一种必要的理论素养。而对于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学生以及刚开始从事历史科学工作的青年干部来说，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外，中国史学史的学习，应该作为他们基础理论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于中

国文化史的研究，以至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写，也有着重要的迫切的意义。

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由中华书局出版。

全书共分六部分，叙述了中国猿人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经过，遗址的分层和时代特点，以及中国猿人化石，他们使用的石器、骨器、火的遗迹等情况。作者认为，中国猿人是现代人的直系祖先，但不是最原始的人类。

侯外庐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不同哲学流派及其发展》。

3月

12日　李文海在《光明日报》发表《论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统一》。

17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审工作办公室、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四单位《关于历史教材中涉及我国同邻国关系问题的情况和今后处理意见的报告》。

《报告》提出，在编写历史教材时，对待涉及我国同邻国关系的问题，应该贯彻如下四项原则：一、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叙述历史事实，分析批判历史上的问题；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我国历史学家的传统看法加以审查，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三、认真贯彻国际主义精神；四、对现代修正主义者、反动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歪曲、诬蔑、诽谤的言论，必须根据事实和对外政策，加以揭发和批判。

27日　中国考古学会筹备委员会成立，郭沫若任主任委员。

原定当年7月下旬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后因故搁置。

是月　东方明在《红旗》第5期发表《加强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和讨论》。

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运用。认真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合历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展开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和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就整个情况看来，史学界对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和讨论还是注意不够的。结合历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系统地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也做得不够，不仅没有这方面的专著，这方面的论文也很

少。关于史学方法论的讨论，也是比较少的。作者认为，勤勤恳恳地搜集、整理、注释史料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受到尊重。但历史研究工作，绝不能限于整理史料。史学工作者应该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自己，逐步学会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利用花费了许多心血搜集、整理和注释的史料，从而概括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作者希望通过关于阶级观点、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引起更多的史学工作者注意研究史学方法论。

方仲在《江汉学报》第3期发表《必须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研究历史》。

4月

8日　陈旭麓、李道齐在《光明日报》发表《对什么是历史主义的一点看法》。

是月　祁龙威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论清末的铁路风潮》。

齐世荣、余绳武等选译《苏联历史论文选辑》第1辑由三联书店出版。

第2辑、第3辑分别于1964年、1965年出版。

胡滨《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系统考察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兴起和没落的历史。作者认为，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60年代为酝酿时期，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从封建主义正统思想中开始分化出来，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从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是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政治上主张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经济上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运动是高涨时期，康、梁等人把改良主义思想推向了高潮，并发展为政治运动；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没落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少数人仍然坚持改良主义路线并对民主革命思想进行攻击，在双方论战中，改良主义思想被击败，影响逐渐缩小。

李时岳《李提摩太》由中华书局出版。

张志康编写《绿林赤眉起义》由中华书局出版。

胡大冈编写《林清李文成起义》由中华书局出版。

任继愈《韩非》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威民、任树明《王小波李顺起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周自强编写《城濮之战》由中华书局出版。

5 月

29 日　戴逸、李文海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清官”》。

该文是批海瑞罢官运动中少数从学术出发进行探讨的文章之一。文章批评了吴晗等赞扬海瑞的观点，认为“清官”，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地主阶级中维护法定权利的代表之一。尽管“清官”们对豪强权贵的暴行进行过斗争，对人民群众的苦难流露过同情，以及在思想、性格、才能和作风上具有各不相同的个人特征，但维护封建的法定权利，这是“清官”们所共有的本质特点之一。“清官”反对豪强地主的斗争，就是封建的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相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豪强地主追求无限制的剥削，而“清官”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种非法剥削。这种斗争不但是封建制度所许可的，而且还是维护封建法定权利所必需的。

是月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2 辑出版。

第 1 辑收集北京地区史料八种、直隶地区的史料九种，内容多是亲历者的日记或书信孤本。第 2 辑收录了传世很少的林学瑊编《直东剿匪电存》及东北地方史料三种。这些史料反映了义和团在直、鲁两地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脉络，以及在京、津、保地区的发展和在东北地区的若干活动。

贾兰坡主持发掘陕西蓝田公王岭遗址，发现“蓝田人”头盖骨化石。

距今约有 100 万年（一说 80 万年），是继北京周口店“北京人”之后所发现的最重要的早期人类化石之一。

山东省博物馆及文物管理处等单位开始对临淄齐国故城进行全面勘查和重点发掘。

漆侠在《哲学研究》第 5 期发表《农民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面，还是地主阶级的后备军?》。

文章针对蔡美彪和孙祚民关于农民战争的看法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农民阶级有自己的思想活动和自己的思想指南，在政治上要求消灭封建等级特权，获得平等权利，在经济上要求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这些思想构成为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石兴邦在《历史教学》第5期发表《我国奴隶制国家形成前夕的社会经济形态》。

作者概述了“龙山文化系统”和齐家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了细致分析。

文章推测“龙山文化末期就是夏文化的开始，或者夏文化本身就是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阶段”。

曾运乾《尚书正读》由中华书局出版。

阎应清、王业猷编写《项羽和刘邦》由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

前身为1959年设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组，1962年扩建为世界历史研究室。1964年5月，为落实毛泽东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成立系列外国问题研究所的指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在研究室的基础上扩编，正式建成世界历史研究所，成为中国科学院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

6月

3日　王思治在《光明日报》发表《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对吴晗赞扬海瑞表示不同意见。

作者认为，“清官”、“好官”是封建制度的“忠孝志士”，他们对其所在的王朝忠心耿耿，至死也不会有二心。因此，既不能根据他们的言论，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如“为民”），就信以为真，也不能专从历史表面着眼，认为他们的活动真是站在农民一边；而是应当对其言行进行阶级分析，拨开其虚幻的表象，透视事情的本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是看他说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最终对哪个阶级有利。

17日　吴晗在《光明日报》发表《〈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读后》，对王思治的文章予以答辩。

文章重新澄清了自己的观点，指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可动摇的，学术上的争论是必需提倡的，正确的批评是应该争取的，学术问题上指出的

错误是应该承认、感谢的。但是，必须要建立一种实事求是的风气，要针对问题。如果所针对的是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别人没有这样说的话，或者对别人说的话截头去尾，甚至根本加以改造，据此而提出批评，捕风捉影，这种风气，是不应该鼓励、提倡的。

自此，学术界展开关于海瑞评价和“清官”评价问题的讨论，讨论的问题主要围绕吴晗的观点而展开。最初的讨论虽然因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而出现了很多“左”的观点和倾向，但总体来看仍然属于学术争鸣性质。

是月　宁可在《历史研究》第 3 期发表《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对林甘泉进行回应。

作者认为，把历史主义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是林甘泉实际的看法。林甘泉也没有论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的阶级观点跟历史唯物主义到底是不是不完全相等的概念，因此，林甘泉实际上还是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看成是没有差别的同一个观点。但统一不等于没有差别，统一并不排除差别，只有分析了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二者的差别，了解了它们是在什么条件之下统一起来的，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统一，才有可能在实际的研究中真正做到二者的统一。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宣称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统一的，更重要的是要阐明它们是怎样统一起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统一，以及为什么在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常常不容易做到二者的统一。如果对于这一切问题仅仅都用“统一”两个字来回答，不足以纠正那种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割裂并且对立起来的做法。不能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统一理解为二者毫无区别。历史主义原则侧重而且首先是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阶级观点则着重根据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对所研究的对象做出科学的解释。为了防止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作简单的抽象的理解，强调它的历史性，强调对它的理解应当具有历史主义精神，是完全必要的。必须把二者紧紧地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它们说成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如果那样做，就会使人以为有了这个就自然会有那个，从而在实际研究中就会引导到不是把两个方面联系、结合起来，而是抓住一个方面而放掉另一个方面。

由翦伯赞提起、林甘泉反驳和宁可再反驳引起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之争吸引了大批学者参加，围绕着历史主义问题的论战由此展开。

尚钺在《历史研究》第 3 期发表《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该文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一些人往往从今天的标准出发对历史

人物进行功过的评定，并据此对有些历史人物进行翻案工作。但因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不明确，所以在翻案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把历史人物现代化的毛病。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提到一定的历史范畴，因为不拘是秦始皇、曹操、唐太宗、武则天或康熙都只是当时社会关系的产物。如果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忽视了历史的现实物质基础，就很难对历史人物做出正确判断。如果不是这样，就要走上这样一个途径，历史人物的行动是遵照着历史过程之外的某种观念来实现的过程，就很难避免把历史人物描写成超越了历史，超越了时代的理想的化身。

何兹全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周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张晋藩、邱远猷编写《科举制度史话》由中华书局出版。

吕浦、黄巨兴等译，齐世荣编校《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论苏联历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

8日　戎笙在《人民日报》发表《从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看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

文章对蔡美彪、孙祚民对农战史研究的批评提出批评。文章说，非历史主义是应该反对的，但不同意蔡美彪、孙祚民那种反法，认为把古代农民无产阶级化了是错误的，应该反对。但是，像蔡、孙那样，把古代农民地主阶级化了，同样也是错误的。把古代农民地主阶级化的种种论点，是在反对非历史主义的口号下提出来的。这些论点虽然脱离了阶级观点，但也没有坚持历史主义，蔡、孙二人的观点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也是十分突出的。

作者认为，作为一种观察问题的武器，一种科学的方法，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统一的，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起来。违背了历史主义，同时就脱离阶级观点；脱离了阶级观点，也违背了历史主义。

是月　邹衡在《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试论殷墟文化分期》。

本文从分析部分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和铜器的形制类型入手，再结合部分单位的层位关系和器物共生关系，分别确定遗址和墓葬的初步分期；然后综合各期遗迹和遗物的特征，再对殷墟文化各期内涵作较全面地对比研究。

《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以

及戚本禹《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两文，拉开李秀成是否变节投降大讨论序幕。

罗文长达7万言，认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农民起义领袖在极度艰危的时候利用伪降以取得重整旗鼓的机会的事例，李秀成就正是用“招齐章程”的计策去哄骗曾国藩。这篇长篇考证文章条分缕析，先分析李秀成自述中那些自污的话随处露出虚假，次分析他说这些话的原因并不是对革命事业丧失了信心、不是贪生怕死、不是受了曾国藩的欺骗等，从而得出李秀成是在用“苦肉缓兵”计的结论，最后论述了李秀成用“苦肉缓兵”计的条件、方法和取得的效果。戚文仍坚持李秀成投降变节、背叛革命的观点，指责罗尔纲的世界观有问题，明确表示“罗尔纲先生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并指责那些与其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人物，而是用革命的词藻来为变节分子进行粉饰”。学术争论遂演变成为政治立场问题，学术问题变成意识形态问题。

7月24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一文。8月23日，《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又同时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同一天，罗思鼎的《大节、气节、晚节——评李秀成问题讨论中的所谓“功过”问题》在《解放日报》发表，所持观点与戚本禹同声相和。

戚本禹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后，范文澜在近代史研究所主持召开讨论会，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邓拓、吴晗、黎澍等参加会议，戚本禹的观点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其中尤以翦伯赞的发言最为激烈。此次会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历史学界的黑会。

随着戚本禹两篇文章在两大报的相继发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场李秀成是否变节投降的讨论。全国性大报以及地方报纸、与史学有关的学术期刊都投入了这场讨论。根据《太平天国史论文选》所附“太平天国史报刊文章索引”，从这时起，到1965年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发表有关李秀成的文章340多篇。凡与戚本禹等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均受到压制甚至打击，对李秀成的研究、讨论也变成了对李秀成的政治大批判。

8 月

18 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中谈论《红楼梦》的历史内涵。

毛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

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29日　国务院批准文化部《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管理办法》。

是月　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以有关史籍、碑刻与《通鉴》比较勘验来纠正《通鉴》原文的讹误，共获670余条。尤重于订正人名、地名和事件发生的时间。对不能断定的问题，只记异同。所列条目均按《通鉴》原文顺序排列，考订的范围也限于《通鉴隋唐记》。每一条都先引原文，然后旁征文献或石刻，加以考辨。《通鉴》的名词、术语，都一仍其旧，标题也多是摘录原文。本书目的在于考史，而不是论史，“侧重在比事方面”，对原书观点并不多涉及，只是考证史实、校订文字。

安志敏编写《仰韶文化》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简略介绍了仰韶文化的村落、建筑、生活活动、手工业的发展、文化艺术和葬俗。

沈嘉荣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若干问题》。

9月

23日　裴汝诚、项立岑、郭豫明在《光明日报》发表《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

是月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作者代表作，主要探讨了汉唐间土地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问题。共收入七篇文章，即《秦汉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与秦末农民起义的关系》、《秦汉间个体小农的形成和发展》、《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王莽改制与农民起义的关系》、《东汉更役戍役制度的废止》、《论黄巾农民起义的口号》、《汉唐间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均田制》。各篇论文独自成章，且论点互相联系，将这段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和基本的历史联系会通为一体。

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作者认为秦汉郡县制建立以后至唐代，全国范围的土地都集中在专制主义国家手里，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皇帝

是最高地主，但这并不排除私人或公共占有权和使用权。此一观点受到学术界重视。

赵靖、易梦虹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全书共上、中、下三册，1964年至1966年陆续出版。该书是1949年后第一部关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著作。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著《武威汉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1959年7月甘肃武威县汉墓所出汉简之整理成果，分叙论、释文、校记三部分。叙论部分介绍了武威磨咀子竹木简墓的发现经过，论述了简本《仪礼》在汉代经学上的地位，并以实物来揭示汉代的简策制度，指出简册的整理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并附有主要参考书目。由于这样完整的成篇经书为以前所未发现过，使人们可以从实物上观察、考索，对汉代简册制度得到较前人稍为具体正确的结论。书中对汉代书简的材料、长度、刮治、编联、缮写、容字、题记、削改、收卷、错简、标号、文字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对竹木简的整理及其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历史论丛》第1辑出版。

主要选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研究人员的报告和论文，不定期出版。"编者的话"说："这里既有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也有重要史实的阐述，有各种历史问题的理论分析，也有某些重要史料的考证。"第1辑收录田昌五《马克思恩格斯论亚洲古代社会问题》、赵纪彬《"人""仁"古义辩证》、熊德基《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及其相关诸问题》、朱大渭《孙恩徐道覆起义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陈可畏《东越山越的来源和发展》、张泽咸《唐代的客户》、陈高华《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王毓铨《明代的王府庄田》等论文。

田昌五在《历史论丛》第1辑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论亚洲古代社会问题》。

该文在广泛征引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作者同意童书业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认为从历史发展序列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当然是指原始社会"，或者说是"文明时代以前的氏族社会"，但撇开亚细亚社会所处的这种或那种历史条件，它又可以指"长期残留在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原始共产主义成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亚细亚社会形态，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合方式而论，无论在逻辑中或在历史中，都是指的原始共

产主义，意味着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原始社会形态”。作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判断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原始共产制的代名词，它并不是专属于亚洲的东西，也不包括亚洲所有的民族和国家；再者，作为亚细亚社会形态的这种原始共产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性质，它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超越于社会发展阶段和各时代生产方式而独立、特殊的东西。

庞朴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试论农民战争的革命性质——评蔡美彪、孙祚民同志的“两种革命论”》。

文章不同意蔡美彪、孙祚民否定农民战争是社会革命的观点，认为他们的看法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同时掩盖了一切革命的阶级基础，美化了剥削阶级的革命，贬低了被剥削阶级的革命。蔡、孙否认农民战争起因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就等于否认农民战争是阶级斗争。这就决定了他们不能不把农民战争等同于地主阶级争权夺利的战争，不能不把农民和地主“合二而一”。

10 月

夏鼐选编《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由历史教学出版社出版。

11 月

4 日　姚学敏、祝瑞开在《光明日报》发表《怎样理解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统一——和李文海同志商榷》。

18 日　力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怎样看待历史主义？——与宁可同志商榷》。

是月　朱活在《史学月刊》第11期发表《从农民政权问题来看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运用——评孙祚民〈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

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数学史组集体编写，对中国数学发展史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对各阶段数学发展和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哲学思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并对历代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对中国数学发展的贡献作了评价。

周年昌、黄宣民在《新建设》第10、11期合刊发表《如何看待

剥削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与翦伯赞、宁可等同志商榷》。

《文史哲》第 6 期集中刊发一组批判孙祚民史学观点的文章。

这组文章包括“鲁史兵”《对孙祚民同志在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必须彻底批判》、王阁森《究竟是历史唯物论，还是历史唯心论——评孙祚民同志在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孔阶平《所谓反对美化农民，实际是丑化农民——与孙祚民同志商榷》等。

“鲁史兵”说，自 1955 年以来，孙祚民就在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很多文章中，散布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错误观点。这些错误观点的实质，是在反对非历史主义的幌子下，公然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仇视农民，诬蔑农民，放肆地阉割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歪曲农民战争的正义性质，抹杀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宣扬阶级合作，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奴役进行种种的辩护，根本颠倒了历史的是非。王阁森说，孙祚民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外表上打着坚持阶级观点的名号，装点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实际上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孔阶平说，孙祚民是在所谓反对美化农民和农民战争的幌子下给农民和农民战争抹黑，对农民进行了恶毒的丑化。

12 月

谢国桢编著《增订晚明史籍考》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介绍晚明史籍的工具书，收集了从明代万历年间至清军入关以后大量的农民运动、人民抗清斗争的史料书目，并对这些书籍的内容作了详细介绍。

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唐长孺在《江汉学报》第 12 期发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

何芳川在《江海学刊》第 6 期发表《试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统一》。

该文主要是针对林甘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以及关锋、林聿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等文进行反驳，批评他们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当成一回事，把阶级观点等同于阶级斗争学说，把历史主义扩大为历史唯物主义。

该文以委婉的方式为翦伯赞做了辩护。

是年

春，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室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世界历史学科建设问题”座谈会。

座谈会由陈翰笙主持，周一良、吴于廑、于光远等学者应邀出席。

冬，科学院古脊椎所由裴文中主持发掘贵州黔西县观音洞遗址。

这是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最大的洞穴遗址，被命名为“观音洞文化”。

1965 年

※ 云南元谋发现我国最早人类化石。
※ 孙达人发文提出“反攻倒算论”。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甲骨文编》出版。
※ 杨宽《古史新探》出版。
※ 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 山西出土“侯马盟书”。
※ 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1 月

《文史哲》第 1 期刊登一组批判文章。

这组文章包括《周谷城怎样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评〈中国通史〉近代部分》、《不能把农民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流寇主义”——评孙祚民同志〈中国农民战争和“流寇主义”问题〉一文》、《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根本目的何在？——对〈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一文的商榷》等。

此后，《文史哲》杂志又刊登大量批判周谷城、孙思白等学者的大批判文章。

2 月

10 日　谢本书在《光明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是月　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分析探讨了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详细记述了战争的过程，歌颂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介绍了清政府对外妥协退让，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经过，并着重探讨了中英两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关系，同时分析了英国同法国、美国和俄国之间相互勾结

与斗争的复杂国际关系。本书广参中外官方文件、报纸、杂志和个人著述，大量引用了英国外交部档案，以及未公开发表的当时英国当权人物的私人通信，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林弘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历史完形论”批判——评周谷城先生的反动史学理论》。

3月

2日　刘大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

1963年12月，作者参加中国访日学术代表团，在日本历史教育工作者协会大阪支部举行的欢迎会上演讲，其间回答了日本学者提出的六个问题。这六个问题是：一、谈谈对日本历史教育工作的想法？二、怎样讲授世界历史？讲授世界史的时候，中国史应该占据怎样的地位？三、古代史与近代史的比重如何安排才合理，教古代史如何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四、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在日本现在的情形下，是否也可以对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物作较好的评价？五、关于历史分期问题，中国是怎样认识的？中国学者对于近代和现代的分期似乎有两种不同意见，联系到当前未解放的日本的情形，应该怎样考虑近代和现代的划分？六、日本侵略过中国，作为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如何看待中日战争的历史？事后，作者根据日本《历史地理教育杂志》刊载的讲演记录稿写成本文。

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主要集中在第二个和第四个问题的回答上。刘大年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应当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潮流所在地，哪里形成了改变世界面貌的人民革命的潮流，旧世界在哪里被推翻，新世界在哪里成长起来，世界历史的中心就是在哪里。关于评价历史人物，刘大年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把劳动人民看作历史的主体，肯定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第一，统治阶级里某些人的进步作用，是以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为前提的；第二，统治阶级里那些人所以能够起一些进步作用，只是由于受到了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阶级斗争的约制，或者说是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推动；第三，统治阶级里面某些人物的进步作用紧密地和残酷的阶级压迫、阻滞历史前进交织在一起，他们即使在前进的时候，同时也在反动、倒退。”

毛泽东看了《人民日报》上刘大年的文章后，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及本文，认为该文所言“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应当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潮流所在的地方”讲得很对，但对于该文评价历史人物的意见，毛泽东则提出一个问题：“照这么说，剥削阶级的历史人物还是没有什么作

用啰!"

胡双宝编写《汉字史话》由中华书局出版。

4 月

黄烈在《历史研究》第 2 期发表《有关氏族来源和形成的一些问题》。

《历史研究》第 2 期开始发表群众撰写的文章。

为体现"写群众的历史，为群众写历史"的要求，该期杂志发表中共巢县县委宣传部编《一个贫农的经历——唐家义翻身史》以及中共栖霞县县委宣传部《牟二黑血腥发家录》。此后，由群众撰写的一些文章开始刊登在《历史研究》上。

5 月

1 日　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两枚距今 170 万年的人类门齿化石，为我国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可作为我国首次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代表。

19 日　柴德赓在《光明日报·史学》第 308 期发表《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

是月　郭沫若《殷契粹编》由于省吾校阅后由科学出版社重新出版。

《后汉书》整理标点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李赓序《彝陵之战》由中华书局出版。

范大声在《华东师大学报》第 1 期发表《批判打着"历史主义"旗号反对阶级分析的资产阶级历史观》。

6 月

佟柱臣编写《龙山文化》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简要介绍了龙山文化的发现过程和文化内涵，认为龙山文化是在仰韶文化之后，小屯文化以前，是相当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一种文化。其结束的时间有参错，河南地区发展最早，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多年，中原地区的原始公社制就解体了，进入夏朝奴隶制社会，陕西地区结束较晚，

直到公元前一千多年，才为西周奴隶制社会所取代。

季羡林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杨建芳《安阳殷墟》由中华书局出版。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在《明代军屯的特点及其历史渊源》、《明代的军户》等文章基础上完成了这部开创性著作。全书分上下两编，约25万字，上编主要叙述明代军屯制度及作用，下编着重讨论了明代军屯上的生产关系及军屯的破坏问题。

该书出版后被国内外明史学者大量引用，被称为研究明代军事史、经济史的典范之作。

7月

8日　刘大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亚洲历史怎样评价?》。

8月

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是中国第一本中非交通史论著，包括五篇论文：《中非交通的历史关系初探》、《从东非史上看中非关系》、《再论中国同东非的海洋贸易》、《中国同北非的交往》、《中国同非洲的海上交通》。在史料的安排上，作者尽可能以我国材料为主，不足之处则以外国材料为补充。

金景芳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井田制的发生和发展》。

作者认为，井田制应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亦即产生于开始从氏族共同耕地改为分配于各个家庭并实行定期重行分配的时期。井田的形式反映这时人们的平等要求和相当低的认识水平。

同期还刊登了何兹全《周代土地制度和它的演变》、杨讷《元代农村社制研究》等文。

牛致功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观点的问题——与宁可同志商榷》。

9月

22日　孙达人在《光明日报·史学》第315期发表《应当怎样

估价“让步政策”》，提出“反攻倒算论”。

针对漆侠和孙祚民所强调的“让步政策论”，作者认为，在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王朝不可能执行“让步政策”，只会实行反攻倒算。较大的农民战争的作用在于推翻和改造了封建王朝，削弱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文章指责“让步政策论”是“根本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理论”。作者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反攻倒算论”。

孙达人还说：“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待农民，决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又说：“封建政权究竟采取什么样性质的政策，不是取决于革命压力，而是取决于地主阶级当时的阶级利益，也即决定于地主阶级的本性。”

作者发表此文时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而主张“让步政策论”的最有影响的人物翦伯赞则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因而此文一出，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和激烈讨论。

孙达人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对他的观点表示赞赏。1965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时，曾经说到孙达人这篇文章，称赞他的观点。他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出了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又说：“研究一下近代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就要实行‘轻徭薄赋’政策。那时，人民很苦，没有多少东西好拿。‘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最有利。”

“让步政策”讨论中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具体看法：一是认为“让步政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两面政策，是统治阶级的进攻手段；二是认为地主阶级的本性不会改变，既不可能接受农民战争的教训，也不可能让步；三是认为“让步政策”只能出现在革命爆发之前，在农民战争之后，统治阶级就不会采取“让步政策”。

是月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甲骨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在1934年编印的同名初编本基础上改订，由河南省历史研究所孙海波执笔编纂。编纂之前，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邀请唐兰、商承祚、于省吾、张政烺、陈梦家、孙海波等共同商讨了改编的体例，郭沫若也提出书面意见。初稿完成后，经过多次修订。

新版在考订上采纳了许多新研究成果，在材料上较初编本更加丰富。

罗荣渠编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月

徐宏慧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置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于何地？——和宁可同志商榷》。

杨宽《古史新探》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作者探讨西周、春秋时代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论文专集，重点研究了当时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共收论文十四篇，包括《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关于西周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讨论》、《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三种不同的主张》、《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试论西周春秋间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试论西周春秋间的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籍礼”新探》、《“冠礼”新探》、《“大搜礼”新探》、《“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射礼”新探》、《“贽见礼”新探》等。

这些文章大致围绕两方面内容展开，一是对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和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以及西周、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宗法制度、贵族组织、学校制度等进行探讨，二是对西周、春秋时代“礼”的起源、流变和性质、作用等进行探讨。作者在论述中独辟蹊径，对中国奴隶社会提出许多崭新看法，大大推进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作者在书中引用了相当多民族学研究成果来与中国奴隶社会作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利用了有关易洛魁人、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德意志人的资料。书中还借鉴了有关兄弟民族历史研究的成果。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论文集，辑录了作者十二篇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包括《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页》、《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评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论康熙》、《回答

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亚洲历史怎样评价?》、《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十五年来中国的历史研究工作》，所选文章多曾引起国内外广泛评论和争论。

该书为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1978 年再版时易名为《中国近代史问题》。

湖北省博物馆在江陵望山发掘三座中型木椁墓，出土越王勾践剑等重要文物。

羽白编写《赤壁之战》由中华书局出版。

11 月

10 日　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启对《海瑞罢官》的大规模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导火索。

1959 年 4 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遂于 6 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1962 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 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

姚文的写作得到毛泽东首肯，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秘密策划八个多月，曾十易其稿。文中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指控《海瑞罢官》就是要鼓吹“单干风”、“翻案风”，要求恢复个体经济，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这就把吴晗推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对吴晗的批判随即在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展开。从 1965 年底至整个 1966 年，报刊上连篇累牍刊登批判吴晗的文章，粗略统计，这一时期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学术月刊》等报刊发表的批判吴晗的文章就达 500 余篇，许多历史学者撰文对吴晗进行粗暴批判。

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会见外宾时谈到这次批判：“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 11 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

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11日 《文汇报》记者就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采访翦伯赞。

翦伯赞严厉批评姚文元“粗暴”，是“打棍子”，是“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同时指出：“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如果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15日 《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登载《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

其中讲到吴晗在11月14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11月20日的《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7期登载《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内中有：“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

17日 蜀群在《光明日报·史学》发表《“让步政策”的阶级实质》。

文章认为，对“让步政策”只应揭露，不应颂扬；“让步政策”是坏事，而不是好事；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绝不是透过“让步政策”来体现的。作者在文章结尾特意说明：“我们只是反对赞美‘让步政策’，主张揭露它的反动性，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承认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作为革命的副产品而存在的事实。”

这期《史学》同时发表的王穆《必须全面分析问题——对“让步政策”的一点看法》一文，不同意孙达人的意见。文章认为：“封建统治者或资产阶级统治者，在革命力量的压力下，是会做出某些让步的，这既是出于当时它对自身阶级利益的考虑，也是革命力量的进攻所逼使的。不能说封建政权对农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仅仅是出于当时它对自身阶级利益的考虑，与当时革命力量的进攻没有关系。”

18 日　《光明日报·史学》开始大量登载“大批判”文章。

是月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篇》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踵《唐诗纪事》、《宋诗纪事》、《辽宋元诗纪事》、《明诗纪事》之例，纂《清诗纪事》，因先编顺治、康熙两朝，故名《初编》。

全书共八卷，分上、下两册，将明朝遗民列为前编，凡两卷，顺治、康熙两朝的作者按地区分甲、乙、丙、丁四篇，凡六卷。共收作者 600 人，录诗 2000 余首。作者依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撰集此书，所选的 2000 首诗大多都属有“事”的篇章，因而不限于名家，不着眼于文学艺术，也不在乎诗（文学）与史（史书记载）的吻合，而贵乎诗能记史外之事，能提供被忽视的史料或发掘史料的线索。书中作家小传，除详述生平事迹外，还就其整个著作或某一专集进行学术的和人品评价，对各家专集的题目、分集子目、卷数篇数、辑刻年代与前后雕版异同尤为注意，对考订清代文献尤有助益。另外，小传中还提供了许多未被注意的史料，并有不少纠正旧说的考证。

山西省考古所在侯马晋国故城发现“侯马盟书”。

盟书又称“载书”，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而经常举行的一种盟誓活动。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取信于神鬼。侯马盟书是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是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公元前 497—前 489 年）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盟誓遗址”在侯马晋城遗址的东南部，面积约 3800 平方米。

侯马盟书的出土，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有重大意义。1976 年 12 月，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侯马盟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2 月

8 日　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文对翦伯赞不点名批判，认为提倡历史主义就是反对阶级斗争，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文章认为：“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戚文给翦伯赞加上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罪名，

说他是“近几年来史学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尖锐斗争中资产阶级一方的代表人物”。

21日　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

在谈到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两篇文章时，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毛泽东传》的著者认为：“他对《海瑞罢官》‘要害’的判断和主张要点翦伯赞的名，显然同他看了《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后引起的思考有关。”

22日　戎笙在《光明日报》发表《歪曲了历史真实的阶级斗争》。

27日　吴晗在《北京日报》发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全文1.8万字，对自己写作《论海瑞》和《海瑞罢官》错误倾向进行检讨，批判自己对海瑞的写作缺乏阶级分析，犯了立场错误，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完全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都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忘记了阶级斗争。揭露自己思想深处有大量的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思想。认识到这不只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不只是一个个别历史事实问题，而是用什么思想指导，用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问题；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两种思想方法、两种观点、两条道路的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思想、学术战线上的两条道路问题。

文章发表后，吴晗遭到新一轮更加猛烈的批判。

29日　方求在《人民日报》发表《〈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该文由周扬主持写作，1.5万多字。文章认为，吴晗歌颂海瑞、歌颂“清官”，是通过歌颂封建阶级的英雄人物，狂热地歌颂封建国家和法律、

封建纲纪、礼教和道德，歌颂封建制度的整个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海瑞罢官》是吴晗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是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邓广铭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吴晗同志的〈论海瑞〉》。

31 日　《文汇报》邀请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参加座谈的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上海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蒋星煜、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谭其骧、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任李俊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束世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宽、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魏建猷、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张家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德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主任陈向平，以及陈守实、李平心、朱金城等。发言的有十二人。座谈纪要发表在1966 年 1 月 7 日的《文汇报》上，1966 年 1 月 13 日《人民日报》节载了座谈纪要。

周予同在发言中从侧面对强加在吴晗身上的罪名进行了辩护：“目前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那么，在蒋匪帮时代，是否做坏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吗？中国封建社会便有三千年历史，阶级成分的变动也很大。因此，对封建社会的人物要作具体分析。全盘否定封建社会的历史，那将要把世界上优秀的一部分文化淹没了。现在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倒不大注意了，敌人美帝国主义拼命在研究明史，日本也很注意中国史的研究，甚至在组织会社研究唐玄奘。将来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只好取材外国资料了。”

是月　《历史研究》第 6 期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黎澍在《记〈历史研究〉杂志》一文中回忆说：“1965 年 11 月，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当时我确实没有思想准备，因为我认定《历史研究》没有必要发表文章对任何一个戏剧进行批评，哪怕它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后来听说硬是非参加批评不可，如果不参加批评，那就不仅是缺乏‘政治敏感’，而且成了大问题。于是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首先在 1966 年第 1 期（实际为 1965 年第 6 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同时赶写文章进行批评。”

戴逸、李文海在《新建设》第11、12期合刊上发表《从海瑞研究看吴晗同志的历史观》。

人民日报理论宣传部、文艺部编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论文选》。

书中辑录了1949年到“文革”前这一时期史学界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十九篇文章。

是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成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

该实验室由夏鼐领导创建，仇士华、蔡莲珍担任具体科研工作。实验室建成后，配合考古学研究厘清了考古年代研究中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如齐家文化的年代、钱山漾文化的年代、华南地区一些史前洞穴的年代、良渚文化的年代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并为确立旧石器晚期以来中国史前考古年代框架奠定了科学上的基础。

1966 年

※ 尹达发表《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
※ 戚本禹等发文对翦伯赞进行政治批判。
※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出版。

1 月

9 日　史绍宾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

文章指责吴晗的“自我批评”是假“自我批评”之名，行进攻之实，以退为进，来顽固地维护自己的错误观点。

针对吴晗文中提到自己“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甚至还有封建的东西”这一问题，作者认为，这种把政治上的阶级立场和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截然分开的说法，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也根本违背事实，它正是一种最标准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表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学术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或手段。一个人在政治上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在学术上便会做出与他的政治立场相适应的表现。学术总是服从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这就告诉我们，政治上的阶级立场与学术上的阶级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不论在政治上，或在学术上，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只能有一个，而不能有两个。

据王春瑜《怀念尹老夫子》（《中华读书报》2007 年 3 月 7 日），“史绍宾”为一写作组，为“史哨兵”谐音，由尹达组织而成，“猛批翦伯赞，就是哨兵们的战绩之一。也因此，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青睐”。

12 日　朱活在《光明日报》发表《“让步”就是进攻》。

27 日　受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的压力，郭沫若致信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请求辞职。

信中云：“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

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此信反映了当时郭沫担心对吴晗以及翦伯赞的批判有可能波及自身的恐惧。龚育之《从〈二月提纲〉到东湖之行》披露了此信的写作背景："估计郭老可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意坐到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也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

1966年2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指示，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2月

3日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会后由彭真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10日　第二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是月　尹达在《红旗》第3期发表《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

作者在文章中首次明确提出"以论带史"的口号，指出："我们提倡'以论带史'。就是说，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对于大量史实给予科学的分析，反对'为史实而史实'、'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

该文最突出之处在于将阶级斗争引入对史学界的分析批判中。作者认为历史学界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把翦伯赞、吴晗、范文澜、黎澍等所谓1949年前的"左翼史学家"、1949年后的"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右翼"摆放到"史学革命"的对象的地位上。作者认为在具有高度党性的历史科学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的斗争，也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说，剥削阶级史学有长期的历史，剥削阶级史学以及作为它的灵魂的唯心史观，绝不可能由于革命的胜利而自行消亡。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史学家，必然采取各种形式，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进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

下，他们不可能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歪曲马克思主义，以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反对马克思主义。文章用意在于将翦吴范黎彻底打倒。

该文为作者 1964 年 8 月写就、供内部参考的《史学遗产与史学革命》部分内容改写而成，3 月 2 日《人民日报》转载。中发〔66〕267 号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附件之二透露“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

这篇文章还同时刊登在《历史研究》该年第 1 期上。

3 月

17 日　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学术批判问题发表讲话。

毛泽东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

3 月 28 日至 30 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连同康生单独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谈话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

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还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24日　戚本禹、林杰、阎长贵在《人民日报》及《红旗》第4期发表《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文章对翦伯赞进行指名道姓地攻击，声称：“在史学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史学方面的一方，吴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文章全面抨击翦伯赞的史学观点，《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是“两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翦伯赞是“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文章给翦伯赞强加四大罪状：一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二是“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三是“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四是鼓吹“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戚本禹等给翦伯赞的史学观点作了总的“判决”，说翦伯赞“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就是‘二反二保’的纲领，即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保护‘史料即史学’、‘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保护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这条史学纲领的遮羞布，就是‘老掉了牙’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并称“这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这篇文章标志着公开批翦的开始。此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掀起一个批判翦伯赞和吴晗的高潮。

27日　史绍宾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历史科学的革命方向——评吴晗等同志的资产阶级史学路线》。

文章以批判吴晗为名，实际把矛头指向翦伯赞。

文章说，以吴晗为代表的一股反动史学思潮，拼命抵制历史科学的革命，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提出了一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史学路线。于是，史学领域的两种历史观、两种方法、两条道路的斗争更加激烈和尖锐起来。文章认为吴晗等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法宝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他们极力讴歌“圣君贤相”，吹捧“清官”、

“好官”，大声疾呼保卫帝王将相，保卫王朝体系。在农民战争问题上，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文化道德遗产继承问题上，以及历史科学方法论问题上，各色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都在“历史主义”的招牌下散播出来，“历史主义”风靡一时。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唯成分论”，是“片面”的、“机械”的、“狭隘”的，是“非历史主义的根源”，鼓吹用“历史主义”来“补充”阶级观点。文章提出，是否承认阶级观点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的根本分界线。吴晗等人的“历史主义”，恰好是阉割和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的。因此，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文章对吴晗反对“以论带史”、提倡“论从史出”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文章最后还对翦伯赞做了点名批判，说“翦伯赞同志也有一套完整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史学纲领，而且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影响极为恶劣”。

4 月

2 日　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文章长达 1.5 万字，以任意罗织、捕风捉影、指鹿为马的方式对吴晗进行了批判，说吴晗整个的海瑞宣传都是为着一种现实需要服务的，倾注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的、抒发了一种反党感情的、号召人们向一种抽象的政治反对派精神学习的作品。《海瑞罢官》这出戏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不久以前被人民“罢”了“官”的那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弹起“魂兮归来”的曲子，企图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他弹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音乐伴奏声中东山再起。这才是《海瑞罢官》的真正主题。

一天后，《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

3 日　越矢在《光明日报》发表《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评翦伯赞同志〈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5 日　关锋、林聿时在《红旗》第 5 期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文章长达 2.2 万余字，从五个方面批判了吴晗所写《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攻击这两篇文章是代表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是为右倾机会主义服务的。《海瑞骂皇帝》骂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骂的是我们敬爱的党中央。《海瑞罢官》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赞美和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丢了官，“不屈服，

不丧气”，“失败了再干”，鼓吹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居官重整纪纲”，即篡夺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

文章批判吴晗在历史科学领域举起了四面黑旗，这就是：保护帝王将相，不准批判；保护为帝王将相写家谱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不准打破；反对大写农民战争、歌颂农民战争，极力贬低劳动人民的作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宣扬史料就是一切，说什么“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他还祭起了三个“法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攻击史学革命：一个“法宝”，叫作“反对‘左’倾”，只要你批判帝王将相，批判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去打破封建王朝史学体系，就是“左倾”，就应该打倒；一个“法宝”叫作“非历史主义”，你批判帝王将相是非历史主义，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非历史主义，统统要不得；一个“法宝”叫作“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放空炮，你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放空炮，非反掉不可。

4月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4月6日《文汇报》、《解放日报》也予以刊登。

6日　越矢在《光明日报》发表《吴晗同志打着反“左”的旗子反对史学革命》。

7日　方求在《人民日报》发表《不能回避要害问题——评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文章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吴晗通过他的作品，把政治的赞美、同情和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英雄”的身上，而把政治的烂泥、污秽、谴责和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吴晗无论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挑战的。

10日　《人民日报》登载《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资料摘抄）》。

13日　史绍宾在《人民日报》发表《胡适与吴晗》。

文章考证了30年代胡适和吴晗之间的关系，认为30年代的吴晗是胡适精心培养的一个标本。在胡适被人民撵走以后，吴晗却在解放了的祖国大陆上，为逃亡海外的胡适招魂。1950年，他写《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以表示对胡适提携的感激之心，并为胡适的反动行径辩护。

1954 年，在批判胡适思想的斗争中，吴晗继续保持弟子对师长的“尊重”，没有发表一个字批判胡适。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大反复的 1961、1962 年，他公然在政治上、学术上替胡适翻案，公开贩卖胡适的货色。他完全继承了胡适给知识分子提出的不革命反革命的四个药方。胡适给青年的第一个药方是：“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吴晗则向青年鼓吹道：“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不时时给自己提出问题，并且跟踪追击，深入到史料中去。”胡适给青年第二个防身药方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吴晗则告诫青年：“必须养成自学习惯。……必须不断地自学。”胡适给青年的第三个药方是：“总得有点信心。”吴晗则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学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己是否努力，是否能克服挡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胡适给青年的第四个药方是：“你们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可责备社会。”吴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把胡适的“不可责备社会”改为“人要掌握环境，而不能被环境所支配”，“青年同志不要用种种理由宽恕自己”。吴晗 60 年代讲的话，同 30 年代胡适的语言仍是多么一致啊！

14 日　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即席发表“焚书”发言。

慑于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郭沫若作了这番发言。郭沫若说：“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这一发言经毛泽东批示后，4 月 28 日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题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郭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国内知识分子读后瞠目结舌，国外则利用这篇讲话攻击中国，这迫使郭出面解释他要“焚书”的意思。1966 年 7 月 4 日，郭沫若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为自己的讲话作了一番解释：“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

17 日　《人民日报》刊登《请看吴晗同志 1949 年前的政治面目》。

20日　苏文在《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同志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批判》。

22日　史绍宾在《光明日报》发表《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破产——评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资料摘抄)》。

是月　《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一组批判吴晗的文章。

该期转载了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并刊载了多篇批判吴晗的文章，包括武任年的《评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人物评价》、施庆的《吴晗所鼓吹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战斗精神”》、江西省赣州专区社联调查组的《历史的真实宣告“清官论”的破产》。该期另有一篇向东生批判翦伯赞的文章《从汉初统治看“让步政策论”的破产》。

从此，《历史研究》开始沦为政治批判的工具。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作者研究《诗经》和周代社会的论文集，通过对《诗经》进行分析并结合其他历史文献对周代的土地制度、经济剥削形态、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进行深入考察，最终得出周代社会的性质是封建社会而不是奴隶制度社会的结论。书中对《诗经》与周代音乐的关系，《诗经》的错简及所收诗歌的篇数、各篇诗歌的编排顺序及写作年代等问题多有独到见解。

5月

8日　高炬在《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该文由江青组织撰写，说：“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南星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一定要抓住它，识破它，戳穿它，剥掉它的画皮，让邓拓这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仅《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要铲除掉，《海

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以及《长短录》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一一铲除，毫不例外。”

何明（关锋）在《光明日报》发表《擦亮眼睛，辨别真假》。

文章指责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文章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暴露了。《前线》和《北京日报》才匆匆忙忙地扯起《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面旗子，发表一批材料。所谓‘展开严肃的批判’是假的，收紧阵地，实行掩护，才是真的。”文章还污蔑《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

10 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批判“三家村札记”。

这次批判得到毛泽东首肯。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合股开了黑店”，继《海瑞罢官》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进攻。文章称：“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的指使，受到什么人的支持，受到多少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全国报纸奉命转载这篇长文。

16 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本月 4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16 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决定撤销 2 月 12 日批转的、由彭真主持起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毛泽东在《通知》中加写了两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

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的发出，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戚本禹在《红旗》第7期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文章一口咬定邓拓“是一个叛徒”。

18日　邓拓自杀身亡，成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高级官员，终年54岁。

邓拓临死之前给彭真等人写信，申明自己绝不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的人。信的最后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23日　傅斯年侄子、历史学家傅乐焕遭受迫害，在陶然公园跳湖自尽。

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任命陈伯达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为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是月　《历史研究》第3期出版批判吴晗专号。

首篇转载了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然后是刘大年的《吴晗的反革命面目》一文，占据该期杂志三分之一以上篇幅；接下来是工农兵群众对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思想的批判，以及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学术批判小组的《复古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武器——批判吴晗的反动历史观》；最后是《评注吴晗胡适通信》。

《吴晗的反革命面目》一文是由多人提供材料和一部分初稿后，再经刘大年执笔写成。文章在措辞上几次更改，开始还称“同志”，稍后刘大年告诉负责编辑的丁守和把“同志”去掉，后又加“反动”，最后改为“反革命”。文章说“吴晗的反革命面目以前一直被掩盖着”是由于两点：“一、吴晗热心政治活动，常常扮着一副‘左派’面孔在人们面前出现；二、学者身份，教授头衔，近几年写文章有时还引几句马克思主义。”文章写道：“吴晗这个资产阶级反动人物的真面目怎样？撕下画皮以后，现在大家不必借X光，就连他的骨头缝里也都可以清晰看透了，那就是：假左派，真反革命！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实用

主义。"

该文与《驳一个荒谬的建议——批判荣孟源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一文同被选入作者晚年亲自审定的《刘大年同志著作目录》。作者在给编选者的信中说："作者认为观点是错误的，但篇目仍应保留，以符合实事求是。"

《文史哲》出版第3期后因"文革"爆发而停刊。

6 月

1日　司马洪涛在《人民日报》发表《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

文章认为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诬蔑农民革命，宣扬阶级调和，对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肆意进行了诬蔑和歪曲。《纲要》还美化地主阶级，讴歌帝王将相，吹捧剥削阶级的"让步"政策，宣扬活命的奴才哲学。文章最后认为，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是资产阶级进攻的一枝毒箭，是他们推行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工具，必须对这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给予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在这场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摧毁翦伯赞的反动史学理论。

迟世武在《光明日报》发表《拉下翦伯赞的"历史主义"的黑旗》。

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

社论措辞严厉地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盘踞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和支持这些"权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这样地把自己摆在同人民敌对的地位。这些"权威"，有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的堕落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边缘。

社论写道，史学界的资产阶级"权威"，顽固地否认几千年的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用所谓"历史主义"即唯心史观，来反对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顽固地否认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尽情污蔑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他们叫嚷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一笔抹杀。他们歌颂的，只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他们是史学界里

的“保皇党”。这些史学界的“保皇党”，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革命的史学工作者，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重新改写全部历史。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进行种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是适应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反抗社会主义的需要的。

社论指出，无数的事实证明，在史学领域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史学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一放松，就被资产阶级占领。在这里，不是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就是用唯心史观解释历史，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在史学中，和在其他科学中一样，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这只能是谁战胜谁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们，口口声声否认阶级斗争，其实他们一系列的反动谬论和活动，就是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社论提出，史学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阵地，在这里，一场兴无灭资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把被资产阶级“权威”霸占的阵地，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霸占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在某些部门里实行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职权，大放毒草，压制无产阶级左派的反击。他们对革命的史学工作者，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加以打击。我们就是要把被你们篡夺了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重新夺回来，在你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地盘上，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社论号召，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把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史学阵地，彻底摧毁，一定要把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反革命的唯心主义史学体系，彻底打垮。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战士，手里有了为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当代最新最高的、战斗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定能取得伟大的新胜利，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牢牢地插在史学阵地上。

报纸第2版还刊登了“史绍宾”《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1930年至1932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该文前言中说：“《历史研究》从1961年第1期由一位新主编接手以来，逐渐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史学领域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这个刊物，在学术讨论的幌子下，以显著的地位，大量的篇幅，在史学方向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等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文章，大放毒草。”前

言用激烈的言辞攻击《历史研究》对吴晗的批判是“假斗争，真包庇”，将批判的矛头对准黎澍。其后，《历史研究》被迫停刊，黎澍被打倒。

黎澍回忆说：“第2期和第3期几乎全部篇幅集中批评吴晗。第3期5月15日出版，载有《评注吴晗胡适通信》。6月3日《人民日报》突然在第1版最显著地位发表社论《夺取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第2版整版以《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为题对《历史研究》发表的《评注吴晗胡适通信》重新加以评注，对原来评注痛加批评，文前按语严词指摘《历史研究》对吴晗的‘假斗争，真包庇’，如此等等，气焰嚣张。由于产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当时已经发稿的第4期，只得停印。对读者连一句话的交代都没有，就中断了出版。这一期正是《历史研究》总编号的第100期。”

“史绍宾”还在报纸第3版发表《为什么替吴晗打掩护》，对近代史所“包庇”吴晗的“罪行”进行批判。

10日　受“文革”冲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篯在家中服毒自杀，时年50岁。

是月　在中华书局校点《明史》的郑天挺被责令回南开大学，受到迫害。

郑从此入牛棚，失去自由。所存书籍、稿件、教学资料、文物、信件、日记、照片全部被抄，损失惨重。

《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停刊。

8月

26日　北京大学保卫组《情况反映》第4号报告翦伯赞被揪斗情况。

报告写道：“（8月23日）有些红卫兵把翦拉出来批斗了四次，有的揪头发，有的扳脖子。”“据说：‘翦的心脏病又厉害了，现已不能起床，两天没吃东西。学生经常往外拉他，怕活不长。’”

是月　戚本禹在《红旗》第15期发表《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

文章说，翦伯赞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阀，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个头目，是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平演变路线的一个重要角色。翦伯赞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打着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招牌，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射出一支又一支

毒箭。他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急先锋。

9月

3日　陈梦家自杀，终年55岁。

“文革”爆发后，陈梦家遭到连续“批判”。为抗议人格侮辱，愤然自杀。

10月

23日　《人民日报》发表“晋群新”文章《〈历史研究〉是资产阶级史学的反动堡垒》。

文章对黎澍及其领导的《历史研究》进行了猛烈批判，说：“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就是史学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堡垒。

“黎澍同史学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邓拓、吴晗、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之流结成死党，过从甚密，或搞聚餐，或开黑会，互相吹捧，此唱彼和，共同策划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历史研究》一贯宣扬邓拓、吴晗、翦伯赞之流的反动史学论点。黎澍和他的主子周扬一样，十分仇视工农兵，而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却视若珍宝，打得火热。他让大批反共老手、遗老孽少，在《历史研究》上大肆放毒，形成了一支反革命的合唱队。

“史学界的资产阶级右派，长期地打着‘历史主义’的黑旗，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主义’简直成了他们替一切反动制度、反动阶级、反动思想作辩护的万应膏。他们到处挥舞这个破烂武器，向无产阶级历史学挑战。”

《人民日报》还为这篇文章加了编者按，说：“自从反革命分子周扬指派他的爪牙黎澍充当这家杂志的主编以来，他们就利用‘历史研究’作掩护，极力维护和散布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流毒甚广，害人不浅。

“他们挖空心思要把人们拉向后转，要人们崇拜古人，崇拜帝王将相，‘发思古之幽情’。他们把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精心伪装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妄图用那些腐朽发霉的思想，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以达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目的。他们还借古人之口，恶毒地攻击我们的新社会。他们采用指桑骂槐、借古讽今的手法，肆无忌惮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无产阶级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的挑战。对于史学界这些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必须穷追猛斗。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使历史学真正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11 月

9 日　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组织负责人谭厚兰受陈伯达、康生等指使，带领 200 多名学生到山东曲阜“讨孔”。

在曲阜的 29 天，他们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刨平孔坟，并把周予同等一批研究孔子及儒家学说的学者押到曲阜集中批判、游斗。

30 日　向达被迫害致死，终年 66 岁。

“文革”开始后，向达备受折磨和凌辱。邹衡《永远怀念向达先生和夏鼐先生》一文回忆向达遭批斗情景说：“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 1966 年 6 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

12 月

12 日　吴玉章逝世，终年 88 岁。

18 日　黄文弼逝世，终年 74 岁。

是年

大部分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暂时中断，《考古学报》、《考古》、《文物》、《历史教学》、《近代史资料》等大批学术杂志停刊。

1967 年

※ 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

1 月

8 日　晋群新在《人民日报》发表整版批判文章《周扬、刘大年之流是叛徒的辩护士》。

文章写道："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多年来，一直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采用反革命两面的手法，在文化界的各个阵地上，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进行猖狂进攻。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李秀成，也被他们用来作为反党的工具。""刘大年公开对抗毛主席指示，为叛徒李秀成辩护，突出地表现在他狂妄地叫喊：李秀成的'功劳'应当'永远用金字铭刻在天安门广场的丰碑上面'，他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先驱者'？刘大年丧心病狂地要为叛徒树碑立传，这充分说明了他是完全站在叛徒的立场上来说话的。这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内心表白。"

3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规定"对文物图书要加强保护和管理工作，不许随意处理和破坏"。

26 日　洪坚斌在《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让步政策"论的反动实质》。

30 日　戚本禹在《红旗》第 5 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

该文借批《清宫秘史》批判刘少奇，污蔑反映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的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反动影片，说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

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文章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着三个重大的原则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戚本禹认为，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抱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抱什么态度的问题。戊戌变法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网罗，在解放思想上起了一些启蒙的作用，但是决不能无原则地对戊戌变法运动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歌功颂德。戊戌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本身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他们改良主义的目的，从来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人民和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所要改变的只是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而不是旧事物的质。他们所幻想的只是以渐变的形式，使地主经济逶迤曲折地改变为半地主、半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并企图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所以，改良主义即使在当时也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

4 月 1 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后，全国各大报刊迅速开展了矛头对着“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5 月 11 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称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要求各地认真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戚文为诬陷和迫害刘少奇定下了基调，成为“文革”深化的标志。

5 月

14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

30 日　史红兵在《光明日报》发表《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占领史学阵地》。

8月

1日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主持起草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导致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倒台。

1968 年

※ 毛泽东希望范文澜把《中国通史》继续写下去。

1 月

8 日　童书业逝世，终年 60 岁。

3 月

吴晗被捕入狱。

6 月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发掘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

两座墓墓室都凿于山崖之中，规模宏大，出土了“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等珍贵文物。

7 月

20 日　毛泽东派女儿李讷看望范文澜。

毛向范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体系、观点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范文澜听后马上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安排工作计划，组织人员编写，并从8 月开始工作。他说：“全书五年完成，我还不过八十，不算老。”

8 月

1 日　蒙文通逝世，终年 74 岁。

10 月

13 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毛泽东在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予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并且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他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12月

18日　翦伯赞被迫害致死。

1936年，翦伯赞曾参与国共两党“南京和平谈判”工作。1968年11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开始对翦伯赞进行连续审问，逼迫翦诬告刘少奇在这次谈判中有“勾结”国民党CC派特务，“阴谋消灭苏区、消灭红军的反革命勾当”。翦坚决不做伪证，被迫与夫人双双服毒自杀。死后在其上衣口袋里发现两张纸条，上写：“我实在交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翦伯赞助手张传玺于1978年所写的“要求中央为翦伯赞昭雪沉冤的申诉状”中写道：“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翦就作为‘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当时他已68岁，身患重病，批斗传审，天天不断；拳打脚踢，坐飞机，每天被斗十几小时。在6、7、8三个月中，被斗一百多次。他有一次被从厕所揪出，有人将粪纸篓扣在他的头上，几乎被揍死。林彪、‘四人帮’的黑干将聂元梓、孙蓬一几次开万人大会斗翦。翦卧床不起，就用平板车将翦拖到会场，不许坐下。翦站立不稳，就让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着，一斗几个小时。这个斗翦镜头已印入法国画册，传遍全世界。翦夫妇被关在二楼的一间屋中，不得行动。全部钥匙被收缴，家具几乎全被砸烂。图书被偷走五六千册，珍贵文物剩余无几。”

1969 年

※ 甘肃武威发现一批铜车马武士仪仗俑及铜奔马等珍贵文物。

7 月

29 日　范文澜逝世，终年 76 岁。

范逝世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关心《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1969 年 10 月 31 日，周恩来将哲学社会科学部工、军宣队呈送的《为继续编写〈中国通史〉的报告》批转陈伯达，要他抓一下这项工作，抽时间请学部商谈，并批示："这个任务很重要，这是主席交给的任务，你找他们谈完以后，到政治局备案。"

10 月

7 日　陈寅恪逝世，终年 80 岁。

11 日　吴晗被迫害致死，终年 70 岁。

其妻袁震于 1969 年 3 月 18 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 1976 年 9 月 23 日在狱中自杀身亡。

是月　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县雷台一座东汉晚期砖室墓中发现一批铜车马武士仪仗俑及铜奔马等珍贵文物。

11 月

16 日　何干之逝世，终年 63 岁。

1970 年

1 月

23 日　柴德赓在苏州郊区农场劳动时，因心脏病突发含冤去世，终年 62 岁。

是月　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科研部门、高校教师下放农村或工厂劳动。

4 月

18 日　沈元以叛国罪在北京被执行枪决，终年 30 岁。

“文革”爆发后，沈元受尽迫害，走投无路，于 1968 年 9 月 1 日化妆成黑人，闯入马里驻华使馆，欲寻求政治避难，被捕。

5 月

18 日　梁方仲逝世，终年 62 岁。

8 月

31 日　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我的一点意见》。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于 1970 年 8 月 23 日到 9 月 6 日在江西的庐山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围绕是否称毛泽东为“天才”的问题展开激烈斗争。会议第二天，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定的《论天才》的材料。8 月 31 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其中说道：“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此后，一向受到毛泽东重用、有“理论家”之称的陈伯达遭到清洗，林彪亦因此引起毛的警惕，最终倒台。

10 月

18 日 施觉文在《解放日报》发表《“让步政策”论再批判》。

1970 至 1972 年间，《解放日报》、《光明日报》连续刊登批判让步政策的大批判文章，形成一个小高潮。

23 日 《文汇报》发表孙达人、王家范、左盾、李凡《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批判翦伯赞的反动“让步政策”》及郁宫农《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彻底批判“让步政策论”》。

12 月

1 日 南开大学历史系大批判组在《光明日报》发表《政权是革命党根本问题——彻底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

3 日 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大批判组在《光明日报》发表《“让步政策”论是宣扬“阶级调和”的反革命理论》。

1971 年

※ 标点印行廿四史及《清史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1 月

15 日　河北师院大批判组在《光明日报》发表《坚持阶级斗争，反对阶级调和——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

是月　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对隋唐东都洛阳宫城含嘉仓遗址进行钻探发掘

发现粮窖 259 个，初步探明了粮窖的结构和储粮情况，其中一窖估计可藏粮食 50 万斤左右。

4 月

3 日　史坚斌在《文汇报》发表《“让步政策论”就是阶级合作论》。

29 日　标点印行廿四史及《清史稿》工作会议召开。

3 月 15 日，全国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由于毛泽东对历史的偏爱，4 月 2 日，姚文元致信周恩来信，称“文革”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得以标点出版，这一工作应继续完成，以“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当日周恩来即在姚信上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究如何为好，请吴庆彤同志提出版会议一议。”4 月 7 日，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及国务院出版口、中华书局人员到顾颉刚家中向其传达了指示。随即顾颉刚便开列了工作人员名单，并制定了校点计划。29 日，标点印行廿四史及《清史稿》工作会议召开，会上讨论了顾颉刚的计划书及中华书局的计划，决定抽调人员集中到北京、上海两地，组成两个标点组，各承担若干部，分头进行。每史都指定一个人负责通读复阅，以统一体例。各史校点完毕，由顾颉刚总其成，审查定稿

后，由中华书局出版。

5 月中旬，毛泽东批准了这次会议所拟定的工作计划。中华书局开始从全国各地抽调众多历史学家如唐长孺、翁独健、王仲荦、白寿彝、郑天挺、邓广铭、吴泽、罗尔纲、陈述、王毓铨、孙毓堂、张政烺、启功、周振甫、阴法鲁等参加这一工作。因当时顾颉刚已年近八旬，且体弱多病，具体工作由白寿彝负责，并成立了点校组，由白寿彝任组长，赵守俨、吴树平任副组长。

校点工作从 1971 年 5 月开始，经北京、上海两地 80 多位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于 1973 年底校点完毕，至 1978 年全部出版。

5 月

13 日　南开大学历史系写作小组在《天津日报》发表《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彻底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

6 月

21 日　陈垣逝世，终年 91 岁。

7 月

1 日　故宫博物院举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

“文革”开始后，许多国外媒体夸大中国文物遭受破坏的情况。为了消除这些影响，在周恩来支持下，“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后来的国家文物局）组织了这次展览，实际上带有辟谣的性质。共有 11 个省市参展，展出的文物精品共 1982 件，包括 1968 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金缕玉衣，1969 年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1970 年河南洛阳唐墓出土的三彩骆驼，1971 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北齐黄釉瓷扁壶等等，故宫展出结束后，这批国宝级文物精品以“中国出土文物展”的名义，远赴西欧、日本等西方国家，均引起极大轰动。

是月　陕西省文管会发掘唐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墓。

8 月

17 日　国务院下发《关于选送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通知》。

1973 年 5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第一站在法国巴

黎开幕，郭沫若为展览题词，王冶秋任展览团团长。6月8日，展览在日本东京开幕，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出席开幕式。9月28日，在英国伦敦开幕，首相希斯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其后，该展览又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奥地利维也纳、瑞典斯德哥尔摩、墨西哥墨西哥城、加拿大多伦多、荷兰阿姆斯特丹、比利时布鲁塞尔、美国华盛顿、菲律宾马尼拉、澳大利亚墨尔本、日本名古屋以及中国香港等地举办。从1973年到1978年，该展览先后在16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参观总人数达到657.5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古老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也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打破外交封锁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9月

上海师范学院《义和团运动》编写组编《义和团运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月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精装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晚年最后一部著作，"文革"结束后引起较大非议，被普遍认为是作者一生之败笔。书中"扬李抑杜"，高度赞扬了李白，大大贬抑了杜甫，说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彻底改变了此前对杜甫的高度赞扬。书中还考证李白出生于苏联碎叶城。据时人披露，该书的写作与毛泽东的喜好有关。与郭氏终生私交甚好的李一氓在《正确评价郭沫若同志》一文中谈到郭沫若写作该书的动机和背景是："（郭）后来写的那个《李白与杜甫》，也是根据毛主席的一些说法加以发挥的。主席好像就说过，他高兴李白不高兴杜甫。"

平装本于11月出版。

11月

1日　郭宝钧逝世，终年77岁。

1972 年

※《考古学报》、《文物》、《考古》复刊。
※ 竺可桢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竹简 4900 多枚。
※ 郭沫若发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
※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国史研究组，计划编写《中华民国史》。

1 月

《考古学报》、《文物》、《考古》复刊。

1971 年 7 月 22 日，郭沫若在给周恩来《关于〈考古学报〉、〈文物〉、〈考古〉复刊的报告》中提出："三种杂志拟复刊，以应国内外之需要。"周批示"同意"。这几家杂志成为"文革"期间最早复刊的少数杂志之一。

标点本《南齐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夏鼐在《考古》第 1 期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考古新发现》。

同期还刊登了安志敏的《关于我国若干原始文化年代的讨论》。

竺可桢在《考古学报》第 1 期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作者认为，用古史书所载物候材料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文章依据西安半坡、日照两城镇及安阳殷墟等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植物残块和孢粉、殷代甲骨文以及我国古代典籍与方志上有关物候的大量记载，对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进行了系统总结，为我国历史气候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书中把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的时间分为四个时

期——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前1100年）、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1400年）、方志时期（公元1400—1900年）、仪器观测时期（公元1900年以后），对中国古气候史的变迁情况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论述，堪称中国古气候史研究领域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对中国历史地理以及中国环境史的研究起到了非常大的指导作用，得到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普遍推崇。谭其骧对该文予以高度评价："每读一遍，使我觉得此文功夫之深，分量之重，为多年少见的作品，理应厕身于世界名著之林。"

1973年《中国科学》第16卷第2期、1973年6月19日《人民日报》转载该文。

近年来有人对竺文提出不同看法。牟重行在《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认为，竺文在分析使用历史文献资料中存在"对文献误解或疏忽"、"所据史料缺乏普遍指示意义"、"推论勉强"等缺陷和问题，并对竺文结论给以否定。

2月

《批判"让步政策论"》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了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在报刊上的15篇批判让步政策的大批判文章，包括张仁忠的《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批判"让步政策论"》、杭斯斌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让步政策论"》、石仑的《从梯也尔的"文明"和"正义"看"让步政策论"的反动本质》等。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本文曾于1944年3月起由延安《新华日报》连载。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本文。

夏鼐在《考古》第2期发表《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

3月

标点本《陈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郭沫若在《考古》第3期发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文章论述我国古代文字表达由简单到完善，书写则由繁复到简易的辩证发展过程，认为我国文字起源于半坡，"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划"就是最初的文字，"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出现了"殷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经是具有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由于社会生活日趋繁剧，

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以致后来秦始皇“使已经有统一倾向的文字更由人为的大力而整齐划一”。因此，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该文是作者晚年对他几十年研究古文字的总结。

4 月

于省吾在《考古》第 4 期发表《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

山东省博物馆在临沂县银雀山发掘两座西汉武帝时期的墓葬，共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竹简 4900 多枚。

除《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外，还出土了《六韬》、《尉缭子》等兵书，另外还有《管子》、《晏子》、《墨子》等先秦古籍，以及《相狗经》、《曹氏阴阳》、《风角占》、《灾异占》、《杂占》等残简，还出土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所记的朔晦干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籍竹简，其种类之多，字数之多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也表明我国使用竹木简牍始于战国时，而不是汉代。同时还解决了一些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以前对历史上有无孙武其人、《孙子兵法》的真伪以及孙武是否即孙膑等均存有疑问，这次《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将这一问题彻底解决，证实了流传至今的《孙子兵法》十三篇乃是孙武的原著。这批汉简的出土，还纠正了以前认为《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是汉以后的伪作的看法。该批汉简的出土，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文字学、校勘学及古代历法研究均有重大价值。

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不仅丰富了我国古代军事学的宝库，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由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分别于 1975 年、1976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银雀山汉墓下葬于汉武帝时期，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比墓葬稍早，从简文书体属早期隶书看，应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写成的。

5 月

5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7 日　华岗含冤在济南监狱去世，终年 69 岁。

1957 年，华岗被从青岛看守所解往北京秦城监狱关押。从 1954 年底开始到 1965 年，华岗被整整审查了 10 年。其间发愤读书和写作，以惊人

的毅力写出《规律论》、《美学论要》、《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个要素”试释》、《自然科学发展史略》、《科学的分类》、《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近百万字文稿。1965年3月，华岗被最高人民法院以强加罪名判刑13年。旋即被押赴济南监狱服刑。“文革”开始后，华岗在狱中被强制进行重体力劳动，身染重疴，后被送回青岛家中。因病情恶化，而当地医院拒不接受“反革命”住院治疗，1972年春节前夕，华岗被迫回到济南监狱。死前留有遗言：“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

是月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拉铁摩尔重访中国。

朱活在《文物》第5期发表《从山东出土的齐币看齐国的商业和交通》。

6月

陈直在《文物》第6期发表《出土文物丛考》。

安志敏在《考古》第6期发表《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

7月

1日　郭沫若在《红旗》第7期发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

文章专门论述我国历史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划分的时期，总结了自己几十年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成果：“抓住在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而且特别是地主阶级这个矛盾方面”，“断然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即公元前475年”，从而说明“春秋和战国是孑然不同的两个时代”。同时指出：“旧时代的‘学者’总是囫囵吞枣地把春秋战国看成为一个单元，而且以为每况愈下，战国还不如春秋。那是大错而特错的唯心史观的看法。”

1973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改编本《奴隶制时代》以此文为《代序》。

作者发表此文目的在于重新在学术界发起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由于正值“文革”非常时期，未能引起响应。

8月

9日　杨宽在《文汇报》发表《“自上而下变革”说的商榷——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该文是对郭沫若发表在《红旗》第 7 期上的《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的商榷，认为郭文把商鞅变法看作“自上而下的变革”，把秦国看作由于自上而下变革“才扬弃了奴隶制而转入封建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作者认为，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是一次社会革命，是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来完成的，不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变革所能完成的。

9 月

夏鼐、王仲殊赴阿尔巴尼亚参加第一次伊利里亚人研究会议。

10 月

1 日　北京猿人展览馆开放。

11 月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国史研究组，计划编写《中华民国史》。

这是国内第一家以民国史研究命名的研究单位。

1971 年全国出版会议召开时，经周恩来倡议，决定实施于 1956 年制定的《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中列为重点项目的民国史编写计划。为此，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该研究组（后改名为研究室），决定编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和作为附录的《民国史资料》（包括《民国大事记》、《民国人物志》、《专题资料》等）。

甘肃武威城西旱滩坡墓葬中发现了 92 枚汉代医药简

这次发现，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 1949 年前所发现的医药简的总和，而且内容相当丰富。它包括医学上的内、外、妇、五官等各种临床医学和药物学、针灸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保存了比较完整的各科方剂三十多个，方中所列药物近一百味；并详细记载了病名、病状、制药方法、服药时间、针灸禁忌等，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医药著作的原始文物，它对进一步探讨汉代简册制度和我国医学遗产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胡厚宣在《文物》第 11 期发表《殷代的蚕桑和丝织》。

标点本《北齐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12 月

1 日　杨荣国在《红旗》第 12 期发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

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儒法论争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该文是应《人民日报》编辑之约而写，是提出“儒法斗争”这一论题的第一篇文章。“批儒颂法之风自此开，儒法斗争体系自此始”。作者借此被推上“文革”儒法斗争学说的前台。

是年

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陆续设立考古专业，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培养大批人才。

甘肃省博物馆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地区发现汉代木简两万多枚。

1973 年

※ 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始挖掘。
※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简牍和帛书。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开始出版。

1 月

张政烺在《考古学报》第 1 期发表《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

作者凭借深厚的甲骨文功力，对商代的开荒过程、耕种技术以及生产者与族组织的关系进行了考辨，为作者的代表性作品。

《化石》创刊。

该刊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创办，初时为半年刊。1976年改为季刊。

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 1 期发表《论秦始皇》。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1840—1919）》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侯仁之在《文物》第 1 期发表《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

袁伟时在《中山大学学报》第 1 期发表《孔子反动教育四议》。

3 月

侯仁之、俞伟超在《考古》第 2 期发表《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

4 月

20 日　夏鼐率领中国考古小组访问秘鲁、墨西哥。

24日　毛泽东就恢复部分刊物一事与姚文元谈话。

据《〈历史研究〉的遭遇和“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阴谋》介绍，毛泽东对姚文元说：“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一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其后，一些学术性刊物陆续复刊。

5月

16日　国家文物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保护古窑址的通知》。

是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碑帖拓片展览”在日本东京开幕。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此次再版，删去文艺论文八篇，增加了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问题的论文。

标点本《梁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批孔问题，评法批儒运动由此发端。

毛泽东说：“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对。要批判孔子。”

本年7月4日，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再次谈到批孔问题，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7月17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一次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郭沫若），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6月

（法）让·莫里亚克著、张芝联译《戴高乐将军之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

19日 《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张铁生的一封信。

张铁生本是下乡知识青年，在参加1973年大学招生考试时，因成绩不佳自知录取无望，便在最后一门课的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辽宁日报》在发表这封信时加了编者按："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张铁生的信，并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成为全国学习的"白卷英雄"。

8月

1日 国家文物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考古发掘工作的管理的通知》。

要求各地考古发掘要履行报批手续，要注意科学性，并再次印发国务院1964年批准的《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管理办法》。

7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本文依托"战国封建说"对孔子进行了猛烈批判。认为春秋时代，奴隶制度日趋崩溃，孔子提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治口号，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孔子站在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反对新兴的封建势力，他的思想的实质，是要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论证劳动人民只能被剥削、被奴役、被统治。用一句话说，他就是要论证"剥削有理、造反有罪"。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才能揭穿孔子的反动本质。

作者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看在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下，他是站在进步阶级方面主张革新呢，还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主张保守。

文章发表前，《人民日报》曾将此稿排成内参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杨文颇好"。

8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杨荣国《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大规模"批林批孔"和"评法

批儒”运动开始。

是月　标点本《隋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9月

4日　《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梁效”写作组第一次公开亮相。

两校大批判组即“梁效”，是以“两校”的谐音命名的写作班子，由江青亲自指挥、直接控制，是“四人帮”的主要喉舌。前后有四十多人参加，曾用过“梁效”、“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史军”、“闻军”、“哲军”等十几个笔名。梁效除享有《红旗》、《人民日报》优先发表的特权外，还直接把持《北京大学学报》，并一度控制《历史研究》。

1973年10月1日，《红旗》杂志转载了该文。

15日　《学习与批判》创刊。

该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复旦大学名义主办的理论月刊，这个写作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该刊被当时的西方报刊称为“中国激进派的刊物”，1976年10月停刊，共出版38期。

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尊儒反法》，文章经姚文元亲自修改，称：“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潮，也是党内两条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而开启了“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先声。

该写作组的笔名主要有：“罗思鼎”、“康立”、“石仑”、“翟青”，“方海”、“齐永红”、“梁凌益”、“戚承楼”、“靳戈”、“史尚辉”、“史锋”、“曹思峰”、“方岩梁”、“石一歌”、“任犊”、“宋敏彬”、“景池”、“史经”、“薛庆松”、“贾漱章”、“宫欣”、“范佑卿”、“吴耕畔”、“翟海”、“范贻”、“丁学雷”、“任菁”、“方兴”、“巩学庆”、“宫效闻”、“常峰”、“杜华章”、“龚青”、“景汉”、“方泽生”、“洪松”、“魏峡安”、“舒浩晴”、“施伦”、“范毅平”、“忻启明”、“方天戟”、“史文桐”等。

杨人楩逝世，终年70岁。

20日　张岂之在《陕西日报》发表《孔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代表》。

26日　杨宽在《文汇报》发表《孔子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

刘梦溪在《山西日报》发表《孔子——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反动教育家》。

10 月

1 日　贺昌群病逝，终年 71 岁。

14 日　吴于廑在《湖北日报》发表《孔子“复礼”是对春秋时代历史潮流的反动》。

16 日　康立在《学习与批判》第 2 期发表《读〈封建论〉》。

25 日　张岂之在《陕西日报》发表《春秋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荀子和韩非》。

31 日　高亨在《光明日报》发表《论孔子杀少正卯》。

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严禁将馆藏文物图书出售作外销商品的通知》。

是月　《文史哲》杂志复刊。

此后一个阶段，《文史哲》杂志刊登了大量“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文章。

韩国磐在《厦大通讯》第 4 期上发表《孔子的“复礼”就是复辟，“仁政”就是反革命专政》。

11 月

1 日　罗思鼎在《红旗》第 11 期发表经姚文元修改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该文在“反复辟”上大做文章，捏造了三次复辟事件，还特意选择吕不韦作靶子，批宰相，批折中主义，大搞歪曲影射。此文发表后掀起了一股批“宰相”旋风。12 月 26 日，他们又在《学习与批判》炮制了另一篇批宰相的文章《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文章歪曲历史，借批大司马霍光和丞相田千秋，进行影射攻击。

4 日　浙江省文管会、博物馆开始发掘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

该处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处重要聚落遗址，总面积约 4 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 4 个文化层，根据 C14 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 7000 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 6500 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 5600 年，第一文化层

距今约5000年。1977年冬季又进行一次考古发掘，两次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纠正了我国栽培水稻是从印度阿萨姆传递过来的传统说法，有力地证明了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该遗址还发现了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数量众多的陶器、石器、骨器、木器及原始艺术品，还有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畜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等遗存，为研究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这些文化遗存，充分证明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并不晚于中原地区，同样是中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1982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5月12日，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落成开放。

9日　周一良在《北京日报》发表《读柳宗元〈封建论〉》。

文章说："历代评论秦始皇的文章，咒骂者居多，只有极少数人肯定他的成就，唐人柳宗元的《封建论》是杰出的一篇。《封建论》肯定秦朝废除分封，设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进步意义，指出这种措施对于维护统一，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必要性，从而正确估计了秦始皇革新进取的历史作用。柳宗元在议论历史的同时，还联系当时政治局势发表了意见，使自己的史论为政治服务。《封建论》是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10日　美国考古代表团访问中国。

14日　方立天等在《北京日报》发表《一场激烈的阶级搏斗——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反对儒家的斗争》。

朱绍侯在《河南日报》发表《秦始皇在历史上功绩》。

16日　外贸部、商业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从杂铜中拣选文物的通知》。

19日　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大量简牍和帛书。

简牍主要是遣策和医药简，帛书主要是古籍，20余种，计12万多字，字体大致可分为古隶和今隶两种。帛书大部分是久佚古籍，如《春秋事语》、《黄帝四经》、《相马经》、《五行》等，也有一部分是后世有传本的古书，如《战国策》、《老子》、《周易》等。帛书《老子》有两种写本，一种用古隶抄写，称为甲本，抄写时间在公元前221年—前195年之间。另一种用今隶书写，称为乙本，时间稍晚于甲本。帛书《老子》甲、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传世本相反。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

为研究汉初社会发展和先秦古籍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

长沙马王堆汉墓共有三座，一号墓于 1972 年 1 月 16 日开始发掘。此墓深达 16 米，内中棺椁的边箱中塞满大量的随葬品，为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夫人辛追墓。4 月 28 日，考古人员打开内棺材盖，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具沉睡了两千多年却显得十分新鲜的女尸，外形完整无缺，全身柔软而有弹性，在往她体内注射防腐剂时，她的血管还能鼓起来。除眼球突出，舌头外吐等体表变形外，其他特征完全像刚死的鲜尸。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历史悠久的湿尸，出土后震惊世界。此后发现的类似古尸均被考古界归为“马王堆尸型”。

二号墓于 1973 年 12 月 18 日开始发掘。二号墓主为轪侯利苍，因曾多次被盗遗失了很多随葬品。

发掘工作由湖南省博物馆与科学院考古所等单位联合承担，整个发掘工作于 1974 年结束。一号墓的发掘收获编撰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1974 年出版)，三号墓所出帛书，经整理出版为《马王堆汉墓帛书》(1975 年出版)。

是月　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博物馆等单位开始发掘大冶铜绿山春秋战国时期矿井遗址，发现数座春秋时期的炼炉。

金冲及在《学习与批判》第 3 期发表《〈天演论〉和中国近代反孔思潮》。

12 月

3 日　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

6 日　张岂之在《西安日报》发表《中国近代尊儒与反儒的斗争》。

7 日　蔡尚思在《解放日报》发表《论孔子反动思想的核心——“仁”》。

13 日　高亨在《光明日报》发表《孔子维护哪些奴隶制》。

是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丛稿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编，包括大事记 31 辑，逐年逐月逐日地记载自 1905 年同盟会成立到 1949 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被推翻这一期间发生在我国的各类重要事件。其中，人物传记 23

辑，民国人物传14卷，选录了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被推翻这45年间的著名人物1000余人。特刊7辑，如孙中山年谱、民主党派史料、黄炎培日记、民国会党武装等。专题资料21种，如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农民银行、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中国青年党、救国会、胡适任驻美大使往来电稿、长城抗战、台儿庄会战等。翻译海外资料17种，其中英文资料有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史迪威资料、民国名人传记词典等，日文资料有《日本战史丛书》，包括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长沙作战、香港作战、缅甸作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国事变海军作战史、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土肥原秘录、东北抗日联军、昭和20年（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等。

这批资料出版，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与教学，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受到国内外史学界普遍关注。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在小屯南地发掘7000多片卜骨和卜甲，其中4511片有刻辞，是1949年以来出土有字甲骨最多的一次。

这批甲骨都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又与陶器共存，为甲骨的分期断代以及殷墟文化的分期提供了新的依据。1975年10月，考古所成立了小屯南地甲骨整理小组，对这批甲骨进行剔除土锈、加固、粘对、缀合、墨拓等技术性整理工作。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是《中华民国大事记》的初稿，分辑印行。取材的原则是“大事突出，要事不漏”，“既有重点，又较全面”。上限起于1905年，下迄1949年，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影响等都详细记录。诸如重要报纸、杂志的创刊和停刊，重要人物的逝世等也予备列。

1974 年

※ 陕西临潼发现秦始皇陵兵马俑，引起世界轰动。
※ 殷孟伦发表《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
※《历史研究》复刊。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元旦献词》。

文章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

4 日　唐晓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

10 日　林剑鸣等在《西安晚报》发表《秦始皇与吕不韦》。

16 日　康立在《学习与批判》第 1 期发表《孔子、儒家和礼》。

18 日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批林批孔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1 月 12 日，王洪文、江青写信给毛泽东，建议转发由江青主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批准。文件说，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此后，全国掀起批林批孔的高潮。随后，"四人帮"控制的三大批判组大搞影射史学，抛出大量"批孔"文章。

21 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人民日报》发表《略论秦始皇的暴力》。

26 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人民日报》发表《孔子

是怎样利用教育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

是月　邹衡在《文物》第 1 期发表《从周代埋葬制度的变化剖析孔子提倡“礼治”的反动本质》。

3 月

29 日　秦始皇陵兵马俑被临潼县西杨村农民打井时偶然发现。

同年 7 月 15 日，以袁仲一为队长的第一支秦始皇秦俑坑考古发掘队开赴现场。至 1975 年 3 月，历时 7 个月的第一次试掘工作结束，共清理出与真人大小相仿的陶俑 500 余件，与真马相当的陶马 24 匹，木制战车 6 乘及其他青铜兵器百余件。随后，秦兵马俑发掘工作继续进行，陆续有重要考古发现问世。

兵马俑的出土是 20 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引起世界轰动，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1975 年 8 月，国务院决定建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是月　广东省博物馆在西沙群岛进行文物调查，发现一大批反映唐宋以来中国开发南海诸岛的历史文物资料。

4 月

1 日　《红旗》第 4 期刊登由江青亲自拟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撰写的《孔丘其人》，该文被称为“文革”影射史学的代表作。

文中虚构情节，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江青夸赞此文“写得生龙活虎”。

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中对该文的出笼经过进行了披露，否认该文是对周恩来的影射。

22 日　刘乃昌在《大众日报》发表《彻底批判孔丘复古倒退的历史观》。

是月　李学勤在《文物》第 4 期发表《朱熹〈四书集注〉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

5 月

15 日　杨宽在《文汇报》发表《韩非“法治”理论的进步作

用》。

27 日　张岂之在《西安晚报》发表《关于〈秦献记〉和〈秦政记〉——从两篇史论看近代的反复辟斗争》。

是月　章开沅在《文物》第 5 期发表《“孔家店”与张勋复辟》。

6 月

2 日　方国瑜在《云南日报》发表《批判“以古非今”的儒家反动思想》。

22 日　江青带队赴天津宝坻小靳庄开展群众性“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使其成为闻名全国的典型。

23 日　刘乃昌在《大众日报》发表《韩柳之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25 日　秘鲁考古代表团来华访问。

是月　标点本《魏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7 月

7 日　邓广铭在《光明日报》发表《王安石——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

该文还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第 3 期上。

18 日　钟达在《人民日报》发表《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

20 日　刘梦溪在《山西日报》发表《〈红楼梦〉的反孔学精神》。

28 日　刘蔚华在《大众日报》发表《李贽与尊法反儒斗争》。

是月　胡厚宣在《文物》第 7 期发表《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上篇）。

下篇发表在《文物》第 8 期上。

8 月

6 日　刘乃和在《光明日报》发表《西汉吕后和她的玉玺》。

8 日　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

24日　杨荣国在《光明日报》发表《前秦儒法两家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9月

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明清工艺美术展览”在日本东京开幕。

29日　墨西哥考古代表团来华访问。

是月　齐钟久《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0月

1日　梁效在《红旗》第10期发表《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

是月　标点本《宋书》、《北史》、《辽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殷孟伦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

该文对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考证，通过对有关碎叶的历史记载和文物的逐一考核，用确凿的证据证明碎叶在中亚，焉耆无碎叶。此论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证明中亚碎叶自汉唐以来，虽然由于局势的反复变化，管辖上曾有过转移变动，但仍然隶属于我国兄弟民族的版图。作者明确论定了碎叶城得名由来及其地理位置，指出了有关碎叶地理位置的错误说法，并将这些错误说法归结为三个问题，并逐一加以驳正。文章特别指出发生错误的根本在于对《唐书·地理志》焉耆都督府下“有碎叶城”一句的理解。作者特别以这一问题作为讨论中心，反复辨析。

11月

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汉唐壁画展览”在日本北九州市开幕。

是月　高亨在《文物》第11期发表《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释文》。

河北省文管处开始在平山县境调查发掘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遗址和两座王陵。

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一座出土3件长铭文铜器，总字数为1099

字，为战国铜器中所仅见。

朝鲜文物保护考察团来华访问。

张景贤著《中国奴隶社会》由中华书局出版。

标点本《晋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12 月

标点本《新五代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历史研究》复刊。

1973 年 6 月，为贯彻毛泽东有关恢复刊物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军宣队和业务行政领导小组先后提出仍旧由原主编负责筹备恢复《历史研究》的工作。本月 5 日，黎澍向学部军宣队和业务行政领导小组递交报告，对《历史研究》杂志的历史情况、复刊条件、复刊计划和要求做了简要说明。6 月 18 日，哲学社会科学部正式向国务院科教组做了关于恢复《历史研究》的请示报告，并转报中共中央，提出恢复刊物的计划，请求批准。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杳无回音。

1974 年 6 月 14 日，江青、张春桥约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提出复办《历史研究》问题。张春桥对迟群说："原来让学部筹办，总是搞不起来，就让你们办。"江青也说："办《历史研究》不要学部。"因此，复刊后的《历史研究》撇开了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原编辑部，由国务院科教组迟群把持。

复刊后的《历史研究》，成为"评法批儒"的主要阵地。

是年

贾兰坡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 12 卷第 3 期发表《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

同期还刊登了吴汝康《人和猿的界限问题》。

1975 年

※ 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版开始出版。
※ 杨宽发表《马王堆帛书〈战国策〉的史料价值》。
※“评《水浒》”运动在全国展开。
※ 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大量秦简。
※ 国家文物局成立“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
※ 中国科学院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室”。

1 月

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版开始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主编为英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英文版于 1954 年开始刊行，首卷《导言》甫一出版就赢得举世瞩目。其后每出一册都引起世界性反响，许多国家的报刊发表书评，给予很高的评价，并随即被翻译为中、日、法、西等国文字。该书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原文书名为《中国的科学和文明》），实际上是对上下几千年、世界各大洲科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内容丰富、论据有力、卷帙浩繁，为世所罕见。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工业、农业、医学以及科学思想和社会背景各个方面，有力地论证了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作用。

出版时为内部读物。1990 年开始由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

国家文物局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主办“各省市自治区新发现文物汇报展览”，接待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唐长孺在《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论曹操法家路线的形成》。

2 月

18 日　张岂之在《陕西日报》发表《从唐代看儒法斗争与阶级

斗争的关系》。

25日　刘乃昌在《光明日报》发表《北宋农民起义与王安石变法》。

是月　标点本《新唐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杨宽在《文物》第2期发表《马王堆帛书〈战国策〉的史料价值》。

其后，杨宽又在《文物》第3期发表了《战国中期的合纵连横战争和政治路线斗争——再谈马王堆帛书〈战国策〉》。

3月

6日　萧萐父在《长江日报》发表《农民革命的风雷对王夫之思想的影响》。

是月　湖北省博物馆约请河南、湖南、上海等省市文物考古人员以及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考古专业的师生对楚都纪南城进行大规模勘探和发掘。

韩国磐在《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唐代刘知几的反孔斗争》。

杨伯峻在《文物》第3期发表《孙膑和〈孙膑兵法〉杂考》。

4月

16日　王重民遭受迫害，在颐和园自缢身亡。

出于影射政治的需要，为了将明末思想家李贽树为法家英雄，“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断定明版《史纲评要》为李贽所作，并让作为目录版本学家的王重民为其进行论证。王经过研究后证明这是一部假托李贽之名的伪书。王不愿做违心之论，只得在政治重压下选择自杀。

是月　贾兰坡《周口店——“北京人”之家》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5月

15日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克拉克·豪厄尔率美国古人类学考察组来华访问。

是月　标点本《旧唐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刘乃和在《文物》第5期发表《帛书所记“张楚”国号与西汉法家政治》。

6月

佟柱臣在《文物》第6期发表《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

文章认为处于文献记载的夏族活动区域之内的二里头一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在年代上相当于夏代，应是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二里头一期文化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二、三期文化的联系，应是夏文化的特点。夏代晚期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属于红铜时代。夏代的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可能出现了井田，产生了贡赋。王湾三期的灰坑葬反映了社会的分裂与阶级的产生。文献中的夏王就是大奴隶主。作者还依据文献论证了夏代已按地域来划分国民、设立了公共权力机构，说明夏已是奴隶制国家。文中还利用考古资料论述了商代的手工业、商业及阶级对立情况，并依据文献说明了早商按地域划分国民及公共权利的设立情况。作者的结论是：“仰韶文化时期还未形成国家，只有到了龙山文化及其以后，才出现了夏代奴隶制国家”。

谭其骧在《文物》第6期发表《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

冯天瑜《孔丘教育思想批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与杨荣国著《中国古代思想史》、《简明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著《论孔丘》，赵纪彬著《关于孔丘杀少正卯问题》等书，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先后被推荐给全国学习。

标点本《南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7月

9日　耿淡如逝世，终年78岁。

是月　标点本《金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唐兰在《文物》第7期发表《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

同期还刊登了王仲荦的《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

书》。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开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刊为系列丛刊，按年代分专题编译西方特别是美国出版的一些文献和史料汇编，以资料长编的方式来反映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初创时编委会集中了上海最优秀的世界历史和国际问题专家。起初内部发行，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改为公开出版。第一至第五分册由本书编委会编，第六分册由刘同舜、高文凡主编，第七至第十分册由刘同舜、姚椿龄主编，第十一分册由时殷弘、蔡佳禾主编。其后停刊。编者慧眼独具，所选题目每每切中战后国际关系和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对国际关系史研究多有引领，为众多国际关系史和战后世界史学者所重视。

8 月

14 日　毛泽东回答北京大学教师芦荻有关《水浒》评价提问，“四人帮”借机在全国开展“评《水浒》”运动。

26 日　英国“英中中心”组织的英国文物保护访华小组抵达北京访问。

9 月

17 日　伊朗考古代表团来华访问。

是月　中央政治局决定《历史研究》仍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黎澍复任《历史研究》主编。

陈铁健回忆说：“邓小平主持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由黎澍接管《历史研究》杂志。他由近代史所借调丁守和、严四光、陈文桂和我到编辑部工作。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起，《历史研究》在十分复杂而微妙的严峻形势中艰难行进。有时不免采取合法手段，力争发表一点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在紧张的斗争中，编辑部也不平静。”

李泽厚在《文物》第 9 期发表《从历史文物试探体脑分工的起源》。

10 月

5 日　罗马尼亚博物馆考古小组来华访问。

19 日　伊拉克考古代表团来华访问。

是月　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第10期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11月

13日　田昌五在《光明日报》发表《我国是怎样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的》。

14日　杨宽在《文汇报》发表《驳斥〈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评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的观点》。

20日　杨宽在《光明日报》发表《黄老学派和战国时期的反复辟斗争》。

12月

20日　刘乃昌在《大众日报》发表《〈水浒〉是地主阶级瓦解农民起义的反动工具》。

是月　顾维勤《由考古资料中看商周奴隶社会的阶级压迫》由中华书局出版。

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孝感地区和云梦县文化部门在云梦睡虎地考古发掘中发现大量秦简。

考古人员共发掘了12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号墓出土大量秦代竹简，总计1155枚，另有残简80片。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秦简，意义重大。这批简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编年记》（整理者定名）、《语书》、《秦律十八种》（整理者定名）、《效律》、《秦律杂抄》（整理者定名）、《法律答问》（整理者定名）、《封诊式》、《为吏之道》（整理者定名）、《日书》（甲种、乙种）等，涉及秦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为研究秦代的历史，尤其是我国早期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见的丰富材料。

张政烺、李学勤等参加了这批秦简的整理工作。197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平装本，内容包括秦简除《日书》以外八种的全部释文、注释，其中六种并附有语译。1990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精装本。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沙俄侵华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年

国家文物局成立“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

自1959年开始，新疆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葬区等地先后发掘了四百五十余座古墓葬，出土了上万片十六国至唐朝的古代文书（包括碎片）。在唐长孺建议下，1975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由唐长孺负责主持对这批文书进行整理。整理工作历时近十年，先后集中了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近二十人参加。整理过程中除对出土文书极细心地拆揭、反复大量的拼接外，还作了文字辨读、录文，以及内容的定性和时代考订，尽可能确切地对每件文书拟出标题，做出题解说明，并加以注释。最后整理出能成文的文书一千八百余件。录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于1981年1月出版，到1991年10月完成了全十册的出版。1992年10月，图版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卷出版，到1996年12月完成了全四卷的出版，并对原录文本的每件文书内容、文字进行了复核，作了全面订正和补充。每卷均采取上列文书图版、下列文书录文方式排版。图版本还将十册录文本中未收的各墓所剩细小残片，一概补入图版，以便学术界继续深入研究。

该项目是我国学者对出土古文书进行的首次大批量的科学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出版，促进了敦煌学研究，并为吐鲁番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983年在中宣部、国家教委的推动下正式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北京大学先后出版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五辑，武汉大学出版了《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集，厦门大学也出版了《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论文集，其重点都放在对新出土吐鲁番文书进行开拓性的研究上。

《世界史动态与资料》创刊。

该刊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组陈启能等编辑，是供内部参考使用的不定期非卖刊物，1978年停刊。

中国科学院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孙越生任主任。

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开展了大量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在孙越生主持下，1977年4月至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三卷《国外中国研究》（内部资料），这是我国学术界最早的“sinology”专门性刊物。1977年底，孙越生等开始筹划“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的编撰出版，开启后来各类“中国学（汉学）”丛书之先河。所收书目包括《国外西藏研究概述》（1979年）、《日

本的中国学家》(1980年)、《美国中国学手册》(1981年)、《俄苏中国学手册》(1983年)、《世界汉学家手册》、《国外中国学研究》等，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日本、美国、俄苏等国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情况和特点。1978年，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开始出版发行不定期刊物《外国研究中国》(内部参考资料)，至1980年共出四辑。

朱绍侯在《开封师院学报》第3期发表《〈水浒〉对农民起义的反动影响》。

徐中舒在《四川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甲骨文所见的儒》。

安志敏在《科学通报》第20卷第2期发表《人和猿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关于"生物人"和"社会人"的商榷》。

吴新智在《化石》第2期发表《关于早期人类历史阶段划分的问题——人的社会性不容忽视》。

侯仁之在《建筑学报》第3期发表《从古代城市建设看儒法斗争》。

1976 年

※ 陕西岐山、扶风周原遗址考古发掘展开。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发掘妇好墓。
※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捕。
※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一卷出版。
※《历史研究》对“四人帮”进行清算。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秦公一号大墓。

1 月

8 日　陈铁健在《光明日报》发表《老沙皇脚下的叭儿狗，新沙皇笔下的“政治家”——近代民族投降派李鸿章简析》。

是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历史纪年表》出版。

依《辞海》所附《中国历史纪年表》修订而成。全书分为九部分：(1)《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标明原始社会至清朝各代的起讫年代；(2)《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表》，标明春秋时期至清朝时义和团起义的年代、领导人姓名和建立的年号；(3)《旧石器时代表》，标明距今 60 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到距今 1 万年的资阳人的年代和考古发现的年代、地点；(4)《新石器时代表》，以仰韶、龙山、青莲岗、良渚、屈家岭细石器文化为纲，标明公元前 5000—4000 年的半坡遗址到公元前 1725 年（加减 95）的齐家文化等考古发现的时间、分布地点、C14 断代；(5)《夏世系表》；(6)《商世系表》；(7)《周世系表》（共和以前）；(8)《西周共和以后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按时代或朝代分为 14 种表；(9)按笔画编排的《年号索引》。

此书纪年准确，内容简要，查阅方便，被认为是同类纪年表中较好的一部。

谢本书在《思想战线》第 1 期发表《谈阶级的局限性与历史局限性》。

2 月

24 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人民日报》发表《再论孔丘其人》。

是月　谭其骧在《学习与批判》第 2 期发表《碣石考》。

1954 年夏天，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魏武帝曹操登临的碣石究竟在何处，引起了学界关注。多种毛泽东诗词注释和曹操著作注释，都说是已沦没入海。1974 年第 2 期《地理知识》刊载的《沧海桑田话碣石》一文，也从现代地理科学角度，论证古代碣石山确已沦亡入海。谭氏经过缜密的考证，认定魏武以及秦皇汉武所登的碣石山，就是今天昌黎县北的碣石山。但山前的地貌，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在发生变化。历史时期的碣石山一直屹立在渤海北岸，既没有脱离过大陆，更没有沦于海底。此文发表后，引起学术争论，1979 年，黄盛璋在《文史哲》第 6 期发表《碣石考辨》，对曹操东临碣石之所在进行了考证，认为碣石应在今秦皇岛金山嘴附近。

田昌五在《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划清两种界限，坚持继续革命——从〈水浒〉谈农民革命问题》。

同期还刊登了张海鹏的《李秀成——修正主义和投降派的一面镜子》以及唐长孺的《喜谈史学战线的新变化》。

安作璋在《山东师院学报》第 1 期发表《再论商鞅变法的历史经验》。

3 月

陕西省文管会、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在陕西岐山、扶风周原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

在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一处坐落在整片夯土台基上的西周中晚期完整院落遗址，在扶风县召陈村发现 15 座西周中晚期大型宫殿式建筑基址，在扶风县庄白 1 号窖藏发现大量西周窖藏青铜器。共出土西周青铜器 103 件，其中有铭文者共 74 件，《墙盘》一器铭文长达 284 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现的字数最多的一件西周铜器。又在凤雏院落遗址的一个窖穴中，清理出 17000 片卜甲和卜骨，其中近 200 片卜甲有刻辞。

4 月

阎崇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 2 期发表《农民起义史上投降

与反投降的斗争》。

林甘泉在《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略谈李贽对儒家反动历史观的批判》。

5月

11日　杨荣国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必须为现实斗争服务》。

是月　林甘泉在《文物》第5期发表《对西周土地关系的几点新认识——读岐山董家村出土铜器铭文》。

6月

林剑鸣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阶级斗争》。

阎崇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评王莽复辟的社会基础》。

陈梧桐在《天津师院学报》第3期发表《李自成的反投降斗争》。

7月

20日　以缅甸考古局总局长吴昂道为团长的缅甸考古代表团来华访问。

是月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发掘妇好墓，出土大批铜器和玉器。

该墓是殷墟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且能与甲骨文和历史文献相联系起来断定其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殷代王室墓葬。共出土1928件随葬物品，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石器63件，宝石制品47件，骨器564件，蚌器15件，象牙器3件及残片2件，以及6800多枚贝壳。珍贵文物数量之多，制作之精，堪为殷墟发掘之最。它的发现，对于探讨商代的礼制，考订殷墟商王大墓及青铜器的年代，研究商代社会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1980年由文物出版

社出版。

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全四册。作者从宋以来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各体史书及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金石、地理、政书、史评、类书、小说、笔记、文集等广泛辑集有关两宋农民战争的史料，但由于成书较早，有些材料仍有缺漏。部分资料是否是农民起义尚有待讨论。

此书出版后，中华书局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方面的书稿。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发表100周年纪念会。

林甘泉在《文物》第7期发表《秦律与秦朝的法家路线——读云梦出土的秦简》。

9月

9日　毛泽东逝世。

23日　菲律宾考古学与人类学代表团来华访问。

10月

6日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被抓捕，中国社会进入大转折时期。

是月　我国考古博物馆代表团赴罗马尼亚访问。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四卷，为国内研究近代沙俄侵华史论著中较有影响的一部，所引资料翔实，观点鲜明，学术性较高，是了解近代中俄关系的重要参考书。

史达《沙俄侵华简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12月

以黎澍为主编的《历史研究》从第6期开始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对“四人帮”展开批判。

陈铁健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品格——忆黎澍》一文中回忆说：“‘四人帮’被扣的消息刚刚传来，编辑部立即紧急行动，全力以赴地开始揭批‘四人帮’及其代言人梁效、罗思鼎。黎澍集中全力领导大家组织稿件，撰写文章。”此后，《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大量解放思想的论文，对整个学术界思想界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起了巨大作用。黎澍本人也成为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的领军人物。

这一期上刊登了两篇编辑部文章《〈历史研究〉的遭遇和“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阴谋》和《痛打落水狗梁效、罗思鼎》，还发表了庞朴的《评“四人帮”的假批判》、吴江的《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何其芳的《从狄克到“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稿编写组的《史学领域的阶级斗争与“四人帮”的反革命复辟野心》、李祖德等撰写的《评“四人帮”歪曲秦汉之际阶级斗争历史的奇谈怪论》等文章。

刘泽华在《南开大学学报》第 6 期发表《史学领域的复辟纲领——评江青的“法家爱人民”说》。

哈尔滨师范学院编《无耻篡改历史，妄图称霸世界——批判（苏）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论文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3 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保存比较完整的帛书二十余种，共有十二万字左右，内容有《易经》、《老子》、《战国策》，以及关于天文、相马、医学、历法、兵法等方面的典籍，并由帛书整理小组整理出一部《战国纵横家书》，全书共 27 章，其中有 16 章是久已失传的帛书，从未见于现存文献，不仅可以补充《战国策》、《史记》等书之不足，还可以订正这些书籍中的一些舛误。

是年

《井盐史通讯》创刊。

该刊是我国唯一的盐业史专业学术刊物，主要刊登中国盐业经济史和科技史的专题研究论文。1986 年改名为《盐业史研究》。

陕西临潼零口镇发现西周青铜器《利簋》。

上有 32 字，铭文有“武征商，唯甲子朝”等，所记武王克商之时日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一致。

《革命文物》改为双月刊。

本刊原为1972年开始出版的《文物——革命文物》专号（不定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凤翔县南指挥村开始发掘秦公一号大墓。

墓主为秦景公，系秦穆公四世孙、秦始皇十四代先祖。发掘过程长达十年，直到1986年5月才开始启椁。此墓为“倒金字塔”型，规模巨大，墓道和墓室连成“中”字形，长达300米，墓室顶部长59.4米，宽38.8米，底部长40米，宽20米。总面积5334平方米，比此前所见先秦最大的殷天子墓河南安阳侯家庄王陵大10倍，比湖南长沙的西汉马王堆一号墓大20倍，是迄今我国考古发掘最大一座墓。在大墓主椁室，规整有序地排列密布了186个人殉，在所发掘西周以来墓葬中也是殉人最多的。椁室的柏木“黄肠题凑”椁具，为我国迄今为止所发掘的周秦时代最高级的葬具，椁室两壁外侧的“木碑”是我国墓碑最早的实物例证，墓中所出土的石磬也是我国发现的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文字多达180多个，字形体为籀文，酷似“石鼓文”，为推断墓主提供了文字依据。

1977 年

※ 夏鼐发表《碳—14 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
※ 唐兰发表《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
※ 邓小平推动恢复高考。
※ 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部出版。
※ 李学勤发文引起关于“历组卜辞”时代的争论。
※ 黎澍发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

1 月

林干《匈奴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有代表性的匈奴史研究著作。作者对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约五百年的匈奴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权组织、文化习俗、部族盛衰、政治演变，及匈奴族与其他各族特别是汉族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叙述，提供了一幅匈奴族历史面貌的大致轮廓。

后作者在此书基础上经补充扩展又撰成《匈奴通史》一书，于 1986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 月

7 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文中提出著名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观点。

15 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文物局《关于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加强文物保护管理的报告》。

是月　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编《中国原始社会》由文物出版社

出版。

内容包括人类社会的形成、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和原始社会的解体三部分。

4 月

9 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和云南省博物馆联合考察队在云南省禄丰县发现一个完整的古猿下颌骨化石。

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这种从猿到人过渡类型的完整的下颌骨化石，国外也从未发现过。

15 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

是月　夏鼐在《考古》第 4 期发表《碳—14 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

文章根据当时公布的各种史前文化碳—14 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它们之间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亦即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问题。该文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独到看法，尤其重要的是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一观点是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

此文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对后来大陆学界考古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黎澍在《历史研究》第 2 期发表《“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

该期还发表了《“四人帮”在史学领域招摇的一面霸旗——评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历史唯心主义的标本——评〈儒法斗争史概况〉》、《复辟狂唱出的“反复辟”高调——批判梁效、康立歪曲西汉历史的谬论》、《覆灭前的哀鸣——评梁效〈论李商隐的无题诗〉》等文章。

姚雪垠在《人民文学》第 4 期发表《谈〈李自成〉的创作》。

作者对无限拔高农民起义领袖的观点给予批评，认为从秦朝末年到清朝末年，很难找见一个农民英雄的领袖人物能摆脱帝王思想或皇权思想。他们或者是希望自己称王称帝，或者是拥护别人称王称帝，其下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应该把某次农民起义时的一些乌托邦思想或不能成功的试验当作超脱于封建历史之外的政权实体。人类历史没有存在过非封建性的农民政权。农民起义领袖的帝王思想就是皇权思想，他们照样受到天命观的束缚，无法超越历史局限，因此不能把他们塑造成无产阶级英雄。李

自成所领导的是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但客观上不可能而且主观上也不会觉悟到需要改变封建社会的性质，所以李自成不仅不反孔，相反还迷信孔、孟和利用孔、孟。作者认为，封建社会中领导农民起义的杰出人物并不是超人，不能忽略他的各种想法和具体活动都得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不能将那些只有现代人才能有的思想和行动强加到他的身上。

5 月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修订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该书的最后版本，依据 1973 年改编本修订重印。迫于“评法批儒”的压力，作者在这两个版本中，特别是在后一版本中，将先前坚持的孔子和先秦儒家学说曾在历史发展中起过进步作用的观点做了大量删削。

6 月

郭沫若在《历史研究》第 3 期发表《捧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调寄沁园春》。

词曰：四匪成帮，疯魔乱舞，小丑跳梁。恨垄断论坛，是非颠倒，生吞历史，比附荒唐；妄想夺权，阴谋叛乱，竟欲登天摘太阳。粉碎了，把多年流毒，彻底扫光。宝书传遍四方，第五卷雄文放光芒。是斗争经验，辩证思想；辉煌实践，精锐武装。努力钻研，加强建设，毛泽东旗帜高扬。齐奋勉，学英明领袖，治国抓纲。

该期还发表了《一桩异乎寻常的反党事件——评“四人帮”伪造党史的罪恶活动》、《“古为帮用”——清算〈学习与批判〉利用历史反党的罪行》、《董仲舒的儒法合流的政治思想》、《一个反法的“法家”——王夫之》、《中国近代“儒法斗争”驳议》等文章。

齐思和在《历史研究》第 3 期发表《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

匈奴西迁及其是否到过欧洲的问题，自 18 世纪起就是西方学者广泛讨论的问题，匈人是否即匈奴以及匈奴如何西迁欧洲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聚讼纷纭的问题。其关键在于学术界未能考证出匈奴西迁的具体过程。作者依据中国和罗马文献中关于匈奴西迁的原始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文章考察了北匈奴西迁的历史背景，并对北匈奴西迁的具体过程进行翔实论证，从而证明了匈人的主体即是匈奴这一历史结论。

齐文有关匈奴西迁的具体路线引起学术界争论。

7月

14日　唐兰在《光明日报》发表《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

作者首次提出我国文明史有六千年左右，并认为大汶口文化已经出现了阶级，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

该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针对其观点展开了一场有关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学术讨论。彭邦炯在1977年12月15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是氏族社会不是奴隶制社会——就大汶口文化和唐兰先生商榷》，对唐文进行质疑。唐兰在1978年2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兼答彭邦炯同志》，坚持自己的观点。陈国强也在《厦门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发表《略论大汶口墓葬的社会性质——与唐兰同志商榷》、高广仁在《光明日报》1978年4月27日发表《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与年代——兼与唐兰先生商榷》，参与讨论。后唐兰又发表《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与其陶器文字，批判孔丘的反动历史观》，更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21日　刘节病逝，终年76岁。

是月　《河南文博通讯》创刊。

该刊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季刊，2000年改为双月刊。

陕西周原考古队开始发掘岐山凤雏村甲组建筑基址，发现了大批甲骨文。

这组建筑基址的时代属于西周初年，为宗庙建筑。甲骨文出土于建筑基址内西厢房第二号房间的二个窖穴里，共出土甲骨21050片，其中卜甲19710片，卜骨1340片，有字甲骨293片。这是我国首次大批发现西周甲骨文，其意义不亚于1899年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这批甲骨文字的内容很广泛，主要记载上起先周王季或文王，下至西周康昭时期的卜祭、卜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卜征伐和杂卜之事，另有关于人名、官名、地名、月象和计时方法等等记载。该批甲骨为探索周文化的渊源，研究商末周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商周关系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8月

4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

《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

关于学风问题，邓小平说："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并指示"学术刊物要办起来"。

12 日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结束。

是月　王永江、陈启伟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评梁效某顾问》。

文章对冯友兰"文革"期间参与"梁效"班子活动进行嘲讽。陈石之还在该期发表了《评"四人帮"发言人梁效》，并在《历史研究》第 5 期上发表《二评"四人帮"的发言人梁效》，两文对梁效炮制的一系列文章进行了揭露。

9 月

1 日　黎澍在《光明日报》发表《正确理解"古为今用"》。

文章对"文革"影射史学进行了批判，指出把"古为今用"粗暴地歪曲为实用主义的"古为帮用"，大搞影射史学，这是"四人帮"的一大"创造"，他们用一些随心所欲的胡说八道来代替科学论证，使历史完全变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

15 日　刘大年在《光明日报》发表《毛主席指引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

10 月

21 日　《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

1977 年 9 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邓小平的坚决支持下，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 10 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高考制度的恢复，为被"文革"耽误的大批知识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并就此改变命运的机会，使社会上和青年中重新出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高考制度的恢复，也是国家走上正轨、新时期即将来临的标志。

是月　《苏联修正主义史学观点批判》（第 1 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博物院和文物出版社联合发起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

以夏鼐为团长的中国考古代表团赴伊朗访问，并参加伊朗考古学中心召开的伊朗考古学年会。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作者的学术论文集，内容包括他早年在北京大学讲授金石学的讲义《中国金石学概要》，以及研究铜器、度量衡、石刻、石经、书籍制度等方面的45篇重要论文和序跋杂文。其中《中国金石学概要》一文对北宋以来金石学的研究成果第一次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1988年再版。

11月

18日　国家文物局在河南登封召开告城遗址发掘现场会，座谈有关夏文化问题。

是月　李学勤在《文物》第11期发表《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引起关于“历组卜辞”时代的争论。

作者提出了“历组卜辞”的概念，并从文字特征、文例、人物、贞卜事类、称谓及与出组卜辞有共版关系诸方面论证了历组卜辞非武乙、文丁卜辞，而应是武丁晚年至祖庚时代的卜辞。这一见解，是对董作宾五期分法的重大修正，发表后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并在学界引发激烈争论。

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评。

全文近14000字，用丰富而扎实的材料证明了杜甫后期思想中既非如刘大杰所说的“存在着重法轻儒的一面”，也不是“由轻儒而倾向于重法”。

刘大杰是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专家。“文革”中，为适应儒法斗争需要，其把文学史改写成儒法斗争史，受到毛泽东称赞。陆侃如此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震动。在“文革”刚刚结束、“两个凡是”大行其道、“批儒尊法”余音未消之际发表此文，无论对作为“摘帽右派”的作者还是《文史哲》杂志来说，都需要具有极大的胆识和勇气。据陆侃如的学生龚克昌回忆：“1977年夏，陆师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封长信，问我能不能在《文史哲》上发表（我当时是负责《文史哲》文学版的编辑

工作)。此信是批评刘大杰先生在其修改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把杜甫说成法家。陆师把杜诗中提到孔子、儒术、儒生、腐儒、管仲、屈原、秦始皇、贾谊、诸葛亮、唐太宗……诗句逐一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杜甫并不是‘轻儒’‘重法’的法家。此信在大半年前寄给刘先生，刘先生没有回信，故他寻求在《文史哲》发表。我以为此信写得很好，用事实说话，征得主编蒋捷夫（蒋实为编委会主任——引者注）同意，就安排在《文史哲》1977年第4期上发表。陆师此信完稿于1976年11月1日，他当时是（山东大学）中文系《刘禹锡诗文选注》编写组的‘壮劳力’，此信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从信中所说的他‘对杜集再读一遍’推测，陆师酝酿写此信必在1976年夏秋，而那时正是毛泽东病重，‘四人帮’横行之时。当时大家也都意识到，刘大杰改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是有背景的，‘四人帮’中的某些人在起作用。聪明过人的陆师不会想不到，但他却偏要去批逆鳞，可见其胆识之不一般。——顺便说一下，此信发表后，蒋捷夫主编告诉我，告状的人还真不少，说为什么给他这种人发文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几年后，北京、上海等地一些权威人士都说，陆师信是《文史哲》1973年复刊后最优秀的文章之一。”（龚克昌《我心目中的陆侃如先生》，《文史知识》2003年第8期）

该文实质上是对“文革”期间那种以政治斗争指导古典文学研究做法的彻底否定，对新时期杜诗研究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影响。

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标点本《宋史》由中华书局出版，标志着我国第一次用新式标点点校的“二十四史”全部出版，历时二十年。

12月

2日 《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北京和在京的一些省、市的部分哲学史工作者，就如何开展哲学史研究工作等问题举行座谈。

侯外庐、黎澍、任继愈、张岱年、王思治、钟肇鹏等30多人参加了座谈。与会人员认为，“四人帮”把“古为今用”篡改为“古为帮用”，大搞影射史学，把所谓的“儒法斗争”作为哲学史研究的“基本线索”，从而把中国哲学史篡改为“儒法斗争”史。一定要肃清其流毒，大力开展哲学史的研究。

是月 黎澍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

该文在思想理论界率先提出“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文章指出：近代中国要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必须经过民主革命，从封建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必须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一场真正的革命：批判一切封建思想，破除所有封建思想的束缚。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共领导的革命对封建思想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和系统的批判；1949年后，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对封建主义思想一直未能得到彻底的清算，以至“林彪、‘四人帮’的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乘机沉渣泛起，以貌似新奇的式样，聒噪一时的花腔，在社会上散发出冲天的臭气”。

文章特别强调，“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我国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长期任务，因为这绝非是采取某种简单的行政措施所能解决的。”“要彻底解决落后思想的影响问题，必须加紧创造消灭落后思想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

是年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创刊。

该刊为不定期连续出版物，由韩儒林创办，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编辑出版《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内部资料）。

主要刊登从日文和英文刊物上翻译过来的学术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美国的中国学家》（内部资料）。

1978 年

※ 理论界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
※《北京大学学报》重刊翦伯赞文章。
※ 湖北省博物馆发掘战国早期曾侯乙墓。
※ 全国历史学规划座谈会在天津举行。
※ 庞朴发表《孔子思想的再评价》。
※ 刘大年主撰《中国近代史稿》出版。
※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会在长春召开。
※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开始出版。
※ 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
※《世界历史》创刊

1 月

23 日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成立，唐长孺任主任。

该机构致力于整理和研究中国出土古代文献资料，主要研究甲骨金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碑刻墓志、石窟雕塑、长城考察和古代工艺等。并编辑出版《出土文献研究》和《文物天地》。

是月　邓广铭、李培浩在《北京大学学报》第 1 期发表《剥掉罗思鼎“史学权威”的画皮——驳斥〈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的胡说八道》。

俞伟超、高明在《北京大学学报》第 1 期发表《周代用鼎制度研究》。

第 2 期、1979 第 1 期连载。该文从分析周代鼎制的分类及其使用制度开始，进而考察使用制度发生的变化，以研究周代社会等级制度的变迁。

2月

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岂之、林英、黄宣民、卢钟锋、樊克政、何兆武、殷瑞渊等参加编著。

该书以中国与西方、进步与保守之间的激烈斗争为线索，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主要社会思潮和哲学学说及其演进过程，着重阐述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等人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理论。对中国农民革命思想及其哲学形态与特点以及西学或新学的历史作用和破产的历史必然性也作了系统论述。由于本书编著于1973—1974年，因此带有明显的"文革"社会思潮的痕迹。1979年重版时虽然作者对全书进行修订，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版面貌。

《哲学研究》第1、2期合刊发表一组论文，对"四人帮"的"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批判。

这组论文包括林子力、有林《历史唯物论还是历史唯心论？——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反批判》，罗元铮、赵履宽《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驳"四人帮"在生产力问题上的谬论》，方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科学论断不容篡改》等。其后，《哲学研究》又连续发表这方面论文，对于学术界重新认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产生较大影响。

同期还刊登了侯外庐《肃清"四人帮"流毒，积极开展哲学史研究工作》一文，提出要彻底批判"四人帮"用"儒法斗争"取代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3月

3日　教育部发出《关于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

其中提出：关于儒法斗争问题，"教材在春秋战国时期，要讲百家争鸣的内容，在讲述过程中，可以按历史事实，讲到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战国以后，地主阶级内部人物在思想上的斗争，不作儒法斗争处理"。关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下限问题，中学中国历史现代部分断限至一九五七年，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涉及的最后时间。世界历史部分，基本上断限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此外，还对中国历史教材中封建社会时期的章节安排，农民战争同下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之初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之间的关系，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共产国际、

《第三国际》的编写问题，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

11 日　黎澍在《人民日报》发表《“四人帮”与社会科学》。

31 日　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发表《科学的春天》讲话，号召知识分子钻研学术。

是月　李洪林在《历史研究》第 3 期发表《揭批“四人帮”是一场历史性大决战》。

作者认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大决战。同遵义会议之后需要一次整风运动一样，粉碎“四人帮”之后，非常需要一次极大规模的思想斗争，把被“四人帮”弄乱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和路线是非，彻底加以澄清。但是“‘左’比右好”的思想，还相当严重地束缚一些人的头脑。好像一批判“左”，就批判到马克思主义头上似的，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还有这样一种论调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只有一个错误倾向，就是右倾，因此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这更是极其荒谬的。既然一般的“左”倾机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四人帮”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搞的那些“左”的东西，当然更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对于那些主观上想革命而犯的“左”倾路线错误，党尚且用了多年时间，花了极大的力量予以批判，难道对于“四人帮”为了掩盖极右实质、为了达到极右目的而搞的极左外衣倒不应当批判吗？

周振甫在这期上发表了《从“四人帮”的假批孔看影射史学的破产》。

任继愈在《哲学研究》第 3 期发表《批判“影射史学”，恢复哲学史的本来面目》。

裘锡圭在《北京大学学报》第 2 期发表《战国货币考》（12 篇）。

张传玺在《北京大学学报》第 2 期发表《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形成的三个阶段》。

文章指出，我国古代土地私有制的形成过程，共经历了九百年左右的时间。以宅圃买卖为标志的第一阶段开始于西周中期，到春秋末年止，其间约五百年。就整个土地私有制的形成来说，这是萌发时期。以耕地买卖为标志的第二阶段开始于战国前期，到西汉中期止，其间约四百年。由于耕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特殊重要地位，耕地买卖关系的出现，意味着土

地国有制基本瓦解，土地私有制基本确立。以山林川泽买卖为标志的第三阶段开始于西汉中期，它标志着土地国有制彻底崩溃，土地私有制深入发展。

4月

8日　邢贲思在《人民日报》发表《哲学和宗教》。

文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信仰。林彪、“四人帮”“把经他们歪曲、阉割、篡改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当作认识对象，而是当作信仰对象，只许人们盲目迷信，不许人们认真思索，更不许人们鉴别真伪”。同时指出：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破坏就是，妄图把经过他们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宗教，就是要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搞信仰主义、蒙昧主义。

文章在理论界引起很大争论，赞成者认为，问题提得非常尖锐，观点切中要害。反对者认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与宗教相提并论。当时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文章。

夏鼐率中国考古代表团赴希腊访问。

15日　陈铁健在《人民日报》发表《神化杂谈》。

该文对“文革”期间历史学界根据现实阶级斗争需要对历史真相加以歪曲的做法进行了揭露，并对太平天国及义和团运动的一些阴暗面作了客观论述，要求还历史以真实面目。该文发表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前一个月，表现了作者的胆识和见地。

文章说，太平天国后期，外部有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围攻，内部农民的弱点也大量暴露出来，封建帝王思想侵蚀了革命领导集团。洪秀全等人纵情享乐，严分尊卑，结帮自固，暮骄之气，日益严重。洪秀全往往把荡平中外之敌的希望寄托在子虚乌有的皇上帝身上。一直到死，他都劝人相信：皇上帝一定会把胜利和幸福赐给天京的臣民。曾经是唤起人们觉醒的拜上帝教，成了束缚革命向前发展的桎梏；本来是农民政权象征的天王府，已经悄然向封建皇权转化了。这大概就是洪秀全的悲剧。

作者认为，自发倾向十分突出的义和团，只是崇拜怪力乱神，企图借助于降魔术，创造刀枪不入、灭绝洋人的奇迹。它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这就使它更易于沾染封建思想的霉菌，接受封建统治者的影响，因而无法防止和克服笼统排外的行动。

是月　庞朴在《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发表《“火历”初探》。

文章认为，大约在所谓的伏牺神农时代，我们祖先曾以大火（心宿二）作为纪时星象，在文献、礼俗、天文知识等方面，都留有明显痕迹。1984 年，作者又相继发表《“火历”续探》（《中国文化》第 1 辑，1984 年 3 月）、《“火历”三探》（《文史哲》1984 年第 1 期），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四探预定为海外部分，未见刊出。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等校专业教师集体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哲学研究》第 4 期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积极开展百家争鸣》。

文章说：没有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思想交锋，认识就会停滞、凝固化以至发生僵化。只有在自由讨论的基础上，科学和文化才能充分发展和繁荣。在学术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需要进行创造性探索的新课题上，如果只许讲一家之言，不许讲不同意见，只搞“一言堂”，不搞“群言堂”，其结果就会堵塞科学发展的道路，就会使科学窒息。从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寻找片言只语，甚至捏造某些言论作为武器，来反对别人进行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来堵别人的嘴，是“四人帮”所推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的一个特征。必须把“四人帮”，连同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禁锢政策一起，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开展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必须严格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撤销“四人帮”设置的许多学术“禁区”。

《历史研究》第 4 期刊登编者文章《大家都来提倡自由讨论——答读者》。

文章说：“四人帮”一伙在学术领域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得社会科学园地上百花凋零，荒芜寂寥，自由讨论问题的民主空气被破坏殆尽，万马齐喑。“四人帮”是压制人民自由的最大罪犯，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要充分发扬民主。允许对于一些学术问题舆论不一律。只有科学的批判，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批判，才是具有最大威力的批判。不仅不能排斥，而且恰恰需要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上，提倡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提倡百家争鸣。

戴振海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驳“四人帮”的历史学界“一片黑暗”论》。

文章说，用“客观主义”的大棒否定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用“历史主义即唯心史观”的胡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四人帮”炮

制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的“理论”基础。他们否定了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也就根本否定了唯物主义而代之以从主观需要出发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也就根本否定了历史的辩证法，而代之以反历史的形而上学。

林甘泉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论秦始皇——兼评“四人帮”的唯心史观》。

文章写道：“四人帮”在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上，把历史学变成“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其流毒是不可低估的，从理论上深入批判他们的反动观点，肃清他们的流毒，是当前的中心任务。

5月

4日　黎澍在《光明日报》发表《民主与科学》。

11日　《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实际上提出了重新评价毛泽东的问题。

文章认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一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是月　《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重新刊发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从学术上为翦伯赞平反昭雪。

编者按云：在这篇文章中，翦伯赞同志就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意见”。这些意见与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的《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的有关讲话相配合，坚决批判了当时存在于史学领域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和浮夸、浮躁等不正之风，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林

彪、“四人帮”的黑干将戚本禹之流就给翦伯赞同志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扣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的大帽子。这完全是颠倒黑白，蓄意诬陷。今天，林彪、“四人帮”虽已揪出，可是流毒不可低估。翦伯赞同志当年谈的一些问题，至今仍为史学界所关心。

该期还刊发了一组纪念翦伯赞的材料，包括郭沫若在不同时期写给翦伯赞的35封信件，邓广铭、陈庆华、张寄谦、张传玺合写的《翦伯赞同志和〈中国史纲要〉》，以及北大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所写的《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

国家文物局在故宫博物院举办“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览”。

湖北省博物馆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发掘战国早期曾侯乙墓。

此次发掘出土了“曾侯乙编钟”等大量珍贵文物，对于研究曾国历史、中国音乐史有重要意义。

傅振伦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方志——史料的宝库》。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共同发掘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

这是西藏地区第一次进行考古发掘。

6 月

12 日　郭沫若逝世，终年86岁。

13 日　全国历史学规划座谈会在天津举行。

会议的主题是拨乱反正，讨论制订未来几年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规划。来自全国各地的170多位史学工作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科研组织局局长刘导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在会上讲了话。

座谈会对“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及其对历史研究和教学的破坏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宋振庭和刘泽华分别在会上宣读了《论“四人帮”的产生和灭亡》、《砸碎枷锁，解放史学》的论文，引起强烈反响。

与会人员认为，要在几年内编写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各种多卷本通史、断代史和专史，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积极开展历史学各学科重要专题的研究和重要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重要史学工具书的编纂。历史学的各个学科都要进行基本建设，尤应以中国的和世界的近现代史为重点。同时，

还要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恢复和建立各种史学研究机构，培养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人才。会上，各个单位和地区踊跃承担研究任务，初步落实的专著有四百四十余项，资料书和工具书有近七十项。会议议定成立和着手筹建的学术研究会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清史研究会”、“蒙古、元史研究会”、“中国史学史研究会”、“东南亚史研究会”等共十三个。会议提出在积极发展各种学术研究会的基础上，恢复中国史学会。

这次会议，是历史学界摆脱“文革”影响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1979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的筹备会。

是月　丁伟志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四人帮”是历史科学的敌人》。

文章说，在“四人帮”的欺骗和胁迫下，几万人、几十万人都来“之乎者也”地“评法批儒”，这是对历史学的大破坏。“四人帮”散布了大量乌七八糟的东西，制造了大量的混乱，历史科学因之遭了大殃。因此在揭露和批判他们利用历史反党的政治实质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他们在利用历史反党的过程中对历史科学本身所造成的破坏。“四人帮”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敌人，应当拿出对待敌人的郑重态度，严格审视和剖析他们在历史学方面炮制的各种论点和口号，以辨真伪、正视听。

同期还发表了几篇讨论太平天国的文章，包括郭毅生的《如何评价杨秀清——太平天国的“五主”、“八位万岁”与“天京事变”的考察》、王庆成的《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蔡少卿的《论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田原《关于编选洪秀全“述志诗”的一点意见》等。

傅筑夫由南开大学借调到北京经济学院。

1977年，国家制定科学发展八年规划，中国经济通史被列为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向南开大学借调傅筑夫承担八年规划的这项重点任务。

张钰哲在《天文学报》第19卷第1期发表《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

作者根据对哈雷彗星运行周期的推算，结合古代文献中相关资料，对武王克商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年代提出了看法。在张文的启发下，赵光贤发表了一组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的研究文章。张文对90年代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乔志强《山西制铁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7月

18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

《报告》写道："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清除'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在人民内部，要有领导地、旗帜鲜明地采取开放的方针，放手让大家创作，让大家著书立说。要严格遵守毛主席规定的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不能任意上纲，把作品中的思想问题、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要通过出版物促进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和不同流派的自由发展，促进学术上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同一专题可以出版不同作者、不同特点、各有创见的学术著作。重要的外国名著，可以出版有不同特色的译本。重要的古籍可以出版用不同方法整理的选本或注本。""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方针。要继续批判'四人帮'的文化虚无主义和禁锢政策。批判地继承中外文化遗产，是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必要条件。要按照不同读者的需要，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有选择地整理出版中国古籍和翻译出版外国古典和当代的重要著作。"

是月　宋振庭在《历史研究》第7期发表《论"四人帮"的出现和灭亡》。

同期杂志还发表了其他几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包括周叔莲、吴敬琏的《"四人帮"——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招魂巫师》，罗尔纲的《对"四人帮"的历史学界"一片黑暗"论的有力批驳——建国以来十七年间太平天国史工作的成就》、戎笙《洪秀全与〈劝世良言〉》等。

宫川寅雄率日本考古学者代表团来华访问。

叶世昌、陈绍闻《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册和下册分别于1983年10月、1980年7月出版。

上册为先秦的经济思想，中册为秦汉至鸦片战争前的经济思想，下册为近代的经济思想。每册各按历史时期分若干章。每章的第一节概述本章所涵盖的历史时期的一般社会经济情况，以下各节按人物或著作分述其主要经济思想。每一人物或著作都先介绍其基本情况及政治、哲学等观点，然后将其经济思想归纳为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

该书是国内最早将中国古代和近代经济思想贯通起来的一部专著，主要缺点在于上册内容过于简略，且受到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册经修

订和扩充后，单独以《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为名于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复旺、王建初在《哲学研究》第7期发表《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文章说：迷信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只能歪曲和糟蹋马克思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而不是当作教条来对待。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发展的理论，而不能看成一成不变的学说。

韩连琪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

8月

22日　杨荣国逝世，终年71岁。

“文革”结束后，杨荣国受到批判。1982年6月，在杨荣国病逝4年之后，中共广东省委纪委对其做出结论：“杨荣国同志在‘批林批孔’期间，为迎合‘四人帮’所谓‘儒法斗争’的需要，不惜歪曲事实，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但未发现杨荣国同志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意不给处分。”

是月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历史的记录——“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与篡党夺权阴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文革”影射史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分三编，第一编为“四人帮”影射史学罪行录，将1973年9月至1976年10月间“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重要著作尽行列出，并对文章的写作背景、经过及其主要内容进行了揭露。第二编为“四人帮”反动历史观论点摘编，系统总结了影射史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第三编具体列举了“四人帮”歪曲史实、编造历史的证据，对“四人帮”强加于孔丘以及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历史的不实之词进行批驳。

该书于1976年11月开始编撰，1977年6月曾以《“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资料汇编》为名内部发行。

刘泽华在《历史研究》第8期发表《砸碎枷锁，解放史学——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革命”》。

作者认为：“史学革命”这个口号，由于“四人帮”及其同伙的歪曲和篡改，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革命意义，成为这伙反革命黑帮在史学领域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为了达到称王称霸的目的，他们祭起了两大法宝：一是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取消百家争鸣，以邦言号

令天下；二是以反对纯学术和折中主义为名，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置于死地。“四人帮”在这方面造成的混乱，远未清除，有必要拨乱反正。作者提议，凡是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理论、历史事实，进行了错误批判的，必须执行批判的批判，把它拿到实践面前重新加以检查。“四人帮”设置的许多“禁区”和“禁条”，有些还像恶魔一样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却步不前。不打破这些“禁区”、“禁条”，繁荣历史研究就是一句空话。作者认为，必须打破“关于孔、孟、儒的历史评价问题”上的禁区，允许人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重新评价。要在历史研究中坚决摒弃历史类比的做法，必须把秦始皇这类被“四人帮”神化了的人物从供桌上请下来，让人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去研究、去批判。“四人帮”利用历史搞反革命影射，又用影射的观点看待历史问题和评价别人的历史著作，致使许多历史问题，弄得人不敢摸不敢碰，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同时，要打破“四人帮”在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要好一切皆好，要坏一切皆坏的形而上学的桎梏。在历史科学面前，一切历史问题都是可以研究的，这里没有终极的真理。关于研究历史的“理论根据”，作者认为这只能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至于对具体问题的论述，则不能字字拘泥。

该文的发表，对史学界冲破教条主义禁锢起了推动作用。

庞朴在《历史研究》第8期发表《孔子思想的再评价》。

这是“文革”后第一篇为孔子翻案的文章。作者一反“文革”期间盛行的对孔子进行辱骂和猛烈批判的做法，认为孔子学说在后世发生的影响，有消极的一面，也还有积极的一面；后人对孔子的利用，起过反动作用，也曾起过进步作用。不能以一个方面否定另一方面，不能拿一种作用抹杀另一作用。只有把旧思想旧文化中的合理部分剥取出来，吸收下去，才会变得更有力量和生气。这种把孔子既当作革命对象，又当作继承对象的态度，就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对于那些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剥削阶级思想学说的批判态度。对待孔子思想的问题，不是消极地处理一件斑驳的古董，单纯地防范毒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关系到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这样一个大问题。这一点，不因我们注意与否而顽强地存在着，并随着我们解决的正确与否而发生着促进或阻碍社会前进的作用，是不容掉以轻心的。

文章发表后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台湾情报刊物以《中共对孔子思想的重新评价》为题作了摘要，谓“该文似为当前华派重新评价孔子的代表作”。亦有人评价此文开近30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先河。

《光明日报》8月12日同时发表。

戴逸在《历史研究》第8期发表《实事求是　勇于创新》。

文章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反对一成不变、因循保守，反对在片言只字中讨生活。实践是最有权威的，理论必须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历史研究中，就是要占有丰富的实际材料，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而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不能受框框的束缚。在历史学界，也存在着不从历史实际出发而从片言只字出发来研究历史的情况。发言写文章，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力求稳妥，一个论点总要寻找经典著作上的某句话作为护符，似乎这样做，就能够证明论点之"正确"，就能够保险不犯错误。这种态度是和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外国研究中国》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刊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介绍西方"汉学"的出版物，发70年代以来"汉学"输入之先声。内部发行，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从第二辑开始，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印数达1.9万册之多。到1980年5月终刊，共出版4辑。

刘大年主撰《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革"后期，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准备扩充篇幅重新编写，近代史部分仍由刘大年主持，定名为《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约集丁名楠、钱宏、樊百川、张振鹍、龙盛运、刘仁达、金宗英、俞旦初、张海鹏等参加编写。《中国近代史稿》大体上采用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框架，加上后出的研究成果，史料更加充实。每个时期各有总评。该书原计划分为三册，叙述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80年的历史，即将原《中国史稿》第四册的三章内容每章扩充为一册。原书第一章改为一册，原书第二章因内容较多，扩写为两册，即第二、三册。原书第三章的扩写工作因故没有完成。故最后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稿》共三册，时间上只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失败60多年的历史。

第二、三册1984年出版。该书后被定为高等学校教材，影响广泛。

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1卷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是《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一种，是1949年以后以"民国"作为书名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标志着民国史学科的真正起步，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一辑由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录了白钢《评“四人帮”在农民战争史领域所制造的混乱及其反革命本质》，刘重日、周绍泉《十七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童超《从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看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作用》，牟安世《论中国近代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作用》，张泽咸《曹魏屯田制和汉末农民革命》，朱大渭《唐寓之起兵的性质是农民起义吗?》，王曾瑜《试论宋代农民起义的某些特点》等24篇文章。

马克垚在《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古代社会的几点体会》，再次引发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

该文认为，由于世界史研究中西欧中心论占统治地位，一些外国学者依据马克思、恩格斯谈到东方社会的片言只语，加以引申，以此论证古代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把具有土地国有、公社长存、停滞落后、专制统治等特点的东方社会称为特殊的“亚细亚形态”，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古代东方的特点，主要是从东方的封建社会归纳出来的。他们的看法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对这些特点后来或则产生怀疑，或则予以否定。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这一过程，说明他们已否定了古代东方是特殊社会形态的论述。该文通过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否认了人们从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所引申的东方社会的特殊性，代表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新看法。

文章发表后，志纯、学盛在《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上发表商榷文章，认为经典作家们并没有抛弃“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名称。于可、王敦书在《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发表《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宋敏在1979年第4期《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看“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志纯、学盛同志商榷》，徐启基在1979年第11期《学术月刊》上发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探讨》等文章，参与讨论。1980年，吴大琨在《学术研究》第1期上发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几个问题》，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历史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应该是六种而不是斯大林所说的五种。

黎澍参与筹划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撰写工作，后未果。

陈铁健回忆：“8月中旬，胡乔木在西郊召集黎澍、李新、廖盖隆商谈编书。胡乔木提出在短时间内写出三本书，即由黎澍负责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此前后，我被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先后调来

的还有郑惠、郑新如、席宣和徐世华。作为主持人，黎澍反复强调要写一部可以影响现实，传诸后世的信史；他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尤其重视。”“为写好共和国史，黎澍多次访晤老一辈革命者。当他得知彭真在陕西某地竟高兴不止，急派我和苏双碧一道准备飞赴陕西访问，了解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有关背景资料。飞机票已买妥，因故未能成行……时隔不久，正是因为不许涉及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许涉及对天安门四五运动的评价，而使大家感到愿望落空，人心思散，最终导致写书组的解体……每当翻检旧作，就会记起黎澍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一定要秉笔直书，写出一部信史，把‘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丑恶公之于世，使人们警醒。否则，就难免重蹈覆辙。”’

9月

1日　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为翦伯赞平反昭雪。

是月　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通过对化石的分析研究，论述了人类的起源和进化发展过程。内容包括中国土地上化石的发现发掘经过，人类化石的形态特征及其比较研究，已发现的各个文化遗址的基本情况介绍，远古人类使用的石器、骨器和用火遗迹的分析和研究，远古人类生活情景，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新发现等，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好评。此书由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日、德、西等4国文字出版，成为国际上的畅销书。

李洪林在《历史研究》第9期发表《翦伯赞同志十年祭——驳戚本禹对翦伯赞同志的诬陷》。

文章逐条批驳了戚本禹强加在翦伯赞头上的帽子，认为：在人民内部，不光是思想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也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更不用说学术问题了。民主的方法就是让人讲话，让人讨论，就是说理，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动不动就给人扣大帽子，不由分说，一棍子打死，这不是社会主义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专政。思想方面的斗争，还要运用思想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战无不胜，并不是靠拳头，而是靠真理。如果只准许批评而不准许反批评，那就不是批评，而只能叫作打棍子。事先把对方的手脚都捆住，然后去打棍子，这能叫思想斗争或学术讨论吗?

文章引起历史学界广泛共鸣。

这一期还刊登了陈启能、沈永兴的《“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与“洋为帮用”反革命阴谋》。

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影射史学批判》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0 月

16 日　余英时率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来中国大陆访问。

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洛阳、西安、敦煌、兰州、长沙、昆明、成都等地，并与俞平伯、钱钟书、唐兰、夏鼐、唐长孺、缪钺、任继愈等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这次访问增进了刚刚摆脱“文革”束缚的中国史学与西方汉学之间的了解。访问结束后，余英时撰成考察报告《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27 日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周扬任主任。

31 日　《历史研究》编辑部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在长春联合举办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会。

黎澍、白寿彝、杨向奎、王玉哲、何兹全、日知、郑昌淦、斯维至、李埏、金景芳、赵俪生、田昌五、王思治、徐敏、丁伟志、余鸿业、裘锡圭、李泽厚等来自十五个省、市的 86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主旨是在古史分期问题打破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的局面，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成为批评对象。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的诸问题，特别是两种制度演变的时间问题。与会学者冲破了古史分期问题讨论长时期的禁忌，就中国古代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展开热烈争鸣，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诸说并陈，畅所欲言，一举打破了古史分期讨论中“战国封建说”一统天下的僵化局面。

这次会议带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会后，史学界展开又一次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

是月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一部甲骨文集大成性的资料汇编，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甲骨文合集》编辑工作组集体编辑，共 13 册，到 1982 年出齐。编辑工作从 1959 年开始。《合集》内容包括殷墟发掘所得及国内外收藏的甲骨和拓本，共选录 41956 片，其中相当一部分第一次发表。在编辑过程中，进行了辨伪、去重、断片缀合等工作，使《合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发现甲骨的最丰富的结集，被称为“建国以来古籍整理的最

大成就”。

李学昆在《历史研究》第10期发表《扼杀历史科学的恶霸行径——再驳戚本禹对翦伯赞同志的诬陷》。

该文通过对戚本禹的批判，对翦伯赞在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等方面的观点进行了强有力辩护。该文以及李洪林《翦伯赞同志十年祭——驳戚本禹对翦伯赞同志的诬陷》等文的相继发表，和备受批判的翦伯赞的纲领性文章《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的再度问世，反映出史学界要求全面为60年代初期翦伯赞史学观点平反，要求在一系列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和贯彻历史主义的学术诉求。

文物商店总店成立。

11月

15日 《光明日报》第三版以通栏标题整版刊登苏双碧《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此文是为《海瑞罢官》平反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文章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进行了猛烈批判，认为姚文元的文章实质上是“实行法西斯思想独裁的反动‘信号’”，兴海瑞的文字狱，是“四人帮”篡党夺权所走出的第一步；姚文“为‘四人帮，制造冤狱大造舆论”，别有用心地把海瑞“平冤狱”和现实专政制度混同起来，声嘶力竭反对“平冤狱”从其政治阴谋是为了掩盖他们制造冤狱的罪恶勾当，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实行法西斯统治作舆论准备。

文章尖锐指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出笼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大阴谋，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大浩劫。

“十年动乱”是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为发端的，否定姚文就意味着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这篇文章一刊发，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就广播了这篇文章的摘要，《文汇报》等国内众多报刊争相转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天决定出版这篇文章的单行本。世界各大媒体也纷纷播发刊登了这篇文章的消息和评论。11月16日，美国《纽约时报》刊发专稿，称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非神化的努力中最惊人之举”；17日，日本《朝日新闻》认为这篇文章批判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8日，《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这是一篇“冲击性很强的文章”。

21日 山东大学举办文科理论讨论会。

应邀参加讨论会的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五十余所高等院校，以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国家出版局、《光明日报》、中华书局、古籍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战线》、《大众日报》、山东人民出版社、山东省广播电台等新闻出版单位也派出会议代表。蔡尚思、罗竹风、杨向奎、吴大琨、周振甫、徐中玉、张舜徽、王先进、孙思白、吴寿祺、漆侠、田昌五、李秀林、高放、钟肇鹏、郑鹤声、殷孟伦、王仲荦、韩连琪、蒋维崧、孙昌熙等出席会议。

这是一次在思想领域深入批判“四人帮”，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学术讨论会。会议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会议认为，要发展科学，繁荣学术，就必须打开“禁区”。会议还对如何评价孔孟和儒家思想，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作用、农民政权的性质、皇权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3 日　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史讨论会，会上成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吴泽任会长。会议集中就皇权主义、农民革命政权性质、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和研究农民战争史的现实意义等四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后，农民战争史研究逐渐摆脱阶级斗争观念的束缚，贯彻历史主义成为主流。

29 日　中国古文字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成立。

是月　彭明《五四运动论文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汇编了作者多年来研究五四运动的成果，虽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但综合内容来看，实则是一本比较系统的五四运动史。作者对五四运动的时代背景，特别是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进行了探讨，对五四运动发展的每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三次论战等，都进行了阐述。

12 月

15 日　《世界历史》创刊。

该刊是我国第一本世界史专业杂志。

19 日　黎澍在《未定稿》第 4 期发表《彻底平反吴晗同志的冤

狱》。

文章指出：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仅造成了吴晗的千古奇冤，并在全国各地株连了难以数计的作家和演员，是"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举诬陷、陷害，制造冤狱的开始……人们老是感到心有余悸，思想从何解放？四个现代化的步子如何能够加快？消除余悸，当然要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前提，而平反冤狱又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吴晗的冤狱是一次大冤狱……吴晗的冤狱实际上已是一个不平自反的冤狱了。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胆子再大一点，把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这个长期悬而不决的冤狱彻底平反，解除这个精神负担，使人心胸为之一快呢？

是月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49—1966）》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包括中国大陆出版的考古学书目、报刊所刊载考古学论文索引、论文集所载考古学论文索引，以及台湾和香港的考古学书目、报刊和论文集所载考古学论文索引。共收中国考古学及有关论著537种，收文献7000余种。

《历史研究》第12期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提倡不同学派平等地讨论问题》。

该文意在破除古史分期讨论中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的局面。文章说：要允许各种学派存在，允许各种学派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去探索真理，进行争鸣，并以国家权力为之提供条件。在古史研究领域里，有人偏重于文化典籍的研究，有人偏重于考古文物的研究，或者有人偏重于其他方面的研究，都应该受到鼓励，而不应该受到轻视甚至无理的反对。在探索过程中，意见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不是坏现象。"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从历史上看，人类对客观事物要有比较全面，比较正确的认识，几乎无不是在漫长世代通过如此种种不同的途径发展起来的。

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书中提出了华北古文化分期，认为"匼河—丁村系"的文化系统是这样演变的：西侯度文化→蓝田文化→匼河文化→丁村文化→鹅毛口文化。此分期受到科学界广泛重视。

蔡尚思、李华兴在《文史哲》第6期发表《学习毛主席有关孔子

论述的一些体会》。

文章认为，从革命和反革命的政治斗争看，孔子思想体系属于反动文化，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从哲学上的两军对战看，孔子思想体系是反面的东西，要在同它做斗争的过程中发展真理，从对待历史遗产看，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留下的一份珍贵的遗产，应该批判地继承，但即使对孔子思想中某些有用的东西，也不能照搬照用，而是借用它的语言，注入新的内容。

漆侠在《文史哲》第 6 期发表《读〈李自成〉——论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

此文认为农民阶级高于资产阶级，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阶级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政治上，要求消灭维护封建等级特权的专制主义压迫制度，使自己获得人身自由和平等权利。

是年

《考古学参考资料》第 1 辑刊载张光直著、张长寿译《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继续探索》。

该文考察了“块茎种植者居住的中国南方”、粟黍种植者居住的中国北方和“黄河下游、淮河和长江下游的平坦、低洼的冲积平原”三个地区的史前文化，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具有特色的本地产物，是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三个地区的文化逐渐向高水平发展，到公元前 2000 年，“龙山文化至少在三个地区——河南、山东和长江中下游——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社会分化水平”，从而为过渡到一个进步文明时期做好了准备。作者认为商文化源于河南龙山文化，其他新石器文化也为商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并推测“现在被当作早商的”遗存“事实上就是夏”。中国的文明历程“遵循了近东、欧洲和新大陆所见到的同样的形式”。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简明中国历史图册》开始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本图册共 10 册，至 1979 年出齐。

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开始大规模考古发掘。

此墓地发掘时间延续时间较长，出土遗物也非常丰富，其中如彩绘陶盘、鼍鼓、土鼓、特磬等都极具研究价值。

贾兰坡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 16 卷 2 期发表《中国石器

时代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

该文提出了全世界的细石器有两大体系的理论，并提出华北可能是发源地。此说在国内引起重视。

张芝联在《法国史通讯》第1期发表《法国年鉴学派简介》。

该文是“文革”后介绍和引进法国年鉴学派的开山之作。

1979 年

※《中国史研究》创刊。
※ 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
※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 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纂工作启动。
※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出版。
※ 历史动力问题论战展开。
※ 王仲荦《北周六典》出版。

1 月

1 日　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骤。

3 日　胡乔木在中宣部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讲话。

胡乔木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对社会前进究竟起什么作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不是也推动社会前进？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认真的探讨。”

这篇讲话成为稍后学术界发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的引子。

4 日　《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文章指出：“我们党在解放初期提出来的，以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已经不适用了。他们已经不是解放初期那种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而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是党的依靠力量”。“在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内部，巩固地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之一。”

5日　新华社播发《一个惊心动魄的政治大阴谋——揭露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黑文出笼的经过》电文，系统揭露姚文炮制过程。

报道说，有关部门揭露的大量事实证明，由姚文元于一九六五年出面抛出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为结帮篡党夺权而玩弄的一场政治大阴谋。

记者在上海市有关部门亲眼看到了张春桥原来在上海的办公室密藏的有关炮制这篇文章的种种证据，其中有张春桥的亲笔"指示"、"批示"、"作战计划"，有经过张春桥反复修改的历次原稿，有张春桥有关谈话的原始笔录，有姚文元给张春桥的亲笔信函，还有文章发表后搜罗的知识界和社会上的"动向"，等等。这些材料共达百万言以上。

11日　唐兰逝世，终年78岁。

16日　胡如雷在《光明日报》发表《"让步政策"是客观存在的》。

文章认为，农民起义对地主阶级的震慑，使新王朝的皇帝心有余悸，不得不推行"让步政策"。农民起义越是能在推翻腐朽王朝中取得较大的"成功"，"让步政策"的推行就越有效。因此，"让步政策"是农民起义的成果之一，是农民阶级所占领的斗争阵地的扩大。

18日　"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从思想上结束"文革"的标志性会议。

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参加会议的有理论宣传各界的代表及一些在党内多年从事和关心思想理论工作的特邀代表。

此次会议对于新时期思想解放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28日　苏双碧在《人民日报》发表《切中时弊的两本好书——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文章从政治上批判"四人帮"对《三家村札记》的诬蔑，指出《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是"一曲真理和正义的赞歌"，它"伸张了正义，宣传了历史的光明面；鞭挞了历史上的横暴势力，揭露了历史的黑暗面"，姚文元对两本书的批判是"歪曲史料，颠倒是非"，所举证据没有一条能够成立。

是月　翦伯赞遗作《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1、2期合刊上发表。

该文原作于 1960 年，1962 年曾以《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为题在上海作过学术报告。所论皆为五六十年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焦点问题，生前因故未能发表。作者认为，在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问题上，主张在阶级社会只有民族同化，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融合。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都说成是融合，是掩盖了阶级社会民族关系的实质。在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强调战争及其作用，看不见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主张少讲或不讲战争都是错误的。在民族英雄问题上，作者认为，在阶级社会，民族英雄不可能没有偏狭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想。

作者对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种种非历史主义的看法进行了校正，强调民族问题与阶级关系问题之间的差别，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的指导性文献。后收入 1980 年出版的《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

张芝联在《世界历史》第 1 期发表《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

该文系统考察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形成的过程以及相应于不同的过程上的历史主义的内容、特征，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对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批判、继承及其二者的本质不同。通过考察西方国家历史主义的形成及特征，间接为翦伯赞所提出的历史主义主张翻案。

《历史教学》复刊。

《党史资料》创刊。

本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办，初为丛刊，1986 年 1 月改名为《革命史资料》（季刊）。

《中国史研究动态》创刊。

该刊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以发表本学科专业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为主，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各分支学科的年度综述、专题综述、海外汉学研究状况介绍、每年学术会议介绍、名家名作介绍、书评、书讯等，以信息量大，综述水平高而被学界同好称道。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邹衡执笔）《商周考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第一本公开出版的大学考古专业教学参考书，编著者根据现有的考古研究成果，较好地论述了商周考古的基础知识，资料丰富，简洁明了。

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文物展在故宫博物院举行。

徐中舒在《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几点意见》。

作者主张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认为西周是封建领主制，在封建领主制下，土地不能买卖，剥削形态是徭役地租。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转化，大约从西周末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唐末五代，宋以后才是完全的封建地主制社会。

黎澍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最先对中国近现代史上“救亡压倒启蒙”的现象进行了揭示。认为“五四”没能完成彻底反封建的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反封建思想革命任务也不可能彻底完成。主要是“由于中国封建传统异常牢固，而革命又始终是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任务极为紧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这个阶段反封建斗争虽然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发展不能不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作者认为，由于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无论经济领域或者思想领域，都仍然存在着一些由于封建主义长期统治所造成的不容忽视的问题。不重视对有二千年历史的封建传统的批判，不坚决清除旧制度的残余，其结果必然是封建势力乘机在各方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死灰复燃，暗中取代社会主义，还要冒充是最革命的。

何兹全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汉魏之际封建说》。

作者认为，就西周春秋来说，虽然有农奴制或依附关系的出现，只是说明这时是由公社解体向奴隶制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从社会发展所走的道路看，战国秦汉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决定它的社会性质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奴隶制经济。作者指出，汉魏之际，才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并从“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这样几条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之间社会变化的主线来阐述说明。

李洪林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打破党史禁区》。

文章写道：在林彪和“四人帮”所划的禁区当中，党史是最森严的禁区。在这个禁区里，只许他们讲假话，不许别人讲真话，只有唯心主义横行和形而上学猖獗的自由，没有实事求是研究党史的自由。党史是科学，科学没有禁区。因此，打破林彪、“四人帮”所设的禁区，使大家的思想获得解放，实在是研究党史的起码条件。而且有些禁区，实际上是心有余

悸的人自己设的。由于怕鬼，便以为到处是鬼，害得自己寸步难行。这就是所谓“内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正视党史中的混乱现象，而不是回避那些尖锐的问题，就必须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为了帮派利益而歪曲党史，使党史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这是林彪和“四人帮”对党史科学的最大破坏。历史是既成的事实。一切历史（包括党史）的记载，研究或宣传，只不过是对于已经成为客观现实的历史的反映。既然搞党史，那就只能使它尽量符合历史事实，决不能使事实符合反映者的心愿。这应当是搞党史的起码原则。

田昌五在《哲学研究》第1期发表《评“四人帮”唯心主义复辟史学的极右实质》。

2月

1日　苏双碧在《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

文章从总体上揭露姚文元对“三家村”著作和作者的无端诬陷，呼吁为“三家村”平反。

黎澍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一个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

5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在北京举办陈独秀等历史人物评价讨论会。

会上着重讨论了陈独秀的历史评价问题。与会者认为，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地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做出全面的评价，是研究党史、革命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课题。

22日　翦伯赞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悼词说，翦伯赞同志是我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研究中国历史的老一代史学家之一，为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是月　金景芳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

第3期连载。该文主旨在于批评战国封建说，反对历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作者反对通过非学术力量将某一学派定于一尊，认为中国古代分期

之所以长期悬而未决，主要是没有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文章用上、下两篇文章与郭沫若的古史分期说进行了商榷，从理论指导、研究方法到具体论述等多个方面对郭说予以全盘否定。上篇从八个方面谈了对郭沫若分期说的意见，下篇主要谈作者个人对分期的看法。作者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后者则是土地私有制；前者的政治制度是分封制，而后者是郡县制；前者的意识形态是礼制，后者则是法制。正是秦朝对中国的统一，才促成了这种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变化。因此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应从夏后启杀益夺权之日开始，下限终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三个阶段。

侯绍庄在1979年第8期《历史研究》上发表《怎样理解郭沫若同志的古代史分期学说——兼评金景芳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为郭说辩护，认为"郭老的分期说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并为多数人所接受，并不是由于什么别的原因，而是由于郭老的学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至于金先生指责人们对郭老的学说'习非为是，积重难返'，则是论据不足的。"

刘泽华、王连升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论秦始皇的功过是非》。

文章对"文革"中形成的将秦始皇抬至云端加以神话的做法予以挑战，"旨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秦始皇作一番自由的、实事求是的讨论"。作者认为，秦始皇所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就单项推论，似乎无可非议；然而却被另外一些政策、措施所抵消，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或起点不误，落脚点却走到了起点的反面。秦始皇好大喜功，他超越战后秦朝物资匮乏、人丁稀疏的现实，不惜动用大量民力财力，进行一系列浩大的工程。其次，秦始皇是一个少见的暴君，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刑罚之严使人没有伸屈之地。整个秦王朝简直成了一个大囚场。秦始皇统治下的秦王朝成了一个刀光剑影、随时都可能身首异处的恐怖世界，这哪里还谈得上去贯彻推行那些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呢？作者最后总结：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功大过亦大的人物，集中在他身上的矛盾重重交错。怎样在复杂的矛盾变化中陈述他的功过是非，是远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正因为复杂，对他的评价历来差距悬殊，甚至大相径庭，其中蕴含的理论分歧也较多。再加上"四人帮"借吹捧秦始皇宣扬封建专制主义，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因此对秦始皇进行再评价，对促进历史研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都是有意义的。

刘泽华在《社会科学战线》2004 年第 4 期《答客问：漫说我的学术经历和理念》一文中回忆这篇文章时说：关于秦始皇的问题，在当时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议题。人所共知，领袖不止一次以秦始皇自喻，因此秦始皇成为一个神圣的“代号”，形成望秦始皇而生畏的局面。我们评秦始皇的功过是非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秦始皇还给历史，同时要批判秦始皇的残暴和罪过。文章在《历史研究》一刊出，便接到一批愤怒的来信，说我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意在“砍旗”云云。我希望年轻的读者，把我们的文章放到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里读读，比较一下，会有兴味的！

黄逸峰、姜铎在《历史研究》第 2 期发表《重评洋务运动》。

文章反对“不适当地”偏向于洋务运动的积极面，反对过分拔高洋务运动，提倡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评价洋务运动。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一个反动的运动，它是中国封建主义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产物，是清政府一部分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这一反动目的而搞起来的罪恶产物，是外国侵略者一手扶植起来并直接间接为外国侵略利益服务的罪恶产物，是把近代中国导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罪恶产物。它又是臭名昭彰的大刽子手大汉奸大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们发起和把持的罪恶产物。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很不光彩的一页。这是评价洋务运动基本的也是主要的一面。另一方面，洋务运动在改变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促进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方面，客观上起着一定的作用。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是同时并存的，要对它做出历史的全面评价，应该两方面兼顾，任何一方面都不可偏废。

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一场大争论。

张玉田在《辽宁大学学报》第 1 期发表《应当全面看待义和团运动》。

作者提出，必须肃清林彪、“四人帮”在义和团研究中的流毒，全面正确地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在肯定义和团反强暴、反压迫及其反帝爱国性质的同时，还必须实事求是地正视和评价它的落后的一面，“应当把它作为沉痛教训来加以接受”。

李侃在《历史教学》第 2 期发表《义和团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吴泽、桂遵义在《学术月刊》第 2 期发表《实践标准与历史研究》。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根据历史文献对历代古长城的位置、路线、建置的年代和历史沿革进行了考证研究，分《齐长城》、《楚长城》、《魏长城》、《赵长城（附中山长城）》、《秦昭王时之长城》、《燕长城》、《秦统一后之长城》、《汉边塞》等八篇。书中附有12幅插图，表明了上述各段长城经行的路线。作者本拟将东汉以后的长城的考证编为下编，但因故未能如愿。

该书内容大部分写于三十年代，且作者未能进行实地勘查，故而受到一定限制。但作者采摭了大量文献，且详加考释，因此仍具有难得的学术价值。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姊妹篇，由8篇论文组成，主要对中国封建社会总过程，特别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等方面问题，进行了多方面阐述，构成了一个独特而严密的理论体系。论者认为，“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奠定了侯氏学派关于中国奴隶社会史的理论，那么，《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则奠定了该学派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理论”。

《中国史研究》创刊。

该刊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在海内外中国古史研究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是了解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的重要刊物。

创刊号发表了郭沫若《有关〈易经〉的信》，陈垣《治史遗简及晋长沙王刘卒年考》，顾颉刚、刘起釪《〈尚书·甘誓经〉校释译论》，唐长孺《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杨向奎《司马迁的历史哲学》等文章。

田昌五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论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兼评让步政策论》。

针对学术界为“让步政策论”平反的浪潮，作者仍然对“让步政策论”持反对意见。作者认为，大规模农民革命战争所起的作用，和这种战争过后封建统治阶级执行什么政策，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不应把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归结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让步政策论的错误不仅仅在于把大规模农民起义失败后建立的新王朝所执行的某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毫无根据地说成是对农民阶级的让步政策，更主要的是把农民革命战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让步政策，认为只有通过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农民革命战争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说农民革命战争只有通过封建统治的让步政策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把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

的直接动力，不需要借让步政策而行，变成“斗争+让步=动力”。

孙祚民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分歧》。

作者指出，之所以在“农民政权”问题上会有这么多人出现错误，最根本的关键问题，是他们离开了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被某些表象所迷惑，而忽略了政权的阶级实质。少数同志尽管主观上也力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相结合的原则，但由于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如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理解上有片面性，认为对于作为劳动者阶级的农民及其进行的起义和战争，只能赞美其革命性和历史作用，而不能分析他们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这种做法，虽说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善良的愿望，却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不但在实际上离开了“一分为二”的原则，而且难免得出不利于无产阶级政治的结论，片面美化，无限夸张，甚至把古代农民无产阶级化，把古代农民战争现代化，客观上起了“把缺点说成是美德”加以宣扬，甚至“拔高”农民而贬低无产阶级和党的领导的反作用。

3月

23日　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

这是中国当代史学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主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部分编辑出版部门等单位的二百八十多名代表，是史学界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会议呼吁建立中国史的各种学术研究会和各地区的史学会，以调动和组织各方面的研究力量。会议以较多的时间讨论了在过去两次历史学规划座谈会和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的中国历史学发展规划草案（分古代史和近现代史部分），认为实现中国历史学发展规划，必须分别轻重缓急，保证重点。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夏文化史、清史、边疆史、中外关系史、有较高水平的中国通史和近现代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军事史以及重要的历史资料档案、历史大辞典，大百科全书的历史部分等，要集中力量保证完成或提前完成。

会议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进行了学术交流。大会宣读的论文有傅衣凌的《关于明清时代阶级关系的新探索》、陈庆华的《国外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状况》、翁独健的《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的展望》、戴逸的《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些问题》、李侃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点建议》、刘泽华的《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商榷》、戎笙的《关于农民

战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几个问题》、朱杰勤的《关于大力开展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问题》、田地的《关于中国军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吴泽的《中国史研究与四个现代化》等。

黎澍在会上做了《关于发展中国历史学的几点建议》的讲话，指出："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是一切科学研究取得进展的前提。这是举世公认的规则。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问题上绝对不允许搞'集中制'。有了争论，只能平等讨论，不能服从多数，不能服从个人，不能服从权威，不能服从定论。任何情况下，都要允许坚持意见、保留意见，也要允许改变意见，要永远废除由领导机关或权威人士以行政手段为学术论争作结论的错误做法。没有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就不可能有科学的迅速发展。同时也还要提倡给予科学工作的成就以应有的尊重。"

是月　黄现璠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

第3期连载。

文中云："殷周当作奴隶社会，理论既公式化，不辩证地体会马克思之意，站不住脚，史料方面也没有说服力。"该文是1979年后第一篇冲破禁忌，从学术上论证"中国社会发展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阶段"的论文，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拥护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者越来越多，对"中国奴隶社会论"形成强有力挑战，殷商并非奴隶社会几成历史学界的共识，并推动了新时期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陈铁健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重评〈多余的话〉》。

该文意在为长期以来受到歪曲的瞿秋白《多余的话》辩诬。作者本着维护历史真相的态度，对《多余的话》产生的原因、背景、具体内容及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对瞿秋白身上的两个主要矛盾——"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和"马克思主义和绅士意识的矛盾"进行了重点分析，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以文人卷入政治漩涡，因不改本色产生的内心矛盾的自我解剖。它不是所谓叛徒的自白书。

该文是第一篇为瞿秋白翻案的文章，对瞿秋白的平反昭雪起了重要作用。该文的发表，揭开了中国历史学界重新评价中国革命史上重要人物的序幕，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参与讨论该文的文章达数十篇之多。与瞿秋白交往多年的丁玲认为："这篇文章对秋白一生的功绩，对他的矛盾都做了仔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比较全面，也很公正。"茅盾也指出该文"持论极公平"。

顾颉刚、王煦华整理标点《崔东壁遗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罗明等编著《中国近代史常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 100 多个题目组成，发行量较大，先后重印 8 次。

《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下册于 1981 年出版。

该书是由杭州大学、北京大学、通辽师范学院、辽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吉林师范大学等校历史系教师共同编写，林志纯主持，是在吉林师范大学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世界上古史》基础上，历经多年修改而写成的。书中广泛运用原始史料和国外研究成果，对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大阶段的具体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并大大推进了国内世界史学界关于古代城邦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世界史研究动态》创刊。

该刊由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编辑部编辑，初创时限国内发行，1986 年起改为公开发行。1995 年起，改为《世界史研究年刊》。

罗荣渠在《世界史研究动态》创刊号发表《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作者认为，世界史的研究中有许多“禁区”。造成这些“禁区”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史的个别论点绝对化，认为凡是经典作家说过的话，即使是只言片语，也“句句是真理”，只能照抄不误。一种情况是把有关国际问题的外交文书和官方言论经典化，认为凡是报刊上公布的正式提法都是权威性的，科学研究都必须按此“口径”办事。由于这两个“凡是”在作怪，世界史研究中的“禁区”比比皆是。作者指出，打破“禁区”，并不是要破除一切“语录”和一切官方文书，而是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问题和如何正确区别历史研究和现实政治的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如果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不能使世界历史的科学研究沿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成立，朱杰勤任会长。

李瑚《魏源诗文系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是魏源研究专家。魏源所写诗文颇丰，惜多未注明写作时间。本

书将魏源著作按年排比，从诗文所记事件、人物，或通过书籍刻印时间考订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方便人们据此研究魏源思想发展的脉络。

4月

4日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广西桂林成立，张舜徽任会长。

6日　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考古学规划会议在西安举行。

一百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王冶秋、容庚、于省吾、徐中舒、商承祚、陈邦怀当选为名誉理事，夏鼐当选为理事长，裴文中、尹达、苏秉琦当选为副理事长。

10日　李洪林在《读书》创刊号发表《读书无禁区》。

此文目的在于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打破他们设置的精神枷锁。

文章说：除了秦始皇烧书之外，我国历史上清朝是实行禁书政策最厉害的朝代。有一个统计说清代禁书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蒋介石也实行禁书政策，他查禁的书不会少于清朝。但是，和林彪、"四人帮"的禁书政策相比，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这差别是多么巨大。作者呼吁，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吸收文化营养，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文章发表后曾引起"风波"。

17日　全国世界史学科规划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探讨了世界史研究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问题，审议了《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五年世界史学科发展规划（草案）》。

18日　国家文物局在陕西扶风召开周原建筑遗址座谈会。

29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考古代表团来华访问。

是月　刘泽华、王连升在《教学与研究》第2期发表《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该文是第一篇对长期以来史学界盛行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说提出挑战的文章。作者认为，生产斗争是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内容，是其他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生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回顾我国史学界以往的研究与教学，存在着一个普遍倾向，即重视阶级斗争这一理

论的研究和应用，而忽视关于生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的阐发，甚至有本末倒置的现象。如有的同志把阶级斗争看作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明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的论述，纠正我国史学界多年来存在的这种偏向，是进一步提高历史研究和教学水平的关键之一。文章还论述了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

刘泽华在《社会科学战线》2004 年第 4 期《答客问：漫说我的学术经历和理念》一文中回忆这篇文章时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的动力、真正的动力，是多年来，特别是 1949 年以后不可怀疑的铁则，谁碰了这个问题，都没有好下场，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阶级斗争为纲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文革”的理论基础。1976 年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很多，但没有对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进行必要的反省，然而这恰恰是“文革”的生命线。我们经过反复的思索，认定必须向这一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但当时形势是不容许“正面”提出问题的，这是涉及到“旗帜”的大事。于是我们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你看，《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中性”的。就我们而言，当时只能用打着红旗“修正”红旗的办法来反思这个大问题。于是从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入手来纠正和修正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说。这篇文章在即将发表之际，又被 1979 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选中（会议向全国征稿），要我在大会上发言。这中间还有一点小小的插曲。起初要我做大会发言，然而在即将开会时又通知我不讲了，没有过一天，又要我讲。这也反映了会议主持者的矛盾心情。我在大会上宣读了文章，几乎同时，《教学与研究》也刊登出来，于是立即引起史学界和理论界的热烈讨论，一些地区和大学召开了多场专题讨论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我们的文章有否这样与那样的不足，另当别论，但有一点是令人称意的，即打破了阶级斗争为纲这一观念的神圣性，使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王戎笙在《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

该文直接针对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的一些论断立论，对农战史研究中一些长期流行观念进行了颠覆。

作者认为，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战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虽然是一种最高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贯串于封建社会的始终和各个方面，只是斗争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才爆发成为战争。除战争之外，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还有其他许多形

式。因此绝不能说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农民战争是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阶级斗争是不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作者指出，阶级斗争是离不开生产斗争的，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即使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也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当然更不能说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

关于农民战争的作用，作者认为，并不是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生产力都有显著的发展。相反，差不多有同等数量的例子说明，很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

该文的发表，标志着史学界在新时期历史发展动力讨论在观念上实现了新突破。

戴逸在《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发表《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

文章从多个方面批驳了长期以来流行的一些史学观念。作者认为，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用农民战争代替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从人类社会存在以来，生产活动总是首要的活动，生产斗争是推进社会历史的强大动力。离开了生产来谈阶级斗争，如果忘记了生产斗争，片面地把阶级斗争当作“唯一动力”，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作者认为，农民战争有破坏生产的一面，否则无法解释农民战争后经常出现的土地荒芜，赤地千里，人口锐减的情况。历史的前进，不是通过不断的暴力革命，不是通过一连串的突变来完成的。过去，由于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评价改良时总是贬得比较低的。这是不公平的。历史上的政治改良和改良主义思想，是起过相当进步作用的。当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改良是有进步作用的。文章肯定了剥削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动性，认为统治阶级从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能够提出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来的，并不一定需要农民迫使他们“让步”。认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都是不管生产，反对发展经济的，而农民总是推动生产发展的。这种观念从道理上是说不通的。

该文与刘泽华和王连升的《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以及王戎笙的《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等文同时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这一流行观点提出异议，很快就引起了全国史学界的反响，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大讨论。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3月至1982年底，全国报刊登载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的文章达到300篇以上。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意见相互争

鸣，出现了生产斗争、生产力说、阶级斗争说、社会基本矛盾说、合力说、物质利益说、客观的社会需要说、人民群众说等多种观点。

杨英锐、杨甘霖在《国内哲学动态》第 4 期发表《关于一个历史观的探讨》。

该文最早对“奴隶创造历史论”这一流行命题提出挑战，提出“阶级社会的历史是由所有阶级创造的，人类历史是现实人类创造的”理论观点。

文章发表后，李振霞、刘性凤等在《国内哲学动态》1980 年第 1 期发表《恩格斯给“所有阶级创造历史”的观点提供了依据吗?》、《由谁创造历史和历史的创造过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等文章，对二杨的观点提出批评。姚青山对二杨观点表示赞同，并针对李振霞的“奴隶创造历史论”所表达的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提出相反意见。余霖、安述明在 1980 年 4 月 25 日《文汇报》发表了与二杨相同的观点，提出“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在《文汇报》上引起了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

由此，横跨八九十年代的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大讨论陆续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收入作者 17 篇论文，分为四组：第一组，关于中国古代史；第二组，关于中国近代史；第三组，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批判；第四组，关于中国经学史、思想史的专题研究。书前有刘大年所写序言。

夏鼐《考古学与科技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汇集作者 1960—1976 年间发表的科技史 10 篇论文，内容涉及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农学、医学以及水利、交通、纺织、陶瓷、冶金等多种学科，体现了作者将考古发现同文献资料紧密结合的精湛功力。作者运用考古发现的大量新资料，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光辉成就，并纠正了以往在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些错误说法，对考古学和历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附彩色图版 8 幅，黑白图版 22 幅。

陈直《史记新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汉书新证》的姊妹篇。作者在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和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等著作之外，充分运用“二重证据法”，将考古材料与文献结合起来进行《史记》研究，不仅广泛引用了

甲骨文、两周铜器铭文、秦汉权量、石刻、简陵、铜器铭文，也大量征引了《盐铁论》、《九章算术》、扬雄《法言》、《全后汉文》等典籍文献，“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多发前人之未见，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为《史记》研究者的必读书之一。

《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发表《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新论坛)》。

1978年11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会期间，《中华文史论丛》编辑部邀请了一些与会史学家讨论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此即会后发言者所写文章的汇编。这些文章针对过去特别是文革期间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提出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戎笙提出：反对以人划线、反对按气节评定历史人物的作用、不能用感情代替科学分析、不能用“长官意志”和“上边精神”来代替创造性的研究。

林志纯、廖学盛在《世界历史》第2期发表《怎样理解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

作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社会。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激烈争论。

《文史哲》第2期刊登一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文章。

这组论文包括孙思白、韩凌轩《“五四”以来反封建文化运动之史的考察》，彭明《中国现代史上的启蒙运动》，吕明灼《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宇宙观》，朱玉湘、吕伟俊《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等。

5月

2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这次会议是1949以后中国大陆第一次纪念五四运动的学术讨论会，周扬在开幕式作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其间，会议就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评价问题进行了讨论。

25日　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也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举行的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共收到中外学者217余篇论文，是太平天国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重新走向繁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次会议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得非常

活跃，做到了畅所欲言。外国学者吴卫平（美国）、魏克德（西德）、小岛晋治（日本）、克拉克（澳大利亚）、黄宇和（澳大利亚）分别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这些报告所阐明的观点和引用的史料，引起了与会者极大兴趣。

会议论文集《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1981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是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内部发行，下册 1980 年出版。所收书信包括胡适自 1915 年到 1948 年的一部分电报和信稿、电稿，并在附录中收入了胡适所保存的其他书信、一部分手稿和一些与书信内容有关的有参考价值的文件手稿等。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分编委筹备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编纂工作启动。

中国历史分编委筹备组成员包括侯外庐、张友渔、尹达、梁寒冰、顾颉刚、孙毓棠、王毓铨、刘大年、黎澍、李新、翁独健、严中平、邓广铭、白寿彝、胡华、戴逸、郑天挺、吴泽、李侃。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集刊第一辑出版。

该刊是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办的一份史学同仁刊物，唐长孺担任主编。虽以“资料”为名，实际内容则以研究论文为主。最初为内部资料，后改为公开发行，在海内外魏晋隋唐史学界享有较高声誉。

苏双碧在《社会科学研究》第 3 期发表《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本文坚持阶级斗争动力说，认为“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生产力的发展是决定因素，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才会出现对社会变革的要求。但是，伴随着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解决。”

中国民族研究学会成立，牙含章任会长。

王曾瑜在《中国史研究》第 2 期发表《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批判》。

本文表面上从思想文化史角度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实际把矛头指向文革。作者写道：后世封建统治者兼采儒法两家之说，既鼓吹君主的绝对专制，又提倡臣民的无条件忠君，一方面实行以天下奉一

人，另一方面又宣称是一人为天下。中国封建时代为宣扬君权神圣所下的功夫，所达到的肉麻程度，真乃举世无双。这是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一个最主要的特征。纵观中国封建文化专制愈演愈烈的史实，可知统治者们愈是对自己的统治没有信心，愈是理亏心虚，则文忌愈多，文禁愈严，文网愈密，而文祸愈惨。这大概可算是一条封建文化专制发展的规律。

伍宗华、冉光荣在《四川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再探讨》。

该文提出历史发展是一种合力的作用，“一个总的合力”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构成为历史演变的直接动力。因此，“无论是只承认阶级斗争或革命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还是孤立地强调生产力或其他某种力量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都是违反客观存在的、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则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动力学说的曲解”。

安志敏在《考古》第5期发表《略论三十年来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

吴泰在《历史教学》第5期发表《应该恢复岳飞的历史地位》。

丁守和在《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论“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

6月

20日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学会在武汉召开“传统精密铸造工艺鉴定会”，对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进行鉴定。

是月　萧涤非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关于〈李白与杜甫〉》，对郭沫若的杜甫研究提出批评。

郭沫若在专著《李白与杜甫》中一改此前对杜甫的高度赞扬，认为李白代表法家，杜甫代表儒家，指斥杜甫“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对杜甫进行全面批判。并对萧涤非有关杜甫的学术观点多次点名批评。郭沫若逝世后，萧涤非发表此文，对郭书“扬李抑杜”、“曲解杜诗”、“误解杜诗”，以及所谓“腐肉中毒”等四方面的论述进行商榷，对郭沫若进行反批评。

田昌五《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1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继续坚持农民革命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说。作者在叙述农民起义和民族斗争时，不是简单地罗列其经过，而是把农民起义和民族斗争放

在当时整个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的变动中进行考察，弄清楚每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性质、特点和作用。作者认为，只有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叙述，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原定 4 册，写到太平天国为止。全书未能完成。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选录了拒俄运动中的函电、演说稿、传单、揭帖、社团条例、报道及其他有关资料。

魏宏远编著《孙中山年谱（1866—1925）》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地理学会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

汪熙在《世界历史》第 3 期发表《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

作者认为，美国是唯一没有占据中国领土的国家，“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起了一定的好作用，美国在华传教事业有功有过，华工在美国西部建设中写下了“友谊篇章”。

汪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争议和讨论。1980 年 11 月 2 日《光明日报》“百家争鸣”专栏介绍了讨论的简况。

黎澍筹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作者考释甲骨文字成果的总结性著作，被称为自罗振玉、王国维以来考释甲骨文字最重要的著作。全书 190 篇，共考释前人未识或虽释而不知其造字本义的甲骨文约 300 字，占全部已识甲骨文字的四分之一还多。并解决了“玄鸟生商”“《尚书·召诰》中一段 500 字的话到底是谁说的”等久悬未决的问题。该书开辟了结合多学科知识考释文字的新途径，在文字考释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均超过前人。

7 月

1 日 《党史研究与教学》双月刊创刊。

17 日 中国哲学史学会在山西太原成立。

侯外庐任名誉会长，张岱年任会长，冯契、石峻、任继愈、萧萐父任

副会长。学会成立不久即创办《中国哲学史》会刊，方立天、蒙培元为主编。

25日　国家文物局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长城保护研究工作座谈会。

是月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二十多年间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成果的汇编，共三十五万字，包含关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章太炎、鲁迅等人的研究论文十篇。其中多数写于“四人帮”倒台以后。该书对19世纪末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和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并把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分为四期，即两个革命高潮和两个低潮，认为当时反帝反清遮盖了反封建，对封建主义以新形式或旧形式继续统治估计不足。中国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民主革命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何以又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演出了林彪、“四人帮”的封建主义的丑剧，也是作者进行多方探索的一个问题。不少见解令学术界耳目一新。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由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按照政治经济学体系来建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运用中外历史比较等方法，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地租、剥削形式和农民的经济地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业经济的再生产与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与历史作用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勾画了两千余年封建社会史的前后轮廓。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可以表述为“用主要通过买卖方式兼并土地的办法，用剥削依附佃农的办法来保证地主占有地租和满足其经常增长的寄生性消费”，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作者认为，地主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极富弹性，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导致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首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

杨志玖在《南开学报》第3期发表《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

1995年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兰西斯·伍德（Frances Wood）出版专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否定《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引起世界关注。杨文即针对伍德所著进行驳辩。此后，作者又连续发表《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马可·波罗足迹走遍中国》、《马可·波罗与中国》、《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

究》（《天津社会科学》1996 年第 1、2 期）、《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与〈南方周末〉驻京记者的谈话》（《南方周末》1996 年 9 月 20 日）、《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历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马可·波罗问题争论的焦点何在?》（《光明日报》1997 年 10 月 4 日）、《马可·波罗书中的长老约翰——附论伍德博士的看法》（《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等论文，就有关马可波罗的诸多问题发表看法，对促进马可·波罗研究的深入起到重要作用。

8 月

1 日　李济在台湾逝世，终年 83 岁。

6 日　余志森、陈雪良在《文汇报》发表《历史研究能“厚今薄古”吗》，对“厚今薄古”的口号提出质疑。

24 日　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座谈会，讨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25 日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在哈尔滨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年会。

大会选举沈炼之为名誉会长，张芝联为会长，戚佑烈、王养冲、端木正为副会长。

是月　谢华《论西周封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史研究》第 3 期发表《中国史学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庆祝建国三十周年部分史学家笔谈》。

包括周谷城《继往开来的史学工作》、侯外庐《提倡科学上的诚实态度》、郑天挺《缩短战线，深入钻研，早出成果》、谭其骧《勿空破，认真立》、尚钺《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徐中舒《夏史初曙》、胡厚宣《编好〈甲骨文合集〉，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陈直《谈谈秦汉史和秦汉考古的研究》、王仲荦《从魏晋南北朝史谈历史的借鉴》、谢国桢《对于研究明清史的一点体会》、季羡林《大力开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等文章。

孙祚民在《学术月刊》第 8 期发表《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三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

《古文字研究》集刊创刊。

王仲翰《满族简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吕澂《中国佛教源流略讲》由中华书局出版。

《清史论丛》创刊。

该刊由杨向奎主持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负责编辑，是一本面向海内外的清史研究学术论文集刊，第一任主编由杨向奎担任。该刊自创办以来，一直为海内外清史研究者、高校及相关研究单位所重视。

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太平天国文献中，文书居于首要地位，诸如军事方略、政治设施、社会改革、对外交涉等活动，皆详见于此。该书收录418件太平天国文书，种类包括太平天国的诏旨、告示、论序、名册、消记、挥条等等。编排时，按照太平天国文书的分类与事务的不同性质，将其分为十类，每类按时间为序排列。为研究太平天国史重要史料之一。

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由中华书局出版。

王献唐《中国古代钱币通考》由齐鲁书社出版。

书稿作于1946年，分上中下三册。主要考证了周、秦、汉三代币制及铸钱工艺，断代为篇，上溯殷商，下迄汉魏，发展了乾嘉以后中国古钱学研究的成果。全书分《周币》、《秦币》、《汉初货币》、《武帝货币》及《铸钱技工演变》5篇27章。书中收录众多古钱图，均按原样墨拓。并引据大量文献及文物资料，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古代货币的源流和制作，对前人论点有所订正，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经济史和鉴别古代钱币真伪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陈智超等著《历史的审判——“四人帮”影射史学剖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陈智超、何龄修、黄宣民、曹桂林、郭松义和刘永成六人合作完成，作者参与了《历史的记录——“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与篡党夺权阴谋》一书的撰写，获得了大量有关“四人帮”影射史学的资料，该书即是根据这批材料写成。共收15篇文章，对“四人帮”的影射史学进行了彻底批判，尤其对影射史学的“梁效”和“罗思鼎”等写作班子的作用，影射史学的手法和理论，以及“梁效”们“批宰相”、歌颂吕后、武则天背后的政治目的进行了深入揭露。

书后附有“四人帮”写作班子笔名和影射史学主要文章目录。

9 月

5 日　邓拓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14 日　吴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悼词说：“吴晗同志致力于历史研究几十年，对明史的研究造诣尤深，是我国少有的明史专家。”

是月　王春瑜在《历史研究》第 9 期发表《“万岁”考》。

文章名为考证“万岁”一词的流变，实际上把批判矛头对准“文革”时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作者写道：“万岁”既与最高封建统治者画上了等号，臣民百姓必须在向皇帝顶礼膜拜时呼喊，否则当然就是大不敬。但是，考唐律、明律、清律等封建法典中，并无此等条文。这就表明，皇帝“称万岁之制”，及相应的大不敬律，是用不成文法固定下来的；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成文法比成文法要厉害百倍。重压之下，百姓只好供一块“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位。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六十年来以来发表的历史地理论文集，共收文 22 篇，从内容上可以划分为历史地理学理论探讨、西北沙漠地区的历史地理考察以及城市历史地理三部分，充分体现了作者在沙漠、城市历史地理研究这两大领域开拓性研究所取得的卓越学术成就。作者通过对西北广袤沙漠的实地考察，透过古城废墟和河道水系变迁等地理变化，再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揭示了我国古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汇地带不断沙化、大幅度南移的原因。书中还对阴山山谷区域一系列汉代烽燧遗址进行了详细考察，对于长城研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黄云眉《明史考证》陆续由中华书局分册出版。

为订正《明史》之误，作者以《明实录》为本，旁采明代各种官私记载 1400 余种，积四十年之功力完成了这部二百万言的皇皇巨著，凡八册，向为士林所重。该书对《明史》逐卷逐篇进行了考订，举凡有关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史籍，均作了比勘考证，对《明史》的缺漏、错误也作了补充和订正；对清人《明史》中叙事过简的地方，则据《明实录》及其他明代史籍予以充实。

《中学历史教学》（季刊）创刊。

本刊由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主办，1980年第3期起改名为《中学历史》。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创刊。

10月

10日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在山西太原联合召开中国哲学史讨论会。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82个单位的171名代表。是中国哲学史界一次空前盛会。会议议题主要有中国哲学史的对象、特点和范围，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哲学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等。会议倡导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对其后学术思想界转变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

23日　《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开设“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专栏。

该专栏讨论持续长达半年。

董楚平在《光明日报》发表《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该文是“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专栏的开篇之作。作者对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真正动力的观点提出强烈质疑，指出了这一命题的种种矛盾之处，如：既然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每次较大的农民战争都起过推动作用，而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举世无匹的，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理应发展很快。事实却不是这样，中国封建社会时间漫长，发展缓慢。为什么动力最大，而速度很慢呢？相反地，欧洲有些国家几乎没有农民战争，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动力，或者说动力很小，却偏偏较早进入资本主义。

作者认为，生产力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从根本上说，不是阶级斗争决定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决定阶级斗争。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停滞不前，发展缓慢，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不是缺乏阶级斗争这个动力。作者认为，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一个各种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战争较少的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战争太多，破坏过甚。中国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世界上仅见的。农民战争有解放生产力的一面，战争时期的破坏是必要的代价。但战争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是严重的，在战乱期间，社会生产力往往不可能发

展，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就是说，农民战争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作者指出，相应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封建帝王当然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当封建生产关系还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时候，只要制订适当的政策，保护小农经济，充分发挥封建生产关系的潜能，生产关系本身就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所谓好皇帝就是他能在这方面发挥好作用。所谓坏皇帝，就是他们破坏了小农经济，破坏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潜能。这个时候，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坏皇帝，解放生产力。在这个时候，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才可能爆发。也在这个时候，农民战争才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

由于该文观点与成说形成尖锐对立，发表后引起较大争议。

30 日　张国祥、张海瀛在《光明日报》发表《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是月　耿云志在《历史研究》第 5 期上发表《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此文首次对胡适做出正面评价，指出胡适与陈独秀一起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所推动的白话文运动，不但在文学革命运动中占有突出地位，而且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胡适宣传的实验主义一定程度上也是反封建思想的武器。胡适的“整理国故”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用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古代文化典籍，不承认那些宣传封建道统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剥去了独尊两千年的孔孟学说的“神圣”的外衣。他确实破除了一些旧有的成见，在某些方面打开了新局面。文章说，凡是学有所成的资产阶级学者，在研究他们的时候，既要注意到他们的政治立场与其文化学术活动之间的联系，同时也要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对于他们的治学方法与其治学的具体成果之间的关系，也应当采取这种符合辩证法的态度，不应当片面地强调其一致性而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

该文对重新评价胡适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在学术思想界产生较大影响。

罗荣渠在《世界历史》第 5 期发表《通向全面战争之路——略论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若干问题》。

蔡尚思《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1949年后第一部以文化史之名行世的著作，但主要内容是对中国古代文献的介绍。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由中华书局出版。

汪士汉《五四运动简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收录作者隋唐五代史研究论文20篇，主要涉及这一时期的阶级关系及其生产力的发展，并试图根据所有制形式决定产品分配形式的原则来阐明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调、庄园经济和两税法的关系，对科举制度及隋唐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等级变化的情况也作了探讨。

郑天挺被重新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

夏鼐在《考古》第5期发表《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

《近代史研究》杂志创刊。

该杂志是中国近代史学科专业学术研究刊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初为季刊，1984年改为双月刊。

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创刊号发表《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

该文是新时期历史发展动力讨论中明确捍卫“阶级斗争说”的有代表性的文章。作者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前进，不能自然而然地改变历史，要通过阶级斗争、革命运动来变革历史。“十月革命时的俄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的中国，生产力相对落后，或者落后得很远，但却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相反地，一些西方国家生产力水平较高，以至高出许多，至今仍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这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自行变革历史，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改变历史的进程。作者并认为，历史研究的中心是阶级斗争。“历史学要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但它有自己的中心。既然阶级斗争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学的对象、任务，就应当是研究一幕一幕阶级、阶级斗争的种种基本事实，研究那些基本事实所表现出的阶级、阶级间的矛盾、运动，这就是历史研究的中心。”

黎澍在《近代史研究》创刊号发表《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

题——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文章重点谈了反封建的彻底性问题。虽然未作明确的文字概括，但该文事实上最先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命题。作者认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争，不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是很不彻底的。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发展改变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使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不能不暂时退居次要的地位，它的任务要留待以后逐步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举行“批判封建主义学术讨论会”。

与会学者围绕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和内容、封建官僚政治、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特权、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明清时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源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11 月

19 日　中山大学、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广东省历史学会共同主办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

28 日　拉丁美洲历史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

与会学者围绕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等问题展开讨论。

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拉丁美洲历史研究会，李春辉任理事长，程博洪、沙丁、罗荣渠任副理事长，黄邦和任秘书长。

是月　黎澍在《历史研究》第 11 期发表《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

该文是对前三十年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反省，主旨是反对教条主义。此文的发表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一步向学术领域的深化。

谭其骧在《中国史研究动态》第 11 期发表《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

作者认为，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混为一谈，“所谓中国的边界决不能仅仅是指中原王朝的边界，而应该包括边疆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其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建立起这么一个观念，边疆地区有时不在汉族政权统治之下，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整个历史看起来，这是中国边疆地区的区域性政权”。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编《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创刊。

第一辑发表了陈守实、陈旭麓、谢天佑、简修炜、孙达人等人的文章。

张泽咸编《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胡华主编《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该书介绍了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鲁迅、陈独秀、恽代英、邓中夏、方志敏、瞿秋白、蔡元培、胡适等11位在五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这些人物的思想、活动及历史作用作了阐述和评价。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成立。

郑天挺被推举为编委会主任兼全书主编，梁寒冰被推举为编委会副主任，吴泽、翁独健、谭其骧、杨志玖、蔡美彪、李学勤、胡一雅被推举为副主编。1981年郑天挺去世后，谭其骧被增聘为编委会主任，吴泽、杨志玖被增聘为主编。

本书上起远古时代，下迄1911年辛亥革命，共收词目67154条。分14卷，陆续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14卷分别为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辽夏金元史、明史、清史、民族史、历史地理、思想史、史学史、科技史等，前九卷为断代史，后五卷为专门史。邓广铭、翁独健、杨翼骧、谭其骧、吴泽、杨志玖、荣孟源、蔡美彪、戴逸、王毓铨、林甘泉、李学勤、王玉哲、田余庆、张岂之、胡守为、杨廷福、吴枫、程应缪、陈高华、曹贵林、罗明、陈振江、刘荣焌、邹逸麟、严敦杰、薄树人、孙毓棠、乌廷玉等分别任各分册主编、副主编。各分册出版完成后，2003年3月又出版汇编本，最终形成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大辞典》。

该辞典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由国家组织编纂的特大型历史专科辞典。举凡历史学科的名词术语、古国朝代、政权年号、民族部落、阶级阶层、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社团组织、史籍文献、典章制度、社会经济、风俗礼仪、文物考古、科技发明、中外关系等，应有尽有，涵括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法律、科技等各个领域。全书还附有1745幅图片，5项附表，24幅各朝代历史地图，全面反映了前人的文化积累和当前的最新学术成果，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全面、最权威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

翁独健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73岁。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由文

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汇集了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文物考古部门撰写的综述本地区三十年来文物考古重要收获的文章，另有厦门大学撰写的《台湾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内容以考古发掘为主，也介绍了对地面文物古迹的保护和流散文物的征集保管等情况。书后附有《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纪事》。

1991 年 1 月，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续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概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四个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成果，书末附有《文物考古工作十年记事》。两书是对新中国四十年来文物考古工作的总结。

《哲学研究》第 11 期发表一组讨论哲学史方法论的论文。

金景芳的《关于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过去在批判孔子的方法论上有缺点，把批判当成了否定，是断章取义、曲解误解以及丑化谩骂。冯契的《对历史上的哲学思想要具体分析》认为对阶级分析不能简单化，唯心主义虽是谬误的思想体系，但理论上有错误不等于政治上一定反动。刘蔚华的《谈谈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要求将中国哲学史研究从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约束下解放出来。其后，《哲学研究》连续刊登此类论文讨论哲学史研究方法论问题。

12 月

6 日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武汉召开。

黄绍湘被推举为理事长，副理事长为杨生茂、刘绪贻、丁则民，刘绪贻兼任秘书长，聘请宦乡、陈翰笙、陈翰伯为顾问。研究会秘书处设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并出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

18 日　漆侠在《光明日报》发表《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作者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能片面强调生产力的作用，因为“生产力内在矛盾的发展，只能反映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发展，无法反映人们社会关系的矛盾。因此，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绝不是单纯的生产力内在矛盾发展史；而且只强调生产力的动力作用，而不讲生产关系，也就无法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所表现的螺旋式上升这个特征。”作者不同意董楚平等人强调生产斗争，低估阶级斗争的作用的做法。

是月　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数十年潜心研究《管子轻重篇》，并于1943年开始写作《管子轻重篇新诠》，凡七易其稿。其第三稿，五十年代中期郭沫若编著《管子集校》时曾借去参考并列入引用书目，引用过近百条。郭在写给马的信中建议“另外写成一篇综合的研究——既是写成论文形式”。作者接受这一意见，先后写了三篇论文，合称《论管子轻重》。此为本书之一部分。另一部分为《管子轻重篇新诠》，是对《管子轻重》19篇的注释。著者在本书中，注重研究《轻重》的著作时代和贯串《轻重》各篇的基本思想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指导进行具体文字的校释。对《轻重》中一些常用字词和专门术语的含义，也注意进行综合的分析与研究。在原文校释上采取慎重态度，凡认为可通的不轻易改、补、删、移。本书在有关《轻重》的一些问题和原意在解释上都提出了诸多独立见解，并对不同的意见进行了驳辩。

林甘泉在《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发表《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转化》。

作者反对把生产力发展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认为一部封建社会史证明，当着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这种黑暗统治，正是封建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束缚的集中表现）已经把社会生产拖入山穷水尽的绝境时，只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革命战争，才能把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推翻，从而为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说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并没有错。

邓广铭在《文史》第七辑发表《“黄龙痛饮”考释》。

王仲荦《北周六典》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搜集了《周礼》、《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关于六官的记载以及南北朝隋唐的史书以及金石考古中有关北周官制的资料，写成此书。本书不仅对北周的职官按系统排列，详加考辨，还网罗了北周各方面的典章故实，分门别类列置于各有关官职之下，因此本书既是北周职官志，又起到《北周会要》的作用。西魏北周制度在魏晋南北朝各代中历来被认为非常独特，头绪纷乱，面目难辨，“此书的出版使北周一代的制度得以大白于世”。

左步青、章鸣九在《历史研究》第12期发表《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作者认为，戊戌维新运动“对封建制度触动的深度，在中国漫长的封

建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不仅为历史上封建制度自身发展过程中曾发生的某些变法和改革所不可比拟，而且也为农民起义所不能企及。关键就在于它虽然软弱，但终归是表达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要求”。“义和团运动的最主要缺点，就是它只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反对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清王朝的封建政权，……义和团运动从来就没有提出一条改变封建制度的道路来”。“义和团作为自发的爱国的农民运动，恰恰由于它的农民的保守性与自发性，使它不能摆脱制度的控制，而终以悲剧的结局断送了它的正义的反帝壮举。义和团运动确实未能触动封建制度一根毫毛。”

庞朴《〈公孙龙子〉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系作者《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之魏晋南北朝史部分的补充修订本。

新疆考古研究所考古队首次到新疆楼兰遗址及附近地区进行科学考察。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由地图出版社出版

下册于1990年出版。该书原是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的组成部分，是专门为配合学习《中国史稿》而编制的。上册收图74幅，时间从原始社会到南北朝时期；下册收图85幅，包括隋、唐至清鸦片战争各个历史时期的总图、分区分国图、扩大图、城市图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专门地图，从多方面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各族人民重大的政治斗争、生产实践和活动区域。

是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办的不定期刊物《中国哲学》创刊，包遵信任主编。

兰州大学主办《西北史地》创刊，赵俪生任主编。

主要刊载有关西北历史地理、中亚历史、西北民族、丝绸之路、敦煌学、西北考古等方面的研究论文。

刘大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史念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67岁。

《世界历史译丛》创刊。

该刊由中国科学院世界史所创办，1981年改名《外国史知识》。

北京图书馆主办《文献》杂志创刊。

该刊为有关图书、目录、版本和文献学的专门刊物，主要介绍我国古、近代文史等方面典籍的刊藏、整理与研究情况，在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

周予同、贺卓君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一期发表《关于孔子的几个问题》。

文章从根本上否认孔子是“复辟狂”，意在对孔子进行重新评价。指出：“孔子不仅反对用活人来殉葬，而且连用‘象人而用’的代用品——‘俑’来殉葬，也大加反对，并大加咒骂，……这样的‘梦想复辟奴隶制’的‘复辟狂’，谁曾见过?”“孔子的尊崇周公，并一直上推到尧，舜，……是穿着古代的神圣服装来演出历史的‘新场面’，这是‘托古’而不是‘复古’。‘四人帮’抓住孔子尊崇周公这一点，不问其尊崇的目的，不看尊崇的主要内容，更不看孔子的实际行动，便给孔子戴上‘梦想复辟奴隶制’的帽子，这不是十足的形而上学，又是什么!”“孔子在奴隶不被人当‘人’看待的奴隶制刚刚开始崩溃或崩溃不久的春秋时代，能够在哲学思想上重人事轻鬼神，看到‘人’的作用、‘人’的力量；政治思想上主张仁政、反对暴虐、反对殉葬；更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具有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因素的‘爱人’口号。这一切都说明，孔子基本上是个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家，而绝不是什么‘梦想复辟奴隶制’的‘复辟狂’!”。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开始出版。

该丛书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组织编辑的民族问题丛书之一，是一套分册介绍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历史的论著。这套丛书自1978年秋冬起，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等在京单位和各有关省、自治区负责组织编写、出版。

五十年代初，为了执行中共的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有关单位就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进行过调查研究。1956年，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在京和各省、自治区有关单位直接参加下，一面继续进行调查工作，一面开始编写各少数民族的简史和简志，到1959年底，大部分完成了初稿。1963年，民族研究所把这些初稿全部付印，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

各族简史的时间下限均写到1949年为止。各册约十万字左右，并附

有民族分布图、大事年表和图片。正文部分逐一论述了各族的族源、族称、发展变迁、社会经济形态、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各个时期对统一祖国的贡献等等。书中对尚无结论的学术性问题，如族源问题、社会性质问题、历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等等，都广泛征求了民族史、民族学专家、专业工作者和本民族人员的意见，并按照“百家争鸣”的方针，召开学术讨论会妥善解决，对于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则求同存异，客观反映，不轻易下结论。

1980 年

※ 李时岳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
※ 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史学会重新成立。
※金观涛、刘青峰发表《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
※ 李泽厚发表《孔子再评价》。
※《陈寅恪文集》出版。
※《中国历史学年鉴》创刊。
※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举行。
※ 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出版。
※“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出版。
※ 刘昶发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1 月

7 日　中国考古学会、湖北省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联合召开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学术讨论会。

10 日　庞朴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发表《“中庸”平议》。

该文重新提出了儒家“中庸”思想的积极价值，认为中庸作为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在论述对立面的相互依存方面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思想资料，并提出中庸的四种形式——A 而 B，A 而不 A’，亦 A 亦 B，不 A 不 B，以抗争非 A 即 B 的僵化的二分法。作者认为中庸在构造儒学体系中起到了杠杆的作用，不应视中庸思想为折中主义或形而上学。

该文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复兴起了倡导作用，引起较大反响，黄宣民、钟肇鹏等刊文商榷，作者又作了答辩。

是月　李振宏在《文史哲》第 1 期发表《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吗?》。

文章对漆侠《读〈李自成〉——论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一文提出的“我国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阶级”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看法提出商榷，认为这种提法缺乏理论根据，在典型的封建时代是绝不可能产生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把封建时代的农民上升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度，是不够妥当的。不能因为拔高对农民的估价，而把民主主义这个只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并且适应这种关系发展的要求才产生的一种思想体系，随便搬到别的历史时代去，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

王燕玉《贵州史专题考》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一本历史地理学专著，收论文 7 篇。

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研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天挺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 81 岁。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下册）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收录了作者在 1977 年到 1978 年之间所写的十四篇大篇幅论文，以专题研究的形式涵盖了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史的核心问题。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室编辑《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丛刊第一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 月

15 日　黑龙江历史学会年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以批判封建主义为中心。

22 日　四川省历史学会举行第一次年会，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

29 日　齐思和逝世，终年 73 岁。

是月　罗荣渠在《武汉大学学报》第 1 期发表《浅谈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关于世界通史教材体系的

一个问题》。

文章把批评矛头指向我国世界通史教材体系。作者认为，1949年以来，高等学校借用苏联的世界通史教材体系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通史教材体系，其中最大的特点是突出了阶级斗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主线，来重新编写和重新讲授全部世界历史。由于阶级斗争被孤军突出，无限夸大，阶级斗争的“纲”实际上变成了取代一切的“目”。一部内容无限丰富、矛盾十分复杂的世界史，被砍削得只剩下一副“革命”的架子，讲授世界通史，主要是讲古代的奴隶起义，中世纪的农民战争，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现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帝反殖斗争……如果说是讲一些社会经济内容或统治阶级的活动，那也不过是作为背景、陪衬、铺垫，或是仅仅为了批判的需要。这种情况在“四人帮”统治时期达到了极点，一般历史专业的教学被砍削为“一论四史”的格局，即政治理论课加上四门历史课（农民战争史、国际共运史、反帝斗争史、党史），作为历史系学生的基本课程。在这种格局之下，只有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革命的国家才能纳入这个世界通史的“框框”之中；甚至连国际关系这样重大的问题，在教材中，一般也只是作为革命的附属物处理。历史的发展本来是愈到现代内容愈丰富，而我们的通史体系却是愈到现代知识面愈狭窄，几乎变成纯粹的革命史。

文章还对“暴力万能论”进行了批驳。

董楚平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

该文对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进行了激烈抨击。作者认为：(1) 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的准备和初起阶段，对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可能持久，它只能兴奋一时，而不能持续到最后。这是因为，当革命初起时，平均主义用来对付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它有“破”的功用，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当革命进入高潮，平均主义用于人民内部，解决社会生产时，它就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2) 朱元璋为什么能够成功当上皇帝呢？一句话，按客观规律办事，攻占南京后，搞封建主义，不搞平均主义。在当时，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其他道路都是错误的。(3) 评价农民革命领袖，不能以平均主义口号为最高标准，谁的平均主义调子最高，谁就是最杰出，而应该以实践后果、对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为主要依据，谁的贡献大，谁的评价就要高。(4) 从平均主义到封建主义，从农民政权到封建政权，这是一切成功的农民革命必然要经历的两个阶段。从前一阶段转入后一阶段，既不是倒退，也不是走弯路，而是前进；这种转化，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种转化愈快愈好。(5) 平均主义只反映劳动人民追求平等的

愿望，却不能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封建制度虽然是一种剥削制度，不代表农民的利益，但比小生产者的幻想要优越。一个最粗糙的窝窝头，也比最漂亮的画饼更有用。

作者认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任务就是推翻腐朽的旧王朝，建立开明的新王朝。这些观点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了较大争议，引发了关于农民战争中平均主义思想评价的讨论。

李时岳在《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

该文是80年代重启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的首创之作，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流行多年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提出了质疑，代之以“四个阶梯说”。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文章认为，“从1840年到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革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前一阶段孕育着后一阶段的因素，前后紧相连接。前一阶段的运动尚未结束，后一阶段的运动业已萌发；后一阶段的运动已经开始，前一阶段的运动尚留尾声，前后交错。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该文对此前流行多年的从“批判剥削阶级”原则出发贬低甚至否定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做法提出质疑，重点论述了这三次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而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则轻轻带过。所以，文章一发表即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中国近代史线索的讨论，刘耀、胡绳、胡滨、孔令仁、戚其章、李新、苏双碧、章开沅、荣孟源、谢本书、张海鹏、张耀美、徐泰来、姜铎、陈旭麓、夏东元等人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由于李时岳在该文中反复强调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是三个连续递进的阶段，有人曾一度称其为“三个阶梯”说，1984年他撰写《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声明“三个阶梯”说的概括不确切，应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包括在内而为“四个阶梯”说。

1981年，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出版，在前言中明确表示“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并重申了其50年代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刘大年、黄逸峰、姜铎、祁龙威等也表示反对“四个阶梯说”，刘耀、张耀美则表示赞同。

王致中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

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封建蒙昧主义运动，封建的蒙昧主义是造成义和团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义和团的封建蒙昧主义突出地表现在它的笼统排外主义上。

作者指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面前，义和团诚然是一支巨大的反抗力量，但却远不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由于封建迷信色彩浓厚，使整个运动显得格外蒙昧落后。义和团运动不能持久，终归失败，封建迷信造成的蒙昧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义和团诚然勇敢，但这种勇敢“很大程度却是靠对封建迷信来维持的”。义和团诚然有严明的纪律，但这种纪律“是靠封建迷信与死亡的恐惧来维持的”。义和团诚然“爱国反帝”，“但是在反帝中把斗争扩大到对‘外洋’事物一律加以排斥，那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是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种笼统排外，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是封建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由于封建蒙昧的作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新的生产方式引入中国都是极其仇视的。”“帝国主义用炮舰侵略东方国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给这些国家。但它却遭到义和团的殊死反对。”因此，义和团“并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积极推动力量”。

本文发表后，引起很大非议。《人民日报》1980年4月10日发表李侃的文章《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光明日报》1980年5月27日为此举行了座谈会。

董楚平在《浙江学刊》第1期发表《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该文继续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文辩护。

作者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为它服务的手段，它只能在生产力提供的可能范围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生产力条件来苛求农民战争，而应该以是否有利于当时生产力发展为主要标准来评价农民战争，这样才可能对农民战争的作用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唯一动力论必然会导致暴力万能论。其表现有二：一是认为暴力越大，动力作用也越大，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能推动社会前进；二是认为封建社会的一切进步，都是农民战争的结果，“两千年来社会生产力和封建生产关系都是在农民战争的作用下发展变化的”。这两种说法，无论在理论上、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农民战争的主要作用表现于推翻暴政和缓解由土地兼并引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担任着清道夫的角色。犹如医药在多病的人身上作用特别突出，青霉素再灵也不能当饭吃，阶级斗争的作用再大，也要受生产力决定与制约。

《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在翦氏《历史问题论丛》的基础上增删改编而成。共收论文39篇，包括《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等产生巨大影响的论文。

冯友兰在《哲学研究》第2期发表《从中华民族的形成看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

文章认为：从民族观点看，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最高代表，"至圣先师"，他的形象和言论，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这是不能否认，也不应否定的。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由中华书局出版。

文史资料出版社在北京成立。

3月

6日　俞兆鹏在《江西日报》发表《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文章说："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但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并不等于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生产力本身不会自动发展，推动它的发展必有一种更根本的动力。这个原动力，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而且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人民群众才是世界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人。"

27日　陈智超在《人民日报》发表《史料的搜集、考证与运用——介绍陈垣的治学经验》。

本文着重介绍了陈垣在史学研究实践中所总结的搜集、考证与运用史料的经验，即在搜集材料方面要做到"竭泽而渔"，勤于搜访，在考证材料方面要弄清楚史料的源流，从多方面进行考究。在考证中采用理证、书证、物证、实地考察等具体方法。

此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史学界一部分人的治学倾向和选择，发表后引起争议。

27日　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在南宁举行。

是月　孙钦善在《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戴震与古籍整

理——兼谈对清代考据学派历史经验的批判继承》。

该文目的在于对考据学传统的提倡。文章说，评价戴震，应该持全面的观点，既肯定他的义理之作的思想价值，又重视他训诂、考证之作的学术价值。他的训诂、考证之作，在当时虽没有什么进步的政治意义，但从古文献学、语言学的角度看，科学价值很高，因为它们揭示了某些客观规律，得出了一些科学结论。过去学术界批判清代考据学派脱离政治、搞烦琐哲学，存在一种基本否定的倾向，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所用过的一些科学方法，所得到的一些科学结论，至今仍具有生命力，值得很好地继承。

该文反映出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部分学人回归乾嘉考据传统的要求。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 3 册，120 万字，是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大型专著，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较高评价，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被称为“最能体现目前中国辛亥革命研究观点、方法、水平”的著作，“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

中册于 1980 年 12 月出版，下册于 1981 年 7 月出版。

朱绍侯在《河南大学学报》第 1 期发表《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和农民战争作用》。

丘成羲、高秀波在《求是学刊》第 1 期发表《论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该文认为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文章说：“有了人，人类才开始有了历史，由于人们生存的物质利益需要，才有了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由此才产生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以至整个社会形态。可见，人们的物质利益需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初基因。”无论人类进入私有制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利益在历史发展中都起原动力作用。

饶会林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 1 期发表《我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问题》。

文章提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不在明清，也不在唐宋，而在两汉”。

辽宁《清史简编》编写组编《清史简编》（上编）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简明清史，叙述了从1644年清王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期间的历史，约34万字。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开始由齐鲁书社出版。

本书共4编23册，内容选自现存曲阜孔府的档案。第1编为孔府档案全宗分类目录索引，第2编为明代档案史料，第3编为清代档案史料，第4编为民国时期档案史料。该项工作由杨向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学院、山东省文化局、山东省出版局等单位组成编辑委员会共同完成，该套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史、地方史、孔府家族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张维华《汉史论集》由齐鲁书社出版。

聂崇岐《宋史丛考》由中华书局出版。

收文十二篇，大部分是有关宋史研究的论文。作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特别是宋代典章制度以及地理沿革的研究，收入本书的《宋役法述》、《宋代制举考略》、《宋史地理志考异》、《汉代官俸质疑》和《中国官制简述》等文，对宋代有关制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其中《宋史地理志考异》早在1949年前就被开明书店收入了《二十五史补编》，在学术界一直受到重视。另附有未收文章存目。

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史学史专著。全书分18个专题，依据历史发展顺序勾勒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在不少问题上提出新见。葛兆光在《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上发表《谈史学史的编纂——兼评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对该书在"史料的可靠性和叙述的准确性上"存在的问题给予批评。

葛懋春在《东岳论丛》第2期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阶级分析问题》。

作者指出，阶级分析法，必须重视研究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揭露隐藏在政治思想斗争背后的物质利益，把经济研究摆在重要地位；必须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进行具体分析，估计到阶级斗争现象的复杂性，防止公式化、简单化；应对剥削阶级的作用进行全面估计，不能以阶级义愤代替科学研究。

孙祚民在《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发表《论让步政策》。

4 月

8 日　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史学会重新成立。

这是自中国史学会成立后时隔近三十年中国史学会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共 125 名代表出席，大会通过了《中国史学会章程》，选举郑天挺等 71 人为理事。理事会选举郑天挺、黎澍、邓广铭、刘大年、白寿彝、周谷城、夏鼐、梁寒冰、翁独健、林甘泉、尹达、胡华、谭其骧、韩儒林、戴逸 15 人为常务理事，选举郑天挺、周谷城、白寿彝、刘大年、邓广铭等 5 人组成主席团，梁寒冰为秘书长。

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讲话着重阐述了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和怎样研究历史。

胡乔木说：谁要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有用，谁就要承认历史学有用。谁如果认为历史学没有用，谁就要接受这样一个推论——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用。历史科学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它拥有极其丰富的典籍文物，需要认真地加以消化，从中吸取营养。为了认识和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不能不研究历史。如果对有关问题的历史没有相当的了解，就不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有说服力地对现实问题作出判断，并提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胡乔木认为：要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性的研究。如果仅仅是记录过去的史实，那么这还构不成历史学。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它当然要包含一种理论，要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不是一个封闭的孤立地存在的体系。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要不断地用历史科学以及其他科学所提供的新成果来丰富自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当成为历史研究的向导，而不能成为研究的终点。要放宽研究课题的视野，不仅仅要作通史的研究或断代的研究，更需要用更多的力量进行富有意义的专题的研究。要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还要研究政治制度史、政治生活史，等等。

关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胡乔木说：不倾向于提倡科学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的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

10 日　李侃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

文章说，在史学研究领域，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就是对历史上的劳动人民的起义和斗争，只能赞扬、歌颂，不能讲它的落后面和局限性。讲了

就可能被说成是"不看主流和本质"，甚至会被扣上"丑化和污蔑劳动人民"的帽子。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由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批判，也连累到历史上的资产阶级。只要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改良和革命，不管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过怎样的进步作用和革命作用，也要"立足于批"；而只要是劳动人民的斗争，不管它有些什么缺陷和落后的东西，也要"热情歌颂"。就在这种似是而非的思想影响之下，义和团运动被人为地捧高了，它被描绘成"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

文章指出，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和灭绝一切与"洋"字有关的事物，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技术，不但不是革命，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反动和倒退。说义和团反对封建主义，甚至要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那更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臆断。

《哲学研究》编辑部和北京市哲学学会联合举行座谈会，就如何开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原理和体系研究进行研讨。

4 月 18 日，《哲学研究》编辑部又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的学者举行第二次座谈会。这两次会议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和一些范畴及原理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意见。

是月　金观涛、刘青峰在《贵阳师院学报》第 1 期发表《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做出新解释。

第 2 期连载。该文长达四万余言。作者将当代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原理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其观点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在该文基础上，作者于 1981 年 9 月写成《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书稿。其后，作者又通过一系列论著继续阐述这一观点。

金观涛、刘青峰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出版后，促使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一股利用自然科学新方法研究历史的思潮。

1992 年，金刘二人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兴盛与危机》增订版，并分别于 1993 年、2000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和《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继续发展超稳定结构说。

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发表《孔子再评价》。

文章认为春秋战国是早期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过渡时期，孔子思想是这一空前时代变革中某些氏族贵族社会性格的表现。孔子所维护的周礼包含着原始人道和民主遗风，正在消失的氏族社会中的人道意识是孔学的中心。孔子以“仁”释“礼”，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从而创始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作者阐述了孔子仁学的四个层面：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认为四因素相互制约，构成有机整体，其精神特征是“实践理性”。孔子的“仁”学所包容的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又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感染、熏陶了不少仁人志士，是在中国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重要传统。

该文打破了以往专对孔子思想作唯物唯心、“精华”“糟粕”分析的框框，实现了孔子评价的重要突破。文章发表时正值学术界进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因此其对孔子仁学的人道主义因素的肯定激起巨大反响，成为理论界思想解放的突破口。

张广志在《青海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否定中国社会存在过奴隶社会。

第2期连载。作者认为，奴隶制和奴隶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们在使用中常常将它们混淆，这是错误的；奴隶制作为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剥削方式，确曾在各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存在过，但它仅仅在极个别地区（地中海一带）获得过充分发展，上升为占主导地位的剥削方式，从而使这个地区的社会构成为奴隶社会，而在世界其他更为广大的地区，则不是这样；因此，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事实上，不经过奴隶社会，见之于广大地区，是通例。经过奴隶社会，见诸极个别地区，是变例。以变例为通例，是以偏概全，是十足的“西欧中心论”。

作者于1980至1985年间，围绕着“奴隶制社会”和“奴隶社会”的不同发表了15篇文章，1988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将这些文章结集成册，以《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为书名出版。

黄云眉《史学杂稿续存》由齐鲁书社出版。

收文十篇，涉及音韵、训诂、考证、版本目录以至读史札记之类。

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博物馆、考古学会主办《江汉考古》创刊。

黑龙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成立。

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四川省民

族研究学会联合主办《历史知识》（双月刊）创刊。

“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 开始在美国纽约等城市举行。

共有展品 105 件，观众达 130 万人次。

5 月

6 日　中国先秦史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师范大学举行。

9 日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一次年会在武昌举行。

会议对中国历史文献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15 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文物局、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

17 日　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历史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

24 日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首届年会在成都举行。

26 日　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郑州举行。

大会讨论通过了现代史学会的章程，选举了学会组织机构。陆定一为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乔明甫为名誉顾问，黎澍为会长，孙思白、董谦等八人为副会长。学会编辑出版《中国现代史学会通讯》和《中国现代史资料丛书》。

是月　中国珍宝展览先后在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士苏黎士举行。

至 1981 年 1 月结束，观众达 51 万人次。

方诗铭编《中国历史纪年表》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所记年代起于公元前 841 年西周共和元年，讫于公元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年代先后，分为十二诸侯（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及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清、民国等 15 个纪年表。每表第一栏为公历纪年，第二栏为干支纪年，第三栏一般为王朝，以下则罗列重要的并建立年号的封建割据、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较为简单明了。

谷霁光《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入《关于商末奴隶制崩溃的几点论证》、《论西周的彻与庸》、《战国秦汉间之农业生产》、《汉唐间“一丁百亩”的规定与封建占有制》、《论汉唐间赋税制度的变化》等 11 篇论文。唐以前，作者着重于对土地制

度的研究，对两宋、明、清则着重于商品经济的研究。

胡滨、李时岳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发表《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文章对李鸿章做出正面肯定，认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在当时是较为"开明"或"进步"的。李鸿章主观上只是想引进某些西方的物质文明、增强国家实力以应付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但西方物质文明的引进和膨胀，势必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体制的破裂，客观上将破坏清朝统治的支柱——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伦理教条，也就是挖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墙脚。

文章在史学界引起激烈争议。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所撰《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一书的修订本。

陈高华编著《元代画家史料》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郑天挺《清史简述》由中华书局出版。

1962年，作者应邀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述清史，用简洁而概括的语言对满清入关到鸦片战争前（1644—1840）197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了总结性叙述，是书即为讲演记录稿的整理。该书虽仅6万余字，却是1949年后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概述清朝历史的专著，不仅填补了清朝断代史的空白，而且更重要的是开拓了我国清史研究的新路。

6月

2日　陈直逝世，终年80岁。

5日　中国经济史学术讨论会在厦门举行。

19日　安徽省中国党史学习研究会在合肥举行专题讨论会，座谈讨论陈独秀的早期革命活动，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

是月　王力《汉语史稿》由中华书局出版。

原为作者在北京大学授课的讲义，为其代表性作品。共上、中、下三册，分别论述了汉语语音、语法、词汇发展的历史。语音部分，从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面探讨从上古音到中古音，再到现代音的演变规律。语法部分，阐述汉语实词和虚词各自的演变轨迹，阐述汉语构词法和句法的古今异同。词汇部分，追溯汉语基本词汇的形成和发展，究讨新词不断产

生和旧词不断消亡的原因以及词义演变的规律。

此书是我国第一部汉语史专著，论述全面、创获甚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尤其是语音部分，作者积数十年之功，建立起博大精深的上古音体系，得到了音韵学界的普遍认同。

荣孟源、庄建平等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册）由齐鲁书社出版。

该书辑录了山东巡抚衙门的文件，其中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的文件占据大部。为研究山东大多数府州县（缺登、莱、青等府州案卷）义和团兴起、发展、组织、成员构成及其和地方当局关系提供了翔实的原始史料。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在上海成立，胡寄窗为第一届理事会会长。

《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文集由上海复旦大学陈氏弟子蒋天枢整理、校勘，凡七册：（一）寒柳堂集，（二）金明馆丛稿初编，（三）金明馆丛稿二编，（四）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五）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六）元白诗笺证稿，（七）柳如是别传。除第四、五、六册过去已出过单行本外，余第一、二、三册在陈氏生前均未收辑成集。

《柳如是别传》为未刊稿，尤值得重视。该书是陈氏晚年写成的代表性专著。书中用翔实的史料，通过对明末名妓柳如是同钱谦益结缡唱和诗的笺证，探讨了柳如是的生命史。尤为重要的是对明末清初的政治、文化状况作了大量的考证、分析和论述，对当时江南知识分子的状况也多有论及。本书综合运用了训诂、考据、校勘等方法，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陈氏文集的出版，标志着传统学人的作品重新受到重视。

《中国历史学年鉴》创刊。

该年鉴是历史学资料性工具书，也是了解学术动态的基本工具书。每年出版一册。初由三联书店出版，林言椒、王庆成、叶青谷等负责编辑。1982 年后改由中国史学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李侃任主编，林言椒任副主编。主要反映中国大陆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和活动情况，包括一年中史学理论、专题史、各断代史、国别史的研究情况介绍，历史著作、资料书出版的评论，各种专题的学术讨论会、中外学术交流、考古文物发现的消息，历史新书书目和报刊历史论文目录，以及现代已故史学家传记和其他资料附录等等，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兼备，出版后颇受海内外史学界人士重视。每册八十至一百万字，分精装和平装两种版本。

黎澍在《中国历史学年鉴》创刊号发表《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

文章对思想解放高潮中历史学理论上的诸多突破作了评述。作者认为，一九七九年历史学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摆脱了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逐步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历史学开始摈弃片面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以及那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方法，实事求是的学风逐渐得到发扬。文章特别指出历史学界在阶级观点再认识、历史发展动力、农民革命评价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作者认为，一九七九年历史学所取得的进展和收获，还表现在学术空气渐见活跃，科学研究中的创造精神进一步得到发扬。

萧艾《甲骨文史话》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本书侧重掌故分析，从多个方面叙述了甲骨文研究成果，并对从事甲骨学专门研究之学者及甲骨学一般知识进行评介。书末附甲骨文研究论著要目与大事年表。

郑天挺《探微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应中华书局之约，把作者多年的一些论文汇为一集出版。该书是以《清史探微》为基础，加上其他有关清史著述，合计四十三篇。

该书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治学之道，即选题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小题目联系大的历史问题，以实证释疑求真即探微。所收论文充分反映了作者在史料学、校勘学、历史地理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方面的精湛功力，多为传世之作。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一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两册，叙述了上起满族先世兴起、强大、入关，下迄1840年鸦片战争这一历史时期清朝的历史。该书论述系统而全面，对某些史学界争议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第2集于1982年2月出版。该书为纪念陈垣诞辰100周年而编。收录了作者已刊和未刊单篇论文、札记、序跋等129篇。收有研究天主教、回教、佛教等世界性宗教在中国传播情况的多篇论文，其中尤以对敦煌摩尼教残经的整理研究为学界所重视。

张泽咸、朱大渭编《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共2册，取材以正史为主，旁及金石、类书、别史、地理、佛道

经典、小说、笔记、文集等。主要汇辑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农民战争、少数民族反封建统治的战争资料，按朝代分条编排。

路遥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由齐鲁书社出版。

该书收录了1960年至1980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三次赴山东、河北55个县调查所获部分资料。内容包括义和团的起源、义和团与民间教派等既有民间组织的关系、各地组织形式、具体活动，以及主要首领的身世、经历等。其中一批义和团运动亲历者的口述史料尤为重要。

韩连琪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周代的军赋及其演变》。

7月

5日　华岗追悼大会在济南举行。

17日　吕振羽逝世，终年80岁。

18日　中共党史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历史问题学术讨论会。

26日　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会正式成立，冯文彬任会长。

是月　庞朴著《帛书五行篇研究》由齐鲁书社出版。

本书为作者研究帛书《五行篇》所撰三篇文章的汇编。作者认为，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甲本卷后所附佚书之第一篇和第四篇为思孟学派佚著，它的发现，解答了久讼不已的思孟五行说问题，是学术史上一件大事。通过对佚书之一的细密考证，作者提出：思孟五行说，既不是五行水火木金土，也不是五常仁义礼智信，而是仁义礼智圣。由此，在《孟子》书中找到了五行的证据。这一结论使学界对五行说的认识产生一个飞跃。

该书出版后对帛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后作者又根据郭店楚简材料对该书进行增改，写成《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由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于2000年6月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上）由中华书局出版。

下册于12月出版。该书收录了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的全部居延汉简图片，共计图版475版；下册为图版释文及附录附表。居延汉简是汉代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的各种文书档案，记录了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情况，该书的出版，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第一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四卷，第一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第二卷“中国同盟会”，第三卷“1911 年的大起义”，第四卷“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第二卷 1985 年出版，第三、四卷 1991 年出版。

本书主要着眼点是考察“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它的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的全过程是怎样的”，作者“并不企图把它写成这个时期的中国通史”，而是非常注重具体事实的叙述，对一些重大事件还作了一些细节的描写，并进行适当的评论。该书以丰富的史料揭示了从甲午战争失败到辛亥革命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全过程，为读者展示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有评论认为：“《辛亥革命史稿》在近代史研究者心目中，与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的建立》并称为现今关于这段历史的三部巨著。在这三部书中，《史稿》不仅出自一手，表现出体例、语言、观点上的前后一致，而且在内容发掘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也大有跃居首位之势。”“应当认为《史稿》是代表了我国现今对辛亥革命史研究最高水平的一部佳作。”

金景芳等在《吉林大学学报》第 4 期发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年谱》由中华书局出版。

8 月

5 日　南开大学主办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

这是 1949 年后我国召开的第一次明清史学术讨论会，来自国内和日、美、澳、瑞士、德、香港等 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 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 92 篇。其中明清时期的政治是会议的重要议题。

6 日　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在青岛成立，熊伟任会长，朱忠武、刘明翰、丁建弘任副会长。

10 日　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 15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家第一次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夏鼐为团长。中国代表团向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提出入会申请，获得

批准。

18 日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吉林省安图县举行。

朴文一任会长，冯鸿志、刘永智、黄龙国、顾铭学任副会长。研究会出版会刊《朝鲜史通讯》。

是月　王永兴编《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茅家琦等著《太平天国兴亡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 15 讲，叙述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缘由及军事斗争，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也多有论述，对太平天国发生、发展直至覆亡的全过程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见解。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开始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

全书共十辑，约 400 万字，由卢文迪、陈泽宪、彭家礼等编选，至 1985 年全部出齐。所收史料包括中国官方的文书选辑，英美等国政府方面的文件选译，中外学者关于华工方面较有权威性的综合性著作，关于各地区（东南亚、拉丁美洲、美国、加拿大、大洋洲、非洲、欧洲）华工的著作和资料等，内容涉及华工出国的历史背景、出国方式、清朝政府对华工的政策、华工的遭遇及反抗、华工对当地社会的贡献等方面。本书取材广泛，不仅有中外官方文件、中外专著，还有根据调查所写的研究报告和亲眼目睹所记录的资料，以及当时国内外报刊所载的有关论文或评论，其中不少资料都是首次刊行或国内难以看到。该书的出版，为研究华工及中国近代经济史、世界近代经济史、中外关系史及移民史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创刊号出版。

该刊是根据 1979 年成都全国史学规划会议决定创办的，是供发表稀见的、重要的清代（鸦片战争前）史料的专刊。

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作者就开始运用统计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1935 年完成了《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专题研究，为同行所赞誉。同时开始从我国史书、政书、方志、文集、笔记、档案中收集整理历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资料，编制有关表格，抗战期间亦未中辍。1956 年，为响应中共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作者在原有工作基础上，提出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计划，在汤明檖的协助下于

1962年完工，书稿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因“文革”爆发，未得刊行。

本书从我国历代正史、政书、地方志、文集以及近人所编的有关统计资料中，搜集、汇编了两汉到清末2100多年间的户口、田地和田赋的统计数字，是我国历史上有关这一时期经济的第一部大型统计资料。全书共76万字，分“总序”、“正编”、“附编”、“别编”和“附录”5部分。“总序”详细地阐述了我国历代户籍、地籍和赋税册的编制和演变过程，说明历代王朝编制各种册籍的目的和方法；介绍了我国历史上进行人口、土地调查的特点；“正编”中的甲编综述历代户口、田地总况和历史户口在地域上的分布；乙编汇集唐代至清代的田地、田赋概况及各分区的田地、田赋统计资料。“附编”则选择出几个南宋至清末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占重要地位的府，作成分县户口统计。为便于同正编配合使用和相互参考，别编刊载表格和说明20份，对西晋到清一些较重要或较复杂的土地赋税制度进行概括和介绍。“附录”包括中国历代度量衡的变迁情况和引用的书籍、论文目录。本书共有215种统计表格，材料翔实，考据精审，对中国历代社会经济，尤其是人口、田地、田赋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大量的可靠数据，并且通过考订、注解和说明，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因此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础性巨著”，是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经济史的必备工具书和参考书。

该书出版后，获得经济学界、历史学界高度评价，甫一面世，便销售一空。1984年6月5日杨联陞致梁方仲之子梁承邺函称：“此书可见其严谨而观其大，‘眼光上下五千年’。同行用历代传下来的资料，非经过此书不可。明清方志、档案等可能有资料修正，不过以全书而论，寿命应不下于《通考》。换句话说，数百年后还有人要参考的。”

由于“文革”中作者受迫害而死，工作未及做完，各朝代田地、田赋统计的度量衡单位未能换算成现行的统一的度量衡单位，因此读者阅读略有不便。有些地方的说明和分析也偏重于史料的论证，缺乏理论概括与分析。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是《北周六典》的姊妹篇，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也是弥补空白的之作。作者收集了地志、史书、碑志中的有关资料，将北周的疆域情况基本考证复原。全书资料丰富，考订精细，展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良工不示人以璞”的学风。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

该套丛书专收 1840 至 1911 年间中国人到欧美日本通商、留学、出使、游历和考察等所留下的日记、笔记和游记，先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出版，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被学界誉为古籍整理的典范。湖南人民出版社原计划出版 60 种，实际出版了 27 种共 20 册，出版年限为 1980 年至 1983 年；岳麓书社出版了 38 种共 10 册，其中 7 种未列入湖南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年限为 1985 年至 1986 年。

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本书所收 10 篇论文，皆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仅《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典型实例》一文的写作，就经过了四次的实地调查。《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发表后受到各方重视，文中所提证据，皆比较牢固。《论“十二兽”历法起源于原始图腾崇拜》一文，认为我国的十二兽历法系我原始先民的独立创造，并非由外国传入。《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认为葫芦象征母体，因此葫芦崇拜就是母体崇拜。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一、二册）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比较详尽的新疆史，叙述了从石器时代开始，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新疆的历史变迁。书中还附了一些图片和大事年表。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 1 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凡 4 册，1989 年出齐。

9 月

16 日　河北省历史学会首届年会讨论农民战争问题。

21 日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在成都举行。

全国 206 名代表参加，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和香港地区的九位汉学家应邀出席。主要讨论了如何科学地考释古文字，甲骨文卜辞分期，甲骨的辨伪，金文的读法，铜器的辨伪，以及战国秦汉文字的解释等问题。

22 日　山东历史学会在泰安举行年会，讨论义和团运动性质和作用问题。

是月　全国第一次碳十四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成立了隶属于中

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的碳十四年代学专业小组。

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1卷（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最早出版的道教史研究著作，主要论述了道教的起源和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作者此后又主编出版了《中国道教史》（4卷）等著作。

孔经纬《中国经济史问题论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晗《明史简述》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是吴晗1962年11月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的记录稿，以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明史当中“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七大问题，包括明太祖的建国、明成祖迁都北京、北“虏”南侵、东林党之争、建州女真、郑和下西洋和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扼要介绍了明朝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包含了作者许多研究成果和独到见解，是一部“在叙事中寓论断，在普及中有提高”的佳作。

孙达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第1卷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坚持六十年代以来在农民战争讨论中形成的观点，坚持认为农民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定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之于生产力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看法。在作者看来，所谓让步政策也不能解释经济的发展。中国后来的落后，完全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果。农民战争的作用表现在，每一场农民战争都严重地打击了原有的地主阶级，导致大量农民摆脱了王朝的控制，他们没有赋税和徭役负担，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使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经济和历史的发展，比如南方的大开发等。只有农民被王朝重新控制了，生产的发展才会受到阻碍。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出版。

该刊由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辑，不定期出版。本集收文三十余篇，张舜徽的《关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问题》是篇引论性质的文章，概述了中国历史上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成绩，并提出了历史文献工作的两大任务：一是改造二十四史，即订正旧本和写定新本，撰述新注和改作新史；二是整理、研究地方志书。《观堂书札》是王国维与罗振玉谈论文字学、音韵学、历史学等的信件，顾颉刚、刘起釪的《〈尚书·西伯戡黎〉校释译论》对《西伯戡黎》进行了校释、今译，并讨论了黎的地点、西伯是谁和本篇写作背景等问题。

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0 年，黎澍针对当时历史研究中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空洞议论多，扎实研究少，只讲阶级斗争，忽视历史态度，将古代农民战争现代化等偏向，接受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提出的编一本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的书，以便让大家了解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的建议，组织人员选编马恩列斯关于历史科学的论述，汇集成书。1961 年初版时，书名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963 年曾修订再版。1973 年改为现名，印过征求意见稿。1979 年又在过去几个版本基础上作了较大调整，并按最新版本校正了译文，于 1980 年 9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参加本书选编工作的主要有丁守和、丛翰香、杨余练、沈元、王忍之、蒋大椿等人。

《辛亥革命史丛刊》创刊。

故宫清代服装展览在美国纽约等城市举行。

至 10 月结束，观众达 10 万人次。

10 月

6 日　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邓广铭当选为会长。

11 日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在北京成立，钱临照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18 日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行关于封建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

与会学者认为，君主专制主义是封建主义的政治核心，并分析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运用中国和欧洲对比的方法探讨了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从科举制度和封建文化两个方面探讨了封建社会的弊端。

全国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韩儒林当选为会长。

全国 60 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主要讨论了元朝的政治和制度、元朝的经济、元代农民起义、元代史料研究等问题。

21 日　全国地方史研究讨论会在天津举行。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地方史座谈会，着重交流

讨论了各省市编纂地方志、编写地方史的情况和设想，拟订了《县志编纂条例草案》。

23日　唐史研究会成立会暨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推举唐长孺为会长。

26日　“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这是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两国史学家进行的第一次大型学术交流活动。参加讨论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是严中平，副团长是邓广铭、王毓铨。成员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等科研单位的学者17人。美国代表团团长是费维恺，副团长是施坚雅，成员有艾维四、张富美、邓尔麟等。

讨论分九个专题进行：（1）农村的社会和政治结构；（2）民间文化生活；（3）人口与都市化；（4）农业经济与土地所有制；（5）政府与经济的关系；（6）区域贸易范围和社会经济发展；（7）皇朝体制下享有特殊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的集团；（8）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9）货币与对外贸易。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还有中国学者杨向奎、陈振汉、沈从文、谢国桢、林甘泉等。美方学者黄宗智、魏克曼、白彬菊、吴秀良等也列席了会议。

28日　孔子讨论会在曲阜师范学院举行。

全国10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就孔子的时代背景、阶级属性、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等方面展开讨论，并倡议成立孔子学术研究会。

是月　裘锡圭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

王思治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分歧的原因何在》。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分期的主张分歧如此之大的原因在于：一是对古史资料诠释的差异，二是对奴隶制的发生、发展，以及奴隶社会内在的运动规律和封建化过程，彼此之间理解不一致。这是同史学界对奴隶社会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的探索和研究还不充分相联系的。人们至今尚未见到一部奴隶社会的理论著作；除了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古代东方型社会”之外，就是探讨奴隶制社会理论问题的专文也不多见。因此，在许多理论问题上，彼此的认识相去甚远。

罗荣渠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略论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与终极原因的内在联系》。

针对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说，文章写道："根据中国的历史特点来看，中国的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比西方国家的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大，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在有些时期甚至起主要作用。但如果把这一特点无限夸大，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是靠农民战争推动的，那么，这就是说，在中国封建时代，政治暴力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始终单向地作用于经济运动，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在中国封建社会岂不是完全颠倒过来了吗？这不但根本不符合实际，同时也根本无法解释在这样强大而频繁的农民战争推动下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停滞性的问题。"

陈智超编《陈垣史源学杂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为作者在辅仁大学等校讲授"史源学实习"一课时指导学生治学的一些文章的集录，共30篇，主要传授了学习和研究历史必须遵循的鉴别古书版本、慎重引证资料、判断史实的方法。所选文章以对《日知录》、《鲒埼亭集》和《廿二史札记》三书作考证的范文为主，充分展现了作者博大精深的史学修养。

"史源学"是作者开创的一个史学研究新学科，主要通过对前人著述的溯源和考订，来鉴别其资料的可靠性和立论的准确性，从中总结出前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资借鉴。

"中国地方史研究会八省市筹备小组座谈会"在天津召开。

罗荣渠《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毛注青《黄兴年谱》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1949年以后第一部以"现代史"为名的中国现代史著作。

张政烺在《考古学报》第4期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

针对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些周初铜器及卜骨中出现的"奇字"，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唐兰曾发表《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一文，认为这些奇字是在甲骨金文之外另一体系的文字，它们"是用数目当作字母来组成的"，这种文字已经消亡。张氏此文力排众说，

认为这些“奇字”是用数字组成的卦画。该文使学术界探索多年的“奇字之谜”终于取得了突破，被称为石破天惊的开创之作，不容忽略的经典之作，是对唐兰相关考证的一大突破。其后，张氏又发表《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易辨》两文，继续对自己的推论进行补充。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民族史论丛》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书为作者晚年所作，为作者先秦史考证毕生成果之汇集，由顾颉刚订正作序。含《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两部分。前者于1965年动笔，次年5月完成，12月改定；后者于1967年下半年以更短的时间写出。全书采摭广博，所论多有创见。

作者自谓：《春秋左传考证》一书，将昔日考证先秦史之所获，经过别择，去芜存精，总结成一书。余思昔日所为先秦史之考证，皆发源《左传》，几无出左氏一书之范围者，乃决计为“春秋左传考证”。所考结果编为两卷。第一卷既成，举凡古史传说、西周史事、春秋大事、西周春秋之经济、政治制度及文化形态之大概，皆大致完备，并附以若干古代地理之考证，几包括春秋历史之全部。撰第二卷前，则先搜集史料，重阅金文、易、书、诗、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仪礼、周礼、二戴礼记、孝经、逸周书、战国策、古本竹书纪年、世本、论语、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孙子、楚辞、春秋战国异辞等书，摘出有关史料，为春秋史料集五册。又云：余既为《春秋左传考证》，觉尚伤于繁富，其中尚多属常识，本无烦考证者。因为此札记，简括考证《春秋左传》中太古传说、西周史事及春秋史事，只取本人心得，其属常识范围者，概从简略。本书为总结本人六十岁以前全部之先秦史考证性研究。包括本人过去所研究古史传说之全部、西周春秋史之全部。

顾颉刚序中以古史专家的身份对弟子的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褒奖有加，认为这部书是作者生平研究古史的一个总结，像作者这样从古史传说到西周春秋史事做出系统全面的考证过去还不曾有过。正可谓“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顾序还认为，这部著已经冲破了旧式考证学的樊篱，较之作者旧著《春秋史》可以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小屯南地甲骨》上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下册一、二、三分册于1983年出版。此书收录了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共编为4612号。所收甲骨按出土单位著录，为研究者提供了

一批可与地层及有关遗物互相联系的科学资料。该书还把能看出钻凿形态的甲骨作了统计，并作了划分类型的整理，对钻凿甲骨进行墨拓或画图，集中发表在下册三分册中，为研究甲骨整治和考察钻凿形态提供了宝贵资料。该书所录甲骨，与出土层位、钻凿形态、释文及各项索引浑然一体，为不同需要和从不同角度查找资料提供了极大便利，被认为“是科学发掘所得甲骨的一部最科学的著录书”。

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49—1979）》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了 1949 到 1979 年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刊资料。第一部分是报刊论文资料索引；第二部分是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第三部分是书目，收录 1200 余种专著，按“总类”、“分类”编排。“总类”下再分通论、政治、经济、中外关系、文化、人物与著作等类；“分类”下再分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类目。

张维华在《文史哲》第 5 期发表《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1 月

4 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安徽和县龙潭洞发现直立人阶段进步类型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命名为“和县人”。

12 日　北京学术理论界举行陈垣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

14 日　义和团运动 8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山东大学举行。

国内学者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美国学者约 200 余人参加，讨论了义和团的源流，义和团的起因，义和团是否反封建，怎样看待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义和团运动与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关系等问题。

会上还成立了中国义和团史学研究会，丁名楠任会长，徐绪典任副会长。

黎澍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率先提出“西体中用”说。黎澍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有勇气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流行的观念颠倒过来，改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才可以摆脱长期烦扰我们的糊涂和错乱的观念，获得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西学。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承认西学为体。首先，学

习马克思主义必须西学为体，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根据；如果中学为体，读四书五经，那就不是学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也必须以西学为体，否则不是现代化。”这一报告引发强烈反应。据王学典对会议现场的回忆：黎先生的这个报告可能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心理上、精神上所能有的承受力度，他的发言尚未结束，会议上就已经是摇头者一片了。黎澍未等会议结束就中途匆匆返京。在济南，就好像接到了北京方面打来的批评电话。他的主题报告本确定在1981年第1期《文史哲》头条刊出，返京不久，他就给来了一封加急电报，让把那篇文章撤下来。义和团研究会、山东大学历史系编辑的《义和团研究会会刊——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专辑》摘要刊登了许多人的发言，唯独没有黎澍先生的发言，甚至在会议综述上也未提及黎澍先生的讲话。专辑是1980年12月30日编定的，可见那时对他的发言就已经开始封杀了。事实上，早在黎澍决定来济南参加义和团讨论会时（1980年夏），山东这边就已经在作应付他的准备了。因为他对义和团运动的看法众所周知，据说应付的措施之一，是当时的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义和团讨论会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亲自动员孙祚民先生撰写批判王致中的文章，王致中否定义和团的文章得到黎澍的欣赏和支持刊发在《历史研究》上，孙先生果然向大会印发了这篇文章。所以，大会后来对他的“封杀”行动绝非偶然。

1989年，黎澍将此报告以《中西文化问题》为题发表在《历史研究》第3期上，并在文前交代：“据说在当时与会者中引起过强烈的反应。什么样的强烈的反应？是赞成还是反对？说者笑而不答。我想，大概是遭到强烈的反对了。反对什么？我判断可能是因为这个发言提出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使一些人误会为主张‘全盘西化’，感到难以接受。于是我想，大概是说得不周全或者是完全错了，再想想看。一搁多年，经过反复的思索和观察，我依然认为我是对的，决定略作修改和补充，公开发表这个发言稿，请大家来研究这个问题。我希望弄清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近代中国到底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17日　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在武汉市举行，中心议题是楚文化研究。

26日　第三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呼吁重视抢救文史资料，特别对许多健在的老人，要抓紧时间把他们的活材料整理和记录下来，为近现代史提供珍贵的研究材料。

是月　邓广铭在《中国史研究》第4期发表《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

文章介绍了北宋政权赋予募兵制度的种种妙用，认为募兵制度是北宋王朝积弱积贫的重要原因，并深入论证了募兵制度对于北宋农业生产的消极影响。

贾兰坡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周谷城《史学与美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共收文 16 篇，前 7 篇是研究历史问题的，属于史学范围。后 9 篇是对史学与美学等问题的探讨，属于美学范围，所选文章都散见于报纸杂志。

孟祥才《梁启超传》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梁启超长篇传记，详尽描述梁启超在推进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尤其是社会和思想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等方面所做的贡献。1990 年由台湾风云时代公司重印该书，称赞该书是“对梁启超一生所作最完整而翔实的评传”。

杨诗浩、韩荣芳编《国外出版中国近现代史书目（1949—1978）》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 1949—1978 年国外和香港地区出版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外文著作和资料约 3500 种，分西文（含英、法、德、意、匈、捷、瑞等语种）、俄文、日文三部分。每部分基本上分八大类：一、总论，通史；二、政治；三、军事；四、经济；五、文化；六、外交；七、传记、回忆录；八、史料集。每条书目著录书名、著译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页数或卷数、作者和书名原文。书后附录有四种：一、东方问题论著书目（俄文）；二、文集、全集书目（日文）；三、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概况；四、国外出版有关中国近现代史工具书简介。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中国通史著作，上起远古，下迄五四运动前夕，不到 30 万字，提纲挈领地叙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论者认为，独特的体系、明晰的轮廓、清楚的线索等是此书所长。书中对每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作综合叙述，并力求讲清中国历史中的重点、难点和特点，其通俗性与科学性兼备的撰述风格，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累计印刷 30 余版，逾百万册。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英、日、西班牙、德、法、罗马尼亚等七八种外文版。

该书为白氏日后主持编纂《中国通史》巨著积累了经验。

王思治《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他》由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古史分期问题，主要论证汉代是奴隶社会的观点。第二部分是有关清史的专题研究。

孟世凯《殷墟甲骨文简述》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丁守和《中国现代史论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2月

1日　古人类学家吴汝康率领的发掘队在云南省禄丰县石灰坝发现了800万年前腊玛古猿完整的头骨化石。

其意义可以和1929年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相比，为研究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

9日　天津史学会召开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

福建省历史学会福州分会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在福州举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学术讨论会。

16日　洋务运动问题讨论会在长春举行。

这是1949年后关于洋务运动问题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全国专家、学者90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主要讨论了洋务运动的阶级基础、性质和作用、演变和分期、历史地位、洋务运动的结局等问题。

25日　顾颉刚逝世，终年88岁。

是月　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田氏为郭沫若之后持战国封建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该书共收入13篇论文，对亚细亚社会形态、中国古代的氏族和部落、中国奴隶制国家形成、我国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国奴隶制形态、中国古代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断限、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期间的社会变革、中国古代奴隶制向封建制的革命转变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所论多为我国奴隶社会研究有代表性的看法。

吴天墀《西夏史稿》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对西夏兴起和灭亡的历史作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论述，着重于西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西夏的社会形态、经济状况、军政制度、文化和风俗等方面都有研究。

《中国哲学史研究》(季刊)创刊，辛冠洁任主编。

刘昶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发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

期延续的原因》。

该文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归结为农民起义。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都严重地打断了封建化进程，葬送了封建化已取得的成果，使社会重新退回到封建化的起点上去。因此，从长远的历史发展观点来看，农民战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农民战争事实上是专制制度借以摆脱王朝危机、实现改朝换代的工具，是专制制度对抗封建化的一种特殊机制，专制制度通过这一机制不断地再生重建，顽强地横亘在封建化变革的道路上，阻碍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作者以西欧封建社会为模式，提出封建化的标志是农民农奴化、土地庄园化和政治多元化。这在西欧只经历了一次变更，而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不断地反复重演封建化的种种场面，却始终没有完成封建化。而且，外部游牧民族不断侵略所造成的外部压力的挑战，激起了中原人民的仇恨和应战，而为了有效地抵御这种入侵，整个社会就必须统一起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抵制封建化的正常进程，并保持长期统一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中国封建社会陷入六道轮回、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周期性的治乱兴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特点和特殊运动方式，而中国封建社会就在这种循环轮回中延续下来。

刘文发表后，引起热烈讨论，王守稼、汪征鲁、刘修明、宋杰、李大生、白钢等纷纷撰文，从不同角度与刘文商榷。从而在史学界引起一场规模大时间长的学术讨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一直是这一时期史学讨论的热点问题，据统计，1978 年至 1982 年间有关这一主题的论著总数在 180 篇左右，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十一个论题：关于农民战争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是否完成封建化的问题；关于外部游牧民族的侵扰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陷入“治乱交替、循环轮回”而没有出路的问题；关于地理条件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关于小农经济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关于地主经济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关于封建经济结构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关于应用系统论、控制论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长期停滞原因的问题；关于封建专制主义与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关于封建意识形态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问题。

《历史研究》1981 年第 2 期破例转载该文。

陈梦家《汉简缀述》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被划为“右派”后，由于夏鼐的关照，得以借调到甘肃整理新出

土的“武威汉简”，从此开始汉简研究。

该书被称为简牍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巨著，将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应用于简牍研究，是本书的最大特色，尤其是与考古学的结合，标志着简牍学科的正式形成。

何兆武、步近智、唐宇元、孙开太编著《中国思想发展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先秦到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思想史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作者在思想史的写法上进行了新尝试，除论述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而外，还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科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以及农民革命思想作了简要系统的阐述，以体现中国几千年来思想、文化的丰富性。有英文版、阿拉伯文版行世。

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为弥补西周封建说在理论阐述和文献解释方面不完善之处，作者另辟蹊径，钩沉发微，从土地所有制与劳动者身份、典章制度以及意识形态诸方面全面考察周代社会性质，得出周代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结论，使西周封建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形成了较大突破与创新。书末附录作者所撰古史分期焦点问题的考析文章八篇。

《文史哲》第6期发表童书业遗稿《庄子思想研究》。

次年第1期连载。

是年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所魏斐德教授率美国中国明清访问团访问中国，了解变革后中国历史学的走向。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黄宗智来华访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学等单位做学术演讲，介绍美国中国学发展情况。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考古与文物》创刊。

该刊是考古学学术性和知识性刊物，始为季刊，1982年改为双月刊。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主办《敦煌学辑刊》创刊。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创刊。

该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不定期出版。“编者的话”云：该刊“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

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1995 年终刊，15 年间共出版 27 辑，发表 400 余篇近 800 万字的译作。内容既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英、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成为学术界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发掘广汉县三星堆遗址，确定该地为古蜀国早期都城遗址。

迄 1989 年完成。